白城文史资料

伪满时期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白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白城文史资料

第一辑
（伪满时期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吉林省白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主　审：张　洪
主　编：刘庆余
副主编：靡　方　李春棠
编　辑：杨学志　郑连宇　潘永华

《白城文史资料》第1辑
白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32开　11.8印张　180千字
1999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200册

主　审：张　洪
主　编：刘庆余
副主编：廉　方　李春棠
编　辑：杨学志　郑连宇　潘永华

《白城文史资料》第1辑
白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大32开　11.8印张　180千字
1999年12月第一版
印数：1200册

勿忘國恥
昭諭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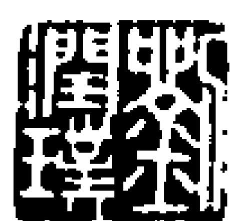
王憲林於己卯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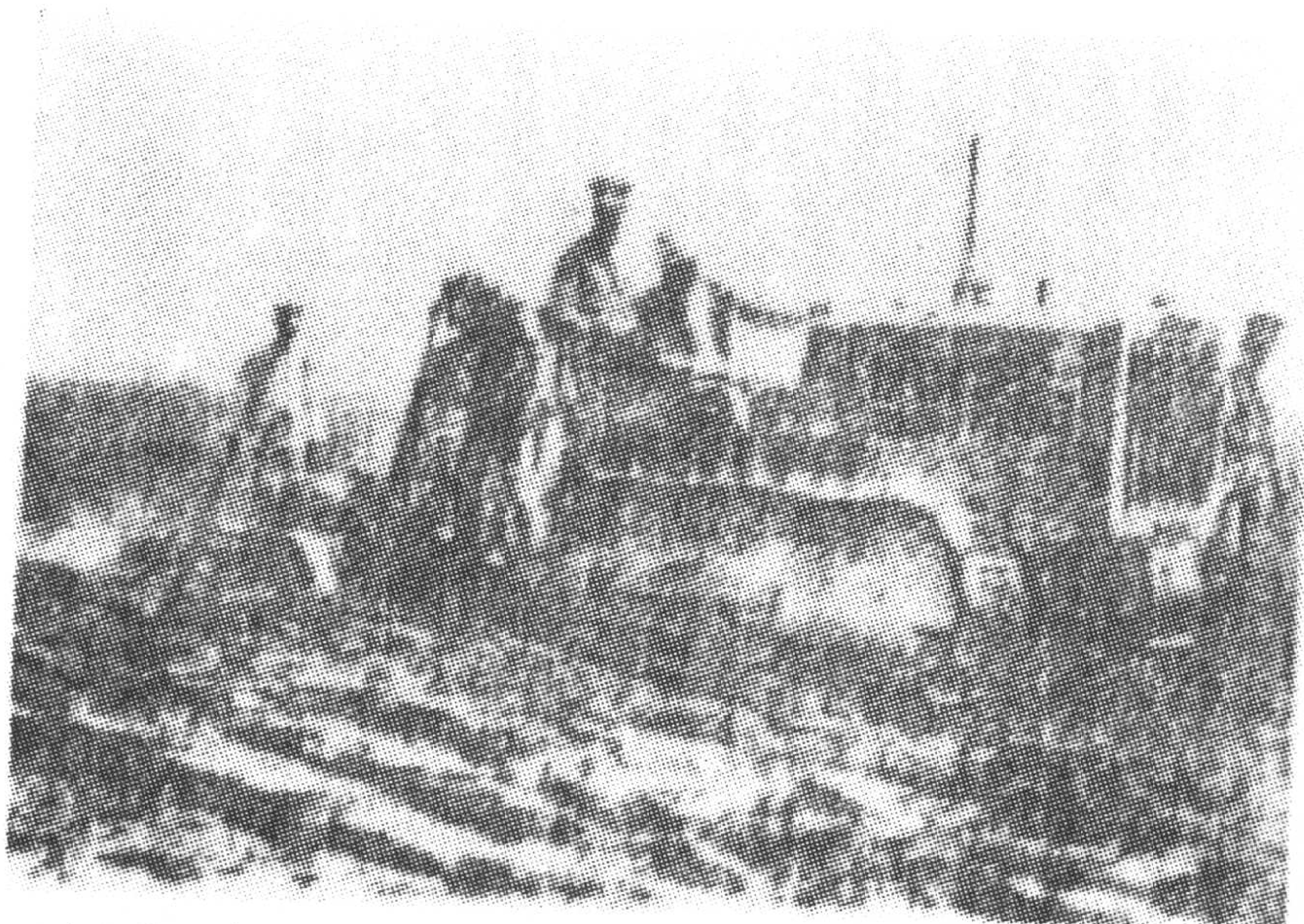
中共白城市委书记　王宪林题词

白城市市长 刘润璞题词

扬民族正气
振中华国威

劉潤璞
九九.十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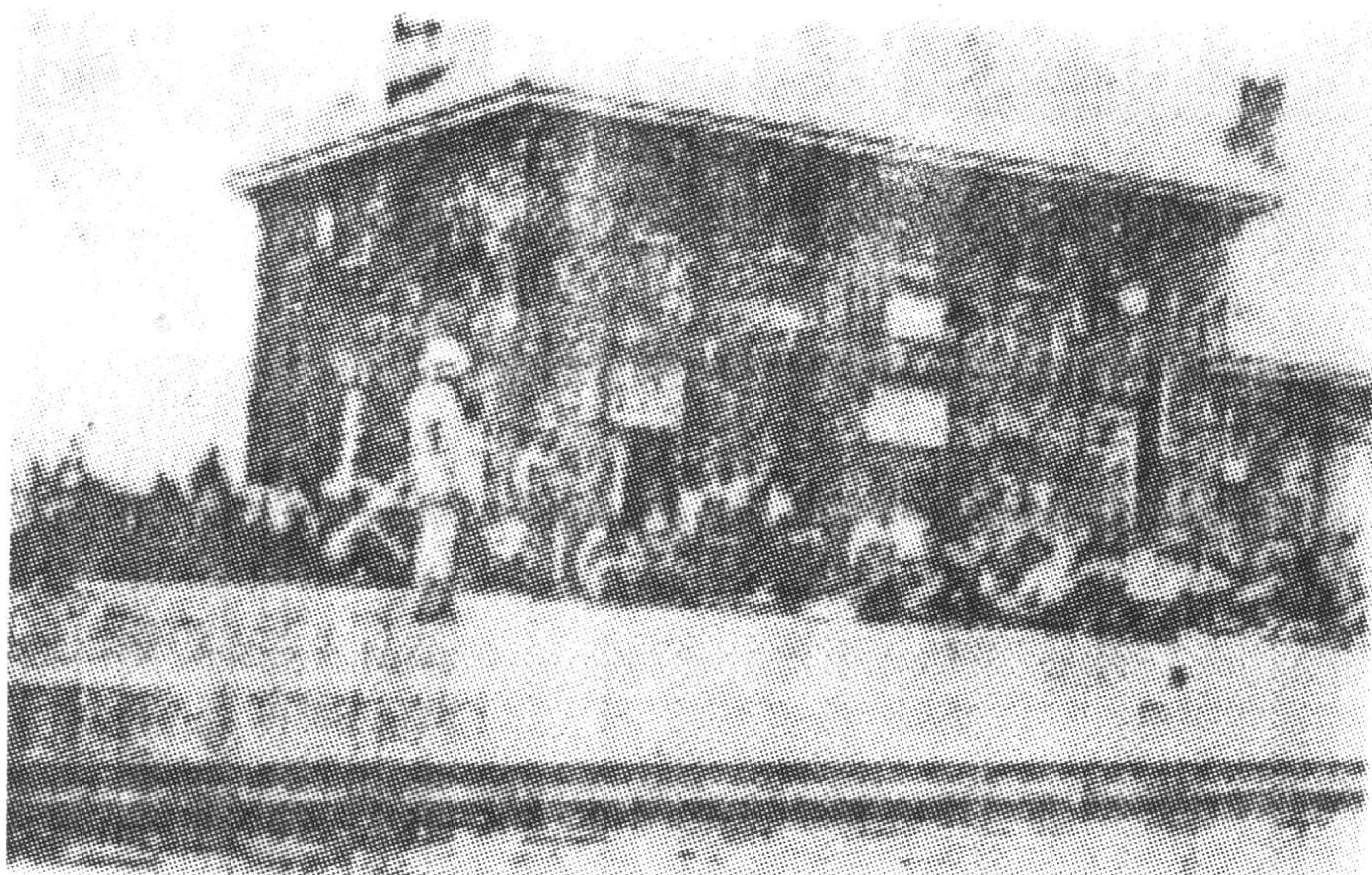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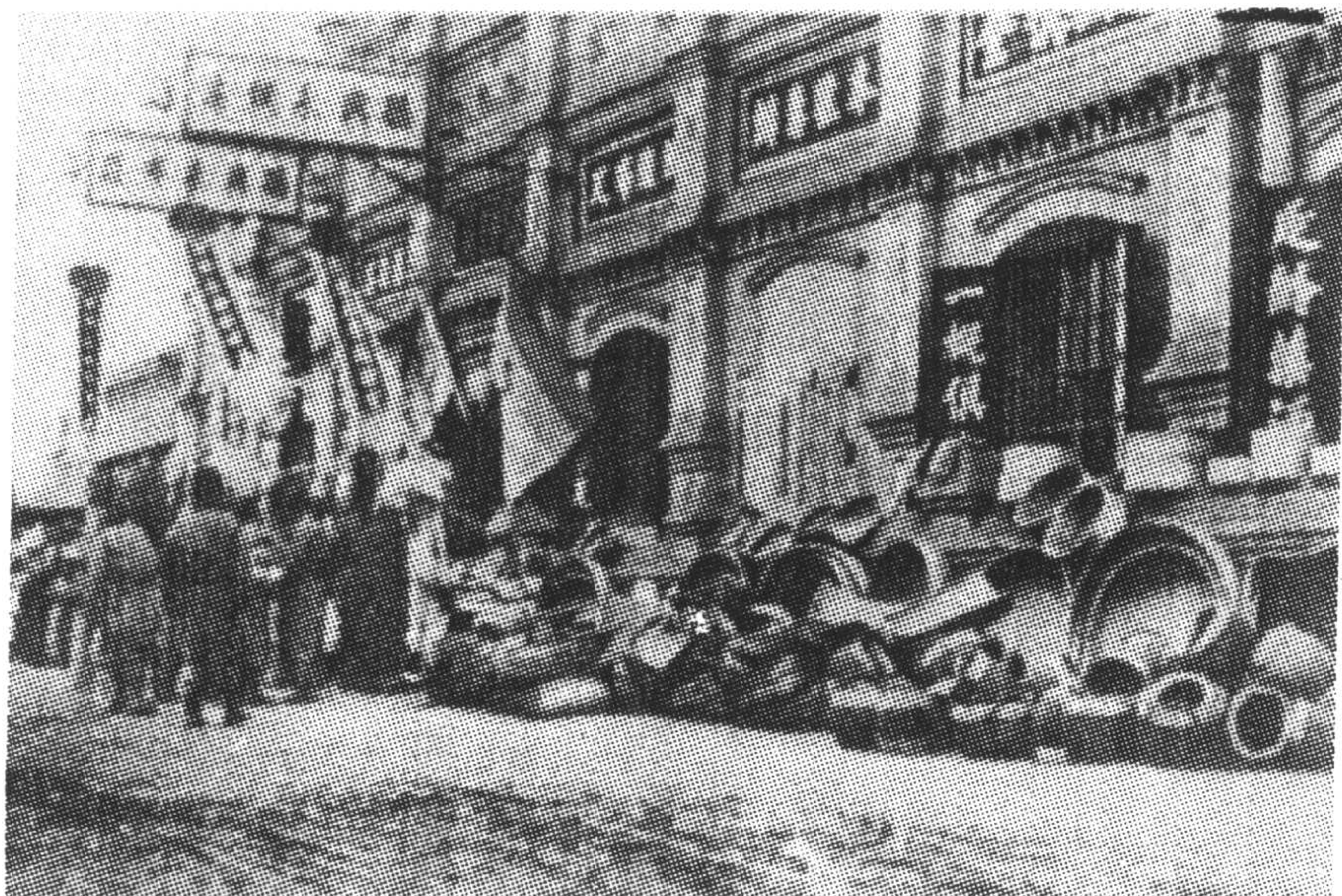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兴安屯垦军在白城子垦荒情形 （白城市洮北区档案局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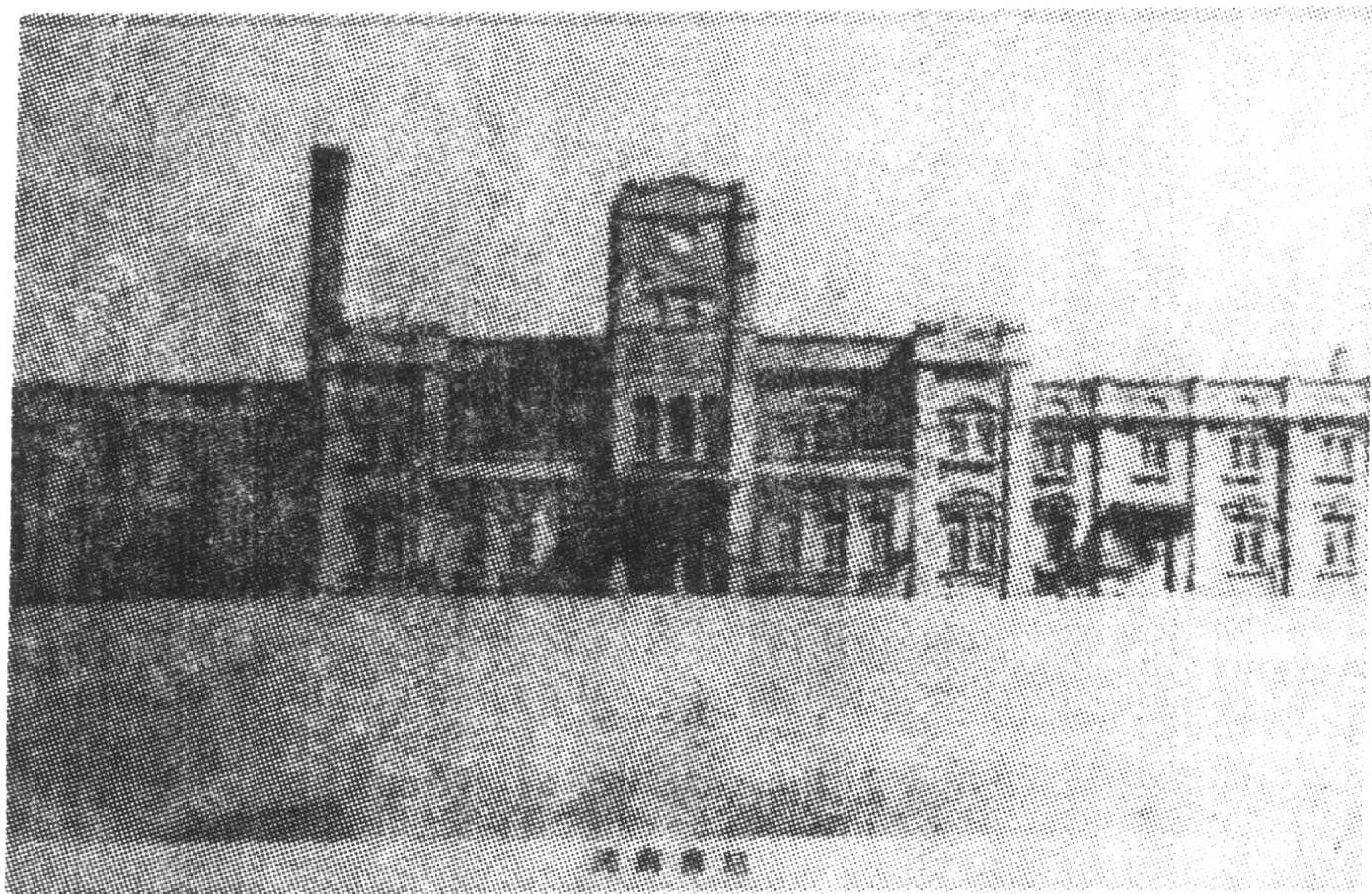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白城子的商业街 （白城市洮北区档案局供稿）



伪满时期白城子火车站　(白城市洮北区档案局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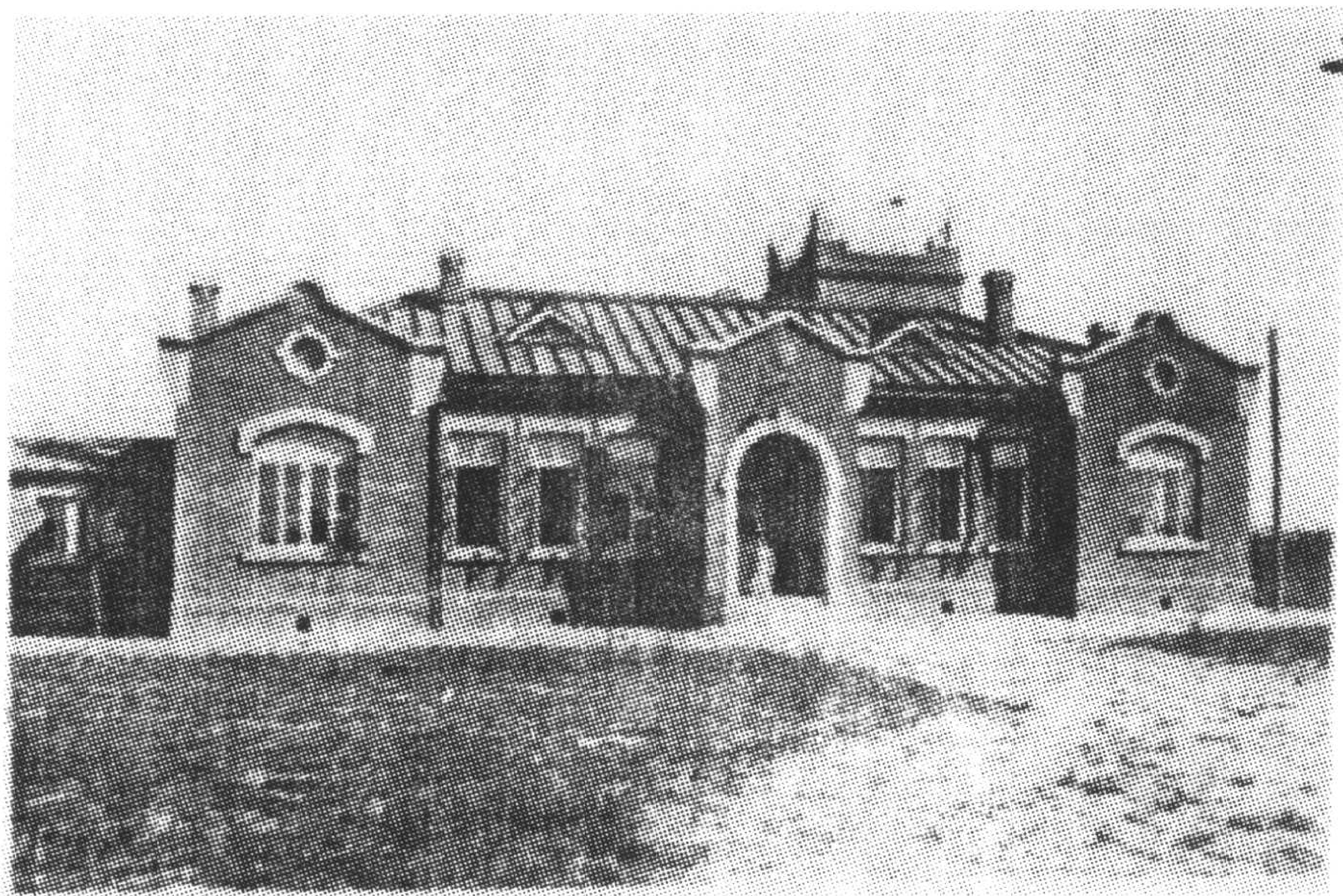
伪满时期的洮南百货店　(洮南市档案局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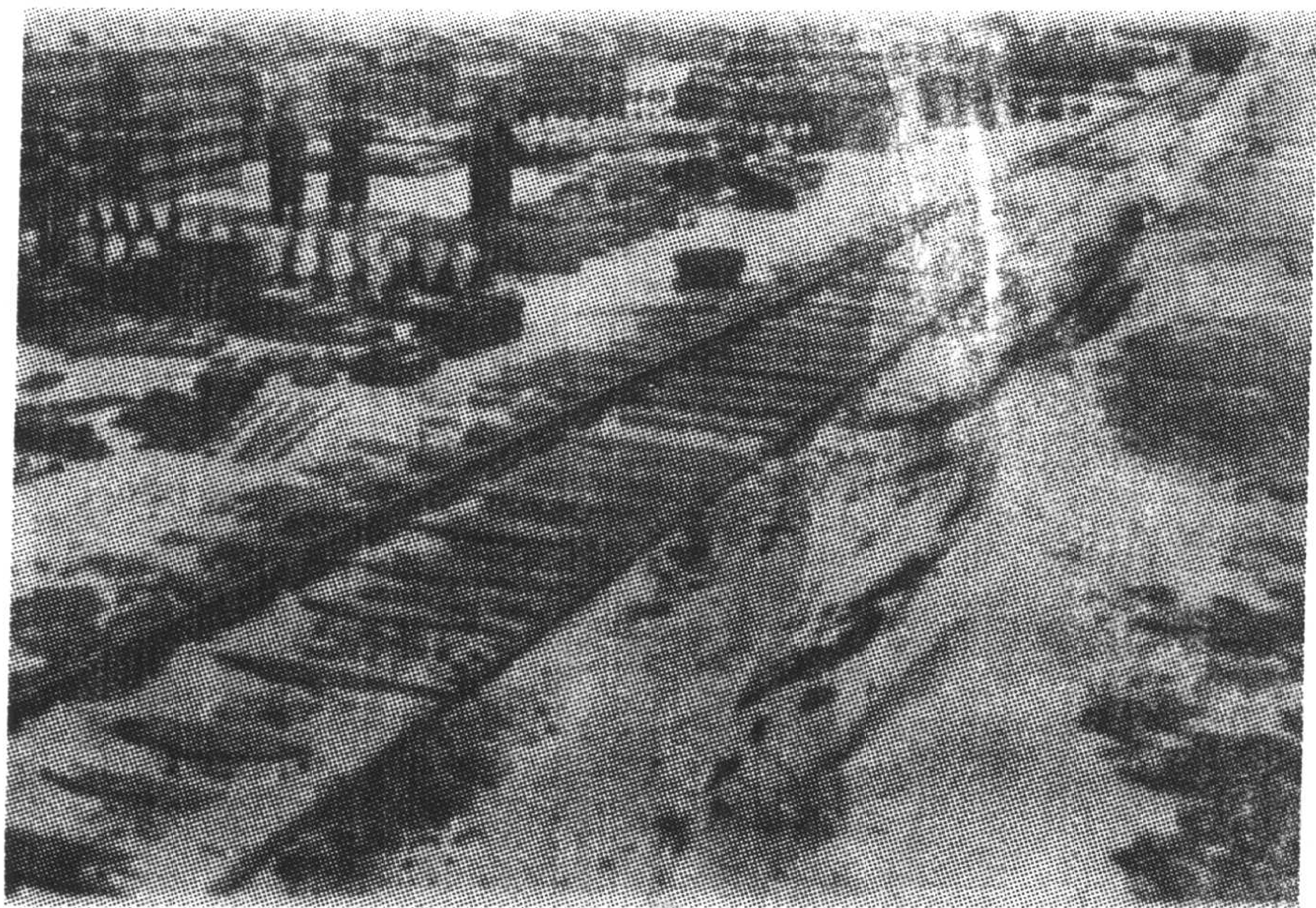
伪满时期洮南南站 （洮南市档案局供稿）



伪满时期洮南吴俊生楼 （洮南市档案局供稿）



伪满时期洮南铁路公所　（洮南市档案局供稿）



伪满时期洮南铁路材料广场　（洮南市档案局供稿）

前　言

白城市政协副主席　　马传海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至今已68年了。值此，白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了《白城文史资料伪满时期专辑》一书。书中所收录的史料，大多是亲身经历过伪满时期的人们对苦难生活的忆述。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下，白城人民倍受蹂躏，经受苦难，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下，全国各界民众、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高举爱国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奋起抗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一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会使我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激励我们在新的形势下，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

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全力以赴，奋发图强，为振兴中华，实现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汇编此书，旨在“存史、资政、团结、育人”，使广大读者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尤其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十分必要。本书是从各县（市、区）政协文史委和市直文史部门选送的80余份稿件中，经过认真筛选，反复修改，核定、审定，选取48篇汇编而成的。全体编委勇于克服困难，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存真求实，其热爱文史，献身文史工作的精神可敬可赞，令人钦佩。此外，本书为了存真、求精，对部分来稿作了一些删简和割舍，还请各单位及作者加以谅解。由于时间紧迫，编审仓促，编者虽尽心竭力，但疏漏错讹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征稿启事

征集、出版以富有时代特征的崭新史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文史工作者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的中心任务。为开创我市文史资料研究出版工作的新局面，本委已编印了《征集〈东北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史料〉的提纲（1945．8——1976．10）》，我们将按提纲要求，广泛征集、研究、出版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文史资料。望各界人士、社会贤达，特别是阅历丰富、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本着“亲历、亲见、亲闻”的原则，积极撰稿，以存史资政，昭喻后人。

一、征稿时限和范围

征稿时限：上限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下限为1976年10月，即“文化大革命”结束。

二、征稿范围及内容

1、我市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工商、民族、华侨、宗教等各方面史料，以及地方风物、社会风俗等史料。

2、我市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重要活动，以及反映上述事件、人物活动情况的原始资料，如文物、电函、会议记录、日记、手稿、图片、照片等。

三、撰稿要求

1、稿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忠于史实，不歪曲、不溢美，力求做到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知识性和可读性有机的统一。

2、来稿不限题材、不拘观点，要翔实、具体、有血有肉，文字、图片兼收。

3、稿件请用方格稿纸抄写清楚，并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等，以便联系。

四、来稿处理

1、凡来稿本会有权删改，若不愿改动，请预先注明。

2、来稿一经采用出版，酌付稿酬，并赠本刊一本。

3、未采用稿件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白城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9年10月

政协白城市第二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刘庆余

副主任：廉　方（兼）

成　员：刘金泰

王振华

杨学志

潘永华

李淑芹

王焕芝

白丽娟

目　录

封面照片说明：

曾任安泰镇守使的万福麟的宅院旧址，伪满时期日本守备队占驻。

伪满时期的白城地区

白城市政协文史委

白城地区沦陷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实行不抵抗政策，十几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将祖国的大好河山垂手相让，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内，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沦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时，白城地区各县分别隶属于辽宁和黑龙江省直辖，洮南、开通、瞻榆、镇东、安广等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赉县隶属于黑龙江省。日本为了达到侵略目的，不停地在东北制造事端，寻衅入侵。1931年5月，日本参谋部的现役大尉中村震太郎，伪装成农业专家，与一日本上士井杉延太郎、一名俄罗斯人和一名蒙古人，擅自到白城地区搞间谍活动。这里当时是兴安屯垦军的军事禁区，张学良的部下、炮兵司令官邹作华任兴安屯垦军督办。下设三个团，屯垦区域划分洮南、洮安、镇东、安广、大

赉、突泉、索伦、泰来、景星等地。中村等人在白城子北被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抓获。在行囊里搜出有军用地图、测绘仪器、报告书和各种表册，表册上对屯垦军的兵力、布防、驻地、武器装备等都有详细记载。据此，关玉衡团长下令将四人秘密处死。8月17日，日本政府在隐瞒中村等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事实的前提下，公布了他们被杀死的情况。然后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提抗议，一方面大肆渲染中村事件，故意扩大事态，宣传所谓“满蒙危机”，煽动战争狂热。与此同时，日本军部、政府、议会、政党和极右团体，都利用中村事件大作文章，声张以此作为“打开满蒙问题僵局的突破口”。对日本当局的寻衅，兴安屯垦军进行了有力的反驳，屯垦军驻白城子督办公署统带苑崇谷还将搜查到中村等人间谍活动的证件亲自送到北平副司令长官公署，提出：“按国际公法，主权国家有权处死外国间谍”。强烈呼吁：“国土不可侵，国威不可辱”。9月13日，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之命率20余人到兴安垦区调查“中村事件”。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对“中村事件”妥协退让，委曲求全，蒋介石等人还表示对关玉衡等进行制裁，结果关玉衡被解职软禁。由于日本政府目的不在于此，仍步步紧逼，并以此为借口，增兵南满，准备对东北全面进行武装入侵。

“九·一八”事变时，驻守在这里的军队除兴安屯垦军三个团外，还有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统领官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第三十三师，下辖五个团。“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副司令行营长官公署曾致电张海鹏，令其镇守洮南，防

止日军继续北犯。同时委任张海鹏为蒙边上将督办，并将其所辖五个团扩编为九个旅。第一、六旅驻守白城子，第二旅驻守洮南，第三旅驻守瞻榆，第七旅驻守开通，第四旅驻守突泉，第五旅驻守扶余，第八旅驻守长岭、乾安，第九旅驻守王爷庙（乌兰浩特）、索伦。尽管拥有这样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守卫白城地区，由于张海鹏等早有投降日本的意愿，当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来洮南劝降时，张海鹏当即首肯，并拜托林义秀从中联络。9 月 24 日，关东军一部 120 人，乘三辆铁甲车向洮南开进。张海鹏按与日本人河野正直双方密约，命令军队退出洮南城。24 日 9 时许，张海鹏同县长申振先带领文职人员迎接日军进入洮南城。日军占领洮南城后，册封张海鹏为黑龙江省主席，并拨给张 2 万支步枪和大量弹药。在日军的扶持下，张海鹏在洮南成立了“保安司令部”，将原属各旅改为支队，张自封为司令，并于 10 月 1 日在洮南宣布“独立”。由于张海鹏的叛国投敌，致使开通、瞻榆、洮安、安广、镇东等县，日军未费一枪一弹，相继占领，白城地区开始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

日本人在白城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为镇压人民的反抗，达到长期霸占东北的目的，对白城地区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在政治上，一切大权都掌握在日本人手里，白城地区各县公署，均有日本人做参事官，各警察署都有日本人做指导官。在

各城镇和乡村的基层组织普遍实行保甲制、街村制，严禁群众结社、集会。1932年7月5日，伪满公布《县官制》，县知事改称县长。1933年夏，驻四平日本领事馆在白城建立领事分馆，同时设领事警察署，以维护日侨的特殊权益。在军事上，日本侵略者调集重兵围剿活动在白城地区的抗日义勇军。对抗日群众进行疯狂屠杀，制造了多起屠杀惨案。当抗日义勇军被瓦解溃散后，日军仍有一个旅团的武装部队长期驻扎在白城子。白城北大岗的平台被日军建为军事基地，并先后在大青山、肖家屯、平安镇、镇西建四个飞机场。1937年8月，日本齐齐哈尔宪兵队在白城子建立了宪兵先遣队，专门监视人民的抗日活动。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首先控制了全区的金融。1932年6月27日，伪满"中央银行"发行纸币，严禁旧铸币、旧纸币在境内流通。为垄断交通和工商贸易，以"开发实业"为幌子进行投资。1931年12月，满铁内路总裁与四洮铁路局长阚铎签订合同，攫取了四洮铁路的经营权。1934年4月，动工修建新京（长春）至白城铁路。白城地区的交通均为日本人所控制。1935年，洮索、长白铁路相继通车。日本人垄断了交通运输和工商业。在交通通讯方面设有"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洮安电报电话局"、"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白城子营业所"、"满铁白城子建设事务所"、"白城子电器段"等等。在建筑方面有"东亚土木出张所"、"北满公司出张所"、"京城土木合资会社出张所"、"车组出张所"、"信共土木公司"等等。在铁工、电器方面设有"石神制造所"、"白城子铁工所"、"河村工务所支店"、""满洲电业洮南会

社出张所”、“中村电器商会”等等。在商业方面，强化经济警察，制定并公布《价格等临时措施法》，1943年5月，又公布《物品销售统制法》，限制商业活动。白城子当时共有商号111户，而日本人经营的即占72户，民族私营商业只有39户。在农村，推行“粮谷出荷”，强迫农民售粮，严禁民间进行粮食及肉类品交易，发现买卖自食大米、面粉的人，按经济犯罪惩处。在各县设兴农合作社，村公所设兴农驻社员，大肆掠夺农副产品。此外，还通过鸦片专卖进行经济掠夺，以大片土地种植毒物，商业性烟馆遍及各地，仅白城子就有7家鸦片零卖所。日本侵略者还大量移民，组成“开拓团”到白城地区，强行廉价收买土地为“开拓地”，征逼农民开荒。从1937年到1942年，日本人在白城地区就侵占开拓地344.6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4%。在思想文化方面，日本人极力推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改变人们的民族意识，成为殖民统治者的驯服工具。1932年7月，日本人先后在各县成立了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亲善”、“日满协和”等所谓“建国精神”的法西斯统治专制机构“协和会”。1938年以后，日伪又在各地建立了由协和会控制的“协和青年团”和“少年团”，很多有文化的青少年均被划入这些机构中。1943年9月，制定并公布了《保安矫正法》和《思想矫正法》，以进行法西斯统治。在学校，把日语列为国语强行讲授，取消了中国历史、地理课。1940年以后，中等以上学校又开设了军事训练课，派遣陆军现役军官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许多有文化的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奴化教育。

反满抗日斗争的胜利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东北军驻白城地区的广大官兵对张海鹏的叛国投敌表示强烈愤慨。10月底，屯垦军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营，在旅长苑崇谷的率领下，从白城子绕道去齐齐哈尔投奔马占山奋起抗日，所部被马占山编为黑龙江暂编步兵第一旅，，苑崇谷为步兵指挥官，率部驻守去黑龙江省的要道江桥附近大兴站，参与指挥了震动全国的江桥抗日战争。江桥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对白城地区的抗日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种形式的反日武装斗争逢勃兴起，抗日烽火遍及洮儿河两岸、松嫩平原。1931年10月底，姜荣辉，王可大等600余人在洮南成立了“吉西抗日军”，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为光复祖国，虽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吉西抗日军”的行动，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响应，不到十天，队伍就发展到4万人。1932年5月，由李芳迁、胡宝山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冒敌机轰炸，击溃了日军，攻占了开通，瞻榆两县城。9月4日，东北抗日救亡会第十七路军在胡宝山率领下攻占开通火车站，击毙日军12人。9月28日，驻洮安县的洮辽警备军第九团500人，在团长白永盛、副团长金殿伦的领导下，以“黑龙江抗日义勇军”的名义，举行起义，打进伪洮安县公署，处决三名日本官吏和汉奸实业局长陈景新。1932年5月，李海青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派人与中共满洲省

委取得了联系，在党的帮助下，12 月进入肇原县对部队整编。随后西渡嫩江包围了大赉城，与日伪军进行了两昼夜的激烈战斗，攻克了大赉城。12 月下旬，又攻战了安广县城。安广县的日本参事官斋腾涟，副参事官小岛静磨、濑川五郎和伪县长汪养源仓惶出逃。李海青的抗日义勇军在白城地区多次与日伪军作战，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关东军调集大批军队进行围剿。1932 年 12 月底，李海青率部经开通撤往热河。1935 年春，先期曾在白城地区活动的中共党员王一川，受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派遣，到大赉县筹建分会，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抗日。先后在月亮泡、大小外皮子、前后小榆树、东西两家子屯一带，建立起一支 70 余人的抗日武装。1936 年夏，在大赉县辛广店村遭日军守备队和伪军自卫团的袭击。分散突围后，王一川带领 10 余人转移到黑龙江肇源县靠山屯一带活动。1940 年 12 月 13 日，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十二支队代理支队长徐泽民率抗日部队 200 余人从肇源过嫩江袭击了大赉县五棵树伪警察署。1944 年底，八路军冀东军区成立锦、热、辽远征工作队，中共党员，工作队指导员周哲明被秘密派遣到瞻榆县开展敌后侦察和抗日宣传活动。1945 年，中共党员夏尚志回到他的家乡大赉县五棵树乡，继续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国斗争。1945 年 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 日，苏联红军 150 万人分三路进入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与此同时，原东北抗日联军 600 余人，随苏联红军返回祖国，配合苏军作战。10 日，苏

联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击破日本关东军西路防线，势如破竹，经由阿尔山、五岔沟挥师东进。日伪部队溃不成军，纷纷沿白阿、四洮铁路仓惶南逃。8 月 11 日，苏联红军五三集团军和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进占瞻榆县城。8 月 13 日，进占洮南、白城子，随后又相继占领安广、大赉、开通等铁路沿线城镇。所到之处，日本军政人员均已逃亡，日伪政权土崩瓦解。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宣告胜利，受日本侵略者奴役 14 年之久的白城地区各族人民获得了解放。

“九·一八”事变前后十几年的镇赉

宋德馨

镇赉县是“八·一五”解放后，一九四七年八月，由镇东县和赉北县两县合并而成。民国时期，镇东县隶属奉天省，赉北县隶属黑龙江省，辖大赉县河北的永、庆、升、平四乡。伪满时期，镇东县划归龙江省，与大赉县同属一省。一九四六年三月，民主政府成立时，始划大赉县河北部分为县，定名为赉北县。

民国时期，东北是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军阀统治的地方，军事虽统一，但政出多门。镇东县和大赉县因属两省，不但币制、量器不同，而且行政组织与税收制度亦各异。镇东县花奉票，大赉县花江贴；镇东县用洮斗，大赉县用江斗。因此，物资交流，生活往来，诸多不便。但镇东县与大赉县河北四乡东西毗邻，生活方式和境遇基本相同，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官兵扰攘，胡匪横行，地主盘剥，抓丁掳夫，完全一致。镇东县与大赉县河北两地间虽有关卡，但割不断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他们休戚与共，祸福攸关，荒乱之年，互相搬迁，互相避难。因此，本文对“九·一

八”事变前后十几年的镇赉大事的记述系指原镇东县和大赉县河北两地人民所遭受的兵、匪、水、鬼等灾害之苦。这里所说的“鬼”是指日本侵略者。

写镇赉县不能不涉及当时东北的政局与经济状况，因为它是受整个东北局势影响的，也叫做时代背景吧。

内战连年百姓遭殃

一九二二年以来，直奉战争连年，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以奉军胜、直军败而告终。张作霖父子坐阵北京、天津，大批奉军入关，近驻京津、京奉、津浦等铁路沿线以及大片河北地方；一部分军队南进山东、安徽、武汉和江苏、上海等地，大有不可遏止之势。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奉天驻滦州第三军团副军长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与冯玉祥签定密约，拉李景林入盟，率奉军精锐部队七万出关，宣布倒戈反奉。奉军直隶督办李景林通电：“保境安民，脱离奉系。”

事变突然，张作霖因东北空虚而慌了手脚。他乞求日本政府出兵协助，日本政府派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到沈阳，与张作霖商妥助奉击郭条件，签订了日张条约。日本政府感到不够劲，又派关东军司令白川义则抵沈阳，向张作霖提出种种条件（实际即二十条关于满蒙的第二项之再增），张作霖一一接受。白川义则一面警告郭松龄军队，不得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及日军守备区，不得危及日本在满蒙之一切权益，一面下令日本驻屯军第十师团司令部由辽阳移入

奉天省城，调日本驻公主岭骑兵一部抵奉，代张守城。日本政府还调驻朝鲜龙山日军四千人援助奉军。日本政府先后出动日军一万余人，飞机八十多架，一部分日军乔装张作霖的军队配合张军，从郭军左翼侧击。张军在日军的支援下，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败，郭松龄夫妇被俘枪决。郭松龄反奉，到此结束。

日本侵略者不但在郭松龄反奉中积极支持张作霖，而且在直奉战争时也是积极支持张作霖的。日本政府在直奉战争时，虽通告直奉双方说，对战争取“不干涉”主义，惟须十分尊重日本在满蒙的利益。其实，日本的通告是口是心非的。日本政府希望奉军入关作战，这样，既可以保住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又可争取时间，调兵遣将，占领要地，掠夺物资，修筑工事，待时机成熟，一举夺取整个东北。因此，他积极支持奉军，为张作霖壮胆撑腰。一九二二年九月，张作霖派张宗昌赴海参崴与日本订立军事密约，并购取日人所管之大批军械，运往奉天。一九二三年二月，日本把购自意大利的步枪一万三千支、炸弹八百颗、大炮十八尊全部转卖给张作霖，从中捞了一大笔钱。一九二四年十月，法国售给张作霖的大批飞机运到大连，由日本代为转给张军，日本照转无误。当然是不能白转了，日本是张作霖的好供给主，用钱更是现成，当然是用东北的主权换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内战连年，债台高叠，百姓榨穷，主权丧尽。日本人借口保护满蒙利益，大批军队涌入，修铁路，开矿山，伐森林，种稻田，办工厂，开商店，办学校，设赌场，整个东北命运，操在日本人手中。一九二

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日本东亚同志会”在东京神田会馆召开满蒙拥护外交责问大演讲会，主张援助张作霖，迎溥仪到满洲建立满蒙王国，以支配中国全境。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日本关东军向其军中央建议排除张作霖，“树立能顺应帝国要求的新政府”，并宣布满洲“独立”。日本亡我东北之心已定，惟惜东北军阀之不觉悟，苦我民矣！

内战连年，遭殃的是老百姓，抓丁拉夫，催粮要草，苛捐杂税，地主盘剥，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整个东北民怨沸腾。当时反映直奉战争之苦的民歌很多，仅就笔者回忆起来的几个片断写在后面：

①庄稼郎，去扛枪，胳膊腿，硬棒棒，上前线，去打仗，为大帅，把命丧，苦呀吗苦儿郎……

②直奉战争起风波，炮火连天震山河，尸骨堆成山，血水流成河……

③妻子盼丈夫，父母盼儿郎，依门盼不归，两眼泪汪汪……

打仗是要用钱的，东北军阀除了向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借债外，主要是向老百姓增加捐税。为筹措军费，一九二六年十月，奉天省决定加征出产税、销场税、豆税、牲畜税、补增牲畜税、茧税、参税等。从直奉战争起，城乡各种捐税已增至五倍，吉、黑两省之税较奉天有过之而无不及。东北各省还大发公债，商民每百元资本负担九元，农民每亩田负担一元。张作霖还将巨额外债分摊给各县：一等县十一万元，二等县九万元，三等县八万元。这些钱当然摊在商民和农民身上。从战争开始，奉票、哈大洋、江

贴持续跌价，物价高涨，到二六年奉票每元仅值日金票七角五分。奉省驻西丰骑兵旅，反对以奉票发饷而哗变，在城市焚烧劫掠，损失达五百万元以上。随奉票的跌价，哈大洋和江贴亦大跌，交易所闭市，金融陷于混乱。张作霖因商人提高日元兑换奉票的比价，拘捕四平吉顺百货商店主等缙绅十人（城内各店歇业者甚多）。东北巨商天合盛店主被枪决，该店及其在各处之分店财产均被没收。二六年八月十九日，张作霖因奉票猛跌还枪毙了钱商五人并没收其财产（被捕者尚有三十余人）。

镇东县是奉天省的一个小县，城里人口不过三千，商号十几家，除了两家小型烧锅外，还有几家杂货店和药店，其余为饮食、大车店。镇东地处偏僻、交通不方便，农村人口三万，地广人稀。原大赉县河北东临嫩江，南有洮儿河，距县城大赉城二百多华里，更属偏僻闭塞之区，人口不过两万，又多居住在沿江河一带。镇东赶集卖粮须去相距二百华里的洮南府；大赉河北地区赶集卖粮须去卜奎（齐齐哈尔）或安达，两地都是三百多华里，赶集得到冬天，因为隔江，夏天过不去。农民有粮卖不出，无粮更难挨。当时，农民有这样一个顺口溜：

马架子草房，种地是本行。夏天不用灯，冬天麻油亮，取火用火链，吃盐难上难。庄稼上了场，日夜打场忙，穿衣用粮换，小布一石三。官府来催税，吹胡又瞪眼，捐税加租债，一年算白干。

内战之祸并没有因“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而轻饶镇东与大赉河北，相反更加严重了。二二年以来，镇东

一带粮食收成较好，但粮贱，行程远，路费多，粮款也就所剩无几了。因此，多数农民是入不抵出的。商业亦是很可怜的，只是苟延残喘地维持着，挺不了的就关闭了。前边说的奉票、江贴、哈大洋贬值，张作霜采取高压的手段也没压住，但在农村根本就没有钱，那是以物易物的。嫁女财礼，通常说一斤银子、几件成衣，也是用粮食和牲畜来折合，根本没有什么金银和奉票、江贴来过礼。有些老年人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花钱。小孩子过年时，好不错的长辈给个三吊二吊钱，简直当珍宝，偷偷地拿出去给小朋友们看。小朋友们争着抢着看，羡慕得不得了。这种状况，直到一九二六年七月，洮昂铁路通了火车，才有了好转，因为泰来、镇东、东屏都可以卖粮了，但这只是地主手里有了钱，穷人还是光光的。一九二六年四月，张作霖为挽救东三省财政，密令吉、黑两省开禁栽种鸦片，设局专卖，征收烟税，悉归军用。大赉河北土地肥沃，适宜种植鸦片。于是成片的土地种上鸦片。到割烟季节，便从镇东一带雇去大批妇女儿童。从此，镇东和大赉两地染上鸦片瘾的很多，害民不浅。

自古慕官求官之风甚威，无论豪门巨富，还是黎民百姓，无不把当官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追求。且不论贫苦的读书人埋头寒窗，翘盼高中，即隐士中亦有“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者，就连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也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愿。统治东北的军阀，从张作霖到各省督军无不是土匪出身，其下级军官土匪出身者更不可胜数。当时，东北流传着：“绿林出好汉，江湖出

英雄”，“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一时间，匪匪兵兵，兵兵匪匪，兵匪难分。特别是直奉战争以来，整个东北土匪猖獗，攻城掠地，比比皆是，所到之处，掳掠一空。仅举几例，可见一般。张作霖为发展自己的势力，积极向关内进军，胡匪乘机扩大势力。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胡匪攻陷方正县城，掳去县知事；九月一日，胡匪攻陷辑安县城大肆烧杀抢掠；十月一日，胡匪攻陷柳河县城。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三日，胡匪攻陷方正县城；十月八日，胡匪攻占桦甸县城月余。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八百名马匪攻陷黑龙江省讷河县城，烧杀抢掠而遁。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七日，胡匪小梭子攻入伊通县城；十三日又袭击了辽源县城。一九二三年五月，胡匪破了黑龙江省望奎县城；七月胡匪又破了吉林的柳河县城。这里需一提的是，东北三省著名匪首仁义军卢占魁（匪号大龙），他与其妻（匪号驼龙，原名张素贞）率匪徒千余，窜扰于双阳、东丰、海龙、五常、榆树、双城等二十余县，长达七年之久。卢占魁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被捕枪决。驼龙于二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在长春被枪决。驼龙虽死，但在东北的影响很大，被编成戏剧《驼龙》，搬上舞台，很受群众欢迎，成为当时东北三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女英雄。

兵变也是东北地方混乱、百姓灾难的一个方面。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吉林省绥芬张宗昌军一部哗变，双方交火，百姓遭殃。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奉军第六、七旅在八面城公开抢掠。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奉省驻西丰骑兵反对以奉票发饷而哗变，在城里焚烧劫掠。二六年七月

二十五日，丹东炮兵哗变。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奉天骑兵第十一旅因不满改编而哗变。兵变此伏彼起，连年不断，与胡匪交相为害。

直奉战争以来，镇赉县即原镇东县、大赉县河北和整个东北一样，政局动荡，民怨沸腾，土匪四起。从二二年起，至三一年“九·一八”，先后有二十来个绺子，最大的绺子多时达到四百人，最小的绺子二三十人。较大的匪首有“天心”、“黑塔”、“登山”、“越山”、“草上飞”、“华山”、“好友”、“大吉狼”、“南侠”、“局红”、“扫北”、“黑河”、“靠山好”、“跨海”、“双荣”、“刚字”、“青山好”……

原镇东和大赉河北四乡，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两地合计居民不超过五万人。南有洮儿河、东临嫩江，青纱帐起，芦苇密封江河两岸。七月汛期，江河泛滥，胡匪水路假舟楫以抢掠，陆路则乘马以横行，或明伙执杖，打家劫舍，草菅人命，或昼伏夜出，绑缚人票，下书逼款，不交钱就枪毙。洮儿河和嫩江两岸的村屯已被胡匪踏平，成了他们的家。二一年到二五年闹得最凶的胡子是黑塔和天心几个绺子。黑塔（蒙族）的活动大多在原镇东县和乌鸦站一带。他不但鞭笞人票，而且把铁铣烧红，令人票坐上，叫做坐火车。更有甚者，他割去人票的睾丸，闻之令人毛骨悚然。这一骇人听闻的凶残，在大赉、镇东、扎旗西部是妇孺皆知的。后来，家长把黑塔作为吓唬小孩的手段。谁家小孩一哭，就说：“黑塔来了！”小孩也真的不敢哭了。一九二二年前后，镇东和大赉河北除十几家蒙族大户和二十几家汉族大户所住的村屯未被打开外，其余村屯均被踏如

平道。有些大户所住的村屯看上去是未被胡匪打开过，而实际上是要啥给啥的，不给怕打。望海屯是大赉县河北最兴隆的小镇，住户二百多家，有烧锅、杂货店、当铺、银匠铺、铁匠炉、木匠铺、红幌店。虽马连根桑为区所在地，驻有保卫团，但不及望海繁荣。当时最大的土匪天心绺子，他处心积虑地想吞望海这块肥肉。一九二二年四月中旬的一天，他把望海打开，抢掠一空后远去。胡子走后，望海一些住户，特别是屯西头从海城搬来的一些住户，他们都是亲属。为了恢复生产，不再受胡子气，他们集资买了几支枪，把围子又恢复起来了。六月初的一天，天心绺子又回来了，硬叫围子开门交枪。屯子几家一核计，拒不交枪。天心下令攻打围子，足足攻打一天一宿，围子里终因弹尽被打开。胡子一拥而进，象疯子似的见男人就枪毙，除越墙逃走几人外，在围子里的二十四个男人全被打死，横躺竖卧一院子。胡子为了把围子人都消灭，他们把妇女、小孩都赶到一个五间大房子里，抱来柴禾把房子围上，想一把火通通烧死。屋内哭声震天，惨不忍闻。正在这时，来了一个有点权威的的胡子发了一点善心，下令不许点火，救了几十条命。大股土匪是以硬打和硬捐相结合的办法来掳掠财物的。他们捐了不少响窑子，要钱要物，不给就打。有些村屯，看样子是响窑，而实际不知给胡子送去了多少财物。几十个土匪的小绺子，无力打大窑子，他们便偷偷地绑缚人票或赶马群以索财物。这类绑缚人票的事很多，农村有，城里也有。仅举几例。一九一八年夏的一天，一个三四十人的小股土匪乘黑夜摸到升乡二力把屯，偷偷地挖

开这个屯的私塾的后墙，绑去了张广智等人家的六名小学生，把他们带到江沿。一连几天派人下书学生家，索银元千块，大烟几十两，不给送到就割学生的耳朵。如此多的巨额款项那是很难筹集的。迟误了几天，胡子真的就把小学生的耳轮给割下来，派人送到小学生的家，并恫吓说，如再送不到款和大烟土，就把孩子们枪毙。家人一见孩子耳朵怎么能受得了，但又没有办法。张广智带上礼物，秘密地去了大赉城，托人请驻军陈统带（后称团长）为之想办法。陈统带率队来河北，派人输通，虚放几枪，这伙胡子才把孩子给放回来。张家杀猪宰羊，宴请了官兵，才算了结。一九三四年八月的一天晚上，匪首金山好率三十余名土匪，摸进镇东县城南门里张省三老中医家，把老中医的孙子张乃仁和小儿子张玉田绑去。当夜带到城西王区官窝堡，后又带到白城子八区陈团长窝堡。后来，被镇东自卫团和白城子自卫团包围，才把这些人票打下来，这些胡匪，凡称绺子的都有"秧子房"，是看管人票、施刑人票的，他们最凶狠。

大赉县和镇东县都是刚刚放荒不久的新县。蒙汉两族地主的主要财产是牲畜。当地地主说："早晨元宝上山，晚上元宝还家"。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胡匪也赶地主的马群，作为抵押，让你拿钱和大烟土去赎。如遇官兵追击，便丢下一些马匹作馈赠。马主到期不赎，便赶到远处出卖。一九二四年春，五棵树东北屯地主王庆家养了三十多匹散马，一天早上放出去，就被越山绺子给赶去了。越山要价太高，王庆无钱去赎，便报告官府。官府真的派来了军队。他们

在东江沿撵上了胡子，没放几枪，越山就丢下马匹，过江去了。马被官兵赶去，必须交子弹钱和草粮费才能还马。马一扣就是二十几天，经请人说情送礼，交了子弹钱、草粮费、管理费，卖了马所剩无已。

胡匪是原大赉县和镇东县一大害，连年不断，闹得地方不得安宁。究其因，或因国家动荡乘机蜂起，或因地主凶恶起而报复，或因触犯官司而逼上梁山，或因饥寒交迫铤而走险，故战事多为剿匪和镇压地方农民起义。当时大赉和镇东均有驻军，驻军应该是为剿匪而设，但也不都是为剿匪而出力。一九二〇年以来，镇东的驻军是马占山营长（后升团长、旅长……），他为剿匪做出很大贡献。他主动出击，几无暇日。一九二一年冬的一天，华山绺子一百余口子，来到了东屏南管家围子。马占山从镇东闻讯赶至西力吐屯，向管家围子发起了总攻，经半宿一天的攻击，胡子伤亡很重，溃败而逃。在这次战斗中，马占山部队牺牲了一位连长，用一口大棺材盛殓后停在西力吐屯宋家的大门旁，马占山哭而发誓："不彻底打垮华山决不回县城！"于是加紧追赶华山，直至华山过江，杳无音信才回来。马占山调往黑龙江省城后，镇东的驻军就由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军队接替了。开始时，调动频繁，骚扰地方，不事剿匪。一九二六年七月，洮昂路通车后，张海鹏在东屏和镇东都派了驻军。镇东县城驻军为马二营，营长叫王治安。东屏较镇东兴隆，张海鹏派他的大姑爷马一营营长唐××来此驻在。大赉县城驻军为陈统带（后改团长）。除了驻军外，地方还有武装。镇东县计五个区，区有警察局或分局。大

赉县河北分四乡，有一个区，区有警察局。镇东县和大赉县都有地方武装——自卫团，镇东五个区，区区有自卫团，有20—30人，镇东的自卫团总叫姚广田。大赉河北四乡也都有自卫团，整个四乡的团总是全振林，各乡的自卫团的头叫保董。这些自卫团没有固定的营地，有事则聚，无事则散。这些自卫团丁系为雇用的贫苦农民，其薪俸从地亩出，他们走到那里，吃到那里，都是家常便饭，没挑拣。这些自卫团对小股胡匪还有驱逐作用，对大股胡匪却无能为力。

今日匪，明日兵，这是东北军的本质。在大赉河北和镇东为害一阵的天心，后来降到黑龙江，登山、局红降到了大赉城。一九二八年以来，东屏已成为交通便利的繁荣小镇，每到年关，赶集的人更多。马一营的士兵乘机打家劫舍，拦路劫财。他们脱下军装，三、五成群地在通往东南和东部的喇嘛窝堡和乌木村一带拦路劫财。二九年年末，三个土匪在喇嘛窝堡劫道，堵了几十个上街赶集的农民。这几个土匪把劫来的人赶到一间房子里去搜查。这时，一个农民偷偷地逃出来，跑到东屏警察局报告。警察局出动十几名警察，跑到喇嘛窝堡，将这三个劫道的土匪抓获。经审问，原来是马一营的兵。马一营得到消息后，全员出动，将警察局围个水泄不通。他们大喊大叫，说这三个人是请假回家的士兵，声言："不给放出，就火烧大门，砸烂警察局"！警察局长一看，实在惹不起，就乖乖地把这几个强盗放了。打这以后，马一营更嚣张起来了，在东屏附近砸黑窑子，在街里抢店铺，就连有武装的永泉长粮栈也给抢了。

他们强占民房，霸占妇女，闹得城乡不得安宁。警察也是靠欺压老百姓活着，群众给警察编个顺口溜："远看黑毛驴，近看巡警局，两膀贴对联，竟唬庄稼人。"

镇东与大赉河北两地之间，各设关卡，征收过境税，缉私盐贩和鸦片。大赉河北东南部二龙梭口、大屯、五家子、莫莫格一带，都要去东屏卖粮食和农副产品，买回日用品，因此两地的关卡就设在巴喜昭和包力两地。真是雁过拔毛，想逃也逃不了。盐是官营的，不准私人买卖。那时候，吃盐实在困难，不少穷苦人个半月吃不上盐，不用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无处买。这地方吃的盐多是从乌勒门沁运来的，人们把它叫做北海盐。乌勒门沁的盐价不高，一块银元一牛车，只要你能拉出盐池就行。人们通常是套两头牛去，装盐时，卸下来一头，因为只准许一头牛，装完车拉出盐池后，再套上那一头牛。一勒勒车可拉八百至一千斤盐。买盐不困难，问题是，县县有关卡，如被堵住，不但盐被没收，而且要罚款。因此，这个买卖是冒险的。一九二九年春，镇东县太平庄宋德贵和赵长贵二人合伙去乌勒门沁拉了一车盐。他们昼伏夜行，风餐露宿，来回走了两个多月才到家。他们到家后，偷偷地卖了些，还剩三百来斤。他们知道东边（指大赉河北）盐更缺，乘青纱帐起，贪黑就奔往望海屯。天拂晓时，走到望海屯中一个井沿，想饮饮牲口，谁知缉私队已跟下来，眼看就到眼前，两人赶忙把盐袋子投到井里，待缉私队员赶到跟前，盐已不见，他们吼叫了一阵，悻悻而去。宋德贵、赵长贵二人赶快去找人下井捞盐，待捞上来后，因麻袋撞坏，只剩下一半了。

镇东、大赉河北，地广人稀，土地肥沃，本应是劳动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把它建设得美满幸福的地方，但由于军阀混战，横征暴敛，胡匪抢掠，兵痞蹂躏，洪水连年，地主盘剥，却成为人民不堪其苦，满目疮痍的地方。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亡

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垂涎三尺，觊觎已久，他们乘直奉战争，郭军倒戈，大批东北军入关，东北空虚之机加紧了侵略准备步骤。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吴俊升被炸死，东北的政局更加动荡，日本的侵略准备臻于完善。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终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沈阳北郊柳条沟事件，一举吞并了我东北三省。柳条沟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给已经准备好的日军：在拿下沈阳城之后，分兵向长春、吉林和黑龙江进军。霎时间，我东北三省黑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在此千钧一发，东北军民告急之时，蒋介石密电张学良说：“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将此电转发东北军事长官。张学良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东北之所以很快沦为日本殖民地，已昭然若揭。

日军欲取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必须打通平齐线的要塞洮南。驻扎在洮南的军队首领是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统领官兼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张海鹏是个野心勃勃的满清复辟派。日本关东军密令日本驻洮南的特务机关洮南公所所长河野正直抓住张海鹏野心膨胀的要害与之密谈。日本人一面同张海鹏谈判，一面派一支一百二十人的日军携带两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向北进发。河野答应给张海鹏十五个骑兵团的武器装备，封他为边防保安司令，要求他进占黑龙江。密约不久，日军押送的军火，于九月末就运到了洮南车站，计有步枪二万余支，还有机关枪、迫击炮、山炮等重武器。张海鹏喜出望外，亲自出城迎接日军。自此，张海鹏由一个自诩为敢斗日本军的英雄变成一个投靠日本侵略者的汉奸。紧接着，他命令亲信招兵买马，扩充军队，很快发展到二万多人，组成五个支队（相当于旅），每个支队三个骑兵团，一下子就扩大到十五个骑兵团。驻扎在镇东城的马二营营长王洽安，一下了就成了支队长，人们叫他王旅长。驻扎在东屏的张海鹏的大姑爷唐营长，自然是升为支队长。小小的镇东县一下子塞满了这么多军队，其骚扰之苦可想而知。“富怕匪、穷怕兵”，穷人黑天白日伺候兵，挨打受骂是常事。张海鹏当上了边防保安司令后，便开始了他的罪恶活动。

十月八日，张海鹏听到马占山被北平副司令行营任命为黑龙江省代主席，非常恼火。在日本人指使下，张海鹏的军队从洮南出发，途经白城、镇东、东屏，集结于泰来江桥和大赉河北一带。十月十六日拂晓，在日军两架飞机

配合下，张海鹏的先遣军徐景隆部妄图一举攻下江桥。待徐部刚到桥南，便遭到有重炮配合的强烈狙击，第一支队司令徐景隆少将负伤，当场死亡，整个部队败退下来。前线江桥炮声隆隆，后防官兵杀猪宰羊，大吃大喝，寻欢作乐。作为后防的泰来、大赉河北和镇东一带的老百姓大遭其殃。青壮年男女外逃避难，家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庄稼遍地无人割，军队的马草马料是现割现喂，无人铡就整喂。那个时候，老百姓叫跑张大麻子队，一跑就是一个来月。张海鹏的军队败退了，日本关东军不得不亲自出兵。战争持续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十九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落入了日本侵略者手中。张海鹏虽然兵败，但日本人还是死死抓住他不放，任命他为蒙边督办公署的督办。他的军队虽然撤出大赉河北地区，但镇东一带仍是驻扎的老巢。他们除搜刮劫掠，还协助日本人镇压中国人。

土匪是这个地区的一大害，虽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东北，他们也没有改邪归正去打日本，依然为害地方。日本人你侵略你的，我打我的窑子，抢我的财物，真可谓丧心病狂至极。"九·一八"事变时，在镇东、大赉河北等地仍有双荣、越山、刚字、天生好、天五、乐子、天荣、好友、双九龙、两点、跨海等十几伙胡子。他们先后打开二龙梭口、六家子、代头、后望海、三门王家、三家子、管家围子等十几个屯子。兵匪交织，日本入侵，国破家亡，民不聊生。

日本军队乘蒋介石不抵抗之机，攻势迅猛，很快占领了东北的几个大城市。日本侵略者一面用军事加紧占领东

北大城市，一面勾结汉奸筹建伪政权以掩 国际舆论之压力。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垣征四郎的导演下，由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和上角利一去天津静园与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的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密谋 来东北做傀儡；由坂垣征四郎在奉天（现沈阳）坐阵，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天津静园溥仪身边的罗振玉、郑孝胥及其子郑垂等人就和日本人沆瀣一气，一个急于复辟皇位，一个急于寻找傀儡，经过紧张磋商，溥仪终于决定来东北。十一月十日傍晚，日本人把溥仪藏在汽车里，悄悄地混出静园大门，逃到预定的地点——敷岛料理店。在敷岛料理店，换上了日本军官早已准备好的日本军大衣和军帽，改乘日本军车，经白河岸，一直开到码头，登上了日本军司令部运输船“比治山号”，同早已在船上等候的郑孝胥父子俩和上角利一如约见了面。十三日早晨，“比治山号”到达了辽宁省营口市的“满铁”码头，下了船又改乘火车到汤岗子，住进日本“满铁”开的翠阁旅馆。在汤岗子住了一个星期后，日本说汤岗子附近有“匪”不安全，又把溥仪用火车秘密载到旅顺，安排到大和旅馆。

坂垣征四郎在沈阳组织的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和被这个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等人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坂垣征四郎的导演下，通过了一个决议，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在决议中，定这个国家

的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改名为“新京”，国家元首为“执政”，年号为“大同”。说这个国家由五个民族组成，即满族，蒙族、日本族、朝鲜族和汉族，定国旗为五色。经过四个多月的紧锣密鼓的谈判，终于达成了血腥的交易。溥仪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我就是这样，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一方面还幻想着未来的‘复位登极’，公开走上了这条卑鄙无耻的道路，确定了头号汉奸的身分，给血腥的统治者充当了遮羞布。在这块遮羞布底下，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这天起，祖国的东北完全变成了殖民地，三千万同胞开始了浸满血泪的苦难生活。同时，我也给本庄、坂垣之流增添了信心，奠定他们‘发家’的基石。”二月的最后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独立，拥戴爱新觉罗·溥仪为“新国家执政”。三月一日，在所谓请愿代表的恳请下，溥仪表示允任执政后，开始赴长春就职典礼，发表“执政宣言”。

三月九日下午，头号汉奸郑孝胥捧着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推荐”的国务总理和内阁名单，请溥仪执政签上御名。这个内阁名单是：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洽、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兼）、吉林省长熙洽（兼）、黑龙江省长程志远（兼）；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棨、最高检察厅厅长李檠；参议府议长张景惠（兼）、参议府副

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栻、商衍瀛、罗福葆、许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官特任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衍瀛；警备处处长佟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曾一度被溥仪劝降、日本人土肥原诱降的马占山，在得到一些武器后，旋即声明反正抗日，给日伪以沉重打击。日本人给伪满洲国组成一个内阁，并不是把权力真正交给这些大汉奸，而是摆样子，真正的大权操在他们日本人手里。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是驹井德三，是真正的掌握国务院实权的人，其它各部都设日本人次长，各部的大权都操在日本人次长手里。日本人不但把伪满统治权全部抓到手，还用条约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由郑孝胥出面搞了个"日满协定"十二条，主要内容是："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给日本；日本管理"满洲国"的铁路、港湾、水路、空路，并可增加修筑；日本军队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由"满洲国"负责供应；日本人有权开发矿山资源；日本人得充任"满洲国"官吏；日本有权向"满洲国"移民等等。在这个协定中，最后规定它将成为日后两国间正式条约的基础。

至此，日本人可以"名正言顺"地统治东北人民，掠夺东北的资源了。伪满洲国的中央和省一级的伪政权宣告成立后，便着手建立县一级伪政权。县里以汉奸为县长，日本人做参事官（后改为副县长），下设总务科、行政科、实业科等，每科都有副手，而实际大权却操在他们的手里。地

方上武装镇压的机器是警察局和警察大队。纯日本人的武装只是通火车的县的日本守备队。镇东靠白城子近，就由白城子日本守备队管，大赉河北距泰来县近，就由泰来日本守备队管。他们这些守备队有时单独行动，有时联合行动，以显示他们的军威。偌大的东北，为数不多的日本侵略军，想要一下子把城乡都占领是不可能的。只是旋风似地下来一趟，打死几个人威吓一下，马上就回去。一九三一年冬和三二年夏，广大农村还是胡匪的天下，愿意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待县级日伪政权建立后，农村开始建立自卫团以维持地方治安。原驻扎在镇东一带的张海鹏的伪军，因张海鹏当了侍从武官长，他的军队已改编，奉日本关东军之命配合日军去热河与抗日军作战去了。这个地方只靠自卫团维持了。县的警察大队是地痞流氓和降匪的集合体。他们下乡一次，地方就是一次灾难。

一九三二年五月以来，日本侵略者妄图在各县成立伪政权，建立伪武装，以防止人民武装力量之再起。其结果是，土匪日益增多，除惯匪外，有些自卫团也拉出去，不少地主也联合报字拉出去。几个月内，发展到一百多伙，多者百余人，少者二、三十人。当时，较有名的土匪是："双荣"、"刚字"、"扫北"、"狠字"、"登山"、"南侠"、"好友"、"局红"、"混轮"、"天生好"、"天荣"、"草上飞"、"双龙"、"大吉狼"、"四季好"、"乐子"、"金山"、"金山好"、"东边"、"小云龙"、"青山好"、"久战"、"天生"、"助国"、"民助国"、"五省"、"占中华"、"老来好"、"天求"、"南洋"、"云飞"、"华山"、"九省"、"中央"、"中华

好”、“天下好”、“七国”、“三国”、“五洋”、“三合”、“坤山”、“黑河”、“俏皮老疙疸”、“天武”、“德国”、“东胜”、“西来顺”、“靠山”、“喜字”、“大老疙疸”、“老二哥”、“宝山”、“老天和”、“四海”、“南平”、“于顺”、“东江”、“天照应”、“天一”、“魔症”、“北海”、“大英字”、“双雕”、“双喜”、“天扶”、“青山”、“六合”、“越山”、“天增”、“天德”、“天和”、“天江好”、“久胜”、“老一顺”、“九江龙”、“压东洋”、“长山好”、“平东洋”、“四喜”、“两点”、“五龙”、“跨海”、“复国”、“老品字”、“庄稼人”、“靠山”、“靠山好”、“东南侠”、“金甲龙”、“九龙”、“双九龙”、“平洋好”、“东林”、“全胜”、“占江好”、“边里”、“双胜”、“文武”、“明山”、“天帮”、“占一”、“沿江好”、“大家好”……

由于为匪的背景与动机不同，他们的行动也就不同。有的是属于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意欲拉起大帮，寻找机会以出击。事实上，他们多次去泰来一带袭扰过日本人，也偷袭过火车，泰来的五庙子、东屏南发生过这样的事有的是中小地主为保护枪支和财产联合起来，组成一个绺子，在自己的村屯周围转；有的是由地主所在村屯安排出来的，以保护他们所在的村屯，在东南部活动的东江就是这种类型。上述几种类型，他们不打窑子，不抢劫。真正以抢劫为目的的惯匪，依然是很残暴的。“双荣”、“天荣”、“南侠”、“金甲龙”、“双久龙”、“刚字”等二十几个绺子是附近几县最残暴的土匪，他们曾经窜扰过乾安、长岭、通榆、农安、德惠、怀德等县，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这些胡匪有时合，有

时分。“天江好”、“天增”、“天德”、“天和”四个绺子，为打大屯联合起来，报字“四大天”，终于把大屯打开。东南一带，除大官、茨勒两屯外，全被打开，畅行无阻了。不少地主在保护伞下过了关，嘎什根一带最大的地主李万奎，在“刚字”、“东边”等绺子的保护下免遭大劫。五棵树一带大地主王福元，自恃墙高枪多，终被“小云龙”的里勾外联的方法打开，打死了当家的王庆，杀了六、七口猪，吃了几天，洗劫一空而去。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少。

七月，又来了百年不遇的洪水。江河泛滥，几成泽国。那些惯匪乘水打劫，以前望海为例，护地坝开，庄稼全被淹没，洪水紧逼屯堤，如不加宽加高，全屯将付诸东流。全屯男女老少几百人正在坝上拼命地修筑堤坝，小云龙绺子七十多人，乘着六条大船从东南驶来，船未靠岸就开枪了。老百姓有的跑到家，有的还没跑到家，护屯坝就开了。刹那间，一百多户的屯子没入水中一多半，衣物被抢净，家畜家禽顺水漂走，粮食、家具压在水里。青壮年逃到后望海，老弱病残守在塌房前，哭声震天。大水吞没房屋，胡匪乘水打劫的事比比皆是，真是逼得人们没有活路。

当时，大赉河北受胡匪之害较小的村屯，还是蒙族大户居住的村屯。三二年春，从齐齐哈尔来了一连蒙古骑兵，在这个地区驻防，说是蒙边司令部的骑兵。说是蒙古兵，而他们都是达斡尔族。他们这一连人分散住在拉干庙、五棵树和莫莫格一些大家。因为来大水而没走了，对这个地区的保护起到很大作用。至上冻，这支蒙古兵才离开此地去内蒙了。

一片汪洋，几千名土匪到处游荡，猪鸡吃光，他们杀牛宰马，穷苦的老百姓没有衣穿，赤身露体，小孩子光屁股，没有粮吃，只能靠捞鱼虾度命。天无绝人之路，这年的鱼特别多，到处都可以捕到。人吃鱼，猪狗吃鱼，马也吃鱼，因为没有草，它不吃也得吃。点灯用鱼油，取火用火链，东江沿盐是没有的，仿佛回到了原始社会。好不容易挨到上冻，人们才可以从泽国中出来，不少人投亲靠友，颠沛流离，四处逃荒。除惯匪外，大部分绺子撂了。他们也随之逃到外地。他们东逃的大多是讷河、克山、依安、海伦一带；北逃的大多是龙江、景星、昂昂溪、扎赉特旗一带。逃到扎赉特旗附近三家子一带的多是五棵树、嘎什根一带的户。他们由最初的几十家到百家、千家，上万人。去科右和扎旗的马鞍山、土木吉、青龙山及北山里一带的多是镇东东北部的蒙汉居民。这些逃去的居民是今日扎赉特旗人口中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逃去的灾民中，有教员、医生、艺人和工匠，对扎赉特旗的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解放后，工作在扎赉特旗或内蒙其它地区的蒙汉族干部中，有不少人是当年从这一地区逃去的难民或后裔，他们不会忘记当年是怎样从灾难的家乡中逃荒走的。

冬子月，大地结冻，江河冰封。赖洪水，日本军和伪警察大队不敢进入。活动的不以抢劫为目的的各种类型的“土匪”自动解散，有的回家，有的同逃荒户一起而远徙。剩下的以抢劫为目的的大小绺子，在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大队的打击下，有的土崩瓦解，有的降到伪警察大队或伪

军，局红和登山就是降到大赉伪警察大队的。剩下的十几个较大的惯匪绺子如“双荣”、“刚字”、“天荣”、“华山”、“靠山”、“天扶”、“跨海”、“双九龙”、“两点”、“天和”、“宝山”等他们弃船抓马，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大队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广，窜扰于大赉、镇东、泰来、安广、洮安、开通、长岭、乾安、前郭、怀德、农安、德惠、肇源等十几个县。在这些惯匪中，“双荣”的绺子最大最恶最顽固。大赉和镇东是他们的“老家”。所说的老家，不过是有他们的盘根错节的关系，可以销赃，可以上子弹。这当然不是说这些胡子就不抢大赉和镇东了。其实，他们是从这两县抢夺起家的。常言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他们没少吃。“双芝”本是报马台人，可他在本地没少抢，没少打死人。

一九三二年冬和一九三三年春夏，日本人的扫荡和伪警察大队的剿匪，给镇东和大赉河北带来深重的灾难。三二年冬，夏季龟缩在城里的日本守备队活跃起来了。由驻白城子日本守备队长恒地和驻泰来县日本守备队长萝久雄、洮昂线警备日本军独立守备队陆军步兵大尉大原嘉三组成的联合扫荡队，从洮儿河至泰来，闪电似的扫荡了两次。他们乘坐卡车，沿江河进行大搜查，遇到青壮年就说是“马贼”。因此，青壮年和妇女几乎跑光。把网房子和临江河的小屯子烧光了，拉了一些鸡猪回城了。冬天过去，春夏到来，青纱帐起，日本人不敢出来，就派伪警察大队下来。他们本是地痞流氓和降匪所组成，怎么能剿匪，维持地方治安呢？他们下来就是“打粳米、骂白面”，从胡子手

里得到“洋落”。兵来了比胡子还凶，因为当胡子的都是穷哥们，没的说，可是兵来了就不同了。他们对富人不敢惹，对穷人就虎起来，不是你伺候不周，就是你当过胡子，非打即骂，百般刁难。这些伪警察大队名为下来剿匪，实际是下来发财。胡子给他们财物，他们给胡子送子弹。他们佯作包围了胡子，打上几排子枪，胡子给他们扔下一些马匹财物，他们进去不但收取这些“胜利品”，还把老百姓抢个净光，说这是胡子扔下的。他们回城时，说是剿匪胜利，向主子邀功，得到更多的弹药以补充。其实，他们的“胜利品”是用弹药换来的。以“双荣”为首的几股大绺子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有“官兵”的支持。

一九三三年冬以来，在日本侵略军的强大攻势下，东北的抗日力量减弱，日本人已腾出手来，清剿胡匪，镇压反抗力量，建立伪政权。驻扎在泰来县的日本守备队队长陆军步兵大尉柚木园清次、白城子的日本守备队长恒地与洮昂铁路的日本守备队陆军步兵大尉大原嘉三等率领二百余日本军开始了猛烈的大扫荡。此次大扫荡的特点是：清剿土匪，排除干扰；大肆抓人，实行恐怖主义；并村并屯，消灭胡匪隐蔽处；收缴枪支，清除反抗隐患；实行保甲连坐，建立村政权。日本这次大扫荡，持续了一年多。第一次扫荡的重点是江河一带胡匪经常出没的地方，北从五家大坎，南到月亮泡一带的网房子全部烧光，有的老年看房的无家可归，活活被烧死在屋里，老北江看房的就是这样烧死的。他们一路上见到中青年男子就说是“马贼”，有的直接用刺刀捅死，大来甲、十人沟等地都有这样的尸体。有

的捉到屯子里去打拷打。江东新屯一个贩鱼的农民被日本军抓来带到南英台屯，硬说他是“马贼”打了一顿，认为死了，把他扔到英台屯南就走了。这个农民伤虽重，但没有死又苏醒过来了，被英台人救活送回了家。老百姓一听到日本清乡队到来的消息就远逃，家里就只剩下老弱病残。日本清乡队为合并村屯把大批农民赶出了家门，弄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以五棵树以东沿江一带为例，老房身、四方坨子、杜勒吐、一棵树、马鞍山等屯的住户统统被赶出，房子被烧光。这些屯子的住户，一少部分搬到附近的八家子、望海和五棵树屯，这是暂时的。后来大部分逃荒到黑龙江和内蒙等地。沿洮儿河流域的村屯亦如此逃荒。日本守备队在清乡并户的过程中，还大肆抓人。他们说是抓“马贼”，其实，他们抓的是一些具有反抗思想和反抗力量的人。一九三三年冬，仅大赉河北就抓去四十余人。一个小小的望海村就抓去三人。后望海韩家抓去二人：大哥韩德福老四韩德祥；东北屯抓去个杨青山，统统被带到驻泰来县日本守备队，关押起来。这个守备队在泰来车站附近铁道南，牢牢的砖房砖墙，外面是铁丝网，布满了岗哨。院内修个四十来米高了望塔，泰来小城在他的眼底下，机枪口下。这座塔至今还保留着，这是日本侵略者在泰来一带进行血腥统治的见证。韩家二弟兄被抓去十天后，被日本人枪毙在泰来的南岗下，家人偷偷地收回尸。老三韩德祯从那次逃走永未回来。一家哥四个只剩下老二韩德禄哥一个了。日本人为什么要杀韩德福弟兄二人呢？因为韩德福当过保卫团保董、曾经拉出去过，对日本人有威胁，杨青

山虽经日本人严刑逼供，但没有招认什么。后经其家人贿赂翻译，花了几百块大洋，去了四十多人具保，才给放出来。徐家村张马官店屯石永林曾当过保卫团甲长，于三四年春被泰来守备队带至途中给杀害了。石家弟兄很强悍，日本人视如眼中钉。三五年十月，泰来日本守备队在清乡时，又来到了张马官店石家，说石家反满抗日，藏有枪支，把老大石永盛和他五弟一起枪杀后，放了一把大火，把十几间房子全部烧掉。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仪登基做皇帝，颁发登基“诏书”。从此，溥仪更加傀儡化了，更加伏伏贴贴地偎依在日本人的皮靴上了。日本侵略者在这个地区，用两年多的时间，十几次军事扫荡和清乡并户，在此地已经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始建立地方上的统治政权，实行保甲连坐，一人犯罪，株连全甲。将原来的大乡改为村，村设保长（后改为村长），村以下为甲，甲设甲长，甲以下为排、排设排长。大赉河北部分距大赉城较远，管理不方便，在五棵树设立县属的“办事处”负责河北的土地登记造册，管理粮秣。治安方面，村所在地设警察署或分驻所，每个警察署或分驻所都配有十几个团丁，供他们差遣使役。

溥仪就任执政后的一个多月，日本人就提出要建立一个“协和党”。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由于溥仪不愿听什么“党”这个词，后来，日本人决定成立一个“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组织。这个会包括所有居民在内，具体地说，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

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岁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至十五岁的少年均为附属的“少年团”团员。日本人把“党”改为“会”，并不是对溥仪有什么让步，而是认为这比弄个不伦不类的政党更便于统治人民。通过这样一个网罗一切人口的组织，更便于奴化宣传、特务监视和奴役人民。于是县和村都建立起协和会的专门机构，一直通到基层。

日本人不但采用武力的高压手段和协和会这样的宣传、监视机构，还用怀柔政策以麻痹人民。他们积极倡办道德会、慈善会和天主教堂，不但城里办、农村也办，越办越大、越办越多。镇东县道德会的会址在现人民电影院这个角上，东屏设有分会。大赉城有，河北更盛，以河圈庙为中心，整个河北都有信徒。在东北农村好多偏僻的地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主教、基督教，居然在农村也办起来了，就连望海这样一个偏僻小村也办起了一个天主教堂。天主教，道德会各宣各的教，各宣各的道，一时间好不兴盛。日本人来了也表示他们“虔诚”，参加道场，去作弥撒。真是老虎戴寿珠——假充善人。他们还借机大讲一通“日满一德一心”、“王道乐土”，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日本人最担心的是中国人手中的武器。日本人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土匪多，是最难对付的地方。虽然进行过两年多的剿匪、清乡，挖出去不少枪支，但始终未能缴净。于是，张贴《布告》，从县到村到甲大肆宣传，凡有枪支武器者，按规定的日期到警察署登记、打号，逾期不报者以私藏武器论罪，不但处以极刑，并株连乡里。经过

半年多的武器收缴。至三五年底基本缴光。不用说大小洋枪，就连火药土枪和大刀长矛也一扫而光，有的地方连铁烧火棍也视为反满抗日的武器被没收。缴枪总是与挖“匪”相结合，即使是大地主隐藏枪，亦视为“土匪”，亦即反满抗日分子。连枪带人一并拿走，由此而被杀害的人亦不少。“九、一八”以来，日本的烧杀抢掠日甚一日，恐怖气氛愈来愈浓，人心慌慌，不可终日，可是日本人为消除隐患而高兴。在东北他们可以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尽情地掠夺，腾出大批武装力量去进攻我关内了。就这样，我镇东和大赉两县人民同整个东北人民一样被奴役了十四年。

生活在镇东、大赉大地上的老年人，不会忘记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这块大地上的兵、匪、水、鬼之害的血泪史吧?!“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打败了最凶恶的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拨乌云见青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上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恶梦般的痛苦生活毕竟是过去了，永远过去了，但我们的当代人和当代人的子孙后代不应该忘记，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一时期的血泪史。

"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洮南的经过

李国成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十时二十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爆炸沈阳北部柳条沟的铁路，反诬中国军队所为，突然袭击驻有中国军队的沈阳北大营，并炮轰沈阳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日寇分别向各地进犯，占领长春、吉林。二十四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派长谷部旅团三十联队沿四洮路向北进犯，当日占领了郑家屯。

地处四洮铁路北端的洮南城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为了达到尽快占领洮南的目的，先后几次派人串到洮南劝降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九月二十一日，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来到洮，拉拢张海鹏说："张学良已经不能回到奉天，不论张作霖、张学良都瞧不起你，如今你帮助日本，往后可以统治东三省。"对此，卖国求荣的张海鹏心领神会，并拜托林义秀帮助进行联络。日本摸清张海鹏底细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先后派通辽领事友三和日本军大佐大石来洮，进一步诱降张海鹏。并通过日本驻洮南满铁公所（现在第四中学校址是日本的特务机关）所长河野正

直出面与张海鹏秘密谈判。日本答应给张海鹏装备武器弹药，扩充军队，张海鹏答应为日本关东军进占黑龙江省打前锋。

九月二十四日，关东军司令部派一支约一百二十人的日军，携带两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向洮南进犯。二十五日，今田新太郎又通过河野正直与张海鹏取得联系，张海鹏按照双方的密约，事先命令中国军队退出城外，并解除了洮南县的警察武装，同县长申振先等人带领洮南的文职人员于当日九时迎接日军进入洮南城。

日军为了将张海鹏作为以华治华的工具，驱使他去进犯黑龙江省，并册封张海鹏为黑龙江省主席，同时答应十月底以前接济军械，给大盖枪二万支和弹药若干。日本为了收罗伪军，以巨款收买张海鹏的四儿子（外号张四虎）。在日本侵略者的收罗和利诱之下，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十月一日在洮南发表了独立宣言。

张海鹏在洮南得到日军武器弹药接济后，立即秘密召集部下，谋划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用日军运来的武器装备起来，很快当上伪边防保安司令。司令部内设八大处（参谋处、副官处、军械处、秘书处、军医处、兽医处、军需处、军法处），司令部下辖五个支队（相当于旅），每个支队下辖三个骑兵团。这样他的枪也多了，人也多了，实现了卖国求荣的“美梦”。

日本占领洮南后，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在北京，当时黑龙江省的工作由万福麟的儿子万国宾主持，万国宾听到张海鹏在洮南投敌的风声之后，为试探张海鹏的意图，派

马景桂前来洮南，假称黑龙江省欢迎张海鹏，而张海鹏耍了两面派，说什么“本人近年古稀，毫无野心，日本人压迫太甚，部下主张分歧，暂处黑龙江省躲避亦无不可”等。为了进一步劝说争取张海鹏，阻止日军北犯黑龙江省，北平副司令行营电委张海鹏为蒙边督办，并让窦联芳和刘建选携带张学良和万福麟致张海鹏的电，亲赴洮南，劝张海鹏坐镇洮南防敌北犯，勿为日人所利用，但是，张海鹏不顾民族之危亡，不听张学良的劝说，暗里却积极扩充军队，召开秘密会议，积极准备进攻黑龙江省，死心踏地地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中村事件与“忠灵塔”

葛　藤

一　“忠灵”小序

伪满时期，洮南广昌门外路南有一墓碑，叫“忠灵塔”。后又建一“神社”，两筑同址。是“九·一八”事变的国耻地，亦是日伪统治东北人民的精神枷锁。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全境后，在东北各省城重镇大建“忠灵塔”，为法西斯亡灵招魂。洮南的“忠灵塔”是祭祀“九·一八”事变三事件之一——中村事件的亡命徒中村丽太郎的。

“中村事件”本不发生在洮南，击毙地亦不在洮南境内，洮南又系废府小县，为何立碑于洮府呢？这就不外洮南有个南满公所（日本驻西满的特务机关，总管西满与东蒙各领所。原址在今四中院内，“八·一五”后，被拆毁。）的“筹划和侦破之功”——是中村事件的“策源地”；是大兴安岭方面“兵要地志”的终点；又洮南是“洮辽”和“洮索”地区之首府，故于洮府建碑。又于东蒙王公重地——王爷庙（乌兰浩特）与实际发生地——苏鄂公府（察尔

森）两地各筑一碑。

二　中村事件

中村原名“丽太郎”，入伍后改为“震太郎”　是日本本州西海岸新泻县宁诸原郡中之岛大条二五四番人，生于明治二十年（1888年）七月四日。系一渔业铁道官宦世家，其父中村是公于1908年曾做过大连日本“满铁”二任总裁（相当铁道省次长），实为阀阅殷实之大户。

中村系日本“士官”十二期生，“陆大”测绘系毕业。任职参谋本部部员、战地测量科步兵大尉。

中村的案内（助手）是井杉延太郎，为在乡退役军人，骑兵预备曹长（上士衔。在小队长和伍长之间，不是班长），在札免采木公司工作。日本军部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将大批退役骨干军人安插在东北的“满铁”、森工局和开拓团等日营企业做职员。待“九·一八”炮响，再易军装，重做人上人。有的竟做到省、县次长以上的高级文武官员。这就是所谓的“在乡军人”。

司图是白俄矿师，东蒙旗王乌泰的顾员，原洮南二龙索口煤矿（万宝煤矿的前身）的采矿师。当地耆老云：系哈尔滨“戈记”俄轮公司之后，俄国革命后定居于哈，为乌泰雇员。存有中东路时期沙俄测绘的“满蒙”晒图多幅，故被洮南“满铁”雇为中村的司图。懂日、蒙、汉语，兼作译员。不知其名，只呼为“戈矿师”，即后来的“无名白俄”。

联络员兼通司（翻译）是蒙古人刘文茂，扎赉特旗人。是乌泰和巴布札布勾结日、俄的汉奸，是中村联络策反东蒙王公的重要助手和翻译，也是进入兴安区的向导，是札旗巴公爷的女婿，是巴公爷介绍给中村的。

中村于昭和六年（1931）一月参加完“皇帝秘约”后，并于东京驿送行。约十九、二十日在大连登岸，去“满铁”总部（现大连铁路分局一办）谒见其父中村是公。其父喻：“先去沈阳拜会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先生（甲级战犯，被处绞刑），再去洮南“满铁”面晤所长河野正直先生，面授机宜，求其保护。护照由哈、沈领事办改。你不必担心，大胆地去干，如被擒，关东军可以要出来，万万不可激怒满蒙军人。提供《入侵满蒙方案》在此一举，留名军史，是为先遣。”

中村二十一、二日到奉天（沈阳）关东军司令部晋见土肥原，请示办法。一月底抵达洮南，下榻南满公所，河野奉若上宾。并陪同去张公馆，面见张海鹏，商量保护事宜（河野为张的后台）。中村来洮的目的有二：一是踏查大兴安岭方面的“兵要地志”和提供《入侵满蒙方案》；二是拓殖兴安，联络策反东蒙王公的计划。

中村一下兴安。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七日（春节）北上齐齐哈尔，转道博克图札免采木公司（日营，特务机关）。沿绰尔河东岸南下至札赉特旗公爷府。参与札旗巴公爷秘密召集的“东蒙王公会议”，唆使札旗巴公爷、图什业图王叶喜海顺、科右前旗郡王乌泰、科右后旗苏鄂公、科右中旗高力叔公以及海拉尔的呼伦亲王巴布札布的两个

儿子甘珠尔札布和正珠尔札布“九·一八”后，投敌分别充任兴安西省省长和通辽伪军司令。与大汉奸洮辽镇守使张海鹏联合反对“兴安筹省”和阻挠屯垦。并扇动巴布札布的两个儿子“继承亡父遗志”搞“东蒙独立”等等。这就是日本的“满蒙拓殖国策”——《入侵满蒙方案》之一步。

然后，随之测去泰来又葛根庙（洮索路当时的终点站）的进军路线。不料被兴安屯垦一团从索伦山方面以东的“情报跟踪”所监视；又有哈尔滨特警处电悉：“中村私入兴安禁区”的报告，中村慑于兴安屯垦军防范之紧，不得已离开兴安去哈、沈。这是一九三一年二月中、下旬之事，即博克图——札旗之行，这便是中村一行四人，“便衣乘马，三日人与一俄人”的跟踪报告，内有南满公所日人联系员一人。谓之“一下兴安”。

中村二下兴安。中村于是年五月赴哈日领大桥雄一处，以军人冒充商人办理了个“外交护照”。并在哈豪赌负债离走去沈阳，以教育者农业技师研究史地、考察农业的名义，向辽宁省旧交涉署（外事处）领取了“兴安农业考察团”的通行证。入境手续极不完备，更无兴安屯垦公署（驻白城）或兴安屯垦军司令部（驻乌兰浩特）的签证。

中村于同年六月初，以农业技师的身份持证来洮签字入境。张海鹏说：“兴安区归邹作华管，我签不了！”后来“满铁”河野贿赂了洮南公安局长程鹏九（即“程富俊”）和许越衡（两人均系汉奸，做了十四年敌伪局长，四六年被抢毙）签了证。因洮南尚属中心县和警备区（事变后旋

改），并设“旗地办事处”于武公馆（天恩地局，现为科技馆），故可签证，因代管科右各旗及突、乌蒙旗事宜，实仍代行洮南府之职权。然而，中村及河野却无视兴安屯垦机构的存在，难免悲剧与事件的发生！

中村于六月中旬再转道齐、昂、博、免会齐三人西上海拉尔南下洪和尔基，窥测索伦山军事要塞。二十日到达索伦西吉嘎尔旗；二十二日抵达苏鄂公府科右后旗。除测绘一、三团兵备防地外，又游说两旗旗长参加所谓的“东蒙独立运动”。二十五日行至乌北二十七华里的四方台（蒙语“杜尔伯勒基”），偷绘三团三连宁文龙炮连防区。被士兵跟踪至村镇内饮食店打间时擒获，当日解往苏鄂公府团部。中村二次兴安之行，是为了测绘记录“索伦——洮南”一线的“兵要地志”，结果被捕获，并未能生还。

搜查中村行囊。中村四人的行囊与裤套藏有文件地图和枪支仪器多种；日、中、俄军用地图三份，并有校正记载；洮索线路与桥涵图两份；记录、报告和表册以及测绘共八份；枪械仪器计六套；马匹三洋一蒙，鞍具齐备；帐蓬雨具食品和野外考察用具等，一应俱全，真不愧为“农业考察团”。

内容包罗万象，无所不有。上至《皇帝秘约》，东京送行；下至“满铁”拓殖，满蒙纪行及兴安兵备将校，营区后勤，兴安林矿，风土人情，气象地形等等，应有尽有，全面记载。就连策反联络东蒙王公的会谈记录，都有详细记载。这是“兵要地志”加外交谍报，双管齐下，鲸吞兴安而后已。

一审中村。时值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去突北校阅新编骑兵不在余公府团部，由少校团副董平舆代理。董与中村系日本士官同校，因中村身世高傲，派头架大，校友戏呼“中村样”！故友异国情怀不忍处置。然而，正值“济南惨案”与皇姑屯炸车之后，群情激愤，爱国心切；反日情绪高涨，群呼杀之。又恐引起外交纠纷，故不敢擅权。即命副官赵衡于二十五日当晚飞骑二百余里，速报关团长，连夜返回，凌晨方达。

关玉衡星夜返回余府团部，草译中村所带文件、笔记和报告等，略知其身份和私入兴安禁区的目的。即于六月二十六日晨一审中村。

中村上中等身体，面方而多髭须；身着深灰色棉衣裤，外罩俄式皮夹克；头顶三耳火车头皮帽，帽脑套副风镜；脚踏军用短靴，手提马鞭。好一副日本“武士道”目中无人的狂妄横像；又一派傲慢自大，盛气凌人的英国绅士架势——不愧谑为“中村样”，确实名副其实。

然而，审讯时中村蛮横暴躁，狂奴故态。自诩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推托不懂汉语，搪塞罪责。嗣而改用日语审讯，中村也是拒而不答，只甩出中村名片一张：“法西斯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别无他获。另两个亦推托不懂汉话，只有助手井杉略作交代。

原来日本军部使用的中国东三省地图是沙俄修筑中东铁路时，窥测的“满洲军用全图”，并标测森林地矿。中村带的三种地图与白俄雇员的目的就是“实地印证、校对上图”，回国复制入侵满蒙急需的军事战略要典——“兵要地

志”。其他概而不答，别无收获。只有核对证件、物证，却无中村口供……

二审中村。二十六日晚，华灯初上，集群佐广议。再审中村，取其口供。不料，中村“武士道”性大发，大打出手。关团长抽出战刀欲手刃强虏，中村气焰方煞。令其签字画押时，又借机撕打，惹怒官兵，用枪托击其头，昏倒在地。“武士道”者，自毁其身；飞蛾扑火，自寻灭亡。

时值董平舆团副与陆鸿勋营长在场，两人提议“秘密处决”！于是关团长下令：“命宁文龙、王秉义两连长带兵将中村一行四人押赴余公府后山七、八里僻静之处，一并枪决。所带物资，除重要文件、物证呈报外，包括马匹行李，一应焚毁灭迹。封锁消息，严守保密。并派副官赵衡监刑处置，时为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午夜三十分左右。

二十七日晨，关玉衡驰赴白城子兴安屯垦公署报告处理中村之结果。邹作华督办行将出国考察，由总办高仁绂接待。所有证件、物证托苑崇谷团长去北平晋谒之便，均送北平协和医院转呈张学良副司令长官留存。

三　善后事宜

日本参谋本部在一九三一年五月上旬派出少壮派军人长勇大尉率领一批军事间谍到海拉尔与外蒙交界地区（即“呼盟”西部）进行军事间谍活动。

又于是年六月中、下旬同时派出两伙军事调查组。中村大尉一行四人潜入兴安区和洮索路一带（即“兴安盟”）

进行窃取军事情报活动；森纠大尉等人到齐齐哈尔西北地区（即“呼盟”北部）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大本营军部派出所谓“三次军事调查”。

一九三一年七月初，长勇与森纠皆返回东京“大本营”销差。只不见中村回报，又没有电信情报，其“保护神”——洮南“满铁”公所也杳无音信，日方均疑其失踪。

七月上旬，蒙族向导刘文茂家人从佘府闻讯，并前来寻尸，几遭弹压，后逃回报告札旗巴公爷。必定是“翁婿之情”，怎不大动肝火，欲提蒙古骑兵去佘府问罪！正逢前旗乌泰闲居 札旗（乌泰造反后虽复职，但始终不敢长居葛根庙，常避隐于札旗）。闻此“噩耗”，深为懊恼。但却劝住巴公爷“不要鲁莽蛮干”！“你斗得了屯垦军吗？不如绕道去卜奎（齐齐哈尔）和洮南报告日本人，比咱们力量大得很！”结果两人绕道泰来以去黑龙江省和洮南办事为名，分别报告给齐齐哈尔日领（特务头子）长林义雄和洮南“满铁”所长河野正直。大汉奸张海鹏将河野请去张公馆与乌泰面叙。

这就是日本东京《东朝夕刊》于昭和六年（1931）八月十八日报导的“亲日系（亲日派）支那人并蒙古人绕道密告日领所”的内幕。日伪时期始终未予披露，因蒙、汉汉奸正炙手可热。

嗣后，日本举国哗然，沈阳日报喧嚣。张学良从北平急电密令关玉衡：“灭迹保密”。于是在七月末将中村和井杉的尸体在佘公府东北山地焚毁灭迹。日报“七月一日焚

尸”的可信度太低了！六月二十七日零点处决中村一行，不会只隔三天去做“蠢事”——“扬尸烽火，告警倭人”。

八月初，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强行来洮，扬言“武力搜查兴安”。由河野陪同去洮安县（白城子），在白城车站被检，知兴安有备。到兴安屯垦公署（驻白城）时，又遭拒绝保护。只得与河野同沈阳的铁参谋去葛根庙，沿途备受盘问和冷待。到乌泰王府经蒙古王公劝阻，怕做“第二个中村”！“回去吧！关玉衡鲁莽得很！”故此土肥原“余府寻尸”作罢，回沈大肆宣传鼓动，又回东京扇动“必须武力解决”！

后来，派来中村的同学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大尉（法西斯少壮派、战犯）和土肥原的助手今田新太郎大尉同河野组成“侦察班”化装去洮索。在“前、后、札三旗民族败类”的帮助指点下破悉。

八月十二日，由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土肥原向日本军部正式提出所谓“中村事件”，“是靠武力解决满蒙的最好机会”。

八月十七日，日本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向东北当局提出“中村大尉事件”交涉案。东北当局同意调查。

八月二十八日，东北军司令部派参谋孟相品一下洮索作例行公事的调查，复电南京外交部：“并非事实”。

九月五日，张学良训令辽宁省长臧式毅及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就地“第二次调查”。

九月十日，林久照会东北当局提出：“赔偿、道歉、处罚、保障”四项要求。

九月十日前，东北重炮旅长王致中来兴安“三次调查”。并动员关玉衡出走苏联，未允。关同意与日对质，王、关于十二日前悄然回沈，取证对质。张学良派人送回“中村谍证”。

九月十三日，为防日本出兵兴安（林久一日三抗议），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命赴兴安拿办。演戏给日人看。

九月十六日，外传将关玉衡押入监狱，实则匿居于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家。故日报载：“支那演苦肉策”。

九月十七日，东北当局通知日领中村事件的肇事者关玉衡忙解沈查办，可协商处理。即谓“四次调查”。

九月十八日，晚十时十分左右，日本守备队河本夫守中尉，按关东军高参坂垣征四郎（甲级战犯、被处绞刑）的预定“炸车计划”，将南满路柳条湖村，即文官屯柳条沟一段自行炸毁，制造了“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十一时许，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沈阳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九月二十日，关玉衡乘乱逃往北平。兴安军“九·一八”后归马占山指挥，关团由赵振武带领向江桥集结。

九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在顺成王府接见关玉衡，委任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并批给生活费五百暂用。至此这次“宁安老满”从此做了“寓公”托名“国尔家”，撰述中村始末，直到“西安事变”才得到真正的归宿——投奔延安去了。解放后，出任某炮顾问。

然而，关玉衡处死中村震太郎，引起“九·一八”事变，犹如普林西顿刺杀裴迪南大公一样，导致“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可见，中华不乏热血男儿，历尽艰苦卓绝，继而八军抗战，“夺回我河山”。叫“东亚病夫”一去不复返；让日本法西斯见“鬼”去吧！

热血男儿多壮志，爱国军人最可泣。

四 塔碑琐记

一九三二年春，日伪在洮索地区三建“忠灵塔”，以祭亡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副官今田新太郎与洮南“满铁”所长河野正直亲自坐镇洮索三地督建。

洮府的规模较大。塔基十五米见方，三级塔台，六米墓碑。中塑中村与井杉的军人浮雕；下设石栏铁索。碑阳望乡东瀛，上书：“中村大尉殉难烈士之碑”。东南约四十米又建“神社”，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四一年（伪“康德”八年）秋，曾发生砸“天照大神事件”，显示洮索人民的反日精神。“八·一五”被苏军大炮击毁。人亡碑毁，被扫进历史垃圾堆。

一九五一年在原塔基上改建“苏军烈士纪念塔”。

乌市与洮府同型，只不过是木质的，系临时性纪念物。在乌兰浩特站下北侧，“八·一五”为内蒙自治军烧毁，四七年重建“解放纪念碑”。

察尔森（余公府）是中村的葬身地，在察尔森北门外四华里的“心山”（蒙语：巨力艮）之顶立有“中村少佐大义之地”（死后荣升）一碑，规模不大。因一九三一年十月初，中村夫人随军来“余府寻尸”途径“心山”北侧拾到

一只军用短靴，认为家物，故定此山立碑。后有牧民用狗骨头欺骗日人的笑话流传于洮索，更有学生戏谑“中村之歌”（中村夫人作）之“戏唱”。如：“那拉木踏拉着一只靴，葬身兴安没有穴……”。（中村穿着一只靴，死到兴安连座坟都没有！）

六六年“文革”时期，被学生毁掉。剩余半碑滚于山东之下，却有“形影相吊，望乡东瀛”之意。

实际真正的“葬身焚尸地”是在余公府后山（东北）七、八里之处。现在尚有蒙、俄二墓之遗迹，一曰：“入蒙先遣英雄刘文茂之墓”；一曰：“入蒙先遗无名英雄白俄之墓”。墓碑毁于文革。

五　踏查后记

另外，“中村事件”中，日多种史料记载：“由洮南复茂（塔拉艮）解往葛根庙途中逃跑被击毙”一说，实系外交托辞，敷衍日人之说，以避“入境被俘间谍按战俘处理，不得随意杀害或虐待”之虞。又日方未找到尸体，故多做附会推测之说。

“中村事件”已过半个世纪之久，今史志重提，著家蜂起，作品频仍，莫衷一是。故查询二十多种中、日资料和“九·一八”事变前夕原件，并三次单车实地踏查。校正史实，以飨后世史家；鞭策后人，牢记国耻；不忘外侮，保土守疆，振兴华夏。

伪满镇东县协和会

胡国忠　张焕东

1931年9月18日，蓄谋已久的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我国沈阳北郊的“柳条沟事件”，日本铁蹄很快踏遍了我国东北三省。从此，我东北锦绣河山便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为平息世界舆论，掩盖他们的侵略本质，便抬出扶植已久的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号为“执政”。1932年3月1日，在日本人的导演下，溥仪于长春原吉长道尹公署举行伪满洲国建国典礼，并发表了“执政宣言”，继而组成了日本人掌握实权的伪内阁，并宣布了伪省长，组织伪县级政权。

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除了用武力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控制政权、强化治安外，还进行思想统治，推行精神麻醉的“怀柔政策”。他们成立民众教育馆，立教堂、办道德会、慈善堂、大肆宣传宿命论、日满一德一心、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协和会”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织。

提起“协和会”，年过花甲、伪满时期过来的人都能知道，那是伪满时期的大门势头。但有许多人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受其害而不知其所以受害。

溥仪就任执政后一个多月，日本人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协和党”，并提出这个党的任务是“组织民众协力建国”，培育民众具有“尊重礼教，乐听天命”的精神。当时的执政溥仪被“党”这个词吓破了胆，不愿听什么“党”这个词，后来，日本人把“党”改为“会”，叫做“协和会”，作为“翼赞”政府的一个组织，溥仪接受了。伪满大同元年6月18日，伪满国务院召开协和会筹备委员会。同月25日，正式成立了伪满洲国“协和会”。溥仪为名誉总裁，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为会长，并发表了“协和会纲领”。这个“会”来头大，声势高，范围广，凡是伪满洲国居民无所不包。妇女均为其附属的“妇女会”会员，十五岁至二十岁的青年均为其附属的“青年团”团员，十岁至十五岁的少年均为其附属的“少年团”团员。由日本人设计的黄色衣帽，定为协和服、协和帽，并由伪国务院下令定为国家礼服，凡集会典礼必须穿协和服、戴协和帽，并佩戴标明官衔的协和带和勋章。

协和会的宗旨是：“向一般国民彻底普及国民精神，谋图民族协和，纠合爱国纯良之国民，尊重礼教，享乐于天命，振兴农政、努力改革产业，以期保证国民之生活，排除共产主义的破坏和资本主义的独占。”协和会章程规定，“协和会不受任何其他行政机关所管辖，而是直接受协和会中央本部领导的独立存在的垂直机构。”

从表面上看，协和会的性质是一个宣德达情的宣传机构，即对国民宣传政府之德政，让人们听从、效忠。达情就是对上要及时反映国民之“隐情”，为民排忧解难。而实际上协和会是进行“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是政府精神之母体，通过政治实践以期民意之畅达。”这就是说协和会不是单纯宣传机构，而是地道的实践组织。它要实践、宣传“王道乐土”、“日满一德一心，”是进行国民精神的思想实践；是进行“民族协和”、忠于“友邦”、忠于“天皇”，妄图毁灭中华民族意识，甘当亡国奴的教化实践；是进行配合日满政权，经济上掠夺，政治上迫害，军事上镇压的实践。这就是日本人要成立协和会的实质。

协和会的权力很大，掌握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一切权力。具体地说，它有掌握伪满洲国的统治权和行政权，法律权，土地和财产权，物资消费和配给供应权，掌握限制中国人的人身自由权，严禁中国人集会和谈论国家大事的言论自由权，缴纳国家税务收纳权和缴纳协和会会费权，发展文化教育权，监察国家机关权等等。权力之大，无所不及。所以当时人们把“关东军、宪兵队、警察署、协和会”称之为“四大硬”，协和会为四大硬之一。

说协和会“硬”，是说它表面上宣德达情为其建会精神，而实际上它掌握、控制人们思想动态，监视人们的举止言行，对老百姓有生杀予夺之权。协和会的具体任务很多，大体是：

一、宣传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宣传政德，达情日满，使日满形成手足永不分离的关系；

二、向群众宣传统治人民的方针、政策，并配合伪政府贯彻实施；

三、宣传伪国兵法，协助征兵，按期入伍；

四、宣传勤劳奉仕，训练青年奉仕队，为战时军事总动员打下军事基础；

五、宣传物资统购、粮谷出荷和配给制；

六、宣传日满提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七、配合伪满政府，实施政令；

八、定期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搜集上来的"民情"及其他情报，逐级上报；

九、担任日本军队宣抚工作，宣传日本建国方针，效忠天皇；

十、大力发展组织，扩大成员。

伪满洲国协和会组织分布很广，中央（指伪满洲国）有协和会总部，各省、县（市）都设协和会本部，行政村有协和分会，直至基层。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总部成立后，它的组织机构自上而下逐级向省、县（市）、村扩展。1937年2月8日，伪满协和会在长春中央总部召开总部委员会议。议决本年度工作方针要项四点，并提出要扩大地方协和会机关。随之，各县协和会本部相继成立，有的由原来的办事处改为县协和会本部。

伪镇东协和会县本部成立的比较晚，1943年春四月间，根据协和会中央总部指示精神，经过一段筹备工作，成立了镇东县协和会，成立之初叫镇东县协和会办事处，由日本人林登吉一人主事。职员二人，马延洪和刘国东，此

二人均系买卖人出身。还有一名工友叫孔庆安。办事处负责协和会的日常工作。到夏末秋初时节，奉命将协和会办事处改为镇东县协和会本部。县本部长由当时伪县长吴旭瀛兼任，本部副长由日本人副县长稻津一穗兼任。县本部事务长由日本人林登吉担任，他负责总务和日常各项业务。后期，林登吉调走以后，第二任事务长是日本人石森。石森到任不长时间就光复了。

1944 年末伪镇东县协和会县本部的内设机构详见下表：

县本部长吴旭瀛（兼） 县本部副长稻津一穗（兼） 协和会事务长林登吉	总务班 班长　林登吉（兼） 庶务班 班长　刘贵权 班员　马延洪 　　　王洪晋 指导班 班长　于瑞聪 班员　盛德福 　　　王立德 雇员　张新霞 青少年班 班长　傍岛（日本人） 班员　王懋忠 　　　赵秉刚 　　　刘树侠

协和会本部内各班的职责任务都比较明确，大体是：

总务班

（一）掌握国家统治机关的统治权力；

（二）管辖协和会县本部的人事调动事项；

（三）搜集地方情报和上报情报等事项。

着重搜集地方以下各种情报：

1、搜集地方匪情；

2、侦查宗教团体动向；

3、搜集侦查各机关内部间谍；

4、侦查社会上的流言蜚语；

5、侦查反满抗日分子；

6、检查各机关政令贯彻执行情况。

（四）宣传日满协和、一德一心，形同手足，永不可分的关系。

庶务班

（一）管理现金出纳事项；

（二）负责协和会财经预决算事项；

（三）负责协和会备品物资的管理；

（四）工资发放；

（五）公文管理、收发事项；

（六）印写、抄发文件等事项。

指导班

（一）指导各分会及各系人员分担任务的执行；

（二）指导各分会及各系之方针及方法；

（三）指导协和会各系人员学习协和会之性质和权利；

（四）指导日满亲善，发扬国家之政权，负责会议之召开。调解民族之纠纷，发展会员；

（五）指导调查方法，了解民心动向。

调查了解如下情况（与总务班基本相同）：

1、搜集地方情报，查有否通匪、给匪、匿匪等情况；

2、查各宗教团体有否反动行为；

3、查有否私通红军的人；

4、查各机关内部有否间谍。

青少年班

（一）登记十岁至十五岁少年，组成少年团；

（二）登记十五至二十五岁青年，组成青年团；

（三）训练适龄青年，使之具有初步军事教养，为总动员打下基础。

青年训练班下设青年训练所，对青年进行训练，每年对适龄青年进行一次或两次训练。训练所对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和奴化灌输，每期一个月或更长些。因为战事吃紧，枪支不足，每个青年发一支锄杠，作为木枪，老百姓把这些青年训练队叫“棒子队”。这些青年队员可随时听调，站岗放哨，执行任务。

青年训练班还负责满洲军人的后援工作，这个会的正副会长均由正副县长兼任，有专职主事一人姓曲，负责调查国兵适龄者应征数字，国兵逃亡者处理；国兵退伍编入在乡军人后援会事宜，召集在乡军人会议；掌握退伍国兵的动向并指导其行动。

当时伪镇东县政府下设八个行政村，协和会镇东县本部也相应地下设八个协和会分会，分会有分会长（一般都由村长兼任）还有专职干部书记长、书记辅，有几名雇员。

当时的八个分会是：

镇东分会，分会长胡兆庆

莲泡分会，分会长李培青

东屏分会，分会长蔡世有

协和分会，分会长李慕白

岔台分会，分会长王×福

嘎海分会，分会长杨继皋

套保分会，分会长王铁珊

董家围子分会，分会长王景鸿

协和会村分会下设总务系、庶务系和指导系，其职责如下：

总务系

（一）掌握分会各系分担的各项工作；

（二）执行县协和会本部的各项决议；

（三）书记代表地方民情作出草案，上交本部作出决议；

（四）向民众宣传日满一德一心，形同手足，永不分离的关系；

（五）宣传粮谷出荷报国，支援国防强盛；

（六）调查机关工作者是否有违反日满一德一心的言论和行为；

（七）调查各宗教团体是否有反动行为；

（八）调查是否有私通红军的人；
（九）搜集地方情报。
1、搜集老百姓中的流言蜚语及违反政令事项；
2、查搜老百姓中是否有间谍；
3、搜查地方通匪、给匪者；
4、搜查地方思想不良分子；
5、搜查行动可疑的人。
庶务系
（一）担任分会现金出纳，职员工薪支付等事项；
（二）担任征收会费；
（三）参加村公所做民需配给品等项工作；
（四）公文管理、记载事项。
指导系
（一）宣传日满一德一心，永不分离的关系；
（二）宣传粮食出荷报国；
（三）宣传支援国防之意义；
（四）调查反满抗日分子；
（五）调查游手好闲的人；
（六）调查私吸大烟、贩卖大烟的人；
（七）调查国兵、奉仕逃跑人员；
（八）调查劳工逃跑人员；
（九）调查地方的各种情报；
（十）为本县选派青年训练队队员或直接训练。

军人后援会、青年训练所、女子行动队是协和会的附属组织，其职责要求和县本部的各项职责要求基本相同。

协和会的会员是全民性的，凡年满二十岁男女均为当然的会员。当时吸收会员不履行什么手续，只是召开一个大会，会上宣布凡与会者从即日起便是协和会会员，必须遵守协和会提出的章程，按期缴纳会费，城镇职工每月从工资中扣除工资的1%作为会费、农村每户每月收二角四分钱会费。凡是协和会会员之家，门上都钉上一块上印有“协和会会员”字样的长条铁牌。县协和会本部设委员会，委员多是地方士绅和伪政府机关干部组成，并由上级本部长任命，县本部每年召开一次大会，把本部的委员及分会长都集中上来，对事先由分会提出的各种议案进行讨论，写出决议案，同时布署下步工作。

镇东协和会县本部设在现在的新华书店对过，占地很大。有二十多间房子，专为训练青年队用的。这座高宅大院平时进进出出的除日本人外多是那些地方绅士、分会会长、有头有脸的人，穷苦的老百姓是不敢着边的。

1944年，日本侵略者节节失利每况愈下，中国人民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伪满洲国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但他们封锁消息，制造假宣传。协和会秉承其日本主子之旨意，大肆宣传他们的“胜利”，竭力搜刮，强行支前。同时，为了防止人民反抗，对群众严加监视，草木皆兵，在全县各地，特别是饮食业、旅店业都张贴“守口如瓶”、“莫谈国事”的醒目标语。那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身着便衣，与警察密切配合，寻风摸底，四处活动，谁要是倒霉的话，或者他们看着不顺眼，就以“莫须有”的罪名告知警察署把你带去。一般说，协和会不直接出面处理案子，他们把调查

到的或反映上来的情报送到警察署去处理。县公署、警察署遇到棘手之事经常找协和会出面调解。一旦惹起众怒之事，协和会就站在“为民说话”的角度，装好人，说好话，麻痹群众，实际上，他们是串通一气的。

伪满时期，镇东县设八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都设有村公所、警察署或分驻所。协和会三个单位，是三位一体，相互配合，统治农村。村公所是县公署各项指令的执行者，村长是一个村的最高领导人，既是村长，又是村协和分会的分会长，还是兴农合作社的兴农会长，身兼多职，上下串通。平时，正常的工作由村公所办理，如出荷粮、抓劳工、征租税、挑国兵等等。在执行行政任务时，遇到阻力，和群众“顶牛”时，由警察出面用武力镇压，如果镇压失策，由所谓“宣德达情”的协和会出面调解，这样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使矛盾得以缓和，既达到掠夺财物，又安抚民心，巩固了统治政权。

协和会所掌握的民情，除自己调查外，还在群众中安些“耳目”，经常上来反映情况，通风报信。在县本部，大多是林登吉亲自接待，把反映上来的情况都记到一个小本子上。大案，协和会要定期向中央总部汇报。汇报情报是一项绝密工作，协和会里只有日本人自己去办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了，成立了二年半的镇东县协和会随之也垮台了。

伪满时的保甲制、街村制

黄显升

1937年4月我到洮安县（1938年5月1日改称白城县）苇子房保公所任事务员，第二年又考入白城子街公所任司计，1941年到平台村所任助理员，后又到大兴村公所和格索营子村公所任村长，直到1945年8月祖国东北光复。

推行保甲法强化殖民统治

伪满时的大同年间（1932和1933年），洮安县的基层政权仍沿袭旧制，县内设警察局，下有八个警察区，每个区都设警察署，县里并有警察大队，负责“清乡”、“剿匪”，维护地方治安，各警察区虽有自卫团，但受彭金山的自卫团统带部管辖、指挥，警察局管辖不着。一个警察区内有两三个村，全县不是29个村就是30个村，都是小村，村有村长，一村管辖3到5个屯。

1932年8月29日，洮辽警备军第九团（白团）与八区部分自卫团举行武装起义后，日伪当局趁彭金山调到郑家

屯任职，首先废除了自卫团统带部，将各区自卫团的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县长（实际上交给了县公署的日本参事官），并对各区的自卫团进行了清洗和整顿。

1933年12月22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暂行保甲法”，1933年1月17日公布了“暂行保甲法施行规则”，同年12月22日又公布了保甲法。洮安县于1934年（康德元年）实行保甲制，将全县城乡划为21保，保下划甲，甲下划牌，城内一牌有50户，农村大屯划两三个牌，小屯一个牌，还有两个小屯划为一个牌的，户数在四、五十户之间。保设保公所，有保长、会计、事务员等，甲有甲长，牌设牌长。每个保内都设自卫团，自卫团有团长，也叫保董，下有30到40多名自卫团员，武器都是县里发下来的，是一些过去从乡间收缴上来的私人杂牌枪。有的一个保（单保）建一自卫团，有的两三个保（联合保）建一自卫团，当时社会秩序很乱，为防范“土匪，维护日伪统治，自卫团员都吃住在团部，昼夜值班，并有电话和县里相通，随时汇报“匪情”，听从县里（主要是警务局）的调遣。实行保甲，是“十家连坐”下来的，一人通“匪”，全家受罚，一户通“匪”，邻居受株连，一保内出了“匪”，将要制裁保长。建立保甲就是互保不通“匪”，不资“匪”，防范“坏人”进保甲防区。

在第一警察署（白城子区）设了5个保，在城外设了三个保，即三合屯保、保盛屯保（保长陈德生，土改时被镇压）、太平庄保；城内设两个保，以现明仁街为界，划为东保和西保。东保长韩成林，保公所设在现五金一商店大

楼处；西保长王晓峰，保公所设在现水果店大楼处。两个保一个在道南，一个在路北。乡间19个保都有自卫团武装，城内东西保与外乡的保建制一样，就是没有武装。在第二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大兴屯保，保长刘万仁；苇子房保，保长高永吉。第三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哈尔呼吉保，保长徐士武（后任花拉道村村长，土改被镇压了）；花拉道保。第四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程四家子保，保长姓聂；十家子保，保长姓季。第五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三十户保和满洲岱保。第六警察署区内设三个保，有西五家户保，保长是小龙湾屯的孙绍华，孙后来到大兴村任过村长；有胡宝山保，保长黄云卿；还有高世功保，保长郑相庭。第六警察署区内的三个保是联合办公，联合保公所办事处就设在胡宝山屯，三个保长轮流到保公所办公。第七警察署区内设三个保，有五棵树保，白庙子保，索格营子保。第八警察署区内设两个保，有苗家窝堡保，红八塔保。

我在1937年4月在苇子房保公所任事务员，保长是保公所西高大骡子屯的高永吉（高兴阶），他经常在保里吃住，那时保上的事情多，胡子也多，县经常来电话，他不在保里不行。保公所驻有自卫团，团长也叫保董，姓马，他归警务局管，但也听保长的指挥。我和保公所的会计薪水都是30元左右，保长和保董挣的不如我们多，但他们的职务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当。枪是民国时散在人民手中的枪，啥枪都有，很不统一。自卫团员都是当地人，每人每月20元左右，还有马乾（读gān，马的草料费用）每天5角钱，一

个月可有30多元的收入。当时的钱很实，白面3元钱一大布袋（有100来斤），肉也贱，鸡蛋1角钱10来个，这对一个青年农民养家糊口来说，也算是不小的收入。

苇子房在大沁塔拉草原的边上，过去那地方常闹胡子（土匪），于八店那地方就是胡子窝，像兰家围子屯和勿兰巴打南屯，都有“活人”，谁家被胡子绑了票非找他们去通不可。但胡子对大户人家也不敢怎样，因为大户有枪有炮台，一时打不下这个“窑子”（指院落），还容易遭到警察大队和自卫团的增援和袭击。一般他们抢的都是些中等农户人家，抢完就走，不在一地停留更多时间。我在苇子房保公所只呆4个月，有胡子路过，但还没有发生过大帮胡子攻窑抢劫的事。

1937年8月我到胡宝山保办事处，是总务兼会计。这个办事处是三个保（胡宝山保、高世功保和西五家户保）的联合办事处，地点就在胡宝山屯。后来我才知道黄云卿在白城子也是很有名望的人。他和李方（其父李云起是放荒“揽头”，三十户大地主）是亲戚，和杨春甲也是亲戚，杨父杨润波是民国时的省议员，是黄云卿的表兄弟。民国时奉天省有省议会，一个县一个省议员，可见杨润波在洮安县里的名望地位是不一般的。杨春甲也是大地主。黄云卿有这样两家靠山，所以才能当起保长来。我到白城子来，就高永吉和黄云卿举荐的我，我才来的。这个联合保的办事处三个保长轮流住在保里。这三个保就一个自卫团，保董姓郑，下面有20—30人。这三个保内很太平，那里一马平川，又是洮安县（白城子）的中心，没有闹过几回胡匪。

伪满康德4年收缴枪支，自卫团随着也撤掉了，加强了警察力量，以后警察也多了。日伪政府为了巩固保甲制的实施，各警察区也设立了相应的警察分所。白城子警察署设立了三合屯、保盛屯和太平庄警察分所；苇子房警察署设立了大兴屯分所；哈尔呼吉警察署设立了花拉道分所；十家子警察署设立了满洲岱分所；胡宝山警察署设立了西五家户和高世功分所；白庙子警察署设立了五棵树和索格营子警察分所；苗家窝堡警察署设立了红八塔警察分所。

全县一共有多少甲我不清楚，像我呆过的苇子房保就有5个甲，即苇子房（修好屯）、王豆腐房、金钱达、平顶庙和勿兰巴打。胡宝山有陈树政、方家、龙湾、胡宝山、陶家屯五个甲。西五家户保有四个甲，即西五家户、东五家户、凤凰城和聚宝山四个甲。高世功保有四个甲，即日升屯，田喜屯、刚喇嘛屯，高世功屯。至于每个保都各划多少牌，我更不清楚了，因为保就管到甲，一切都与甲联系。

保直接归县里管，保公所的呈文直接送到县长，上写“××保××号保长×××”，写中间“洮安县长殿”，不与区（指警察区）发生关系，县里文件也一直到保。保里关于其他事项报告则报告有关科局，如关于人口的事报行政科，关于耕作方面的报实业科，关于征兵的事报动员股（国兵民籍股），如此等等。

全面推行法西斯政治，实行街村制

在白城子实施街村制是从伪康德5年（1938年）5月

1 日开始的。根据街村制“规则”，废除了保甲制，把原来的保并为街和村。同时洮安县也改为白城县。白城子街内原来的东西两保撤销，建立白城子街公所，街长韩成林。将白城子街外原来的太平庄、三合屯、保盛屯三个保合并为太平庄村，村公所的地点就在保盛屯，村长先是高村长，后来是门玉璞。将苇子房保和大兴屯保合并为大兴村，村长徐世武。将哈尔呼吉、花拉道保两个保合并为哈尔呼吉村，村长范仲庚（先是徐世武，范原是助理员）。将程四家子、十家子两个保合并为十家子村，村长郑长仁。将三十户保、满洲岱保合并为三十户村，村长黄云卿。将西五家户、胡宝山、高世功三个保合并为胡宝山村，村长杜永书。将五棵树、白庙子、索格营子三个保合并为白庙子村，村长高永吉。将苗家窝堡、红八塔两个保合并为红八塔村，村长孙连才。全县共划一个街和八个村，随着保公所撤销之后，原来的甲也就改为屯了。康德六年又增设三合屯和索格营子村公所。索格营子村长李瑞（号雪峰，原满洲岱教员），三合屯村公所村长冯绍箴（后门玉璞）。

伪康德八年（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为适应其日趋紧张的局势，便于支持平台军工基地的建设，便于督促出荷和经济统制，又将胡宝山村的东五家户、西五家户、凤凰城、聚宝山及红八塔村的四马架、张俭屯、三畲堂等 10 来个屯设立了平台村，村公所设在平台，村长门玉璞，后来是刘景兴。由于哈尔呼吉村公所管辖地面太大，如六家子都近镇东了，就在楚伦坡东，即洮儿河堤东头增设了花拉道保村公所，伪满白城县农村的十二个村公所建制

直到 1945 年 8 月东北光复。

我是在胡宝山保通过考试进入街公所的。1938 年 5 月 1 日成立白城子街公所，我是 5 月 2 日到街公所的。街公所有几个系，行政系有王书润、董士庸，财务系有贺移坤，国兵民籍系有孙家象等人。当时街长是韩成林，是当地士绅。他的老叔早年曾任税捐局长，他的姑母是万福麟的大太太，万国宾则是他的表兄弟了。韩成林当街长可能也借万福麟的光，当时万福麟正在关内与日本军队作战，安排他当街长可能也是作为对万福麟等人的一种引诱吧。韩成林当街长时间不长，到伪康德 7 年就把他给免职了。因伪康德 6 年 3 月 24 日公布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法律开始实行，日本在白城子领事馆（现五金楼地址）撤销，日本居民完全由街公所管理。当时县城人口 25，000 多人（25，107 人）中，日本人就有 2，000 多人（2057 人）。伪康德七年以后“出荷粮”日紧，配给物品增多，人心不稳，街公所也派进了日本人任职，韩总和日本人顶牛。他的工作很不投日本人的意，就遭免职了。韩离职后，没有街长，则由日本人岛村副县长兼街长一职，副街长由酋本、遇那岭两个日本人担任，伪康德七年又派来安永宽任街长一职，安只呆了三个多月，也因没处理好同日本人的关系被调离。之后就派来日本人安武晨喜任街长一职，副街长先后由张玉麟、王盛贵（王尊庭，原县公署行政科长）担任。直到 1945 年 8 月光复。

我乍到街公所的时候，白城子街内仍是两个保，保下面是甲，大体上是一条街的方块为两个甲，甲下为牌，每

牌50户左右，光复后才将牌变成间。1938年年底，白城子街内才撤销了保，划了十个区，区有事务所，虽然不是一级政府，但有区长，副区长和事务员等，人民有事就到区里去办。特别是康德七年实行配给制后，区里的事就更麻烦了。配给的东西太多，是凡日常的东西，如棉布、胶鞋、白糖（粮食用户口簿）等都配给。先是发票，后来发现票易作弊，有票买不到，就用配给簿了。簿里面有项目，棉布一年一次，胶鞋一年几回，糖也每季给一定数量。各商店也有簿，也限制。各部门买统制的东西要请求，要批条子，如大米、白面都得批条子，布也统制。各家都有配给簿，都得到区上办理。街里服役、出劳工，日本人要修什么，从街上要勤劳奉仕，街上组织义勇奉公队等，都通过区，所以区里事情繁杂，工作很忙乱，几个人也干不过来，往往要找帮手。白城子街十个区的区划是：车站以东沙坑从南到北那一长条地带是10区；铁路居宅是9区；西门外是5区；1区在现洮北区公安局北至铁路；2区在现联营商场大楼以北；3区在现百货大楼以北；4区在八女百货大楼北；6区在浴池大楼以南；7区在地区医院大楼以南；8区在福仙居大楼（原明仁文化馆）以南。城乡有街、村公所，县、省有公署，伪中央有国务院，人称“四大政府”，伪满统治机构这才定型。

村公所有村长、助理员（相当副村长）、司计（会计）。村长负责全村工作，助理员辅助村长，司计主管全村的财务和村公所机关的一切收支。下设5个系，有庶务系，负责人事、掌印、文件印发、总务以及礼仪（祭孔孟、祭关

岳）等项工作。行政系，负责修缮道路、河川、桥梁和人口、卫生等项工作。财务系，具体负责理财、征收，征房地产税、勤劳所得税、附加费、卫生费及税金，收滞纳金，或豁免税金等。那时户口是双重管理的，街公所管户口，警察分所也管户口，也都查户口，但目的不一样。街公所管掌握人口数，控制统制物品发放，青壮年服劳役，出国兵；而警察分所是控制外来人和各种罪犯流入。至于卫生完全由分所管，街公所只是配合。征收附加费是街里花销，摊在各种税项上面的钱，加的虽少，街公所每年也能收上三万五万的，收上之后，归街公所自用；各村在收税时也加附加费，归村公所用。实业系，管工商业情况统计，土地播种面积统计；伪康德 7 年后还负责粮谷出荷、统制物品配给等，对土地耕作面积及时填写上报“割当”表（日语，即有情况数），后连种大麻籽，养牛、羊、马、鸡等都是得报数，都得分配任务。国兵民籍系，负责征兵、服役、劳工等。各系都有系长 1 人，事务员、雇员 4～5 人，夫役（勤杂工）1 人。一个村公所都有 20 余人。属实业系国兵民籍系最忙，所以人也多。村公所是合署办公，助理员、司计和各系长都是官，但助理员和司计是县里任命的，并对各系实行监督。各屯有屯长 1 人，每月 5 元“手当”（跑腿）钱，还有事务员 1 人，每月 30～40 元，相当村职员，是村长任用的；下面牌有牌长，没有钱。

街公所的机构除街长外，其它与村公所机构相同。在伪康德 8 年白城子升为指定街，提格了，各系都成股了。到了伪康德 9 年街公所的各股就变为课了。课长下有事务员，

还有若干雇员。课下不分什么，但有某项工作的担当者。各村也就变系为股了。以前的普通街和各村一样归县管，划为指定街后，就直归省管了，并成立筹备处，做进一步变市的准备。当时的街长就是日人安武晨喜，他来我就调到平台村公所去了。

白城变市在民国时就筹备过。兴安屯垦军民国十七年来白城子，要把白城子变为兴安市，所以邹作华督办出了很大力，修建了八大处，划定了街基，动员修门市盖房屋，现在的主要街道就是那时候规划的。当时买街基都得自出现金，但为了壮市面，修街基、盖房子，可以向银行借钱。当时白城子买卖少，富户不多，是个后开辟的地方，人们没有钱，修房子都是向银行借款的。如彭金山、韩成林等各家修不少房子，都是从兴大银号借的钱，是现大洋。各家都借出多少我不知道，我来白城子几次，看白城子修建的确快，只两三年的时间，房子全起来了，那时的白城子街内啥买卖家都有，有精忠书馆、大烟馆、饭馆等，市面很是热闹。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而没有变成市。兴大银号是国家的钱，后来政局变了，彭金山他们借光了，都白劳了一笔大钱。日本来后，也就没人提这些事了。

伪满康德五年或六年，日伪当局曾计划向白城县迁移日本居民100万，把白城子街向西护展到三十户，向西北至平台、平安镇，直到镇西（当时叫索格营子），要建成为一个大市。拟建纺织厂，以轻工工业为主，并有水产加工、罐头食品、淀粉加工等，同时也计划修建一些钢铁厂等重工工业。各工厂、商业区、居民区的布置，都制成图，存

于县都邑建设局内。由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们忙于战争，无暇顾及，这项计划也就随着流产了。关于城市建设，原来县公署行政科内有一管绘图姓邢的雇员，谁家盖房子都得找他批，并经他绘图。后来由行政科分出一个都邑计划局，局里有一日本人姓岛内，专管绘图。康德5年我调到街公所，大兴城市建设，岛内经常找我，说："黄商（"商"日语"先生"的意思）你的帮我改图，改一个图3角钱。"当时我负担不重，就帮助他修改，对图上的街道、胡同地名不符或位置不对的地方进行校正。我工作细心，很得他的赏识，于是他就拿出一个大的规划建设图来，让我校正。这就是白城子移民百万的规划图。由于白城子变市，移民百万牵涉许多村屯地名，所以，我才知道这项计划大致的内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都邑建设局就撤了，成了县公署建设科一个股，也就没有财力去搞建设了。就剩下日本这移民计划图了。

白城子街公所下属有一个窑厂，还有一个卫生场。窑厂在伪满初年就有，地点在城北三、四里地万家屯后边的德善屯，有好几垧地，主要是烧砖。卫生场在城西乱葬岗子西。有100多人，负责清除城内厕所粪便和清扫大街。选卫生场地点，日本人曾跑了大连、海城、辽阳、长春、四平等地方学习经验，最后选在了那里。那时没有汽车，往城外拉粪有40～50辆马车。城内修不少公共厕所，修的不怎么好，但很干净。雇有监督员，一天清扫几次，兼收卫生费，每户一月3—4角钱。就这样北门外日本住户还常常给街公所打电话，说厕所埋汰了，粪便沾脚了，就得叫人

去清理，弄得天天不得消停。五金商店大楼地址原是日本领事馆，领事馆撤销后，改兵士乃家，后又改军人会馆。现市工会地址伪满时是日本武术馆（柔道），康德四年街公所搬迁到那里，武术馆和军人会馆都迁到现劳动公园处，其路东又修了神社（后立石牌坊），北门外路东路西盖了许多房屋，全是日本居民的住宅（光复后全扒光了），成了日本人的居住区。因卫生场赔钱，后来就包给白雨希了。白雨希民国时曾在黑龙江省某师当过副官长，伪满住在白城子。他和郑漾桥关系好，由郑提议并用郑的恒丰厚粮栈担保，把卫生场包了去，由此发了财，白郑两家还成了儿女亲家。在城西乱葬岗子那还修一个火葬场，火化用的是汽油和柴油，人们都称为“炼人炉”。日本人大人小孩死了都火葬，交火葬使用费，之后将骨灰装在木盒里保存。中国人也有火葬的，但为数甚少。

伪满康德二年白城子就有大烟馆，康德三年最兴旺，有5个大烟馆，有俊兴隆、赛桃园，宝丰久、兴隆号、新兴号等。这些烟馆都归县里管，街公所不管。我在街公所一共四年，后期升为司计，兼总务系长，又兼庶务系长。那时是人财主义，我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什么靠山，完全是自己干出来的。我刚到街公所工薪是35元，一年内连提3级，长到50元钱，那一年我还买了一张一元的彩票，中了五彩，得了50元钱，确实很顺当。但街公所内工作也不是好做的。除两个日本人副街长外，街公所内还有几个日本人和朝鲜人任职。如实业系（管配给）的清水三浦、大久保，还有一个朝鲜人李某，财务的佐佐木（女），他们和副

街长一起都掌握着实权，特别是酉 本副街长他精通会计直接管理财务，对窑场、卫生场和火葬场的“三场”财经收支，都直接过问、查看，稍有疏漏，便遭训斥。

伪满时各街村的会计独立，司计负责财务工作，上级审计局经常来检查下面支出情况。来时事先不通知，一来就是一大帮，有二、三十人。到街、村公所后，屋内的人不许再干什么，都得站起来接受检查。他们对各股挨个检查，特别是对会计帐目和金库检查的更严。每笔大的支出和收入都检查单据，每份支出单据上都印有现成的报销表格，附在单据的前面，村长、助理员、司计、系长和担当者（经手人）都得盖章。每日金库内存款都有记录，10元的多少，1元的几张，甚至几角、几钱都得填好数目。在审计检查时，差几分几角还可以，如差多了就不行，就算失职，犯错误，就要受处分。所以做现金的，每日午后下班前必须下好白天发生的各笔帐，并清点库存现金，作好记录，以备检查。街公所管财务支出有三、四个人，而村公所只司计1人，各屯有记帐员（事务员）一人。司计每年末除了作当年决算之外，还要做好下年的预算支出。会计科目大的方面有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预算超越支出(追加)。

街公所每年开支预算要10几万元，其中卫生场就要花掉4～5万元(去掉收入)。当时俸佣工资有分别，街长、副街长、司计以上是官叫俸给，事务员叫工薪或薪水，雇员是薪金，佣人是工资。办公费的项目还有祭祀费，每年要祭关（羽）岳（飞)、祭孔（皇）孟（轲)，还有其他费用。

街公所的日本人经常过问帐目，我当会计，特别是接近年终，他们就问我还剩多少钱。当时每年年终结余，不论多少，都得作表上缴。他们听说还有多少结余，就填条子，如下乡旅费等项目报销，使一年预算没有结余，之后几个人平分（也塞给我一份）。

伪满康德八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街公所动员股的事务就多起来了。以前街公所主要应付日本军队经常调动，来一拨军队，就要一次劳工，主要是修整大青山的飞机场和从铁路上运输东西。当时汽车没几台，全是大车，当时叫服（劳）役。要人要车全向买卖家要，买卖家出不了人，就雇街内的闲散劳力。服役的人，日本军队虽然给点钱，但很少，除去吃饭，所剩无几。至于出“勤劳俸仕”、义勇奉公，这事归行政股管，则不给什么钱了。去劳工多数是修大青山的飞机场，这个飞机场不如平台北大岗上的飞机场大。平台是伪满一个大型的飞机场。大青山飞机场修建时忙于战争，无暇顾及，基础不好，简单，不规格，为适应飞机起落需要，每年都要整修几次。此外，每年到外地出劳工还要两三次，地点不固定。

白城子街那时只有 4，600 多户，人口 25，000 多人（1939 年统计 4，610 户，25，107 人），日本人就占 600 多户（675 户），2，000 多人（2，057 人），占城内户数的 15%，人口的 8%。他们不出劳工，也不出钱，所以当时城内买卖家负担是很重的。伪满康德六年，三合屯建村时即成“自然村”（即“模范村”，每县一个），外来人参观都去那里。三合村虽然地势高，在三合屯中有个大架子，是地高的标

志，据测量比洮南高出几十丈，但土壤肥沃，农作物连年丰收。建为“自然村”，县里专门为他们培养作物种子，进行种子改良，县里对他们优待，农民道场还派一名技术员进行指导。那年日本还在三合村排过电影，片名叫《满洲大地》，当然拍的是电影的一部分。在那里主要记录了农舍、牛羊群、高粮、苞米、谷子等农作物，还录了农民劳动场面，手摇“乌橹把”（提井水的工具）的情景，在放映时，还组织伪职员和居民们去看，以显示日寇所鼓吹的“王道乐土”。

伪康德八年4月魏绍书任街公所司计，我就到平台村任助理员（副村长）了。平台原来没有村的建制，是因为大岗军队逐渐增多，胡宝山村公所应付不过来而建立的。在平台村公所我只呆了8个月，于同年底（11月）我就调到大兴村公所任村长。

原大兴村村长是孙绍华（五家户保保长）。大兴那儿地主多，读大书的多，“邪神”也多。敌伪时期当村长一要体察民情，二是为当地农民（中小耕地户）解决些问题。孙绍华在那以“官相”压人，所以当地“邪神”就找机会告他，直到把他告走。大兴村管辖地面很大，下辖13个屯，83个小屯。白城子南部的土地好，民富粮丰。虽然哈尔呼吉、十家子靠河一带涝，但年年都有好收成。伪满以后靠河这一带因连年水涝都已荒芜，日寇借口“开发”把这些土地连同镇东县的一些靠河土地，全都变成了日本殖民的开拓地。镇东县给占去多少我不详细，白城县就给占去17，000垧，大兴村南部和东部土地全给占了去，整个草原为开

拓团所有。那时白城县是12个村，136个屯。伪满各村长都兼协和分会长，白城县南边四个村即大兴、十家子、哈尔呼吉、花拉道保算一个片，这四个村每年开一次协和分会会长联席会议，并选我当会议主席，连续三年，所以那边我去过不少地方。镇东县风水山那儿有日本开拓团，白城县给占去的大片土地都没有日本人，土地任凭荒芜，人们也不敢去种。就是有个别农户偷着种点小地块，夏秋日本人到各村调查，被查出来也得交“小作料”。

伪满康德八年正是“出荷粮”紧张的时候，过去农民虽负担“军粮”，但摊派的很少，还按市场牌价给点钱。那时的粮食也贱，一斤也就是几分钱。自从日寇扩大侵略战争之后，“出荷粮”的数额也增大了。起初，县里给一个“割当数”(据播种面积)，秋后按“割当数”“出荷”，交完“出荷粮”后都给一些钱和布。伪康德八年的“出荷粮”数是根据各村年初报的数要粮。康德八年正是涝年，而要的“出荷粮”却比往年高出很多。如大兴村2万垧地，要“出荷粮”5，0000吨，各村完不成，县里就派督励员去督促。督促不上来，就派县公署协和会等组成“督励班”下去催逼，对人们施加毒打，并各处翻找粮食，搞得很凶。我刚到大兴村，去的是县公署财务科长张太行，股长田光玺(外号田老美)，薛奎武(国兵民籍股长)，杨瑞峰(日本翻译)等一帮人。他们没来前，我就和农民讲，“你们一定要留足口粮、种子，之后再交‘出荷粮’。有就交，没有不可强交。留下的粮食，不能藏在明面或容易翻出的地方，要藏就把它藏好，不能叫人给找出来，找出来就得挨打。就

是挨了打，也不能乱说。”张科长他们来后我亲自领着到各屯农户去查看“出荷粮”情况。多数人家没有完成“出荷粮”。他们想要打人，我说：“打能完成‘出荷粮’还行，如果打也完不成怎么办？”他们没啥说了。我又说不是按年初的“割当数”吗？看那家欠交多少，就追要多少，交不足再给他们点时间，让他们各想办法。我这个人好说，到县里、在村里我都说：“没有粮就是没有粮。地都涝了，还产什么粮？”开伪职员大会时，县长把我好顿说，说我挡道。会后有人和我说：“没有粮也不能那么说，那样说话危险！”我说：“那不行，说有粮，粮食在哪里？完了老百姓受苦啊！我这村长怎么当啊？”我知道农民没有粮，说想办法，就是把事情拖一拖。出钱买粮，老百姓哪有钱啊！我找县长不行，于是我找县公署实业科日本人小川科长。我说：“大兴村遭受水灾确实不轻，农户的口粮明年有问题，种地都有困难，今年的‘出荷粮’难以完成。”请他和日本人副县长说说。日本人副县长问我：“你说的属实吗？”我说：“属实。”他又问我“你敢保证？”我说“敢保证。”他又问我“拿什么保证？”我说“剖腹。”日本人不讲起誓讲剖腹，以表忠诚，结果给减免了近一千吨。第二年夏天，我又找小川科长，说农民现在没粮吃，有的已揭不开锅了，现在莳弄地有困难。我是从城里去的，又在官厅呆过多年，小川相信了我的话，说：“你写条子来领米吧。”于是我就先在村公所给缺粮户打条子，小川批后，就直接到粮栈领米，完了我和小川算总数。那时大兴村缺粮户多，用小车、驴驮、担挑，你150斤，他200斤、80斤的，整回不少，群众很满

意，直到青苞米下来。那时官员间不准送礼，有特务、宪兵，一旦查出来，算行贿受贿，是犯罪，特别一些特务腿子总是闻风探讯，得点情报就往上报，所以他们也不敢收礼。于是我就借去城里办事的机会，请他下小馆，共同吃饭，他到大兴去，我也请他到家中吃饭，两人关系处得很好。以后我到索格营子任村长，又给那里减免过出荷粮500吨。

“出荷粮”事过后，我就和村公所实业系的人说，今年自报的“割当数”有去年的教训，地数和产量估计都不能报高了。对农民也讲，今年领配给粮就这么一次，明年就得自己想办法了。康德九年以后年成都很好，康德十年崔宝山转来当县长，这个人不象刘鸿漠，能替人民说话，敢“抗上”，不怕得罪日本人，但他只在白城县呆了一年多。我从配给农民的白面中，给崔宝山送去两口袋，他很乐，我又给日本人副县长送一只老鹰，所以他们对我印象都很好。以后“出荷粮”虽然仍很紧，但“出荷”数都完成了，吃的也就不那么紧了。

伪满时在各村都建立协和分会，分会与村公所一起办公，协和分会除了宣传“日满亲善”“共存共荣”“王道乐土”等内容外，还经常往上级协和分会反映人们的思想动向，有关作物生长及收成情况等。村长兼分会长，另有专职副分会长和书记（都是上面派来的），村长只是挂名，他们有什么事都要向村长汇报，村长一点头，他们就往上报了。兴农合作社在村公所派有驻在员，主要是反映农情，进行生产指导等。

刘鸿谟当白城县长时，去大兴村，到过四十户，到过交通窝堡。据说四十户在民国时还是一个大村呢，后来划入了苇子房。他在交通窝堡住过一宿，偏遇上有人报告一伙要钱的，叫他听到了。我对村公所的人说："你赶快告诉他们，县长在这呢，要耍就到别的地方去耍！"刘鸿谟听后说："哪耍钱，把他们都抓来！"并指责我说的不对，"上别的村去耍钱，也没出白城县哪！"我说："我是村长，不是警察分所长，不管耍钱。"刘县长听后更不愿意了。

为什么有人骂刘鸿谟呢？他在哪些地方不好呢？伪满康德七年刘鸿谟任白城县县长，刚刚上任就指出实业科所报的地亩数和农业收成与实际情况"不符"。本来白城县当时由于水涝实际耕地只有 14 万垧，他却报了 20 万垧，把开拓团占去的土地都给报上了。第二年的"割当数"就做多了，像春旱秋涝，粮食减产，刘鸿谟不下乡察看，却在省里大吹白城县丰收，结果"出荷粮"比上一年多了不少，多出的只好向各村硬摊派，向种地户硬挤，挤不出来，刘鸿谟就派人下乡紧追、硬逼。人们完不成，就进行打骂。我去大兴村任职时，就听到农民的谩骂声。刘鸿谟只顾日本人那边的一头热，而不顾中国人民，所以人人都骂他是汉奸。伪满时的县长、村长以及一些科长没有在一个地方呆长的，最多三年，就得调动一下地方。刘鸿谟没呆三年就走了。

伪康德 11 年 3 月 1 日，我转到索格营子村，那地方日本军队多，总向地方要车要马，地方百姓拉碱土，事先必须和他们联系好，不联系好，就不让你上大岗。日本人忙

于备战，每隔十天八天就来一批军用物资，从火车上往下卸东西，往大岗上运，都要地方出车、出人，最多时一天要过51辆，一个屯一辆车，并要很多人前去卸车，往北大岗上军事基地装运。村长经常的工作就是与日本军队打交道，来来往往，你找我要人要车，我找你网开一面，给予方便，每天都是这些乱事。在白城子日本军队很多，据我知道有培芝部队、国本部队、国芝部队、大岛部队、游佐部队……，有一、二十个。就大岛部队是战斗部队，其它部队性质不详。平台、平安镇都有飞机场，大岗上好几百里方圆内没有人家，又是最好的靶场和伞兵练习降落的好地方。后来大岛部队调到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去了。游佐部队，又叫336部队，是训练军马的，这个部队我去过，其他部队很保密，有些事，不让你去，更不让知道。

伪满的各村都有一个警察分所，分所一方面维护地方上的治安，另一方面也监督行政。如果村公所与警察分所处好了，麻烦事就少，如果不对头，出事就多。有次索格营子村公所司计和助理员杀羊，一个村公所20多人，打算大家分点，这事却让警察分所给检举到平安镇警察署，后又送到警务科。原来索格营子有一个张某还是我的一个亲戚。这小子很坏，专搞小报告一类的事。他和助理员、司计有别扭，一见司计和助理员杀羊，违犯了统制法，就向警察分所告了密。我知道后，就向他讲："你怎么能随便报告呢？你事前没告诉我就告密，这不是从中整我吗？"我把他说了一顿，随后我坐上火车直赶县里找了崔县长，正好崔县长收到了密告信，我把情况一说，才把事情压下来。

伪满时的警察厉害，他们可使用刑罚，并好动刑。打嘴巴、踢人是经常事。如灌凉水、灌辣椒水、打鞭子，什么都干。我见过灌凉水的。胡宝山有一个姓孙的，是个地主，不知道得罪哪个警察了，给整到警察署，把人放在一个长形木曹里，胸腹、膝盖都用绳子牢牢地捆在木槽上。在脚部垫上一个板凳，使头部朝下，再用一个月芽形的东西卡住脖子，然后用水壶往鼻子里倒凉水，使人喘不过气来，很难受。边逼问边灌，一会儿就从鼻孔流出血来。还有打鞭子、打棍子、打皮带，是叫人在地上撅着，露出后背和屁股，往后背上打，往屁股上打，往大小腿上打。日本警察用鞭子打人最厉害，他们是用鞭子抽打人的肋条，这和灌凉水一样，人都受不了。哈尔呼吉警察署长刘孟逵，原先当过特务股长。有一次抓赌，抓着几个人，把1个人绑在车轮上，然后用脚踢，脚上穿的是皮鞋，踢几脚一下子踢到小便上，就把人活活给踢死了。虽然撤了刘的职，通报了，但人也活不了啦。所以在伪满时人人都怕警察，恨警察。

我在索格营子只呆一年多时间，家在白城子街里，每日早上坐轻油车去，晚上坐轻油车回来，很方便，司计和助理员也来回跑。1945年8月11日我回的家，8月12日苏军就进了白城子。以后我再没有去索格营子（镇西），那里有我的皮包，有衣服，有收音机，还有一些其他物品。起先是因为正处于变乱，我没有去，后来，我在公安局工作，也没有去。我不是怕那里的群众，群众对我很好。我想群众拿去就拿去吧，要在群众手中再拿回来对谁也不好，因

为我那时很有权。

我在伪满时当了8年多伪职员，特别是当了三年多的村长，没给人民办多少好事，也没做下什么坏事。解放后土地改革和历次运动群众对我没有提出什么，我感到欣慰。现在提出要抢救伪满史料，对我来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年纪太大了，蜡头不高了，只有密切配合，讲出自己所历、所见、所闻的一切人和事，做为自己的奉献吧。

（根据录音整理，整理人文建章、潘殿刚）

伪满镇东县兴农合作社

张乃仁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沈阳北郊柳条沟事件的一声炮响，硝烟弥漫天空，风云骤变，来势迅猛，诚有迅雷不及掩耳、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我东北辽、吉、黑三省相继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很快踏遍了整个东北。从此我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北三千万骨肉同胞陷于水火之中，惨受灾难。这十四年的悲痛历史，令人不堪回首。

兴农合作社的成立

日本强盗先是军事占领，由东北而华北最后使战火遍烧整个东南亚。强盗侵略的目的在于奴化人民，掠夺经济资源。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后，一手镇压人民，一手掠夺经济。东北农村是整个东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有效地掠夺农村经济，日本人成立了无所不包的“兴农合作社”。

早在一九三三年，即伪满大同二年，镇东县成立了金

融合作社和农事合作社。金融合作社办理信贷、储蓄业务，吸收群众浮动资金；农事合作社办理农业、畜牧业务。迨至一九三七年，时值“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出于扩大战争的需要，向东北人民加紧掠夺战争物资，遂将原金融、农事两个合作社合并为“兴农合作社”(伪满全境大都如此)，镇东县伪兴农合作社应运诞生了。地址在现在车站货物处稍南处。

日本侵略者及傀儡政策厚颜无耻地美其名曰“日满合作”，唱着“振兴农业、开拓生产”的滥调。但经过一个时期的验证，群众一眼就识破了他们是通过一合法机构，向农民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一车车，一列列，满载大豆、高粱……，农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粮食和农副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作战前方和日本本土。粮谷出荷后，东北老百姓虽丰年也不得温饱，农民不叫它“兴农合作社”而骂它为“坑农活作孽”。由是观之，伪兴农合作社纯系日本全面垄断我东北农村经济，残酷榨取民脂民膏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日本官办的大型掠夺机构。这就是伪兴农合作社的性质！

兴农合作社的机构和职能

由于各地资源不一，兴农合作社设置的机构亦不尽同。

伪满时期的兴农合作社是从伪中央到地方，设置的一条龙的垂直机构。伪中央设有兴农会，省设有兴农合作署，县设有兴农合作社，行政村（相当于现在的乡）设有兴农

办事处，最基层由三二个自然屯构成兴农会（相当于现在的村）。垂直机构体现垂直领导。县兴农合作社受伪中央兴农会及省兴农合作署领导，不受当地县公署管制。县兴农合作社管理本县农业、畜牧，经营农民日用必需品，收购农副土特产品以及办理农贷、储蓄等业务工作。各行政村兴农办事处的驻在员管理本行政村范围内的农、牧、购、贩和农贷、储蓄等综合业务，起中间纽带作用。

具体机构及其职能是：

原镇东县兴农合作社设理事长一人，为最高领导人，由日本人高野担当，人们叫他“大奔楼”，以其有大鹅头故名。副理事先是一人，由日本人大冢担任，人们叫他“大胡了”，以其两腮长满胡须故名。后增至三人，一个姓柳的、一个姓杨的。正职主持本机构的人事任免、升晋级、奖惩及方针政策的把关，副职协助理事长工作，并监督内部工作人员的工作。

下设：

一、总务部（即理事办公室）

部领导为主事，属司事一级。由日本人西科任职。下分三个系，领导为系长，属司事补一级，本部有工作人员（雇员）二十人左右。

1、庶务系：系长由西科主事兼任。掌管人事工作及文件收发档案等事宜；

2、企划系：系长为日本人小原。掌管全社各项工作计划等事宜；

3、总务系（即财务系）：系长不详。掌管工作人员的

工资发放，公务费的支出，以及其它事务工作，并于年末年初向中央、省署提出预决算等事宜。

二、农事部

本部主事由日本人久森担任。专门掌管农业生产，掌握农事、农时、农获等项工作。全部工作人员二十人左右，下分两个系：

1、农事系：系长王惠卿。主管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式农具，如双轮双铧犁，中耕除草机，脱谷机等的使用（开现场会）宣传并推广粮谷优良新品种等事宜。农事系下设农业试验场，宣传并示范农药、化肥的使用方法；怎样消灭病虫害；宣传并推广谷物及瓜菜类优良新品种的种植，示范新式农具的使用。

2、畜牧系：系长杨怀川。掌管畜牧业生产，改良当地家畜家禽品种，推广家畜家禽优良新品种等项工作。

三、信贷部

主事先是柳镜心一人，后又配备于春熙一人，柳提升理事后，于为主事，有工作人员十人，下设储金、贷付两个系：

1、储金系：系长鞠福纶。掌管向种地户及富裕户强制摊派存款储蓄事宜。

2、贷付系：系长姓张（外号张眼镜）主管农业贷款的发放及回收。先对贷方作经济调查，了解有无偿还能力，以土地执照做抵押。不贷给贫困户、贷款户到期不还，讨款上门，破产还债。

四、购贩部

主事由日本人河田担当，约有工作人员十五人左右，下设两个系：

1、购买系：系长周玉衡。该系根据出荷粮、上缴野干草（羊草）、谷草（专为关东军九八三部队收购）的单据数量售与农户日用的麻线布、棉花、棉线、煤油、火柴、豆油、豆粕等物品，现金付货。大约每吨粮配给麻线花洋布30尺，棉线一支，棉花2斤，油、盐、火柴配给量记不清了，数量是不多的。

2、贩卖系（特贩系）：系长先后由日本人松尾、江川及汉人黎代明担任。主管土特产品及粮谷的收购。如出荷粮军用红萝卜、狗宝等蔬菜以及军需野干草（羊草）、谷草等的收购事宜。

该系除在社里有数名记帐员工作外，还设有捆包场、粮谷交易市场、家畜交易市场，作各自日常业务工作。

捆包场：负责人为主任，前任费大昌，43年秋至44年秋为张乃仁。地址现车站货物处西南不远处。占土地面积约三公顷。各村种地户按县公署依耕地面积摊派的羊草、谷草出荷任务量，到秋送到所属捆包场上缴。先由目测员以目力按车的大小、途程远近、煞绳松紧等情况，酌情估数（检斤）、验质（当时没有地中衡，以后才设置），由山积员管理上垛，后由记帐员在所属兴农会户头上下帐、发票据。每个户头都记有总任务量，直至完成上缴任务为止，再用捆包机捆包上垛。由关东军九八三部队检斤验质后，经车站向部队发送。每年要上缴羊、谷草数百万斤，专供军用。外雇夜警员（临时工）数名，日夜防守。

粮谷交易市场：按收出荷粮、小租料等事宜。有工作人员十几名，掌管检斤、验质、划价、开票等项工作。收库后交三泰栈（日本人办的全伪满统一的粮栈）仓储、发运。

家畜交易市场：管理家畜交易事宜。当时有张羲太负责收管理费。

根据我县地理环境，本社在东屏村又成立一个支社，以便工作。主事张俊举。机构及工作职能范围与本社相同，只不过是规模小，人员编制少而已。东屏支社也设粮谷交易场及捆包场。粮谷交易场主任姓高，捆包场主任张乃仁。东屏支社工作范围不大，只负责东屏、英华两村的粮谷、军草的收购。

罪孽的粮谷出荷

罪孽的粮谷出荷给农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每年当春耕夏锄之交，由伪县公署农业科组织工作人员下乡做出荷粮的割当（摊派）工作。即按耕种土地面积向种地户摊派出荷粮及军草任务。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使上钱送上礼可少摊点，无钱无势的种地户遭了殃。任务强行摊派，还得签字划押。缴出荷任务，也以县公署催粮人员为主，配以警察、村雇员以及兴农办事处的驻在员协助催派，迅速完成出荷任务。先是只种地户有出荷任务，以后耪青户也同样有割当量（摊派），这一下可苦了穷苦的农民。

据了解，催粮组每到一兴农会，没见到过官府的农民，

吓得东藏西躲，闻风逃遁。而这些催粮员如抄家一般，翻箱倒柜，扒炕抠窖，到处刺探，寻找藏粮，甚至秽口骂人，皮鞭加身，闹得鸡犬不宁。正如柳宗元所写的《捕蛇者说》中，蒋氏介绍那样："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犬不得宁焉"。恰似对催出荷粮的真实写照。

就是那些大的种地户，对催出荷粮的也是恐惧得很，笑脸相迎，奉为上宾，供给香烟美酒，珍馐佳肴，热情相待，备极优隆，惟恐招待不周，不予宽限。遭大殃的是穷苦的农民，他们除了给地主的还能有多少粮呢？如遇天旱水涝，打完场，吃的都没有，哪有粮交出荷呢？这些催出荷粮的翻不出来粮就打。农民有的逃往北山里，有的被逼无路与之对抗，甚至动手打催出荷粮的，这样的事情到处可见。这正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按规定，农民送的出荷粮、军草等应配给一定数量的花洋布、棉布、煤油、豆油、火柴等生活日用品，但被县、村、屯三级的截留，到农户也就所剩无几了。屯兴农会长都是有钱有势的地主，他们什么坏道都想得出来，他们往豆油里兑苞米饭米汤，把火柴包打开，每盒都抽出一半多。有的农民能摊上几小盒，有的还得不着，真好象几千年前原始时代的生活。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吃紧，出荷粮、草的任务越来越重，配给越来越少。由出荷粮草、所配给的棉布不见了，只给一点花洋布。这些花洋布是以小叶樟或豆秸等原料生产的人造纤维纺织而成的，或是"更生布"。这种布不抗洗涤，

洗上两水就搓碎，做棉衣几天就露棉花。穷榜青户除完成出荷粮任务外，所余尚不足糊口，有的打完场就没粮了。每到青黄不接时节，就得出高利向东家借粮，年复一年债台高叠，永远不能翻身。哪有余粮出售再买棉布做衣穿。再说，棉布是统制品，有钱也买不到。那就只好有啥穿啥，不少老年人把年青时结婚做的花被面做衣服了。当你走进农村，夏天，男人多是光膀子的，小孩上下无根丝，冬天，男女老少都是花衣服，有的是花布，有的是衣破露出的棉花，真是满目凄惨，不忍目睹。

伪满时期，日本人制造的兴农合作社给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带来的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啼饥号寒，罄竹难书。所以那时人们把兴农合作社咒骂为“坑农活作孽”。

东北人民的十四年亡国奴生活终于过去了，全中国终于解放了，但我们中国人绝不能忘记日本侵略者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忘记就意味着对祖国的背叛。

伪满安广县协和会本部活动片断

刁秉正　李治安

伪满初期的日满友好协会于1936年（康德三年）改为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省、县各设本部，街、村设分会。1940年（康德七年）实行二位一体制，伪省长、次长兼任协和会省本部长、副本部长；伪县长、副县长兼任协和会县本部长、副本部长；街、村长兼任协和会分会长。凡公、教人员穿上协和服（黄色翻领、四兜、背有三道缝一腰横）勿须申请、审查、登记都是协和会员。省、县本部设事务长总揽会务。事务长的身份和省次长、副县长是平级，有参与省、县重要机密会议的决策权，并监督政府执行工作。

安广县协和会本部事务长叫清水幸雄。本部下设三个班、两会、一所。即指导班、庶务班、青年班、军事后援会、国防妇人会、青年训练所。协和会具体活动内容是：

一、掌握国民思想动态，指导人心归一。在建国初期宣传日满协和，建设王道乐土，后来宣传"共存共荣。"说什么，没有日本国，便不会有满洲国，日本国是满洲国的亲邦，协和会是满洲国的母体，她孕育着满洲国的诞生，所

以满洲国不能和别的国家一样，称日本为盟邦、友邦，而应称为“亲邦”。因日本裕仁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要求在满洲国都建立神庙，奉祀天照大神。每天让公、教人员、学生向建国神庙遥拜。宣扬“国本建于唯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四海清明”。一套鬼话，妄图制服人心。而对辱权丧志的封建迷信活动，却纵容他们为所欲为。什么宣讲感忠感孝的“道德会”，宣传“基督福音”的礼拜堂，宣扬“三老四少的家理教”，以及和日本同宗同法的“佛教会”在安广县盛极一时。凡无干反满抗日嫌疑者均不加制止，皆得政府、协和会的支持。如1945年安广县化缘修庙，演戏酬神，县本部长偕夫人登台欣赏，副本部长也举办赛马大会助兴。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宣战，以满洲国为总后方，伪满政府发表一系列战时紧急措施纲要，协和会亦拟定战时工作纲要。安广县公署、县本部随之抓紧抽丁（国兵、劳工、勤奉队）、要粮（增加出荷、限制民需）、收缴金属（充做军需）、开展协和必胜飞机献纳和战时国民储蓄增强运动。12月27日公布《治安维持法》和《治安维持法施行令》，12月30日在满洲实行大逮捕，相继公布《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及实施两法的手续令。“思想犯”、“要视察人”的范围越划越大。套莫嘎屯雷云岫教师，有人告他篡改“国歌”被通辑捉拿，幸他逃走外地免遭“文字狱”之灾。解放后，雷当选为政协大安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二、训练青年，贯输武士道精神。协和会安广县统监

部青年训练所主任，名叫夏秋四郎，有一名教官，二名辅导员。学员由各街、村协和分会选送。年龄16—18岁，身体健康的男性青年，不收佃农、贫农子弟。在城镇则抽训工厂、商店的徒工和店员，每期每班集训50人，六个月为一期。学习内容“文科”、“术科”各半。文科包括建国精神、数学、语文（日文、中文）。日文学习生活用语及操练口令，中文数学是国民优级课本。术科授以步兵基本操典、队列变化、扑打刺杀、射击投弹等动作，但不发予真枪实弹，每人各执一支长约2米的八楞木棍，在操场上呼喊跳跃，做模拟表演。当时这根木棍的美名叫“建国杖”，世人蔑视他们是“棒子队”唬洋气。

说起“棒子队”，在受训期间是吃些苦头的。日本人授以“武士道”精神，每天6点起床叠齐行李，外出跑步20分钟。跑步前先集合遥拜建国神庙、皇宫、帝宫各行三鞠躬，接着背诵“国民训”。跑完步入室盥漱，冬夏都浴冷水。每日三餐限10分钟吃完，入座后，面对饭菜静坐一分钟“当思来处”，感谢神的恩赐。待用日语齐喊一声“可以吃了”，才能动筷。伙食是粗粮、蔬菜，每周改善一次，见点油星，吃顿馒头。就寝前点呼一次，严查漏宿。青年人想家，也不轻易给假。文化课和术科都安排在上午，下午多半是参加劳动或社会活动。如脱坯、打墙、抹房子、铲地、打草、站岗、放哨，都是义务劳动。在训练和劳动中，学员们稍有怠慢或失误，教官、辅导员则拳脚相加，左右开弓打协和嘴巴。折磨其形体，征服其心志，使青年人俯首听命，作殖民者的驯服工具。训练期满，发给一纸毕业证

书，从而取得了“三个优先”、“两个光荣任务”。即借助协和分会长的推荐介绍，当国兵优先擢为上等兵；去勤奉优先选为劳工小队长；谋差事优先；街、村协和分会下达各项任务，光荣差使他们下去跑腿学舌。如遣送出荷粮、回收废铜铁、摊销公债、通知防空演习、灯火管制。遇有省长进京述职、皇帝出京巡狩沿途戒严，都少不了他们站岗放哨，完成这项光荣任务。

三、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巩固其殖民统治，首先是对中国青少年进行奴化教育，征服中国民众之心。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就在关东州、南满铁路沿线租界地内，以重金搞智力投资，从小学到大学建立起完整的奴化教育体系，免费为华人教育子女，灌输东洋文化，培养亲日情感，为侵略中国作准备。满洲建国前后，日本侵略者将这批人加以重用，为其统治中国人民效劳。如安广县两任县长。刘茂林毕业于旅顺师范，李连馨毕业于奉天南满中学。县公署中有的科、股长，协和会的指导班长都是公学堂的毕业生。他们凭效忠日本天皇的奴才思想和流利的日语，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从维持会到人民政府

黄显升

伪满时我在白城县索格营子村（今洮南市镇西镇）任村长，家住白城子，每天坐轻油车（以轻油为动力的火车）上下班。

1945年的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我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9日、10日镇西岗上的日本要车很紧，运输家眷和物资，用火车往南运。8日那天还征一批国兵，由村行政股长王文成带到县里，也没有检查，到11日就都回去了，得到日本的失败消息是11日晚。那天是星期六，我下班，在镇西火车站上车，火车里全是日本人，很拥挤。因为我和铁路的人认识，要不我也上不了车。在车上我才知道那里的开拓团日本人已经撤走，只见有几只他们丢下的狗，在车站内跑来跑去，显得很颓废。火车到了白城子，下车一看车站内有好几列火车，车上全是日本人和他们的家属，车头冲着新京（长春）方向在有气无力地喘着气。有的日本人提着大皮箱正往车上挤，几个日本女人一边叽里哇啦说着话，一面发出抽泣的哭声。我不懂日本话，也不知他们在说什么。出站之后，天上还掉着雨点，街上叫买叫卖照

常，只是日本人不见了，穿着制服耀武扬威的警察也少见了。一路所见，预感到有重大的变故发生，但决没有想到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这么快。

1945年的夏秋多雨，连续下40多天雨，过八月节以后还下大雨。8月12日是星期日，我没有回镇西。上午10点来钟天晴，苏联红军先头部队的坦克车进了街。早在11日白城子就成立了维持会，委员长为孙硕民。苏联红军一进白城子，孙硕民等领着一些人到北市场去迎接苏联红军，我也去了。

头一天晚上这街上一些地方就起了火，都是日本人放的火。白城子火车站首先起火，接着守备队那院子（现麻袋厂地址）起火，还有一些日本军用仓库起火，伪县公署总务科保存的档案，也用火点着了，好象是统一行动，都是日本人点的火，全城内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第二天（12日）火车站内还有一些没来及逃走的日本军人，他们聚集在一角，身上的肩章、领花不见了，每个人的军帽上都围着一圈白布条，表示降服了，也没人管理他们了，只有兵士乃家（现五金楼）那地方有日本人反抗，苏军用炮轰几下。那时安备队都走了，县医院也没有人了。有人说，县医院里还有一个日本人是个女的，还是病号，我就拄着一个棍子去了。正好遇到王介眉，我就同他一起去看。那女人眼看要死了，医院里的药品都叫人们抢光了，这病人也没有人照顾。我和王介眉说，红十字会应把她收留起来，他叫人把这女人抬走了。当时火车已经不通了。我曾往索格营子打电话，电话打到警察分所，是韩司计接的。他说助

理员走了（回白城子），别人也不在了，并说，原来的村长李瑞（李雪峰）也回索格营子了。我告诉他，以后和他用电话联系。以后电话也打不通了。李瑞就在那里维持了。

苏联红军进白城后，朱尚达曾在伪县公署的大门外挂出“白城县苏维埃政府”的大牌子。是孙硕民和王盛贵在协和会那院子写的，朱尚达叫人挂出去的。

8月13日白城子抢的最厉害，全街大部人都行动起来了，齐奔向日本人仓库、宿舍和伪满各机关，当时称之为“拣洋捞”。群众认为日本人的东西是“洋捞”，伪满洲国各机关的东西也是“洋捞”，甚至街公所内往外租用的孝衫、孝帽都让群众当做“洋捞”抢走了。人人都知道“老万大楼”那是日本人的军需仓库，有东西，凡是罐头、白糖、精粉，还有军毯、军服等物都一抢而空。

到了8月14日、15日要抢的浮物没有了，就开始扒房子、起瓦、抠砖。北门外原是一排排日本人住宅，两天工夫扒得只剩一片残迹。还有林兼株式会社在城东（现造纸厂），有淀粉厂和罐头厂，1940年建设的，是日本军用肉类加工厂。不但有骨胶、血粉、灌肠、制罐等车间，还有很大冷冻库，光正式职工就有300多人，如连临时工人在内将近千人。就这么个大工厂子，几天工夫，也荡然无存了。

8月13日我正在家街门口站着，看着人们抢运东西来来往往，伪满县警察大队长杨荆璞挎着枪骑着马带着几个兵还在街内巡逻。他向人们喊：日本人扔下的财产都是国家的，大家不要抢，等待国家来人接收。当时日本人都跑光了，他是伪满的一个警官，他的话谁还能听。我向他说：

“现在政局变了，祖国光复了，你还管个啥。你现在管不了啦，可别伤害人啊！”他看管不了，之后也就不管了。

白城县的维持会是在日本人撤退当时成立的。8月20日维持会的人把我找了去，叫我在逆产管理局工作，局长是白雨希。我在局内的总务科办事，每天就是派人下去了解敌伪财产现状，随时整理材料向委员会报告。当时维持会的委员长是孙硕民，副委员长孙益堂、王盛贵。维持会有财务局，局长忘记了；设行政局，局长由王盛贵兼任；有司法局，司长忘记了，伪满检察官李毓秀（外号李半年）也在那里；有公安局，名也忘了；还有一些其它局。由于我在那只呆几天，现也记不清了。维持会人员有60～70人。

8月27日，苏联红军城防司令部将维持会改组为政务委员会，并委任朱尚达为公安局局长并兼任公安队长。不几天，又派来一个县长叫朱琴轩，不久又回王爷庙去了。因为我过去学过法律，又做过司法工作，朱尚达便把我调到公安局。公安局下边有30多人，共分为四个科，有侦察科，由朱尚达小舅子孟祥春负责，下有十几个便衣勤；有司法科，由我负责，后来又来一个副科长阮济群，下面办案的有几个人，后来阮济群调县政府做秘书，我也于1946年到公安处去办企业去了；有总务科，科长刘景星，副科长孟繁星，后孟繁星调走，又来一个夏同河任副科长，夏呆不多日子也调到公安大队当团副去了；还有治安科……。县里的监狱和看守所都归司法科管，两个看守长，一是孙绍武（大兴人），一是杨俊峰（平安镇人）。局长办公室还有两个人，一姓汪，一姓杨，姓汪的跑道。杨荆璞也在公安局，具体用他跑些事务，因

为他工作熟，但没多久，就离开了。

朱尚达对公安业务不熟悉，我曾向朱提议，过去的老人（指伪警官、职员）得用一下，不用他们对我们工作不利，临时还得用他们，以后可以把他们调离。朱尚达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也向公安局和公安队介绍一些人，有的是伪职员，有的是伪警官，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都没有出现啥事。

维持会也好，政务委员会也好，都是临时组织，主要工作就是接待苏联军队，安排食宿，因为没有权威，地方上的事也管不了。它虽然有武装，只是吓唬一些老百姓。当时的苏联红军很有权威，主宰着白城子街内的政局。公安队成立后要人民交出“抢”来的那些日伪“洋捞”。苏联红军司令部内有个芮翻译，在群众交“洋捞”中，乘机捞了不少东西。芮某原是日本人某单位的薄役，会几句俄语，在变乱中投机当上的苏军城防司令部里的翻译。他领着苏联军人到各家串，翻找“洋捞”，发现就罚款，并把东西拿走。他不但领着苏联军人翻“洋捞”，还领着他们找“马达木”（女人），弄得街内居民提心吊胆的。1946年春，苏联军队一撤走，公安局就把他扣下了，并根据人民的控告，给枪毙了。

在维持会改为政务委员之后，九月初，高清成立了国民党，党部就设在市新华书店处（伪满谷口商店）。高清原是教员，也在苏军城防司令部当过翻译，他成立的国民党部苏军也是支持的，夏尚志的队伍来了之后，他不讲国共合作，却处处和共产党作对，夏尚志就把他们七、八个为

首的党部要员给抓起来了。那时部队没有军法处，就押在公安局，并责成公安局处理。押了一段时间，后经与公安局长马远培（八路军派来的）研究只押捣蛋的高清一人，其余人不是主要人物都给放出去了。

高清在没押之前，在县里也很蛮横。有一次白城子公安队奉命去镇东，被那里的土匪打死一个班长。后来接到一封密告信，说有一个名叫谢江的与镇东土匪有联系。后来七中队长刘万富在白城子铁道东抓住了谢江。高清（当时是白城县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主张用谢江给死去的班长祭灵，我不同意。我说没审问清楚怎么能去祭灵呢？当时公安队的一个队长却骂我，说我袒护“土匪”谢江，但公安局长却支持我的的意见。经过审讯，和到镇东县查清，原来谢等几个人拣得20多万元钱，因分摊不均，被那人给写了黑信。他们硬说谢江手中的钱是镇东土匪给他的刺探军情经费。实际这是一起诬告案件，谢江和镇东土匪根本没有联系。现谢江在白城市离休后去世，我也无愧于他的后人了。高清用谢江祭灵一举，表面上是对地主土匪武装的憎恨，实则拉拢县公安队，挑拨八路军与群众的密切关系。

枪毙高清是在光复军打进白城子头一天晚上进行的。在押高清的期间虽然进行多次审讯，原没有枪毙之意。但在光复军围攻白城子期间，就有些风言风语，说有人要抢高清，公安局长马远培决定，立即枪毙高清。枪毙高清是在晚上六、七点钟进行的。从监狱中把高清提出来，他还以为是审讯呢，走在看押士兵的前面，到了北大岗子（伪县公署北墙外）就把他毙了。同时枪毙的还有铁路护路队

的头子许振中，他也是国民党员。

陈子平（志平）伪满时是白城子宪兵队的大特务，他与刘景兰、何化新（何大包）齐名，干了不少坏事，叫人给捉住了。陈的家属和亲友纷纷托人说情，还有一些大买卖家联名出保。当时从关里来的一连八路军连换季的衣服都没有，冬天是棉袄棉裤，夏天把棉花抽出去就成了夹衣，特别是新扩进的士兵，穿什么衣服的都有，很不像兵的样子。我和局长说，现在这些买卖家出保，不答应他们易失民意，从法律上来讲可采取具保候审的办法，有罪恶可以慢慢查，陈子平有钱，家在白城子，也跑不了。马局长同意了我的意见，叫陈家出十万元钱，保人联名出具，放出了陈子平。这十万元拿出的挺快，当然不光是陈家自己拿钱，都是一些保人，一些大买卖家拿的钱。如汇源涌、福丰达、洪昌源等都垫（借）给不少钱。我曾问过他们："你们保他干啥？"他们说："不保他，就可能处死他。平时他对咱们都不错，能眼睁睁地看见他死吗？"这不是他们的心里话，实际保陈子平他们另有打算。这十万元不但解决了棉衣、棉鞋，也解决了不少军费开销的大问题。在陈子平放出之后，他就离开了白城子。光复军打进白城子的时候，他又回来了，并在街上很活跃。后来苏联红军一打炮，他就与光复军一起逃出白城子。1946 年在泰来什么地方又抓住了他，根据他的罪恶和保释后的行径，就把他枪毙了。当然筹集军费主要还是通过收税款的办法解决，还有对不法商人，如贩私盐、偷漏税罚款等办法。马远培没带家眷，还有阮济群，我安排哪个买卖家，哪个买卖家也不愿解决他

们的食宿问题，可能害怕以后政治形势变了，自己受牵连吧。我到玉兴栈找到刘冀孟经理，刘慷慨应允，足见商人的政治态度也是不一样的。

夏尚志带着一连人到白城不久，马远培就任公安局长了，朱尚达任骑兵团长。那一连人由王国华营长指挥，王营长住福丰达烧锅，那一连人有的做司令部的保卫，有的看监狱，哪里的工作困难，就把他们调遣到哪里。

朱尚达的骑兵团在夏尚志没到白城子之前称为公安队，夏尚志接收白城子后，又扩大了队伍，改称为公安大队。骑兵团就是在公安大队基础上组建的。伪满初年曾任警察大队长的郭振东先任公安队长，当朱尚达兼任公安队长之后，他就任公安副队长，不多日子也就走了。朱尚达扩建公安大队时，只几天工夫就组建了几个中队，这些中队长有刘万富（大青山屯地主）、孙相臣、李方甫、梁永等人。经常在白城周围活动的有四个中队，农村其他区虽然也组建了公安队，但没啥活动。刘万富的中队驻大青山屯，那三个中队驻在城里，梁永在城里还成立了公安分局，贺移坤任分局长，地点就在伪协和会（地区电影公司）那院。后来派贺移坤（任中队长）去增援洮南打光复军，这个分局才撤销。朱尚达的骑兵团成份复杂，那些中队长原来就和光复军有联系，都有不同的政治目的。

1946年元旦光复军打白城子，朱尚达的骑兵团及其几个中队大部人员叛变，只有夏尚志带来的那连人坚决抗敌。光复军在围攻白城子时，不知从哪里弄的大炮，在青山屯往城里打炮。他们没炮兵，也不会测量，炮弹啾啾地从城

上飞过，都落在城南草地里了，一个人也没伤着。

光复军打进白城子时，公安局有名的全走了，县政府有留下的，基本上都是当地的人，也不出名，他们都回家了。我在公安局主管审讯，人人都知道，就在光复军打进白城子那天晚上，我是和马远培局长等人一起从北门附近城墙那儿出的城，光复军进城之后就进各家去抢，我们穿的都像老百姓，他们也不注意我们这几个人。跑出之后，我们就住在五家户一带，分散住在几个屯子里。为了避开光复军的袭击，黑夜里也不敢睡大觉，在严寒的天气里，一会儿一转移地方。夏司令的部队在城内还留几个人，经常传递城内的消息，等光复军被打出城，我们就回来了。

光复军攻进白城子之后，它的司令部就设在玉兴栈，司令是镇东的王魁武。首先就到监狱救高清，他们不知道高清已在头一天晚上被我们秘密枪毙了。接着搜八路军和县政府留下的人员。我听人讲，有个光复军的旅长曾指名道姓的抓我，他是梁荣（伪警察，因在徐团长家一带抢劫，被公安局枪毙，是我办的案）的朋友，要为死去的梁荣报仇。阮济群（当时的县政府秘书）当时没走了，梁荣有个兄弟就把他送去了，玉兴栈叫他刷碗。有个光复军头目问玉兴栈里的人，“这里有没有八路军？”有个赵掌柜的指着阮说：“他就是！”光复军的一些人把阮秘书的脸都打肿了，后来要枪毙。王盛贵这时已投靠了光复军，说“先别毙他，往后再说吧，他只是一般干部。”阮济群才没死。打退光复军的第二天，我说：“把赵掌柜的抓起来！”马远培局长说：“咱们经常在那儿吃住，抓了他，对不起刘冀孟，况且阮秘

书还没打死。”还有李铁兰是一个媳妇，也是县政府的干部，光复军抓住她以后，大冬天脱掉衣服打，后来也要枪毙，因为苏联红军动手快才没死了。类似李铁兰被光复军抓住的还有几个，都挨了揍。苏联红军一打，光复军顾不得他们了。实际光复军是在1月2日早上7点多钟在街里出现的，到了下午一点多钟苏联红军就开枪开炮把光复军打跑了，不像在洮南进城之后，又娶媳妇，又建立伪政权，在白城子连一天也没呆上，就给打跑了。光复军攻城时是号称万人，实际没有那么多，也就几千人吧，跟着他们吃溜达的人就有一半。这些人没有枪，杂在土匪当中，进城就抢，特别是城边子的住户所拣的“洋捞”，几乎都叫他们抢光了。等苏联红军一开炮，他们为了逃命，抢的东西也都扔下了。

苏联红军在白城子驻军只有百人左右。打光复军时，是从长春方面来的专车，士兵有300多人，进城就打，那时县政府在福仙居大楼，苏军司令部就在它的对面小楼里。光复军攻打白城子，苏联红军以为他们是国民党军队，苏军恪守中立，没有动手。进城后光复军一抢，朱尚达及城里大商人他们都跑进苏联红军司令部，一说，苏军才知道进来的是一伙土匪。苏军首先是在现百货大楼那儿开的枪，机枪架着往西打，大帮土匪都在汇源涌烧锅（现鞋帽一厂处），枪声一响，土匪见是苏联红军也不敢还枪，就往西跑，也有的跑到南趟街往西跑的。这些光复军没有打过仗，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他们各自顾命，互相抢道，拥拥挤挤，他们的马哪能跑过机枪子弹，沿街打死不少，后来苏军又向西门那儿打了一炮，把一个匪徒身上的零碎都崩到电线

上去了，使土匪更加惊恐，溃不成军，纷纷逃命，从此号称万人的光复军被苏联红军打散了。

把光复军打跑之后，首先是清理街道。这事交给白城子红十字会王介眉处理。第二天用车拉走打死的尸体就有30多具，都拉到城西乱葬岗子去了，还有受伤的光复军也有30多人，就由公安局司法科一个个审问。从他们的口供得知，朱尚达的骑兵团各中队长事先与光复军都有联系。光复军攻城时，又里应外合，共同打八路军（指夏尚志带的一连人和司令部），后又与光复军一起逃出城。为根绝匪源，清除匪患，对参加叛变的都进行了逮捕，先后就抓进来300来人，分别押在监狱和看守所里。这两个地方只能押200人，装不下只好押在现公安局的院子里。我们司法科的人，那时候非常辛苦，成天审讯。有枪的追问枪的去向，跑了的要追问家属，人到哪儿去了。不长时间，如孙相臣、高振刚等人都被我们逮捕了。

经查，农村绝大部分公安队都是被裹进来的，他们事先没参加预谋，叛变中又没啥罪恶活动，所以一个也没有押。只是把他们做了登记，有枪的都把枪留下，放他们回家。对城里和大青山刘万富的中队成员，都进行了审查，有罪恶的，继续审查，随声附的的，没有罪恶的，也作了登记，追回枪支，找保人做释放处理。对罪大恶极，证据确凿的叛变头子进行枪毙，如王魁武、高振刚等。有的材料说光复军司令王魁武是在镇东被我军打死的，这不对，他的案子我经过手，是在白城子枪毙的，是在1946年春天枪毙的，和他一起枪毙的有费大昌（国民党分子）、高振刚

（叛变的队长）、姓梁的（不是梁永），一起枪毙的有七、八个，地点在原日本守备队那儿（现麻袋厂址）。刘万富没抓住，跑了。李方甫是在青山区那被我军当场打死的，剩下的有些罪恶但不够枪毙，查又查不起的，分别取保释放。当时处理这 300 来人，忙了一个多月，才结束。

光复后，我在公安局时，就有人检举王盛贵，光复军打白城子他又追随了光复军，后有个国民党的案子又牵扯到了他，就把他抓了起来，后来死在监狱了。伪街长韩成林在维持会、政务委员会时很活跃，他为什么被押的，我不详细，后押死在齐齐哈尔监狱里。

1946 年以后，白城子的社会秩序就安定得多了，光复军土匪基本消灭了，人民政权也巩固了。

在白城子的苏联红军是在 1946 年 3 月前后撤走的。撤走前，白城子街内还有窑子。人民政府成立不久就要取消窑娼、解放妓女，但当时还不行，苏联军人还到处找“马达木”（女人）。苏联红军一走，人民政府才宣布取消窑娼，妓女各回各家，旧社会丑恶现象从此在白城子绝迹了。

实际上对共产党、八路军我也有看法，乡土观念深，有私心，我一边在公安局工作同时，在 1945 年冬天与别人开了一个“东升久”果子铺（掌柜的王耀东，后改“复兴久”），我在那兼做会计，认为是一条“救命绳”。1946 年 5 月我离开公安局到公安处成立的“光复号”当会计，我仍和人继续经营“东升久”。1948 年干部南下去江西，动员我去，我认为自己是北方人，家里又不同意，没有去，直到 1956 年“东升久”合营，我才算又参加革命工作。

伪满白城子的四个县长

高耀先

伪满时白城（洮安）县先后有8任县长，即金文彬、张殿铭、陈承定、董云卿、赵畏、刘鸿谟、崔宝山和张靖宇。别人印象不深，我只叙述四个县长的德行。

官僚架子张殿铭。张在1932年冬接任县长。此人50多岁，中等个，官架子大。县署一般事务从不过问，全是总务科长王盛贵作主。当时有参事官，但他从不向日本人请教，一派县太爷形象。他有两个太太，并带来很多亲友，如德义楼的吴经理，当警察的吴凌贵、曹宏图等都是他的亲属（吴是他小太太的侄儿）。他带的当差的三、四个，如乔景岐、梁永，常不离左右，很有气派。

花花太岁董云卿。在1937年春从通辽县转任此职。他一身胖肉，肚子很大。他有四个太太，三个在城里，四太太在索格营子的广义泉，每周日都在广义泉度过。此人经常找戏园子唱戏的马玉霞、马艳霞夜间来家唱戏，之后留宿。人们都背他地称是“花花太岁”。

此人任内把精力全用在吃喝玩乐上。当时有副县长，一切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他好吃好喝，常喝得酩酊大醉，也

不注意什么场所。有回阳历年，他带县里的头头脑脑到日本守备队拜年喝醉了，晚上回来直进警察署，拽住一个值班警察问："县里属谁大?"警察见状立即回答："县长大。"他反问："为什么县长说话不算数?!"吓得警察无言以对。

铁杆汉奸刘鸿谟。此人大个儿，光头，红脸膛，体格健壮，在1940年冬天任职。他经常请日本人喝酒，遇事请教日本人，什么事情他都要走在前头，是个十足的亲日派。他在白城子，明明有水旱灾害，他都不报，却说获得了好收成；"粮谷出荷"他亲自上阵，非打即骂，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抓"经济犯"、"抓劳工"他亲自审问，施用各种酷刑。群众骂他是"铁杆汉奸"、"害人精"。

刘鸿谟在民国年间曾任锦县的警察所长，那时他叫刘景典，字叫鸿谟，常带警兵在南荒大凌河一带打胡子。

"爱民县长"崔宝山。有人说敌、伪当官的没好人，其实不然，在统治阶级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有的说他们都是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但在当时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的时候，在处理个别问题上，有些人还有正义感，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受到人民的称赞，伪县长崔宝山就是一个。

崔宝山是在1943年任白城县长的。据说他曾经任过少将旅长。到白城任职后，经常下乡了解民情。在"出荷粮"上，他能如实讲白城县的灾情，请求减免，说了不少公道的话，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为"爱民县长"。他任职期间，白城县连年大旱，经济统制也很紧张。有人犯了"经济犯"，他敢讲情况；大旱不下雨，他带头求雨。

有一次他带领各界求雨，在对天"许愿"时，他说：

“如若下雨，解除旱情，本县要请三天野台戏。在此期间，做什么买卖都行，不算违法。”不知是气候适宜，还是感动了上天，果真下了透雨。崔宝山主动请戏班子，“还愿”、“谢降”。群众看戏不花钱，做什么买卖都可以，人们欢声笑语，买卖热闹兴隆。到了第三天，县警务科长藤井吉次郎依据经济统制法，调动了城内所有警察，包围了野台戏周围的各个通道路口，是凡违犯经济法的一齐抓，一抓抓了百把十人，全都押了起来。人们被抓散了，野台戏也给搅黄了，搞得市民人心惶惶。崔宝山得知后，立即找来警务科长，他说：“你这么抓人还了得，唱三天野台戏，对经济贩卖不限制，是我代表全县人民对天的誓愿，也是事前经大家议定的。你们这样整，不是整我县长吗？这是对天的亵渎！”经崔宝山严厉督促，被抓的人全放了，没收的东西也给返还了，大家都说：“还是崔县长好！”

伪满安广县五任县长轶事

李治安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达十四年之久，直至控制着溥仪傀儡政府。在伪满洲国十四年中主宰安广县的五任知事（县长）虽以其出身、经历、性格、爱好和其所值的年代、时势不同，其政绩、轶事亦因人因事而异。但却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外是“宁作治世犬，不作乱世臣”而已。

笔者伪满时曾在安广县公署做过地政科代理科长，现就亲身接触到的，作概略回忆。

一勇武夫，弃城逃命——德养源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占领奉天（今沈阳）。十月进犯洮南。东北亲日旧军阀洮（南）辽（北）镇守使张海鹏开门揖盗，卖国投敌。十一月，日本军驱使降军（张海鹏的军队）与抗日将领马占山将军战于江桥受挫。十二月，降军徐团长率兵攻陷安广，实行军管。一九三二年张海鹏派其亲信参谋德养源任伪满安广县第一任县长。张海鹏其时

已进新京(长春)当上了侍从武官长,做了汉奸。

德养源原籍北京,满洲旗人,贵族世家,行武出身,清末民初当过领兵(“管带”相当营长)。一九三二年到任时五十多岁,任命其为安广县知事,主要是藉其武略,来维持地方治安,镇压反满抗日活动。伪满建国之始,人心不甘屈服,爱国抗日组织振臂而起;打家劫舍小丑、混水摸鱼亦乘机作乱。

穷兵黩武,东挡西杀,也杀不败抗日烽火。他在县城内强化用巡警维持社会治安,在乡村办起民团督练习武,用以看家护院,彼时兵匪一家,随剿随聚,安广县地方长期不得安宁。

德知事“剿匪”偶尔胜利回师,每枭首于四门示众,其人秉性残暴,不经请示,恒以亲手杀人为快。庆功宴上,每酒后耳热,辄高喊皮(西安)簧(二簧)京剧唱腔,自有琴师伴奏,音韵铿锵,满座寂然。席间有知音者,引起共鸣,合唱对唱,杯盘狼藉,兴尽乃散,惜令人不能记忆其词句,究为《满江红》还是《后庭花》?即使他纵有亡国之恨,也是“笼中鸟有翅难展”。况他死心塌地为侵略者操刀,做日本人指导官的马前卒。在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抗日队伍李海青大兵压境,他闻风丧胆,兵从东门进城,日本人催他从西门弃城逃走,匿影潜踪。可见德知事不过是一位“好龙的叶公”。

逍遥县令,替罪羔羊——王豫顺

伪满时安广县第二任县长王豫顺,原籍北京,官宦人

家后裔，才华风茂，倜傥不群。据悉属清朝荣国公的贵戚。这王豫顺是受伪满国务院加委，来接替德养源的。伪满康德元年（1934 年）到任，康德五年（1938 年）离职，年纪在五十上下，当时县政主要以整顿社会治安，镇压反满抗日为主，这些全听参事官斋藤（日本人）的指挥，王豫顺只能管一些日本人暂时还无暇过问的政务。如民生、文教、体育、卫生等。王只要和斋藤打个照会，斋藤便不加干涉。

一九三四年秋，在王主持下将安广师范学校，改为农科职业学校，推广农业技术。为民众争取丰衣足食，他标榜教化万民，亲笔题字于四门之上，东曰“怀来”、南曰“正德”、西曰“归化”、北曰“玄武”，俾县民瞻仰。在他公馆的客厅里悬有“克已复礼”四个额书大字，配以“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的对联。仿何绍基体惟妙惟肖。在县运动会上他所发的奖品，也与众不同，不是银盾、金牌，而是他亲笔赞辞、励语的条幅和奖状。

伪满康德二年（1935 年）强化“治安肃正”，安广县建一个警察大队，分三个中队，派来日本退伍军人花井里二等三人为警务指导官，加强清乡、保甲连坐制度，一户有事十家遭殃。回收民间枪支，设立弘报协会，控制中国人行动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加紧经济统治与掠夺，县署机构不断扩大，增设农林、经济、开拓、烟务等股，股长全是日本人，掌握农产购粮、经济统治、生活必需品“配给”、食盐、石油、火柴、烟酒专卖和禁烟（鸦片）、贩烟等事务。康德三年（1936 年）成立与政府“三位一体”的“农业合作社”、“协和会”，社长、会长都是县长兼任，而各有日本

人为理事长。县本部长统由日本人“一元化”控制。这时王豫顺便成为徒具虚名的傀儡县长，除在大会上照稿宣科发言外，没有可由他主宰的政务。有时王也常常感到宦途缥缈。他无事衔着旱烟袋闲庭信步，守着大烟（鸦片）枪吐雾喷云，一觉醒来到万泉丰（烧锅）、广济公司打几圈麻将牌，消磨时光，变成了一位逍遥县令。

康德四年（1937年），因受参事官斋藤贿赂京白线（长春—白城）路基事牵连，被查处免官。

训诂穷经，难脱噩运——于尔谟

于尔谟辽宁省辽阳县人，受过高等教育，当过中学教师，文学造诣较深，谈吐辄引经据典，诸如：“洪范”有言“子曰”、“诗云”，以及“朱子格言”教化民众、“正心修身”。其所以出宰安广，是因其同乡显宦所提携。康德四年（1937年）秋季到职，康德九年（1942年）夏季贬离。在任五年和日本人参事官宫本虎雄，副县长铃木敬四郎，交流思想，研究政务，全凭翻译沟通，不存在多大隔阂。于尔谟善看风使舵，不因铃木的豁达疏宕作风而越俎自裁。凡事不落过场，尽与日本人商量。副县长不在时，也让日本人总务科长知道，真是屈躬卑膝。

于尔谟到任不久，传出这样几椿事：

访塾师。于尔谟听说街北有位学究雷云岫，曾自力办起一起“奇峰小学”，想了解个究竟。在一个星期天，他徒步走到套木嘎（现红岗子乡境内），和雷云岫老师谈文论道，

日暮方归。在城内也常到教师家中作客，热心教育给教师很大鼓舞。

建校舍。康德四年（1937年）县街搬到安广，农科职业学校仍在平安（老县城），安广小学校址在东南街洼地，于邀集地方绅商，委吕英为建校董事，集金筹建中、小学校舍。亲自选定校址于西北街高岗处修建。康德五年（1938年）农科职业学校由平安迁到安广，后改为国民高等学校。

刹赌博。住在县公署后院的独身青年职工，夜里无事赌博成风，于知情后，教育他们："闲不住学点历史、文学知识，都有用……。"刹住了赌博风。

作"县歌"。还略输文采，为安广老县作了一首"县歌"，拿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请杨老师给谱成曲……。

随着侵略战争的持久和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加强对伪满洲国国民的奴役和物资的掠夺以满足庞大的战争需要，从而实现其变东北为"大东亚战略基地"的梦想，强迫农民"出荷"大量粮食，实行居民低标准定额粮食配给（供应）制。夺去人民口中食，强抓人去"勤劳俸仕"实行"国民皆劳"体制，拉走壮丁。偏遇康德八年（1941年）晚秋冰雪封地，欠产欠收，按省次长会议讨论"增产"和"出荷"问题，不管收与不收，都必须完成"出荷"任务。直督催到康德九年（1942年）三月，尚有七分之一割当量（分配量）催不上来。激怒了黑龙江省次长，率省"出荷"督励班来安广县"搜荷"。于带到陵界村视察了几个小屯，许多蒙族农民跪倒在地，向省次长求免。因此，"出荷"粮拖欠的尾数才不加狠追。事后将安广县正、副县长以贯彻

执行《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很不得力，于同年六月将于尔谟贬谪到黑龙江边远黑河县，越明年又贬谪到鸭绿江边辑安县。康德十年（1943年）铃木副县长调进“伪中央”特许发明局当科长。

文章不与政治同。于尔谟道一千个“子曰”、“诗云，也逃不脱柳柳州的噩运（柳宗元字子厚，官运不佳，屡遭贬谪，最后贬为柳州刺史，人称之谓“柳柳州”）。

年轻得志，并行相悖——刘茂林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伪满政府贯彻执行《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第三条在农产物方面，于图谋积极增产和彻底“搜荷”的同时，更须加强国内配给体制，努力扩大对日输出的余力。实行所谓“决战搜荷方策”，确立所谓“国民总服务体制”和开展大规模“金属献纳运动”充作军需。就在这非常的时刻，一九四二年七月刘茂林来安广接替于尔谟县长遗缺。

刘茂林家住关东州内（辽东半岛普兰店以南地区），三十五、六岁毕业于旅顺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日本人设立的，用以培养亲日师资。毕业生分配到满铁沿线各站公学堂（日本人设立的收容华人的小学校）当教师，去奴化孩子们的幼小心灵。伪满洲国成立，参加了伪政权工作，官运亨通，步步青云，直到晋升为荐任二等官黑龙江省公署文书科长，很受省次长的赏识。派他出任县长，是对他的信任与重用，他乘兴来到安广县就任。

刘茂林下车伊始，不假翻译，直接和副县长铃木敬四郎谈唠投机。铃木素不愿多管闲事，对刘茂林“忠心耿耿”也就无所疑忌。日本人总务科长近藤，对省次长的“红人”也不敢轻视。所有日本人都奈何不得他，于是他县官得做，有职有权。

首先在“搜荷”问题上，他强调安广县地薄人稀，是春季省次长亲眼见到的，向上司要求适当地降低了“出荷”指标。在街村长会议上，他强调《农产品强制出卖法》和日本人总务长官指示“以武力强迫‘出荷’保证计划数量”这道“圣旨”恫吓百姓。到“出荷”季节，他率领配有警察的督励班，下乡巡回“搜荷”。农民不敢隐藏，殚其地之出，忍饥含泪交出“出荷”粮。也藉着这两年没大天灾，百姓勒紧了裤带完成了“出荷”任务。

其次是贯彻《国民总服务体制》，要抓青壮年去参加建设国防工事、开发矿山、紧急造田等残酷的体力劳动，服务于“大东亚圣战”。安广县出动“勤劳奉仕”一个大队建设国防工事，“勤劳俸仕”一个大队到甘南县开发水田。作为一县之长的刘茂林，也明知这是摧残人命的鬼门关，为保“乌纱”，心存侥幸，化险为夷，他选派得力带工人员，劳工可能少吃苦头。于是，选定张超、卢恒二人，他们二人工作稳健，气质和缓，带到工地果然很少鞭挞。结果两队都没有重大伤亡事故，在省内又评为完成任务较好的县。卢恒以带队有功，当年铨衡为高等官，调往肇东县当动员科长。本县动员股长王永昶作风刻薄，积下民愤，土改时被镇压丧命。可见刘茂林的手法的确胜出他一筹。

至于金属回收、“必胜公债”、“大兴储蓄”，刘茂林和县协和会本部长及兴农合作社理事长配合得非常默契。以安广县建制年浅，又非工业区，碎铜废铁不多，凭协和会收多少就算多少。储蓄、公债强从职工工薪中扣买，总算完成了任务。

怎奈好景不长。康德十年(1943年)，铃木副县长调到伪满中央特许发明局去当科长。派来一个小林留木。他不同于从前的几名参事官与副县长只做幕后指挥，而是以“满洲国”官吏身份，“名正言顺”赤膊上阵，事无巨细，都得经他裁可，实质是从刘茂林手中夺权”。“二雄共存”，“并行相悖”，终将刘茂林挤出安广县，调到伪满中央马政局当科长。

有名无实，苟延性命——李连馨

李连馨，辽宁省辽阳县人。早年读书于奉天（今沈阳）南满中学，这所学校是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所建，旨在培养亲日势力，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及至伪满建国，该校毕业生各得其所，李连馨也即时飞黄腾达，参与统治人民的行列。前一段是奉天省协和会本部的部员，经过一番考验，为其主子所相中，“堪为帝国用”才委派来任安广县县长。

李连馨康德十一年（1944年）六月到任时，年纪五十上下岁。他最常接触的是小林（日本人）副县长。小林为人专横，置李于被动地位，不予主宰政务，李虽能操流利的日本话，但亦不敢与其争衡，凡小林未决案件，李不敢

主宰划行，小林已裁决案件，李有异议，也不敢批驳争论。常见其对小林的回语是："是"、"可以"、"诚然"、"照办"之类的恭顺词；没听到过说个："不行"、"为什么"、"不可以"的否定语，甘愿做个有职无权的傀儡县长。对所属中国人职工也无力照顾，有人受委屈，都不给争口气。

在决战紧急时刻，伪县长是胆战心惊的。面对上级发出的一系列法令、指示都要强制执行。如康德十年（1943年）的《战时农产品紧急增产方策要纲》，省长会议策划的强调"出荷"粮问题；改修的《国民勤劳奉仕法》勤奉适令年龄延至30岁；公布《战时给与令》、《物品消费统制法》、《交易税法》、《劳动所得税法》施行第三次战时增税；公布《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凡年满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发给《国民身份证》。协和会作出"战时紧急国民储蓄增强运动"，全年指标30亿元，连不动产出售价款也要强行储蓄，还实行所谓"协和必胜飞机献纳运动"搜刮民财。伪康德十二年（1945年）公布《关于官署职员工作特例》，在战争恶化情况下，准备施行"自战、自治"体制，妄图作最后挣扎。这些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枷锁，也是套在伪县长头上的紧箍咒。偶越"雷池"一步，百姓遭殃，县官乌纱难保。其时又闻苏联红军开进肇源，白城饥民请愿，日伪在全东北进行大逮捕、大屠杀，殷鉴不远，不能再造孽于人民。他终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追悔当年一失足，沦为千古罪人。直到抗战胜利，祖国光复，安广县百姓通情达理，谅解他一年多傀儡处境，民愤不深，在土改斗争时给予自新之路。

伪满安广县公署见闻琐记

李治安　王郁芬

值此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四周年之际，谨将我们在伪满安广县公署的见闻，琐记于下。

机构设置

1931年(民国二十年)东北沦陷。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启元为大同元年。同年7月15日,依敕令第54、55号公布,将民国时期的县政府改称为县公署,将县知事改称为县长。日本人任参事官、副参事官、警务指导官,县长听日本人指挥,如命处理政务。1937年(康德四年)公布伪政权的日本人首长制,县参事官改为副县长。主要科、股由日本人作科、股长,一般科、股由日本人作副科长、副股长。安广县是龙江省三等小县,至1942年(康德九年)才设有五个科、十八个股。有日本人科长一名,副科长四名,股长七名。

这五个科是：总务科、行政科、实业科、警务科、地政科。三等县不设银行、税务局、法院、专卖局，只设税务分局、专卖分局，不属县长管辖，归省垂直领导。

1、总务科。它总揽机要，是县公署的中枢神经。掌管接官奉诏、各种礼仪、人事外交、机要档案、财政预决算等事项。总务科长是日本退役少佐。科内设有机要室，由日本姑娘作保密员，中国人不许擅入。

2、行政科。掌管地方事务。科内设五个股，下辖县内一街九村。主要负责征兵、勤奉、防疫、禁烟等事项。征兵令、动员令都来自省级，由行政科转饬到街、村按期如额完成任务，街、村依民籍簿指名排号依次征集。当时，由日本人松野任副科长。

3、实业科。主管振兴实业、保护工商、繁荣经济、改善民生。但实际上，实业科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满洲资源，满足日本帝国更多的掠夺，确保大东亚圣战的必需物资。

4、警务科。是地地道道的专政机构。下设一个督察官室，四个股（警务、保安、司法、特务）。地方设三个警察署（安广、舍力、平安），七个警察所，一个看守所，一个警备电话局。副科长村田刚以下有三名日本股长。

5、地政科。安广县地政科始设于1942年（康德九年）。首任科长是日本人，笔者（李治安）1943年到职代理科长。副科长浅井是日本在乡军人，1944年应召归队参加太平洋战争去了。科内还有日本人外园属官。从宏观上看地政科的业务是测量、绘图、审定地权、换发地照，保护土地私有制地主的合法利益。

缛仪繁多

伪满时期每天工作前，全体职员集合于院内，由庶务

股长指挥，向皇宫（日本天皇居处）、帝宫（伪满皇帝居处）和建国神庙（供奉天照大神的庙宇）的方向遥拜，行三鞠躬礼，领读《国民训》，然后再做建国体操。操毕，各科长到县长室朝会，禀报政务、倾听指示，然后分头开始办公。赶上下列日子，还要增加奉读诏书、参拜御影。如：

3月1日奉读皇帝即位诏书（郑孝胥起草）。

5月2日奉读皇帝访日回銮训民诏书。

7月15日奉读国本奠定于惟神之道诏书。

12月8日奉读日本对英美宣战的时局诏书。

1942年3月1日以后奉读建国十周年诏书。

在万寿节日（溥仪的生日）参拜皇帝御影。

诏书和御影供藏在神橱内，平时不得启动。读诏时要求全署职员服装整齐，肃立庭前，由总务科长或庶务股长身着协和服配礼纽（代替礼服）戴白手套由神橱内捧出一个黄包，举过头顶俯首躬腰从室内走出，众人一见黄包立刻把头低下。包内裹着满、日文诏书两纸，县长接过读罢满文，副县长接读日文，读毕用黄布包好，仍如前仪由捧诏人送归神橱，众人听喝“礼毕”方许抬头。读诏时只许恭听，不许窃语私议，否则以“大不敬”论处。不但机关如此，兵营、学校也按期如仪行事。要求职员、官兵、教师对诏书必须背诵如流，背不下来或背错了则拿为冒渎圣聪问罪。所读后四种诏书皆出自日本人之手，其内容不外是：“仰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就是说没有日本人就不会有满洲国，荒诞离奇地把炎黄子孙的爱新觉罗·溥仪，同裕仁天皇同列为是天照天神的后裔，把

天照大神迎进满洲建立神庙供奉，每天向神庙遥拜，把国本建立于惟神之道。从思想上的麻醉，直到言行上的禁锢，诸如《官署职员工作时局条例》、《时局特别刑法》、《保安矫正法》、《思想矫正法》和加强《取缔思想犯的镇压力量》相继出笼。特别是1944年4月26日，日本在东北那次大逮捕，造得人心惶惶，如伴恶兽。

国兵勤奉

伪满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大东亚圣战的需要，每年征集一次国兵，凡年满十九岁的青年男子皆有服兵役义务，经体检合格服役三年，多半在国内做肃正工作，像到热河去剿匪（肃清反满抗日力量）。满洲青年不愿服役，有的籍在学缓征，富有者争取入学；有的自己断指（右手食指）、残肢（瘸腿）逃脱不入伍。躲过了国兵又躲不过勤奉（无偿勤劳奉公），依《国民总动员法》和《勤劳奉公队编成令》把“国兵漏”集结起来编成勤劳奉仕队，驱使他们去建设国防工事、开发矿山、开垦改造农田，一去就是一年半载。安广县的勤奉队曾去阿尔山修过国防工事，到鞍山弓长岭去开过铁矿，赴甘南县去改造过水田，遣送到达沁塔喇（奈曼旗）垦荒造田，为他们去建立日满共同粮食自给体制基地。1945年逼迫安广国民高等学校四年生去白城平台修飞机场，学生拒不前往，搬来白城宪兵队强迫学生就劳。

勤劳奉仕比国兵更为艰苦，劳动量大，生活、工作条

件差，队长管得紧，非打即骂，青年人视为畏途。彼时，有财有势者可以疏通关节除名免役或花钱雇人代劳，穷苦人民则无一幸免。笔者每次目睹集结在县公署门前的勤奉队员，大都衣着褴褛，父母妻子洒泪相送，那种凄惨离别的情景，都不自觉地心酸暗悯。也闻到某次勤奉队出勤，提前超额完成任务，大部分队员幸得生还，那是带队人的功劳，邀得加官进禄。也有的人做动员工作时，待人苛刻，激起民愤，在反奸除霸斗争中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宽容，受到镇压。

防疫禁烟

防疫、禁烟（断禁鸦片）两项工作，由行政科的保健股负责，是一个不得人心的差使。

关于断禁鸦片的问题是：明令禁止鸦片，可是对成瘾者还发给吸食证允许继续吸毒，官方设管烟所，烟馆备烟具，烟妓公开卖烟卖淫毒害中国人民。

出荷配给

伪满时期，每年春季，县公署要召开粮食增产会议，由实业科提出增产的指标，年年加码，省公署分配下来的出荷量岁岁增多。农林股不讲技术措施，地力减弱，壮丁出外勤奉，耜薅不及时，粮食连年减产。在会上，街、村长接受任务不敢叫苦争讲，到秋后交不出荷粮百般为难。每

年到秋由县长、副县长、各科长组成督荷班，下乡催送出荷粮。1944年，笔者（李治安）在伪县公署地政科任职分担醴泉（今烧锅）、陵界（今新艾里）两村督荷任务，在开征后半个多月，上边说这两个村送粮落后了。伪县长李连馨亲自督促，回去后李仗着胆子说："俟包米水份稍降，保证赶送不误"。没过几天，副县长小林留木又下来督促。追究怠慢原因是否责任在李，杜村长讲："村内有几家办红白喜事，人车都打不开点……"。在场的警察所长看李和村长一眼说："办红白喜事算不了什么，给皇军送粮要紧，今晚我派警士们押车护粮，连夜送进安广。"杜村长下保证地说："我村出荷决不能落在其他街、村之后。"这次好歹算给李解了围。

种田人交售完出荷粮后所余无几，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日子。城市居民实行粮米限量配给，唯有日本人和高等官员才能凭票吃到大米。伪满兴农部指示"面粉掺混包米面增量"，降低供给水平。平民要吃大米，就是经济犯罪。

经济股把人民用的生活必需品统制得很死，棉制品实行配给制，一年一人配给的布不够作一件衣裳。后来用晒金巾（麻线织品）、更生布作为交售出荷粮特别配给的生活必需品，不交售出荷粮连晒金巾也买不到。较好一点的香烟、清酒、白糖、炼乳、调味品统归日商滨崎商店经销，只卖给日本人。1941年（康德八年）公布《七二五禁止令》和《物品消费业统制法》，全部商品价格以七月二十五日为准，一律不准上涨，从此，安广县的工商业日渐萧条，铁匠炉打不出镰刀，杂货店买不到物品，物资奇缺。火柴、煤油、

海盐，一律实行专卖，限量供给，势逼百姓熬食土盐，点麻油灯，打火石取火，小孩子寒天偎在草囤里越冬，把生活方式回复到原始社会。

警务活动

满洲国的警察是一群为日本人看家护院、咬中国人的疯狗，人民呼之谓“巡警狗子”。安广县“巡警狗子”隋希文打他爹（卖柴车停在道上）公事公办传成笑话。

“皇帝”陛下的警察官，可以出入到茶社、酒家、烟馆、旅店等处，或便衣盯梢，或官服缉私，横行无忌。当时常见在公共场所张贴“小心扒手（小偷），莫谈国政”的条幅，暗示隔墙有耳，务须自保其身。特别股掌握“要视查人”名单，设人跟踪盯梢，多少无辜者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押送“思想矫正院”，进院后是九死一生。司法股问案不讲调查研究，专靠刑训逼供定案，屈打成招，冤案累累，无处诉怨。

县公署内其他科、股在开展工作时，亦常邀警察官作伥。如征兵、抓丁（勤奉）、搜荷、经济统制都离不开警察官莅场。警察官有权对任何人当场逮捕、拘留、罚金或转送法院审理。

日本侵略者套在东北人民头上的枷索越勒越紧，1941年采取成年人的指纹“登记造册”，严防作乱和抗日逃脱。1943年发放《国民身份证》，十五岁以上的人均须领此证，牢牢地束缚了东北人民的手脚。

日伪时期白城（洮安）县警察组织概况

王六离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后，蒙边督办、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降日寇，在他的指令下，洮安县（后白城县）政界、商界等头面人物成立了洮安维持委员会，"维护"地方治安，迎接日本人的到来，实际上第一批到白城子的日本人就十几名军人，肩扛长枪，维持会的人到车站拱手"欢迎"。以后我在菜市场上买肉，看见两个日本军人也在买肉。因日本人少，平时也看不到。

当年洮安县公安局及所属机构依旧，人员没有啥变化。

1931年末，张海鹏把洮七县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改县长、公安局长由省委派的惯例，他委派陶贵祥为洮安县公安局长，后又派金文彬为洮安县县长，把洮安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由于县长、公安局长的变动，县府职员和警察人事上也出现很大变动。原公安局长由得胜和他所带来、安插的人，也都夹起铺盖卷离开了。

陶贵祥是锦州人，行伍出身，自称在黑龙江程志远部任过副旅长。此人任人唯钱，嗜好鸦片，官僚习气严重。他

到任后，在公安局内安插很多人，也封了不少官，他在任内也收敛了不少钱财。

在陶任内，公安局内并没有日本人，仅县公署来一日本人叫高桥光雄。高桥建立起“自治指导部”，自任县公署的指导官；不久撤销了“自治指挥部”，建立了参事官室，高桥光雄就成了县公署的第一任参事官。后来又来两个日本人在“自治指导部”内任职，这两个人一个姓山岐，另一个姓川樾。

陶贵祥来后，仍然沿袭民国年间的警察体制，设两课一室，即总务课、行政课和督察室。总务课掌管警察编制、警饷发放、枪弹服装保管、警察教育、房屋维修和财务预决算等，课长是于振耀，课员四人，另有雇员三、四人。行政课掌管警务行政调查、侦察案犯和对罪犯搜查审讯等，课长是周谨（士箴），课员二人，有雇员二、三人。行政课还掌管拘留所，常拘押数名人犯，有所长一人，看守警士二人。督察室掌管管区内的内外勤事务，有督察员二人，一叫袁凤山，另一叫崔殿阁（云龙）。公安局有传达室，有警士数人，当时公安局内只有二十余人。

据我所知，于振耀的任职，是彭金山在陶贵祥洗澡时推荐的，彭金山又向他推荐周启东（周再兴，后来做了彭家女婿）的儿子周谨为行政课长。论才学，周精明能干，且文字上很有功夫；而于头脑平庸且文笔很差。伪满初年，洮安县公安局曾办过警察训练所，于当过教官。他在向学警讲课，遇有“苟违警，必罚之”一句话时，他却解释为“别说人犯了法，就是狗违犯警规，也必得重重地罚它”，弄

得学员抿嘴耻笑，他却认为自己讲课取得了效果，由此可见他文化之低下了。但在当时，周谨却没有干长，而于振耀却得到了重用。于在办案中好勒大脖子，勒索来的钱财，总送给局长一半，因此他得到上司的欢心。同时于头脑简单，事事都看主子的眼色行事，毫无主见，这也是日伪时期，做官沉浮的一个重要因素。

公安局下仍是八个公安分局，全以数字命名。第一公安分局在县城，其余第二到第八公安分局设在苇子房、哈尔户基、十家子、三十户、胡宝山、白庙子和苗家窝堡。各公安分局有分局长一人，除第一分局有局员三人分别掌管内外勤外，其它分局都只有局员二人。第一公安分局长是刘愈，二分局长姓姜，三、五分局长姓名忘了，四分局是赫英涵，六分局是刘致贤，七分局是罗文斗，八分局是任立民。第一公安分局下设七个分驻所，即大南门、小南门、小北门、大北门、东门、西门和驿前。其它分局也有分驻所，因记不准，只好从略。

此时的公安大队长由公安局长陶贵祥兼任，大队副是郭振东，下辖两个中队，一、二中队分别是李永山和杨荆璞，后又将民国年间的迫击炮分队改为中队，该中队长是谁想不起来了，每个中队又各辖两个分队。公安大队都有文牍兼会计一人，缮写二人，传达一人，警卫二人，还有警士（兵）若干人。

伪满大同二年（1933年）春，就在陶贵祥任内，公安局改名为警察局，公安大队改为警察大队，各公安分局也改名为警察分局了，但人员上还没有啥变化。

白团起义后，日本人曾对陶贵祥进行审讯，没审出什么名堂，在放出陶贵祥同时，就把公安局长一职也给免了。在办完交待后，陶贵祥人就不见了，不知到哪里去了。陶贵祥离职后，张海鹏又派刘纯玉（凤驰）任洮安县公安局长，时间不长，洮安县又重归辽宁省管辖，由省派来孙兆祥任警察局长。

孙兆祥是铁岭人，曾在沈阳警察厅任督察员，来洮安县前任康平县警察局长。孙到职后，将警察局内设机构作了变动，设两股一室，即警务和司法两股，一个督察室。警务股长先为罗拱晨，后是田鸿宾，职责与原总务课相同。司法股长为于振耀（溥泉）。督察室的督察员则是肖永祥和侯永祥了。八个分局和一分局的七个分驻所照旧，但各分局长却变化很大，第一警察分局长是赵书阁，第三分局长姓姜，四分局是关文玺，五分局是线朝械，七分局是王家厚，八分局是任立民，二、六分局长是谁忘了。此时警察大队长则不由警察局长兼任。郭振东得知后，向孙兆祥花了不少钱，孙兆祥同意保荐，辽宁省警察厅批准，郭振东被任命为洮安县警察大队的大队长。警察大队辖两个骑警中队，一个步警中队，还有炮中队。骑警一中队驻三十户，中队长李永山，骑警二中队和步警中队都驻白城子，中队长分别是杨荆璞和罗文斗。炮中队长姓刘，名忘了。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3月1日，洮安县警察局改为警务局，人员依旧。同年12月，洮安县警察机构和人员编制如下表：

伪康德元年12月末洮安县警察机构和人员编制

人员 / 机构	驻地情况		编制情况					
名　　称	驻　地	分驻所或分队数	警正	警佐	巡官	警长	警士	计
警　务　局	县公署内		1	2	5	1	10	19
第一区警察署	县城东门外	7		1	3	10	50	64
第二区警察署	苇子房			1	1		9	11
第三区警察署	哈尔户基			1	1		10	12
第四区警察署	十家子			1	1		10	12
第五区警察署	三十户			1	1		9	11
第六区警察署	胡宝山			1	1		9	11
第七区警察署	白庙子			1	1		9	11
第八区警察署	苗家窝堡			1	1		10	12
小　　计		7	1	10	15	11	126	163
警察大队	县　城		1	1	3	13	18	
骑警一中队	三十户	2		1	2	4	40	47
骑警二中队	县　城	2		1	2	5	39	47
迫击炮队				1	1	3	25	30
步警中队				1	2	5	44	52
小　　计		4		5	8	20	161	194
合　　计		11	1	15	23	31	287	357

伪满康德元年（1934年），洮安县划归龙江省管辖。日伪当局为打破传统的录用警察制度，淘汰原有警官，培植亲日力量，洮安县警务局开办了警察训练所，每期3至5个

月时间，教官由警务局内出人担任，一次招收学员几十人，训练结束后即为警士，分派到警务局或各警务分局。到了伪康德四年12月举办第8期，累计招收学员有二百余人。学科有警察法，有关司法、保安、特务等法规，有刑法、刑事诉讼法、违警罚法、勤务要则等；术科有检点、捕绳、警备用刀以及各种步法、持枪法等。

在孙兆祥任内，日寇加强了对警察系统的控制，先后派藤本胜、松本觉二任洮安县警务局的指导官；孙调离后，又派藤原今右卫门、古贺完次、奈木野留藏、大何内南等任洮安县警务局的指导官；以后又向警务局派三、四名日人警长安插在各股及白城子警察署内；伪满康德四年秋，日人吉川荣任洮安县警务科（原警务局）首席指导官（相当科长）后，派入的日人警官逐渐增多，并安插在各要害部位，完全控制了洮安县的警务系统。

伪康德二年秋，孙兆祥调离，李树田任洮安县警务局长。李树田是锦州人，他来白城子任职带来不少人，安插在警务局和警察署内。伪康德四年春，日人首席指导官向李树田提出要裁减一批年老的警官和无文化的“冗员”，因裁减的对象多和李安插的人有关，便坚持不同意裁减，李随即被免职。

李免职前，警务局已改为警务科（县署各局也均改为科），科下分股，一是警务股，一是司法股（兼行政），另有督察员，人员也增加许多。伪康德四年夏，肖廷祯任洮安县警务科长。肖是甘南县人，曾在日本内务省所属警察训练所毕业，但他任职仅三个月左右，不知何故即被调离，

由警务股长田鸿宾代行警务科长之职。田原是胡宝山警察署署长，警务股长一职是他花钱“运动”来的，原来警务股长的薪俸是80元，行政兼司法股长是70元，而警察署长一职却是50元（其他科员35元、30元）。他花了不少钱，而到职之后，薪俸没有提高，仍然是50元。

早在伪康德三年3月，警务局奉龙江省警务厅之命令，撤销了洮安县警察大队。人员处理是：年老的警察均作编余裁减，回家为民；巡官以上的十几名警官，分别派到警务局和各警务分局任职；警察大队只留下杨荆璞等三十余名，编为洮安县警察中队；其余均改编为山林警察队，调到三江省（现佳木斯一带）去讨伐抗日联军去了。

新编的警察中队归警务局直接掌管，只设一名中队长，下面一个分队，警士编为三个班。到了伪满康德五年（1938年），警察中队改为巡逻队，队长仍为杨荆璞，分队长为张绍庭。巡逻队专司警务科的各项差遣，如县公署的守卫和县城内各项搜查及巡逻等事项，到了伪康德六年（1939年）巡逻队就解散了，人员就分派到警务科和各警察署去了。

在伪康德三年撤销警察大队之后，洮安县内八个警察分局未动，但名称却以地名叫警察署了，如白城子警察署、三十户警察署等等。由于警察大队的撤销，为确保地方治安，各警察署也增加了人员，增设了警察分驻所。具体情况是：

白城子警察署除原有的七个分驻所，又增设了马警分所和直辖分所，在城郊增设了三合屯、保胜屯、太平庄和

平台分驻所。

苇子房警察署增设大兴屯、平顶庙分驻所。

哈尔户基警察署增设城四家子分驻所。

十家子警察署增设哈尔锦和花拉套保分驻所。

三十户警察署增设满洲岱分驻所。

胡宝山警察署增设赫家窝堡、高世功屯分驻所。

白庙子警察署增设平安镇、索格营子分驻所。

苗家窝堡警察署增设老道庙、陆家窝堡、拉拉街分驻所。

日伪当局为加强对中国人民（当是不许说“中国人”，而说“满洲人”）的思想控制，在伪康德三年春警务局内就设立了特务股，有股长一人，由日人山本警务股长兼任，日人股员二人，内勤为铃木七卫，外勤是迁本正（主要负责调查外国人的来往活动）；股内中国人三人，内勤一人，外勤二人（主要监视上层人物的活动及言论，并对宗教进行监控）。同时在白城子警察署及其它各署也增设了特务系。白城子警察署特务系有五人，有特务系主任一人，而其它警察署则由别的系主任兼任，还有一个兼职内勤来做特务工作。不久在警务科内又建立了保安股，各警察署也增设了保安系（兼管卫生）。保安股管的权限很广，如当时保安股有一股员叫王成礼专管大车，白城子有各种马车好几百辆，马车会长叫石传良，他每月都要到警务科保安股向王成礼报告一次马车数目的变化情况。

伪康德四年9月，日本驻白城子的领事馆撤销。原领事馆下有警察署，专管日本、朝鲜（当时多数改为日籍）侨

民事务。领事馆撤销之后，其所属的警察署遂与白城子警察署合并。白城子警察署长为日人井上广太警佐，从此白城子警察署长再没有中国人来担任了。不但白城子警察署长是日本人，就是下面的司法、特务、保安等系的系主任，也都是由日本人来担任了。只有警务系主任是中国人，但也管不了日本人。与领事馆警察署合并后，撤销了大东门分所，却增设了富兴巷分所。

伪康德四年末，洮安县警务科长换了魏毓筠。魏是从伪龙江省警务厅调来的，警衔警正。同时，日人在洮安县警务科的首席指导官吉川荣警佐改称为副科长。虽名义是副科长，但他拿总，事事左右科长的行动。如警务股、特务股的领导权，完全操纵在副科长吉川荣手里，特别是特务股的报告，副科长不给科长看，科长也是不敢看的，伪康德六年斋藤警正接替吉川荣警佐任副科长，后又换高桥勉。伪康德七年秋高桥勉被免职后，魏毓筠也在伪康八年调离，白城县（1938年洮安县改为白城县）警务科长即由日人稻岗鹿藏警正担任，不再设副科长。从此后，再没有中国人担任白城县的警务科长，此职完全由日本人担任了。

关于警务科下属各股的工作范围，根据我的回忆如下：

（一）警务股掌管事项：

1、警察编制及人事配属；

2、庶务、设备及修缮事项；

3、枪弹、服装保管与发放；

4、工薪调整、警饷领发和供给品的发放；

5、警察部门监督教育、指导及警风纪的整肃；

6、文书制作及卷宗保管；

7、关于警备、警戒及戒严事项；

8、警察行政规划及人口资源的统计调查。

（二）司法股掌管事项：

1、罪犯搜查及现场检验；

2、刑事案件线索、指纹收集及通缉嫌疑分子；

3、犯人复讯、留置及转送；

4、文书制作及保管；

5、司法警察教育；

6、对刑事要视察人监控。

（三）特务股掌管事项：

1、对集会、结社、出版物检查及取缔；

2、对社会风俗、社教、宗教团体监察及取缔；

3、关于侨民登记，各项旅行证、出入境证发放登记；

4、对思想要视察人监控。即搜捕反满抗日爱国志士，监视各阶层上层人物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以及省警务厅特务科指挥的侦察行动等。

（四）保安股掌管事项：

1、关于各特种行业呈请许可及休止；

2、关于建筑呈请许可及取缔；

3、对饮食店、旅店检查及各项营业临时检查；

4、对娱乐场所的开业和取缔；

5、关于交通警察事项；

6、清洁卫生、医生登记与妓院性病、传染病预防；

7、关于市场管理、取缔及物资输出入事项；

8、关于物资统制事项；

9、罪犯搜查。

随着日寇扩大侵略战争，加紧掠夺各种战略物资，为军需所用，遂对一切物资进行统制。在伪康德七年九月又从保安股分出一个经济保安股来，下面的各警察署也都增设了经济保安系。起初，白城县警务科的经济保安股只有两人，白城子警察署的经济保安系也是两人，其它警察署都是有一人兼管。后来粮谷、大豆、花生、大米、砂糖、豆饼、豆油、棉花、钢铁等都实行统制收购、统制贩卖贩运，经济保安警察也多了起来。伪满时人人都怕国事犯罪，即政治犯罪，再一个人们害怕的就是经济犯罪了。伪满时的中国人是不许吃大米的，据说一个刑事犯罪者，在施行压杠子、灌辣椒水的时候，从嘴里吐出了大米饭粒，于是不再追问刑事问题，而追问起大米是从哪弄来的了。经济保安警察管的事很广，谁要违犯经济统制，都以经济犯罪论处（当时称为“经济犯”），所以城内工商业户和乡间的中小地主对经济保安警察都毕恭毕敬，害怕慢待得罪他们以后吃不消。

日寇在扩大侵华战争之后，为确保铁路交通和军事要地的安全，从伪康德六年 9 月开始，将白城县原来的八个警察署进行了合并、迁移。

首先撤销了苗家窝堡警察署，将其辖地并入白城子警察署。设立苗家窝堡、三合屯、平台三个警尉级分驻所，设太平庄、保胜屯两个警尉级的派出所，城内六个门及车站

设立警尉补或警长级的派出所。接着撤销了三十户警察署，将其辖区并入苇子房警察署，设立三十户、平顶庙、大兴屯三个警尉级分驻所。撤销了十家子警察署，将其辖区并入哈尔户基警察署，撤销了花拉道分驻所，设立十家子分驻所。将白庙子警察署迁到五棵树，称为五棵树警察署，同时撤销了胡宝山警察署，变为五棵树警察署的一个分驻所，保留赫家窝堡和高世功屯两个分驻所。这样就将八个警察署合并为四个警察署了。

伪康德七年又将苇子房警察署迁到三十户，改称三十户警察署；将五棵树警察署又迁回白庙子，改称白庙子警察署。

伪康德八年，又将白庙子警察署迁到平安镇（在铁路沿线，附近又有军事基地），称平安镇警察署。同年又新设平台警察署（也在铁路线和军事基地附近）。至此，白城县警务科下辖为五个警察署。以后还有啥变化，因我离开白城子，情况就不详细了。

关于白城县在伪满时发生的几件大事，我说一下。

1、西门外粮栈被抢。

白城子西门外有个粮栈，字号我忘了，经理叫崔重生。伪康德五年春天该粮栈遭抢报案。当时的警务科长魏毓筠，白城子警察署长赵书阁（赵小胡子），我那时是司法股长，都去了。到那一看。粮栈周围有一丈多高的土墙，大墙距房子有五六尺远，在房屋的烟囱上拴着一根大粗绳子搭在墙外。据粮栈的下人说，大门始终是锁着的，进院的胡子只有三、五个人，不知是从哪里进来的。胡子进来后，立

即把大门给把住了，把更夫也给绑上了。院心伙计有二三十人，当时都在睡觉，惊醒后，看见胡子拿枪逼着，也未敢动手反抗。一共抢去有三千多元钱。胡子走时就顺粗绳子爬到墙外去了。

早上白城子警察署接到报案之后，赵署长就领人去了，一些警兵检验一回，也未验出结果。那时的警察也没受过系统的刑事训练，懂个啥呀，何况警察署长都去了，大家就更不能乱讲了，只是听署长的。等魏毓筠科长带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九点多钟了，在场的警察已有二十多人。掌柜的一见这场面，吓得哆哆嗦嗦，立即叫伙计买了十多条前门烟，还有一筐筐桔子和苹果。这些警察里出外进的，也没抽几支烟，都是把烟整盒整盒的揣在自己的腰包里，所以拿出一条烟，一撒手，烟一会儿就没有了，还得再拿。这次招待，粮栈花有上百元。出于我职务上的责任，我讯问了更夫，他说："我没发现胡子是怎样进来的，等发现了，胡子的枪口已顶在我的前胸了。"我逐一讯问别人，他们都说在睡觉。我根据粗绳子只有粮栈才有，将绳子拴在烟囱上，只有院里人才能办到，我怀疑是更夫作的内线，他吓得直抖。因为没有证据，警务科长和警察署长的态度也不明朗，查验、讯问一上午，人也就回去了。没出几天，更夫就辞职不干了。光复以后，我才听说，这起抢案确实是更夫勾结土匪所为。

从伪满大同元年到伪康德三、四年间，白城子地方上哪天都出抢案，甚至超过民国年间。当时盗窃案件少，再有就是"黄案"（通奸）多。

2、三十户的邪神——“三英”。

民国和伪满初年三十户有三个人，名字都带“英”字，当时按群众说法，都是“邪神”。“三英”中的一个是李世英，家有二、三百垧土地，父亲是原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的妹夫。另一个是赵连英，家也有几百垧地，遇事不让人。再一个就是崔英，家有地也有钱，该人的父亲，外号“崔三麻子”，当过校长，谁说比李、赵“二英”势力小点，但一般人也不敢惹。过去人们常讲，“有钱能使鬼推磨”，在旧社会有钱就有势，这三个人在三十户一带谁也不敢惹。就是警察，也不敢惹他们。他们专告警察署长，那地方盛产黄豆，用三车两车黄豆钱，往上一拱，一个警察署长就给整下台了。

曾任三十户警察署长的王金铎就是因为得罪了赵连英而丢掉饭碗的，饮恨而死。

王金铎是沈阳人，原是个小店的伙计。洮安县（后改白城县）公署行政科长王尊廷（盛贵）几次去沈阳办事，都住在他的那个小店，每次去，王金铎都是殷勤招待，百般逢迎，深得王尊廷的赏识，后来他托王尊廷给找个吃饭的地方，王尊廷就把他安插在洮安县警务局行政课当雇员。王金铎的文笔不怎么样，但很会钻营。那时候有钱有人就能当官，王金铎几年工夫就当上了三十户的警察署长。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刚上任，就有人密告赵连英家里有枪。日伪当局收缴枪支后，再私藏枪支是违法犯罪的，所以王金铎决心把这一案件办好，梦想再登一步官阶。赵连英虽住河西，但在三十户有窝棚，他弟弟赵连兴，他哥哥赵连城

(赵大瞎)在乡村中都很豪横。王金铎不管这些,立刻派人就把赵连英抓到警察署,没怎么审讯,就把赵送到县里。当时枪是违禁物,都经日本人审讯,警务局指导官松本审讯后,尽管赵连英没有承认,还是按重犯给押了起来。赵连英押起之后,赵家虽四处托人,时间快一年,仍未放出。赵连英的家人托人求王金铎署长给说一下情,并说,"我们不能白托署长,过后人情我们给送"。王金铎见赵家托的人办事利索,赵家又有钱,他见钱眼开,就去找县公署的翻译鞠松山(后任某科股长),托他和日本指导官说一声。王将东西往上一送,那边就把赵连英给放出来了。要过年了,王金铎就想起因放赵连英的事儿,得给鞠翻译送点东西,何况自己也没得到实惠呀,就去找赵连英。赵连英却矢口否认家中应诺之事,王金铎也不敢强要,心中很是恼火,打算寻机报复。

过年了,那时候无论有钱没钱的都好看纸牌,警察也趁机抓赌,不但能得到"外落",还可以向上司"献功"。有一次抓赌,就把赵连英的老爹给抓来了。王金铎一看是天赐良机,就把这老人押在警察署里,准备以后敲一笔钱。这老头仗着自己的财势,在警察署里搅闹、绝食;赵连英又花钱到县里反告王金铎署长,无故抓人敲诈勒索。王金铎在上级追问下,放吧,卷了署长面子,不放吧,看小牌也治不了啥罪,何况老头绝食,出了事自己兜不起。没办法,只好每天包两顿饺子给老头吃。这老头吃饺子要求三条:一是这饺子必须王金铎老婆亲自包,别人包不吃;二是吃饺子要剪掉饺子边;三是得把煮饺子水留着,叫做"原汤换

原食"，把饺子汤倒了，他就骂。王金铎经不起上司的紧催，后来把老头放出去了。放时这老头不走，还请了一些说合人。王金铎又气又火，从此得了"大肚子"病，一病不起。

王金铎到白城子只是一个雇员。不久就到一区警察署当了署员。有了地位便开始追求女人。在一次邂逅中，他看上了宋占一的大女儿。宋占一在白城子开旅店。外号"铁嘴钢牙"，是刀笔邪神；他大女儿确也年青貌美。王金铎全靠自己的追求，才把这姑娘娶到手，当上警察署长就遇上了这样窝囊事，不但自己在下级面前丢了脸面，还遭到上司的指责，自己的女人这样任人摆布，如何不气恼。王金铎的病情越来越加剧，就想到奉天（沈阳）就医，宋占一父女亲自陪伴。没成想，人还未到奉天，开原车站一过，想做大官想赚大钱的王金铎死在火车上了。

翻开民国年间在五区当区官和伪满初年三十户当警察署长的，没有一个能呆长，都是被告下去的。王金铎的前任是胡东瑜，铁岭人，警察混子，他是被告下去的；王金铎的后任分别是刘铁映（高等警察学校毕业，曾在行政股任司法股员）、刘致贤、张显谟，都在那任职不长时间。我在三十户担任一段时间警察署长，就因为接受别人一袋白面（三元左右钱），而被"三英"告发离职的。

3、我因触怒了日本人，而被逼得走投无路。

我在伪满初年就在洮安县伪警察机构内任职，一直是"效忠"日寇的，而在伪康德八年末，就因为触怒日本人，而被迫离开白城子，跑到华北去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时我在白城县警务科司法股任股长（警佐），手下有一个

日本人姓见原，是个警尉。伪满时都讲阶级服从，不管中国人、日本人，早上一上班，低级职员见了高级职员，都得用日语说："噢哈哟，够载依吗使！"（意思是"早晨好"。）见原对我很客气，我分配他做什么事，他都服从。因为我是要笔头子的，他对我也很佩服。我有个老毛病，好抠死卵子，不顺着上司脸色办事，也不给他们送礼。如警务股长田鸿宾给日本科长送礼、送鸡蛋，我那时没有那些钱，出于倔脾气，也不愿给人家送礼，我总认为干事得凭自己的能力，溜须拍马的事，我不能干，这样很多同事对我有看法，认为我好抠死卵子，不合潮流。后有人进谗言，就把我调到白城子警察署任警务主任，实际是降了一级。白城子警察署虽有20余人，署内却有15名日本人和朝鲜人，我虽是警务主任，却只能管几名中国人。那15名警官直接归日本人署长管辖，我不过对他们做些后勤工作而已。

不久，日人见原警尉也调到白城子警察署警务系任职，这时他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我恭维了。有一天，一个姓孟的警尉补漏勤，见原就说"'满洲人'（指中国人）没一个好人！"又说这个人乱七八糟的，那个人也乱七八糟的，总之"满洲人"都是乱七八糟的。我对他说的话很反感，特别是他对我不尊重，我很生气，就说："你说'满洲人'没一个好人，日本人个个都是好人吗？前天晚上抓来的两个日本人一男一女，是亲妈与亲儿子搞破鞋（确有其事，是经日人审问的），这都是败坏人伦的大事，难道也是好人吗？"见原汉语说得不怎样好，气得满脸通红，小眼睛瞪得溜圆，完全不像他过去对待高级职员的态度了，立即跟我顶撞起来。

他说着说着就凑到我的眼前，往我右肩头上猛击两掌，我急了立即拔出洋刀，照他的肩头也打了三下子。第二天早上，见原向署长报告，说王警佐瞧不起日本人，还砍我三刀。因有许多人在场，署长没有说什么，就把这件事压下了。

那时的警察都好打麻将，我也好玩，打1元、2元的，输赢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取乐子，赢了还要请客。一次却叫日本人给抓住了，别的署长都放了，却说我参加赌博影响警风警纪，把我逮捕了，押了20余天。虽没查出什么大问题，却把这个案子送到检查厅去了。当时白城子区检查厅检查官叫王大功，他认识我，也知道我的为人，王说："打麻将玩算啥罪，送来简直是扯蛋！"他知道我已被警察署给免职了，就叫我找保交200元的保证金，我从商人秦润堂处借200元钱，又请他作保人，区检查厅就把我放出来了。

可日本人井上广太署长和日人见原警尉等还要抓我，并向法院检举。一些同事把这一消息告诉我，他们说，你赶快离开白城子吧，要再给你加一条"反满抗日"，你想走也就走不了啦。我听了同事和亲友们的告诫，不得不忍痛，偷偷离开白城，抛下妻儿老小跑到华北去谋生了。

伪满军队中的顾问制

张东藩

伪满洲国军队内部，是受顾问统治的。关于部队的编制、人事、作战、教育、后勤等，都是军队中的顾问统治着的。军队中的顾问，是由日本关东军直接派遣的。日本的关东军，也是日本陆军省的国外派遣军之一。关东军司令部设在吉林省长春（新京），它有一支上百万人的部队，驻守在伪满洲国境内各地。主要在黑龙江沿岸各军事重要城镇设防驻守，重点对苏联，其次镇压我国人民，指挥着伪满军队，以伪满军队为他的助手，并且还监视着伪满军队，以防叛变。

伪满洲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单位叫军事部，后来于康德八年改称治安部。第一任军事部大臣是汉奸张海鹏，第二任是于芷山，第三任是郝士廉，第四任是于深微。从伪满洲国的军事中央（军事部）直到各军管区司令部（最初是五个军管区，后来发展成十一个军管区），以及奉天（沈阳）陆军训练学校，新京（长春）军官学校，均设有顾问部。

军事部的顾问部设三至五人。顾问的军衔以中、少将

充之。伪康德三年（一九三五年）的军事部最高顾问为平林盛人少将。

各军管区司令部的顾问部，也是独出一帜的单位。顾问部设大、中佐级（校级）军官二至三人或三至四人，外有两名属官（事务官非军职的）。他们可以和隶属下级部队的日系军官，不通过满系首长，直通电话或电报。

各团、营、连均设有日系军官，各日系军官在一九三八年（康德六年）以前，均为副职，团是团副，营是营副，但对日系军官统称为教官，实际上，他们的职权范围是在副职之上，是部队中的神佛，至高无上。各级顾问，掌握着统治的实权，在部队中有指挥、人事任免（包括司令官级的任免），生死之权。军管区以下的各旅、团、营、连等单位的日系教官也是一脉相传，各团、营、连的日系军官，对于顾问，也是尊崇得如神，日本顾问对于日系军官有权任免。

顾问在伪满中是单独一个系统，而不是附属于伪满军之中，表面的名称是顾问，实质是太上皇。顾问是日军中的现役军人，日系军官无论他们的满军军衔多么高，都是日军的退役军人，所以在日军中无军权。

军管区司令部顾问部的顾问，个别有时是大尉级的，但是到旅、团、营单位时，可以指挥旅团营长。伪军中的日系军官，在一九三八年以后，渐渐也都升为正职，掌握了名副其实的军权了，但是，他们内心并不服从上级的满系领导。

伪满军中的日系军官：

在伪满军中被看做神佛的日系军官，部队称他们为教官，实际都是来源于日军现役军官中的犯错误下来的，现

役中的退役军官或后备役的候补军官，或少数退役的下士官。

日本人在满洲统治时期，日满民族间是不平等的。凡是一个日本人，无论身份大小、高低，都有管制满人的权限。“满人”的官，绝对管不了日本人，日本人被人管，就是日本人的耻辱。日本人的粮食，全是细粮，主食是大米，而满人的少校级才可以吃大米。

一九四二年（伪康德九年）伪治安部下令：满系军官在战时外，不准携带手枪，原因是发生一起伪满军官枪杀日本宪兵的事件。

由于民族压迫，民族岐视的结果，满系青年军官中，不少人产生了反抗情绪。在日本投降之前，有不少的伪军官，消极抵抗，泡病号，混时光，有的甚至被逼上梁山。一九四二年春，正在奉天陆军军官学校上学的一名少尉军官王殿荣，原籍沈阳南郊黄土坎屯，在城内一家旅馆住宿，晚间去亚洲电影院看电影，他误坐宪兵的弹压席上，日宪兵将他撵走，王殿荣当时不满，他电影没看完就走了。日宪兵随后跟出，到中途发生口角，王殿荣拨刀将日宪兵砍死。第二天早晨，日宪兵队到旅馆去搜查王殿荣，将他逮捕，但未搜查他腰中的手枪，王殿荣挣开手拷，掏出手枪，一连打死两名宪兵后逃走，日宪兵队跟踪追到通化，王殿荣又打死日宪兵数名，逃跑到黑龙江国境上，日宪兵为避免再伤人，将王殿荣围上，将其父亲放在前面，他父亲被迫跪下，王殿荣才将手枪扔在地上，甘愿就擒。日本宪兵秘密将王殿荣处死，从此，满系军官平时不准携带手枪。

“七·七”事变后，我随日军进占热河的片断

张东藩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当时我在热河的骑兵四十四团进行肃正工作（缴老百姓私有枪支）。团长是王冠英，骑兵四十三团团长宋××，奉日本侵华军的命令，开往长城以北独石口，掩护日军向喜峰口进军。我当时是骑兵四十四团第二连少尉排长。部队开往距独石口三十华里的小厂和大滩，据老百姓和侦察兵的报告，国民党二十九军十三师高桂芝的部队，把守独石口的山岭和独石镇。当天晚上，部队的官兵，背着日本教官原田浩，纷纷议论：明天进攻时，只要是国民党的守军一开炮，我们决定乘马四散，逃向国民党军队的方向。第二天黎明，日本军派来了一个属官，在独石口前下达了战斗命令，派我为尖兵排长，向长城一线前进。我们刚刚用望远镜看到山上有几个兵的影子，然后就不见了，一面搜索，一面前进，一直进入到独石镇，一枪未放，占领了独石口镇。第二天，又派我带一排人，向云州前进，不久进占云州，也没见国民党军队的影子。骑兵四十四团即刻向上级

报告，部队占领了云州。但这时，却命令我们撤回到独石口。解除前进任务以后，又继续撤退到沽源一带，驻在该地开始剿匪。回到独石口时，官兵们议论，国民党真熊，只顾逃命不抵抗，我们还得当亡国奴。

究竟为啥撤回军队内幕不清，待部队回到独石口时才听到消息：中国人打死了日本人藤井（靖安师师长）．因此，满军才被解除战斗任务。

原来，日本军培植的五个军管区之外，另外培养了一个靖安师，驻在奉天东大营军官学校的东邻。这个师是日本从建立伪满时就培植起来的，是一支特殊的可靠部队，一个师三个团编制，附有山炮团。外人起名叫红袖头，军服腕部带有红线。这支部队从排长到师长，军官完全是日本军官，士兵是中国人。以靖安师为主要力量，协助日本侵略军向北平方向进攻。就在到达独石口以南的喜峰口的第二天早晨，日本人藤井中将司令官，带领着幕僚、参谋等人，到前线阵地去侦察地形和敌情时，他的警卫班长，中国人×××，掏手枪将藤井司令官打死，班长当时被随从幕僚逮捕，经过审讯，他说："我家在天津，我听说天津被日本飞机已经炸毁，我的全家在天津市，家中有老母和兄弟姊妹，家被炸毁了，我跟你们去打天津、北京，我的良心下不去，我打死藤井司令官，你们把我也打死吧！"第二天，也在藤井司令官被打死的地方，日本人用刀将这个班长砍死了。这个情报，事后也没传达到全军，从这以后，伪满军队很少被用到第一线上。

伪满大赉工商业

肖润林　华景波

伪满时期的大赉工商业情况，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大同元年（1932年）到康德七年（1940年）。这一时期，大赉工商业是在旧中国工商业的基础上，继续经营。那时伪满洲国刚刚成立，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初期，忙于在政治、军事方面付诸力量进行统治，重点是安邦和开展各项政务活动，一时对工商业尚无力垄断，大赉的工商业曾一度兴盛，各家店铺、商行竞相经营。大赉镇虽小，但工商企业竟达四五十个行业，大体分为：烧锅、当铺、上杂货业、下杂货业、粮米加工油坊、砖盆窑、木匠铺、铁匠炉、皮毛毡匠铺、饭馆、旅店、糕点杂货铺、醋酱房、照像馆、理发馆、豆腐房、煎饼铺、麻花铺、澡塘子、肉铺、粉房、切糕房、印刷刻字、成衣铺、钟表铺、麻绳铺、铁器铺、弹棉房、药铺、鞋帽铺、膏药铺、食杂小铺、镶牙、旧物估衣、草料窨子、鱼店、鱼床子、说书馆等等。在这些店铺中，资本比较雄厚的是烧锅、当铺、上杂货业、下杂货业和粮米加工油房等，他们用人多，利润大，和外埠交往也多，可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下面仅按行业分

类略述其特点和经营情况。

烧锅：旧社会制度白酒的行业，因用锡锅烧酒因而得名，并且将制造成的白酒也统称烧酒。伪满时期，大赉县城里有东烧锅（亦称于家烧锅，现在酒厂址），股东是于风犀，经理是杜肇三。还有西烧锅（现实验小学址），股东潘八爷，经理是陈贵三。烧酒原料为高粱。烧锅业一般都兼营榨油业（制造豆油），原料为大豆。烧酒、豆油销往城乡各地。那时烧锅生产用燃料主要是秫秸，每家烧锅秋后都要买下数万捆，堆垛储存，备一年生产之用。烧锅经理人要和地方官府、衙门头头脑脑取得联系，建立来往，买卖有了靠山才能做活。地方官府迎接高宾贵客也常去烧锅下榻，由烧锅招待吃、喝、存、栈。烧锅本大利粗，群众称之谓“赚大钱的买卖”。

当铺：是一种以衣物、金银首饰、珠宝玩物等为抵押品，向典当者借出钱款到期收回时索取一定利息为营业收入的行业。

旧社会群众有的在生产或生活方面发生困难需要用钱，就将较好的衣物或金银首饰送到当铺，按质论价，抵押借款，这叫做“当号”。双方约定期限，到时还钱抽物，若到期不抽可再续约三个月，再到期无钱抽回当物者，则当铺有权将其当的衣物卖掉，叫做“死号”。若能按双方约定期限按时还付借款，则将衣物取回，叫做“抽号”。

伪满初期大赉有四家私人当铺，生意都很不错，后期全东北各市县都开设一家大兴当，为官办商号，资本雄厚，垄断了当时的当铺业，致使私人当铺营业日趋萧条。

杂货业：杂货业分为上杂货业和下杂货业。上杂货又分大百货和小百货类。大百货经营的主要品种有软缎被面、褥面、丝麻织品、丝绸大衫料、纺绸、毛布（平纹斜纹）、青兰白布、花旗布、大尺布等。花旗布属于棉细布，此布幅面宽，都是由外地购进，也称之为洋货。大尺布属于棉粗布，幅面窄，是国内产品。还有背心，衬衣衬裤（当地加工品）、雨伞、旱伞、包袱皮（素的彩花的）、摆设化妆品，有各种镜子、坐钟、挂钟、簟瓶、帽筒、花瓶、木梳（木制的）、牙刷、羊肚手巾（毛巾）、手帕、洗脸盆、漱口盂（瓷制品）、胰子盒（瓷制）、各种香粉、珞玲粉、头油、发腊、花露水、雪花膏、牙粉（有狮子、苦林、蝴蝶等牌）。那时刷牙用牙粉者居多。牙膏只有两三个品种。洋胰子（香皂）五六个品种，黄胰子（肥皂）两三个品种。日用小百货有各种片带、筒带，都是用粗纺白纱织的，丝子（彩花长条带，镶在衣边、裤角边，妇女、儿童用）。腿带是用细织纱成，长约二三尺，宽二寸左右，染青色，冬季穿棉裤，人们都扎腿带，有些老年人夏季也不散裤脚，扎上腿带以防风保暖。其它小商品还有卡针、顶针、别针、大小包针、各色棉线、轴线、大小刷子、鞋拨子、头绳、衣扣、洋腊（腊烛）、红糖、白糖、冰糖，各色纸张、烟袋嘴、烟袋杆、烟袋锅等等。

在上杂货业中，“东兴福”、“裕昌源”、“德增永”三家买卖较为兴盛。这三家商号深通“生意经”，基本上做到了“言无二价”、“童叟无欺”。并采取和气生财、薄利多销的方法，生意做得活，买卖兴隆。尤其是“东兴福”经理单

仲三是商业通，经营有方，恪守信誉，在服务方面，对顾客十分和蔼，先烟后茶，做到了来有迎声，走有送语，顾客挑选商品达到百拿不厌，顾客深表满意。大赉县第一座二层楼房，就是“东兴福”建的（现被服二厂址）。

那时，行业之间为了招揽生意，获得更多利润，利用多种形式，互相开展竞争。如有的挂出商品大减价几天的招牌，有的实行多买货物附带奖品等等。

上杂货业，正门外上方悬挂牌匾，是商号的字号，一般是木制横匾，上面镌刻着字号，字序由右向左，字用黑色、红色，有的商号特用金色，被社会上誉为金色牌匾大商号、有钱的买卖。

商店正门外两侧各挂一长条牌匾分别刻有“货真价实”、“言无二价”或“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字样。此外，上杂货业门前都挂着长条布幌，用红布制成，上书有“自购申阪洋货，绸缎布匹，无一不备，欢迎选购”等字样。悬挂布幌的幌架，有的商号也很讲究，使用铁制的，绘彩龙凤等吉祥之物，以示商号之信誉和象征营业兴旺茂盛。

下杂货业经营的主要商品是：车马辕具类有套头、枷板子、马拉子、各种粗细麻绳、马套、缰绳、抱绳等；铁制品类有二齿子、泥叉、炉钩、炉铲、大小铁锅、铁勺子、铁炉子、大镐、二镐、板镐、锄钩、锄板、镰刀、芟刀、铁锹等；日用家具类有粗细陶瓷制品，如饭碗、盘子、碟、匙、酒壶、蒜缸、拨火罐、大缸、二缸、排字缸、小缸腿、大小坛子、菜刀、片刀、菜板子、洗衣板（木制）；山货类有木锹、木水瓢、木勺子、木叉子、锄杆、镐把、架木杆等；

灯具类因那时电灯还不普及，特别是广大农村，都点煤油灯。灯则多是煤油灯，有省油灯（只一个玻璃瓶中间可放灯芯），有座灯（由灯壶、灯罩、灯头组成），有吊灯（由灯壶、灯头、灯罩、灯伞组成）。此外，还有手提式便于在户外使用的保险灯。

下杂货业门面比较简单，只是在门脸上挂字号牌，如“顺兴隆”、“成太永”等，这个行业多是明门市，即常年前门大敞四开，便于买主选货买货。冬天店员都身穿皮衣，脚着毡鞋或皮靰鞡，天冷时烤烤炭火盆，一般不生炉子。

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买卖双方可争讲价钱，即不是一口价，店主常常要谎，故有时双方争执，一时难以成交，甚至找人说合。

米面加工油坊业：亦称碾磨坊、油坊。此行业主要是粮米加工带销售，一般都是前门市后作坊。加工出售的品种有白面、荞面、杂合面（苞米面掺少量黄豆面）、高粱米、小米、黄豆、绿豆、芸豆、小豆、豆油、豆饼、麻油以及糠麸等。“三太栈”是粮业专业，以买卖粮食为主。“裕民米厂”、“裕丰米厂”以加工粮米为主。米面加工以“三盛合”与“洪兴成”最负盛名，素有货真价实之称。在方便顾客上，有人买米买面超过四、五十斤时，掌柜的就打发年轻的扛着给送到家，不收分文费用，深受群众欢迎。

糕点、糖果、鲜货业：亦称茶食店。这个行业主要是经营干鲜果品、四季茶食。糕点类有槽子糕、西洋糕、喇嘛糕、芙蓉糕、吉豆糕、核桃酥、焦盐饼、炉果、云片糕、冰蓼花、各种杂拌果子、油茶面、各式月饼、套月饼（大

小不同形状的月饼，摞在一起成为一套，上边再罩上彩纸网，美观大方，馈赠佳品)。正月初五过后，就开始加工元宵，供应元宵节市场需要。出售糕点时，店员用双层纸包好，每包一斤上加彩印花票，用细绳系好，交付买主。店内还备有长方型黄色木制果匣子，每匣装糕点二斤，加以彩印花票馈赠亲友，实惠方便。干菜类有：海菜、海参、海茄子、大海米、小海米、干贝、蟹肉、蟹腿、黄蘑、木耳、榛蘑、花蘑、黄花菜、东洋菜等。鲜果类有苹果、白梨、鸭梨、海棠、花红、沙果、葡萄、山里红、桔子、山楂、无核白葡萄干、黑葡萄干。罐头类：海产品罐头有海参、鲍鱼、虾仁、蟹肉、沙丁鱼等；菜类罐头有东菇鸡、鲜竹笋；水果罐头有苹果、白梨、鸭梨、山楂、杏子、蜜桃、桔子、海棠等，都是马口铁罐。瓶装酒类有青岛啤酒、麒麟啤酒和日货福鹤清酒(三斤八两大瓶装)、一面坡啤酒、八王寺汽水(白酒)。那时樱花啤酒、麒麟啤酒、福鹤清酒货源充足，大力倾销，在大中小城市到处悬挂商品宣传牌，在大街墙壁上涂写大型宣传广告，有时还对代销店赠送玻璃酒杯、茶盘、口杯等招揽顾客。茶叶类有雨前毛峰、明前毛峰、铁叶大方、寿眉、龙井、雀舌、花包种(伪满时公家特制的通用大众商品，用彩印纸盒包装，有一两装、二两装、一斤装等，分为福、禄、寿、喜四种，以区别质量)、各种红茶。糖果类有冰糖、白糖、红糖、各种水果包糖(品种不多)等。

在糕点行业中，以“新增盛”、“长发源”较占优势，两家以产品质量互争市场。“长发源”历史较长，有一定名望。

"新增盛"是后起者，但以产品质量好夺得全城称赞，成为后来者居上，闻名遐迩。"新增盛"是合资买卖，经理人是孙殿武，是糕点行家，亲自动手制作糕点，做到了货真价实，生意兴隆。祖国解放后，孙殿武拥护中国共产党，接受党的领导，遵守国家政策法令，做到文明经商，被选为大赉县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还是政协大安县委员会常务委员。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他被调到大赉县食品加工厂任副厂长，负责糖果糕点生产加工工作，发挥专长，做出了贡献。

木匠铺：木匠铺一般是临街设有门市商店，后院设有加工作坊。加工出售的商品有八仙桌、长条桌、饭桌子、三匣桌、学生桌、板椅、圆盘椅、大板凳、小板凳、长条凳，还有门扇、窗扇等。也有些木匠铺制作比较精细的家具，如大柜、立柜、对柜、对箱、被格、炕琴、书橱、茶几等。有关雕刻的活，高超手艺人也能作。

木匠铺多半都做棺椁，俗称棺材。棺材是过去土葬时装殓尸体用。棺材尺码分六八的、五七的大棺材，四六的、三五的中型棺材，还有小薄皮棺材。棺材头前用彩色或金色绘上阴曹地府、金童玉女等图案，中间留一条空白，用作书写死者的名字。棺材按规格质量论价，上等的用松木，中等的用一般木材，下等的用半朽木材。

木匠铺还有专门制作大车的，亦称车铺，产品有大铁车、钢轴车、花轱辘车。制造这些产品，质量要求比较严格，必须保证承担几千斤载重，不串轴、不掉瓦、不松楔。

铁匠炉：当时大赉县城内共有七家铁匠炉，主要是加

工和零售铁制品，有各种镐头、镰刀、芟刀、菜刀、片刀、锄勾、锄板、马掌钉等。也加工一些铁活，如：铁圈、铁链子、二齿子、炉板、炉蓖子、炉铲、炉勾、大镐、板镐、小镐之类。

铁匠炉设备简单，一般只占两三间门市房，屋里搭一座铁烘炉，拉风匣，烧焦炭，有一人掌钳子，二人抡大锤，天天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冬天挂马掌是营业旺季。

皮毛山货铺：这个行业包括皮毛、皮革、毡匠铺、山货铺等。主要是收购各种皮张，猪鬃马尾，然后通过加工运往外地销售。另外，还加工一部分车马用具，用细竹制成大小鞭杆，有的厂家是专业鞭杆铺。收购兽皮、兽毛的厂家，用毛加工成毡子、毡鞋、毡袜；用羊皮加工成毛袄、皮裤、皮帽子、毡帽头等；用牛皮、猪皮做靰鞡，供应市场。在此行业中，共有大小店铺十一家，其中以“德增远”经营最佳，经理人王金德精通技术，领导有方，做到了货真价实，质量优良，广揽顾客，生意兴隆。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工商业公私合营，王金德曾作为私方经理参加大赉县皮毛厂领导班子，对皮毛生产发挥了个人专长，做出了贡献。

饭馆：大赉县城靠江河，通铁路，交通方便。加上大赉产鱼闻名，来往客商云集，致使饭馆业较为发达。伪满时期，县城内共有大小饭馆十多家，分别在门脸挂单幌、双幌、四幌，以区别营业范围。经营品种主食方面有酥饼、馒头、花卷、大碗面、水饺、包子、蒸饺、馅饼、锅烙、烧麦、筋饼、丝饼、烧饼、麻花等；副食方面有红焖鱼、浇

汁鱼、溜鱼片、溜鱼段、炸鱼、拌生鱼。肉类溜炒菜齐全，海味也兼有之。饭馆门脸上分别挂有“包办酒席、应时便卖”、“应季小吃、经济实惠”等招牌。顾客一进饭馆，跑堂的（服务员）先迎上前来，送杯热茶，然后请顾客点菜点饭，随即唱着向灶房传达下去。饭后清算，由跑堂的按桌上盘碗，一一唱价，最后一口清核出总价。顾客在付钱时，一般要多付给几角，叫做“小柜”，亦称“小费”。跑堂的收到“小柜”后，大声喊“×角喝酒”！随之其他柜伙齐声说“谢”。

饭馆屋内，一般摆放圆桌面或八仙地桌，也有的专备一铺湾子炕，放上两三张炕桌，因有的顾客喜欢坐在炕上，热热乎乎地吃喝。

如有结婚户招待亲友，大饭馆可包办酒席，一次可容纳十桌、八桌。饭馆门上挂着“×宅喜事”红牌。有的饭馆或喜事主人借来一台留声机，俗称洋戏匣子播放戏剧、歌曲唱片，为喜事助兴。

有的饭馆对熟人和有关商号单位用饭，还可以挂帐赊销，以此开展往来，扩大营业。

旅店：亦称旅馆。旅店业一般门脸上除挂有字号牌匾外，还挂有“安寓客商”、“住宿方便”两块招牌。还有写“孟尝君子店”、“四方客来投”的。旅店内设有单间，那时的单间，也很简单，只是每间搭有隔扇，有单扇门，一般没窗户，多是火炕，少数是床铺。

大车店：主要是寄存车马，安寓客商。店大门顶上悬挂一条木制大鲤鱼，为行业幌子。大车店设有平炕（亦称

便炕）供车老板住宿。备有马槽、料缸和马草马料，以便喂马。马以匹、车以辆计费。

旅店、大车店一般都备有伙食，住宿客商在此用餐，饭菜价码比饭馆便宜。

伪满时期，人民没有言论自由，政府禁止人民群众议论国家大事，因此，政法、公安部门责成旅店、大车店在客房内墙壁上都贴上“自照衣帽”、“莫谈国政”“莫谈国事”的标语。

药铺：主要经营中药，丸散丹膏、地道药材，对各类饮片进行炮制。当时的药铺，每家都有坐堂先生（医生），随时给患者看病、开方取药，做到了医药结合，既招揽顾主又方便群众。

药铺门脸上，都挂着写有字号的牌匾，还挂着一块长方木牌，上写坐堂先生的姓名。有的药铺还兼营文房用品，如：纸墨笔砚、书刊、练习本等，还经销学生用的教科书。

医院及西药房：伪满大赉县城内有广济药房、大赉医院、惠民医院、大东医院（天主教堂办的）。这四家都经营西药和诊病。患者就诊、吃药打针随来随看，不设病床，不留住院。那时群众称西药为洋药，专门厂家生产的大宗日用药品有仁丹、若素、胃活、老笃眼药、大学眼药等，到处广泛宣传，行销东北各地。

膏药铺：伪满时群众喜用膏药，街内膏药铺就有六家。销售的膏药有外进的，有自制的（叫做熬膏药）。专治各种疔毒恶疮、头痛、腰腿痛、小儿腹痛等症。无论男女老幼，医治上述病症都愿贴用膏药。当时“福生堂”的葫芦印膏

药疗效好，深受患者欢迎。

澡塘子：伪满时期大赉县城有两家澡塘子，群众称南澡塘子和北澡塘子。两家澡塘子，都是大池塘，每年要买数万捆秫秸做燃料。澡塘内有洗澡、搓澡、修脚、理发等项目，备有床单、毛巾和开水，澡塘子门前白天挂一支木制大腊烛，晚上高悬红灯作为行业幌子。那时顾客洗澡，一般都付小费。

理发业：理发店的字号，多用"轩"字。如"同发轩"、"文雅轩"、"英奎轩"、"新雅轩"等。也有用"理发店"的，如顺记理发店、维新理发店等。理发店的幌子是门前埋一根木杆，涂上红白相同的斜线，杆头镶一块横木板，写上字号，下挂两块一尺见方白布，写"理发"二字，还附有"清水洗头，朝阳取耳"八个字。那时理发员多是男的，只两三家有一两名女理发员。使用的工具是双手理发推子，用左手支撑，右手推动，显得笨重，伪满后期才开始使用单手理发推子。发型有平头、学士头、分头（偏分、中分）、背头等。理完发理发员还给顾客取耳（使用小耳勺、刮刀等小工具掏耳朵）。

理发店铺规是：理发员上工前，禁吃葱、蒜、韭菜和禁止喝酒，以防止理发中呼气有味，对顾客不礼貌。从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俗称过小年）起，理发还要临时涨钱（价格略调高），到春节为止。伪满妇女很少到理发店理发，烫发到后期才时兴起来，但顾客很少。

瓦盆窑：专门制作瓦盆，亦称泥盆（即用陶土烧制盆）。伪满初期瓦盆是民间重要的日常家具。那时普通家庭

的饭盆、菜盆、洗衣盆、花盆、便盆都是使用瓦盆。当时大赉有两家专业瓦盆窑，它们制作的瓦盆，按型号区分有大盆、二盆、三盆、四盆、五盆五种为一套。产品除在窑店销售外，还有些商贩肩挑扁担，八股绳拴两个筐，来窑批发，走街串巷零售。这些小贩多是一手卖瓦盆，一手收破烂（碎铜烂铁、旧棉花、绳头等）买卖双方不动现钱，互相交换。群众称这种商贩叫"换瓦盆的"，日久天长在民间形成一句"歇后语"——换瓦盆的出身一套一套的。

鱼店、鱼床子：大赉县城靠近嫩江和月亮泡，是盛产江鱼之县，因此大赉城内鱼店、鱼床子林立，营业兴旺。大赉县城有江鱼市场，以后归渔业组合。鱼店、鱼床子经营地产江鱼，江鱼由生产者或贩运者运到城里市场，各鱼店去人上市购买，然后回店分类，有的供应当地市场，有的外调，供应城市。一年四季都有捕鱼生产，鱼店、鱼床子也常年生意兴隆。鱼汛季节，大赉市上摆满各种江鱼，鱼贩高声叫卖："鱼贱，鱼贱，多买少算，拿筐多给"。买鱼人从早到晚云集市场，外调江鱼用大车或火车发运，夏季用条筐包装，冬季用麻袋、草袋包装。也有外地客商前来买鱼，大赉有鱼业代理店，为他们购销服务。

除了上述行业店铺之外，伪满时期大赉城内还有照相馆、豆腐房、煎饼铺、切糕房、粉房、修理铺、印刷刻字、成衣铺、弹棉房、铁器铺、肉铺、食品杂货小铺、旧物估衣店、碾磨房等遍及县城各角落。

伪满时期管理工商业的行政机构有警务科、经济保安股、商务会、警察署等。当时各店铺进货渠道不一，大型

商店多数去外埠采购。如从北京、天津、大连、奉天（沈阳）、新京（长春）等地自行进货。中小型的则由本地大商号批发进货。货源比较充足，进货不受限制，各行各业竞相经营，属于兴盛时期。

伪满时期，各商号的组织形式是由股东及若干职员组成某一商店，分为资方（股东）、劳方（经理以下）形成劳资关系。通过劳资双方协商一年或三年一算帐（结帐期）。不到结帐期，资方不得干涉一切买卖业务。

店铺职工的职务分大掌柜（经理）总管全面工作，二掌柜（副经理）辅助经理工作，以下有三掌柜、四掌柜。吃劳金的附属于各级掌柜，还有年轻的（店员），受各种掌柜和吃劳金的支配。还设有帐房先生，总管财务和帐薄，帐房先生必须经过长期考验，认为忠实可靠，才能任用。

利润的分配方法有的按纯利润资方分50%，劳方分50%，称之为东一半与伙一半；有的四六分成，资方40%，劳方分60%；还有的资方分45%，劳方分55%不等。怎样分配取决于东家和大掌柜商议而定。劳方所分的比例，以身作股，除应得的工资外，大掌柜有的作一个股，二掌柜身股为九厘或八厘，一个股比如10分，九厘的就是9分，到结算期根据盈利多少以总股份分配。但必须留出一部分钱赏份吃劳金的和年轻的，因他们没有身股不享受利润的分配。在上一年结算后开始研究下一年结算期的人选问题，对吃劳金的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的经过评选，每人有的给三厘或四厘，再结算时就不可享受利润分配。但也有吃劳金的多年还未得到一厘身股，原因是在工作过程中表现较

差，或是不得掌柜的青睐。年轻的有的青云直上，经过几年由年轻的吃劳金的变为有身股的。掌柜的虽然份不多，但有权享受分红。帐房先生多数享有身股，以便掌握财权。

各行店铺有较严格的铺规。凡是进店铺的职工，必须有一家商号承保。对职工有较严格的要求，首先是对钱的问题，如发现有贪污或所谓偷、摸、渗、漏的立即找承保商号进行辞退。对一般的错误，如不服从领导，打架争吵、闹不团结的，利用业务时间批评教育。凡是进入店铺的职工都要大练基本功，要全面熟悉各种商品名称、产地、规格、质量、用途、价格，以便招揽生意。年轻的（指店员）每天晚上或营业空闲时间要练打算盘、写毛笔字，以便提高业务素质。那时店铺职工每天从早六点“开板”（开门营业）一直到晚十点就寝，劳动时间较长。一般商店作坊职工都统一住宿、统一伙食，伙食费由营业费用支出。伙食安排是每月初一、十五吃饺子，还有的逢五排十吃一顿细粮，菜也比平素好。每逢节假日，饭菜质量都好，特别是春节期间，都讲究排场。从初一到初五每天早饭吃饺子，晚饭有的大商号要摆设筵席或隔日吃一次火锅。但各家商店不尽一致，有的好些，有的差些。春节多数商店放假半月，初一到初五是整天假，初六到十五是上午营业下午放假。正月十六叫做“开市”，各家商店门上都贴“开市大吉、万事亨通”的对联，早晨开板，燃放爆竹。到伪满后期，商业建立了公休日制，每月中停业一天，给职工放假。此外，还有的大商号每年给职工放两个月的住家假，不扣工资，但对回家者不支付路费，如果有人家在关里，因受经济条件

所限，也可以二年或三年回一趟家，可住四个月或六个月。

伪满康德七年（1940年）以后为大赉工商业的第二阶段。康德八年（1941年）“大东亚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为了大力支援所谓“圣战”和补给日本国内所需物资之不足，将我东北重要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日本。对我国人民生产生活所需物资大量削减，强行统治实行“配给制”。伪满康德七年（1940年）实行了“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后（就是从7月25日那天起，物价停止变动），切断了来自大城市的货源。伪满政府为了控制物资，先后成立了“粮食组合”、“渔业组合”、“烟酒专卖”、“小卖联盟”等机构。那时，如有不通过小卖联盟自行进货者，一经查出，以经济犯罪论处。城乡还成立“兴农合作社”，粮食实行“出荷”（就是强制征购）。加上社会上警察到处横行，敲诈勒索，不但对大商号进行苛求，就是对小本经营也不放过。由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疯狂镇压和残酷掠夺，形成了百业凋零和民不聊生的经济局面。各种商品质量日渐低劣粗糙。例如：棉布因棉花须满足军用，机织布数寥寥无几，市场上只好以再生的棉纱织成更生布供应民需。糕点铺因面粉配给数量少，加工糕点只好掺杂苞米面或土豆面，来勉强维持营业。其他行业也都受到货源和原材料的控制，大部分日用商品短缺，如粮食、棉布、纸烟、烧酒、毛巾、香皂、肥皂等实行配给制度，致使各行各业营业萧条，日趋衰落，纷纷倒闭。到祖国光复前，大赉工商业幸存者也由大变小，处于奄奄一息之中。幸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收复祖国失地，把

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成立了新中国．大资工商业才又随之恢复发展起来。

“九·一八”事变前后开通和瞻榆县的金融业简况

朴元锡

民国六年六月（1917年）在奉天成立了东三省官银号（其前身是华丰官银号），开通县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东三省官银号开通分号。民国时期这是开通县唯一的金融机构。“九·一八”事变后闭锁，当时庶务、钱庄及庶民金融机关皆无。大同二年（1933年）一月，满洲国中央银行曾派出专员来开通县，整理“东三省官银号开通分号”。

中华民国时期，东北三省币制发行紊乱，货币种类繁多，仅“四行号”（东三省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发行的货币就有十五个币种，一百三十六个券种。“九·一八”事变前，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间四洮铁路筑成（现称平齐线），由南而北直贯本县中心。随着交通的发达，农工商间的贸易日趋频繁。然而这个时期受政治、军事的影响币制极不统一，发行紊乱，混杂流通。当时黑龙江的广信公司（广信官银号）发行有银元票和铜元票两种；吉林省的永衡官银号发行了永衡官贴，价值分现大洋十元、大洋一元、小洋十元、铜元壹百枚等

四种；奉天则发行奉票。当时，开通县金融市场主要以黑龙江省官银号发行的钞币为多，常见的还有奉票、吉林官贴金票（永衡官贴）、殖边银行发行的小牛票，硬币有银元（带有孙中山、袁山凯头像）面值一元的。"九·一八"事变后，各级地方政权、地方维持会、大商号还曾发行过地方钞票。由此可见，东北币制之紊乱概况。而开通处于辽、吉、黑三省交界之地，国币和县私商之私贴同时流通，其金融状况可想而知。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币制极为混乱，奉票、官贴贬值，广大劳动人民和一些商铺深受其害，居民无法生活，伪职工开不出薪饷，地方政权机关和金融机构乱发地方流通券，维持地方伪职员开支。这个时期国币奇紧，地方流通券泛滥成灾，农业欠收，导致商铺异常箫条，致使农户由富变穷，商铺由兴隆转为萧条甚至倒闭。当时开通县内使用的大部分通货是旧大洋票，满洲国的新国币、张学良的奉天票、吉林官贴的大洋及金票。但此处通票较少，说明开通县和其它县同样财政困难。据历史档案记载，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一日，开通县以县公署及金融维持会的商铺或当豪等为主体发行了流通票，总额为九万五千元。明细情况见下表：

流通票发行额及回收额表

大同二年五月一日调查

发行年月日	发行者名	发行额	回收额	现存发行额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一日	县公署财务局	20.000 元	10.000 元	10.000 元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永远兴	20.000 元	5.000 元	15.000 元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日	福元恒	20.000 元	7.095 元	12.905 元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一日	兴和成	20.000 元	8.920 元	11.080 元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福元涌	5.000 元	130 元	4.870 元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公兴源	5.000 元	1.400 元	3.600 元
民国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洪兴泉	5.000 元	833 元	4.167 元
合计		95.000 元	33.378 元	61.622 元

摘自康德元年开通县地方概说篇

大同元年（1932 年）十月末发行新币以来，曾积极回收流通票，流通票一元兑换国币一元。

瞻榆县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当时中央政权已经颠覆，处于动乱的时期，瞻榆县受此影响，省补助费已断绝，并且所依赖的金融机关也已关闭。因此，地方收入一时激减，财政周转不灵，呈现了停滞现象，当时最严重的是对县职员的薪俸开支不够，工商业因缺乏资金营业而萧条。据此，在县城内组织了瞻榆县金融合作社，先后发行了四万六千五百元的地方流通券，充当各种经费，从而民国二十年（1931 年）的支出全部依靠此项流通券。这次流

通券在当时经济不振的状况下，曾给予市面若干的扶助，但其发行的目的是为了急於救济并满足一时之需要，未做任何的发行准备工作，故价格急剧下跌。在大同元年收回时期，其换算率下落从最高六角五分到二角，致使经济混乱，并给予县财政以极端不良影响。事后由于水灾匪祸接连不断，农作物逐减，税收困难，县财政处于历史上的最困难时期。大同元年间始摆脱这种艰苦环境，财政稍有恢复，但“尚须从国、省方面下拨补助金”。

为了防止流通券下跌，大同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二次又发行流通券六千五百元，先后两次共发行流通券四万六千五百元。大同元年三月至五月间收回发行的流通券，收回额为四万元，现存发行额为六千五百元。

伪满镇东县“戒烟所”及“康生院”

张乃仁

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唯利是图的，更是贪得无厌的。日本侵略者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占领了东北三省并不就此止步，于一九三三年初又进军华北，铁蹄踏进了热河。热河为鸦片产地，日本和英帝国主义是同一付坏心肠，同一双毒眼睛，它早已了解鸦片已成为东北地区部分官僚、地主、富商的生活必需品，鸦片在东北市场大、利润高、销路广、脱手快，便暴露出他们的狰狞面目，恶毒心肝，不惜图财害命，就在热河迫使百姓广种大烟。大烟有了，接着就步张作霖的后尘，亦步亦趋地走着张作霖的老路。在伪满新京（长春），特立“鸦片专卖署”。各省设立“鸦片专卖局”作为独家经营鸦片的管理部门，继之在各县开设“戒烟所”——官办“大烟馆”，作为零售市场，批发零售的单位俱全，为推行毒化政策和为赚取高额利润搭好了架子。

1939年（伪康德六年），继各县之后，我县伪县公署也正式成立了“戒烟所”。位置在现新华书店路东对过，即现在的小五金位置处。座北朝南东西排列七间土平房，门在

拐角路东西向，与新华书店相对。门市房的正面，由青砖砌成，又接着往上砌成砖门脸，高出房盖一人左右，高耸挺拔，极显壮观。由西房门进屋，头两间为办公室，在靠办公室的一边修“领烟处”。上半截围以亮子，留一小门，以便伸手领取烟泡，如同现在商店的收款处一样。顺着房子往里进（往东走），三间房子为“吸烟室”，南北大炕六铺，用砖间壁成十二间单间，可纳二十多名烟客。中间是走廊，同旅馆的格局相似。每铺炕中间都摆一张油漆小炕桌，以备饮茶放置糕点之用。炕桌两侧亦即炕头炕梢各设置铺位，铺以洁净的毡褥。桌子里边堵头都有一木制油漆烟盘，中间放置烟具：大烟枪（吸烟用的，烟袋上安烟斗即烟袋锅，是活的，能随时拔下安上，烟斗顶面中间有小孔，烟由此通过），拳头大的烟灯上罩玻璃灯罩，灯座里装有豆油，一根四寸长的烟钎子（细铁钎）。每个单间小门都挂以洁白的布帘。再往里最东的一间是厨房。此其布局也。

“戒烟所”的组织领导：隶属于县公署行政科厚生股的医事系。负责人王忠，在该股领导下进行工作。

“戒烟所”设置所长一人（李秀山），会计一人（乔福山），负责收烟款及有关现金收支事宜，负责烟料管理及支付事宜。另有勤杂工人，内勤负责饮水供应及室内卫生；外勤负责跑街买取零用等。还有厨师一名，计六、七人。

“戒烟所”的业务主要是向大烟瘾者售大烟。其销售手续是：大烟瘾者先到本县警务局保安股卫生系申领“鸦片领取证”。证里表格有姓名、性别、年龄、发放年月日、领取时间，并贴一寸免冠照片一张，工本费两角，一年一

换。保安股长梁贵彬。与有关单位有关系的瘾者可领两个本，有的不吸烟者也领到两个本。“鸦片领取证”分两色，在“戒烟所”吸烟者领蓝色本，在家吸食者领绿皮本。凭证领取，定量供应。每天两份烟泡，七天领一次。按期领取，过期不付。据说因未领的余额内部高价出售。那时私买烟泡每份两元。在所里吸者，每份两角二分，在外吸者每份两角。因在所内吸要用所的烟具，并有勤杂招待，故多花二分。不论所内或所外吸烟的大烟灰全交给“戒烟所”，不得私留。因与戒烟同时并存的还有“康生院”这一单位，其任务是净化大烟瘾者，防范把烟灰带走，转交给救疗者，影响净化工作。此外，“戒烟所”内还办储蓄业务，凡去抽大烟者，每月都要储蓄10元钱。

“戒烟所”工作时间：早八点到半夜十二点，午间有午休。夜间张灯供客，通宵不熄。

开业时间到了。吸烟室的南窗面对东西大街，通往行人很多，有碍观瞻，所以南面临街窗户都放下窗帘，房子举架又低，窗户窄、门又小，光线不足，烟云飘浮，弥满烟室，散发出刺鼻的烟嗅。豆大的烟灯火舌在半透明的灯罩里蹿跳着，如鬼火一般。阴暗的屋里，一个个瘾者面黄肌瘦，骨瘦如柴，在烟灯笼罩下，变成青脸褐发，好象一具僵尸卧在铺上，使人感到阴森可怕，好似进了地狱，入了鬼门关一般。

又一个瘾者来了，年纪五十上下，却显得老态龙钟，是那样潦倒无精打采地走进屋来，迈着艰难的步子，显得十分沉重，扛枷带锁一般。向工作人员望了一眼，就钻进吸

烟室里。一头扎在卧铺上仰面朝天，头不抬，眼不睁，如像几天没睡觉。喘息片刻，由怀里掏出一个小花纸包，啊！这是烟泡！打个呵欠，侧过身来，懒洋洋地划根火柴，点上烟灯，把花纸包打开，掰块豆粒大烟膏用烟钎子挑着，在火苗上烤烤，在下侧手的食指侧面滚动几下又烤。这样反复几次，最后搓成小枣核样烟球，用钎子插在烟斗的小孔上，按了按，对准小头，含着烟嘴，用钎子拨弄着大烟，被火烤得直冒泡，此伏彼起，吱吱作响，一口接一口地往肚里吸。将要抽了时，用钎子在烟斗周围紧抿几下，务求把烟抽净。把身子再仰过来，随着缓气，把烟徐徐从口喷出。又侧过身来，接着再照样吸二、三口，照样进行几次喷云吐雾。扬扬胳膊，伸伸腰，蹬蹬腿，曲伸几下小脚指头，显得那样舒服，如吃人参果一般。熄了灯，揣起剩下的烟，坐起身，倒杯茶，喝几口。下炕跺跺脚，扑拉几下衣襟，精神十足地耸耸肩，挺挺胸，轻快地走出门扬长而去。来去判若两人。

以上是“戒烟所”的大概情况。下面追述与“戒烟所”相辅相成的“康生院”。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戒烟所”以凭证定量供应的办法，控制吸烟人数和吸量，使瘾者人数不再扩大，使烟瘾不再加重，保持在最低程度，以便通过“康生院”的救疗，净化烟瘾，最后达到康复，吸烟者也随之逐渐消失了。这不过是给 人一个错觉，以掩饰罪恶而已。请看事实吧。

伪“镇东县康生 院”也是经伪镇东县公署于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与“戒烟所”同年建立的。地址是现在县

医院大门西边，座北朝南的随街五间平土房，占地面积约120平方米，入门宽敞。仿佛是四扇门。东西靠边两扇好像是固定的，中间两扇可以开闭。门顶上有个不太高的洋门脸，用砖修成一个长方形框子，四边突出，里边内陷而平，刷以白灰，在高一尺二寸，长三米的平面上用水泥堆成“镇赉县康生院”几个醒目的大字。

“康生院”又名“救疗所”，也由县厚生股及警务科双重领导，协调工作。有院长一人，又名“救疗嘱托”。先是宋汉荣负责，他离任后，由史林格继任。下设“主事”一人，由日本人柴田吉雄任之。下有工作人员2至3人。其工作任务是收容鸦片瘾者入院救疗，净化烟毒，达到没有烟瘾的程度。一年收容两次，每次为期2至3个月，到期烟瘾消除，净化彻底，可按期出院，否则继续救疗，不许出院。被收容入院者，按烟瘾轻重分成四个等次交付“救疗费”，另交伙食费，在院食宿不许外出。救疗方法是不吃药，不打针，不抽烟，干忍着。

收容的瘾者的来源：先由省级单位按你县瘾者情况下达给县一定的任务，县原生股再根据情况向各村下达任务。一般大县瘾者人数多，由原生股下派“禁烟指导员”到各村驻在。指导员负责宣传吸烟的害处，并了解吸烟情况，每周集中一次进行宣讲。县里下达救疗任务时，由指导员指派瘾者入院。如不按时报到，即缴收“鸦片领取证”。再抗拒即采取行动，由警方强迫入院。入院者不一定都是有烟证的，也有没有烟证的。如果各级主管单位有熟人，可以幸免，轮不到救疗。就是经过救疗的，净化出院后，“康生

院”并不是对净化者负责到底，继续监督管理，而是出了院就算完事。况且真正达到彻底净化者为数不多，有熟人再起烟证照常吸食。私买大烟也不困难。每一份烟泡两元（烟贩子每两陆拾元买入，可加工120份烟泡，零售两元一份，其利润之大可见）。

从上述情况归纳起来，烟贩子行贿受贿腐化国家官员，社会上私烟不绝，“戒烟所”可把过期不付的大烟高价出售，经救疗净化的瘾者可以再办烟证或私买大烟，继续吸食。这样恶性循环任其发展，岂有休止之日，因此，大烟瘾者有增无减，与日俱增，愈演愈烈。请看下列调查的数据，可知言之不谬也。

据一九三九年（伪康德六年）即开办“戒烟所”、“康生院”之初，伪县警务局下令全县各警察署对瘾者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当时鸦片瘾者仅240人。其中男性197人，女性43人。最高年龄组为60—69岁。经“戒烟所”的凭证领烟、定量供给的措施，又经“康生院”的救疗净化，经过四年的禁戒工作后，于1943年（康德十年）警务局又进行一次复查，其结果是：全县瘾者为630人，男性405人，女性225人。最高年龄组40—49岁。结果是瘾者人数增多，瘾者年龄下降。

由此，镇赉县以及所有伪“戒烟所”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不是昭然若揭吗？伪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各“专卖署”，省领导机关名曰“专卖局”，而到县则竟然蒙上面纱，挂出一个“戒烟所”的牌子，这不是自欺欺人吗？欲盖弥彰，实足借戒烟之名，行售烟之实，谋取暴利，以挽救大

东亚战争的财政困难而已。不仅如此更有其残酷的目的，乃是有计划有步骤有预谋地对东北地区先进行军事占领，资源掠夺，经济榨取，而后推行毒化政策。“戒烟所”就是为其推行毒化政策的工具。英国大资本家马丁直言不讳地说：“同鸦片贸易比较起来奴隶贸易是仁慈的，我们没摧残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破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思想，没有扼杀他们灵魂。可是鸦片贩子在腐蚀、破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要折磨他们的肉体”。日本帝国主义者纯是鸦片贩子，把鸦片源源不断运进东北，垄断市场，独家经营，来毒化东北人民，腐蚀我东北人民的思想灵魂，丧失其反抗斗志，甘心做他们的奴隶，驯服地受其统治；进而折磨肉体，夺去生命，置之死地而后快。日本帝国主义者，其用心何其毒也。

中国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彻底禁烟，根绝吸食，必须做到为官为政清廉，不受贿，拒腐蚀，执法如山，法当从严。其次要釜底抽薪，严禁私种和贩卖鸦片，在社会上切断鸦片来源，如此则吸食者自绝矣。我国建国伊始就做到了这一点，抓住了主要矛盾，才有吸食鸦片者绝迹于全国的今天，使中国健儿屹立于世界。人民幸世！国家幸世！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日本移民开拓团严重吞食镇东土地

吉万方

日本帝国主义者牢固地占领我东北之后，为了更大限度地掠夺我东北土地和法西斯高压我东北人民，从一九三二年起，就在我东北实行土地“收买”、移民开拓政策。日本帝国主义者囿于侵略战争，人力不足，将国内仅有的老弱病残倾巢而出，移至我东北，致使有的地区全部被日本占领，有的地区分期分批地逐步被其蚕食，假我东北之土地和劳力以养其民。镇东属于不能一次被占领的地区之一。一九三九年以来，镇东被日本霸占的土地占全县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在这些土地上辛勤耕耘的农民，全部沦为日本开拓团皮鞭下的奴隶。

移民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特别是农村，由于日本垄断阶层和地方阶层的剥削和压迫，致使农村凋蔽不堪，无地和少地的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线上。日本当局妄图通过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摆脱政治经济危机，同时也试图用大规模移民的办法，输出“饥饿”，缓和阶级矛盾，扩大自己的殖民势力。

日本帝国主义的移民政策，早在一九一四年就开始试行了。当时主要是针对朝鲜和我国台湾。日本在我国东北的移民侵略狂潮是从“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成立后开始的。一九三二年一月，移民侵略政策的积极推行者石黑忠笃（伪满农林次官）、加藤完治（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宗光彦（满铁公主岭农业实验所所长）等三人共同策划，向日本拓务省当局提出一件所谓《满蒙移植民事业计划书》，主张以在乡军人为主体在全日本范围总动员募集移民。一九三二年八月三十日，日本第六十三届临时议会竟原凶毕露地通过了这个《移植民计划书》，并决定首批向满洲移民五百人，预算二十万七千元，称之为“满洲试验移民费”。就这样被命名为“吉林屯垦第一大队”的首批移民于一九三二年十月飘洋过海进入我东北佳木斯，又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达永丰镇，开始了对我国领土的殖民占领。到一九三六年日本对我东北的移民侵略形成高潮，先后共移民五次，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同年日本当局又炮制出所谓“百万户移民计划”，妄图全面占领我东北土地。卖国求荣的伪满洲当局竟然把日本广田内阁所确定的七大国策之一的“百万户移民计划”，与相继出笼的所谓“北边振兴计划”、“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称之为自己的“三大国策”。显然伪满洲当局是情愿把我东北国土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变为日本的永久殖民地，甘当日本人皮鞭下的奴才。

日本对华的移民政策是由日本关东军直接插手策划的。早在一九三四年底，日本关东军根据几次移民试验，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审议移民政策的具体措施。进一步从

组织上强化了移民政策的实施，在组织机构方面，日伪双方均做了相应的安排。一九三五年四月，伪满洲当局在民政部地方司内设了拓政科，同年七月又改拓政科为拓政司，转由伪产业部管辖。一九三八年一月，又进一步将伪拓政司扩大为开拓总局。同时各省、县相应地设开拓厅、开拓科、开拓股。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于一九三五年十月拓务省组成“海外拓务委员会”，并在东京成立“满洲移民协会”。一九三六年一月和九月，作为移民侵略的具体实施机关，先后成立了“满洲拓殖股份公司”、“满洲拓殖公社”，并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由伪满洲国政府负责安排移民用地。一九三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日伪当局还共同制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加紧扩大侵略政策的行动纲领，充分暴露了“开拓政策”是日本把我东北作为试图独霸亚洲的侵略基地的实质。

日本对华移民侵略，凡每占领一个地区，都是事先作了周密考虑后才进驻的。他把所侵占的地区划分三个地带，“开拓第一线地带”是从伪间岛省（延边地区）起，经伪牡丹省、东安省、三江省、黑河省，至兴安南省，即与苏联接壤的地区，目的在于做好对苏战争准备，必要时充作兵站和据点；“开拓第二线地带”是伪通化省、吉林省、滨江省、北安省、龙江省、兴安东省、兴安南省等地区，即沿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大、小兴安岭的里侧及松辽平原外侧，主要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开拓第三线地带”是铁路沿

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包括扎兰屯，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吉林、长春、兴安、公主岭、四平、沈阳、抚顺、鞍山、阜新、锦州等地，其目的在于经济掠夺和防止我抗日游击队的袭击。

镇东地属龙江省，又为松辽平原东部边缘，跨嫩江便是抗日联军频繁活动的三肇地区，北为大、小兴安岭，老爷岭，亦是谢文东、丁超、李杜义勇军活动的地带。而且北有齐齐哈尔，南有长春、四平、沈阳等大、中城市，铁路横贯南北，交通便利，土地肥沃，既适于防止抗日游击队活动，又适于经济掠夺，自然是日本侵略者吞食的一块肥肉。

镇东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执行开拓整备（收买土地）工作。县设立了开拓地整备委员会，下设土地整备班，专理收买土地事务。全县土地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日本开拓用地，另一部分为当地民众一般用地。被划分为开拓用地的原土地所有者，丧失土地所有权，强迫将自己祖辈所耕种的土地用低价被收归开拓团所有。开拓团只给原地价四分之一的价格，而且把土地划分为许多等级，极力压等压价，强迫收归开拓团。一般的土地每垧只能得到三十元钱，更有甚者，许多地块只给低廉的荒地价十五元钱就被剥夺去了。经过三年的土地整备，全县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土地被开拓团所占有。这种所谓的“土地收买”是日本侵略者在我镇东地域所犯下的彻头彻尾的法西斯暴行。就连日本开拓民都不得不承认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犯罪。日本开拓民后藤藏人在《满蒙开拓难民的记录》中写道：“在

这梦一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无法忘怀的是，常常在心中不知怎的就阵发象针刺一样的疼痛。这种情况几乎是从来没有说出口的，我们的土地是名为满洲拓殖公社这个大机关给与的，而这个机关在靠日本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所谓满洲国的秩序中，从如今我们仍在使役着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手中，与其说白给一样购买莫如说强夺了土地。这当然不是我们直接干的，是入殖后才弄明白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是难以成寐的。”日本拓民这段良心话，一针见血地道破了日本侵略者的豺狼本性。日本通过土地收买进行移民开拓，其实这些日本移民很少劳动。他们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直接雇佣一些丧失土地的中国农民为其劳动，收入归各开拓团占有；另一部分土地便租给当地农民，而这些农民竟变成日本开拓团的佃户。他们除按常例缴纳地捐地税外，还要缴纳地租。即使是三等地，每垧地也要缴纳八、九斗粮。他们并不直接收粮，而是核价缴纳现金，日本人称之为“小作科”。这些地租金由伪满洲国地税部门代收，然后转至日本拓殖株式公社。在这些开拓地上辛勤劳动的人民流下的血汗，就这样流入日本的金库里。

日本当局从一九三九年起，在镇东共设八个开拓团，其中建成的有六个开拓团本部，两个正在建设中的内国开拓团。开拓团本部有龙山（镇南）开拓团、那汗昭开拓团、套保（到保）开拓团、白旦昭开拓团、大岗开拓团、东屏开拓团。内国开拓团有包金台开拓团、胡力台开拓团。在开拓团本部中又分为一般移民开拓团，如龙山开拓团、那汗昭开拓团、套保开拓团、白旦昭开拓团。这些开拓团均属

一般移民，即日本移民携带家眷到中国“耕种”土地。还有一种叫做“义勇队”移民，亦称之为“青年训练所”，如东屏开拓团、大岗开拓团。

所谓“青年训练所”，是根据一九三八年一月，日本拓务省拟定的所谓《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募集要纲》进行的。《要纲》规定，在日本大办青少年义勇队训练所，即将年满十六至十九岁的日本青少年，经过为期三年的军事训练，然后组成义勇队开拓团进行移民。我们从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中看到的情景就一目了然了。阿信的两个儿子就是经过国内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就招募来到我国东北的。这种义勇队开拓民不单是一般开拓民的辅助力量，更重要的是作为军事上的后备力量而出现的，既是日本侵略军的后备兵源，又是战时守备铁路、军用设施和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别动队。训练所分大小两种。大训练所定员600－1200人，小训练所300人。镇东大岗、东屏两个训练所均为小训练所。主要耕种土地，发展畜牧业。根据《训练实施纲要》规定，训练内容很全面，包括生活训练、农业、畜产、特技、精神陶冶、知识涵养教学训练、武士道军体训练等。特技训练内容广泛、如农机具、通讯、测量、农业土木、农、畜、农产加工、经理、木工、挂铁掌、锻工、炼瓦、酿造、给水、卫生保健、医护、荣养、气象观测、照相等等，无所不包。日本妄图长期霸占中国土地，所以各种管理人才都通过训练所独自培训。

所谓“内国”开拓团，大体可分三种：一种是土地被剥夺，中国民众被搬迁到日伪当局指定地域去耕种土地；二

是土地被剥夺的中国农民被驱赶到边疆开荒，荒地开成熟地后，又被驱赶到另一个地区开荒，甚至有的数次遭此境遇；三是土地被剥夺后，中国民众虽未离开原地，但被定为日本开拓民或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到双重奴役和剥削。这种剥削手段更加残酷。镇东胡立台、包金台两个内国开拓团就属于最后一种类型。开拓团霸占了当地农民的土地，而他们又不能全部由自己耕种，拿出30%至40%的土地招雇被剥夺了土地的当地农民去耕种，而日本开拓民则坐享其成。甚至有的日本开拓民利用自己手中的钱放高利贷，残酷剥削中国农民。这种既纳地租、又还高利贷的剥削压榨，给我镇东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灾难。胡立台、包金台的农民有的被迁出去到指定地点开荒，由伪满洲国当局拨给木料盖房子，开荒三年不纳地租，还拨给一部分牲畜、农具。然而物资是以按价贷款形式，三年内要分年偿还一切债务。幸运的是上述两个内国开拓团正在建设中，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伪满洲国也倒台了，镇东人民才免遭一场更大的灾难。

镇东共有日本移民550余户，约4，300余人。其中龙山开拓团有日本开拓民200多户和一些单身青年，大约1，000多人；那汗昭开拓团有150多户，约600余人；套保开拓团有200多户，约800余人；大岗开拓团有500多人，都是单身青年；东屏开拓团约500多人，亦都是单身青年；白旦昭开拓团所属七个大小分散居住点，都带家眷，有200户，约800多人。除青年训练所外，各开拓团亦都设有分散居住点，每个点三至五户，与当地农民杂居，所需住房

由当地从居民房屋中经县辅导部出面协商解决。许多原中国人住户因受日本人气被挤走，多数住户被迁出到不设或暂不设开拓团的地区落户，拨给部分熟地，更多的土地是靠自己开荒解决。随着日本移民人口增多，大多数当地农民被动迁到指定地区盖房或插户居住。日本侵略者实际就是采取这种蚕食手段，达到逐步占领我东北甚至全中国土地的罪恶目的。

日本开拓团由于受日本关东军武装力量的保护，欺压当地百姓的事件不断发生。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的七年中，日本开拓团欺压我镇东百姓的事件不下几十起，据史料记载，“镇东县龙山开拓团承认，只在一九四一年就对周围群众施加暴行六起，其中包括欧打群众、枪杀牲畜、窃取干草，等等。另外残害人民致残致死等更加严重的暴行也时有发生。”（详见《伪满洲国史》351—352页）又如二井子地区当地农民的散马群，不慎跑进白旦昭开拓团的地界去，开拓团发现后，便将群众的散马群赶到开拓团部院内圈起来，两三天不喂不饮，又不通知群众认领，企图强行霸占。当地群众又不敢去日本开拓团取马，怕惹事招祸，只好凑钱带着重重的礼物跑到县城请县开拓股辅导部出面调停。最后把县协和会的日本官员搬出来交涉，才把马群放了出来。当地百姓实在是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遭受凌辱。

1945 年端午节前夕，即日本投降的前几个月，青苗在地的时候，那汗昭、白旦昭两个开拓团突然大搬家，一股脑全都与套保开拓团集中到一块去了，把当地群众分别赶

到那汗昭、白旦昭，与那里的开拓团房换房、地换地、青苗换青苗。实际上，日本人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便于撤退，把开拓民集中到铁路沿线，等待上方调遣。这一罪恶举动却严重的坑害了当地群众。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不仅东西受到损失，土地、青苗都不及自己的好，而且数量、品种都得不到原数，群众只能耐着性子等待他们的灭亡。

但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开拓团的罪行，主要责任不在开拓民，而在日本制定政策的少数侵略者。开拓团的暴行是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影响和民族离间政策的必然结果。走"开拓"之路，是多数日本人民被逼而走的穷途末路。在开拓团成员中，纯农民很少，除一部分无知的青少年之外，大多数是小手工业者或失业人员，如木匠、瓦匠、油漆匠、理发匠和小商贩等。他们在国内是被强制和动员而来满洲的。在日本只领得出国渡航费和落户安置费（每口人四百元）。当然，他们毕竟是侵略国的国民，生活上有保障，比起我国群众要富裕得多。其中也有少数日本人，除领取国家拨给的费用外，个人手中也有钱。这些人与我们当地贫困农民发生高利贷关系，许多残暴行径多半是这些人干的。而他们中大多数日本移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日本帝国侵略政策的受害者。

事实上也是这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节节失利，开拓团中的大多数男性农民，陆续被征招入武，青年训练所的义勇队开拓民更是首当其冲，战争中充当日本侵略者的炮灰，所剩无几，标志着日本侵略政策的彻底失败。

日本侵略者终于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不得不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开拓民中所剩下的老老少少、孤儿寡母被赶出中国领土。从此镇东人民彻底摆脱了被日本侵略者奴役的历史。我们应该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者这段罪恶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决不能让那悲惨的历史重演。

伪满收买开拓用地情况

王作山

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日本关东军将"满铁经调会"作为"纯国家机构"辅佐关东军进行有关平时及战时经济、军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和制订业务计划。其中开拓入殖规划便是其中主要一项。但收买开拓用地主要是通过伪满洲国政府和日本财团法人东洋拓植株式会社共同进行的。政府强迫推行政令,会社提供足够的资金。康德八年(1940年)十二月满洲国政府拟定《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康德九年二月又公布了《外国人在满洲国居住的土地法》,其目的就是日本人欲在满洲国取得土地所有权,掠夺中国资源,用以养活居住在弹丸之地——日本国土上的人口。

自康德五年(1939年),在有关县份增设"土地整备办事处"(即开拓科的前身),暂与土地股合署办公,做收买开拓用地前的准备工作,如复制清光绪年间开放蒙荒所绘制的土地毗连鱼鳞图,抄写有关几个村的地主名簿。内开土地坐落、地种(生、熟荒)、等级、面积及土地所有者的姓名,反复核对,不使一块土地遗漏。作为收买开拓用地的摸底清册。

康德六年五月，随行政机构改革，伪满中央设开拓总局、省设开拓厅、县设开拓科（股）。安广因没有开拓民、团入植的机构，只有开拓用地管理事项，因此只设有开拓股。股长一人、科员二人，股长寺泽铁雄，科员鞠万英、砂山京武，雇员丁万录、刘海滨，其主要任务就是每年催收“小作料”（地租金）。小作料的标准：一等农耕地每年征收 4.50 元，二等 3.50 元，三等 2.50 元，新垦荒地免征小作料一年。

在安广未利用地收买面积约 1，400 平方公里，几乎占全县面积三分之一。其中熟地约占收买地面积六分之一，将近 18 万垧。开拓用地处于安广县城南部霍林河两岸。这一带熟荒地好，民间成交几十元钱也买不到手，开拓用地收买价格偏低。一等生荒作价为 4.50 元，二等生荒为 3.00 元，三等生荒为 2.00 元。农耕熟地一等作价 30 元，二等为 20 元，轮耕地为 10 元。强迫土地主人含泪交出祖宗留给的土地执照，接到手里的仅仅是几张伪币。就连收买区域内的蒙古王公留界地也不例外，一律照收，一块也不漏掉，使为蒙王收租的天安地局亦因之而撤销。

迄至康德七年，收买土地工作基本结束，土地整备办事处未完毕的事宜移交给开拓股办理。安广开拓股属实业科，从前合署于土地股的土地整备处随之宣告解体、开拓区域内地主亦从此宣告破产。

在开拓用地收买之后，日本人入殖未到之前，在这段时间里，对既耕地不能坐视撂荒，仍由原地主耕种管理，但是他已成为国有的佃户，无耕种能力的原地主，暂可作“二茬地东”，转手租让给他人耕种，取得略高于国家收取“小作

料”的标准金额的租金。结果受剥削最严重的仍是贫雇农耪青户，开拓股不直接与贫农雇农耪青户签定租赁合同。

康德十年（1943年）九月，日本政府声明“建立日满共同粮食基地自给体制，并通过阁议作出满洲紧急造田之件”的决定。同年十二月，满洲国政府设立紧急生产推进本部，国务院总务长官五部六藏任部长。康德十一年二月，满洲国政府召开第二次开拓会议，讨论加强生产掠夺问题。安广县副县长小林留木，坐立不安地考虑利用开拓掠夺问题。偏巧开拓股长寺泽铁雄（在乡军人）应召复员参加大东亚战争去了，砂山京武最近又接到复员通知，临时委鞠万英为代理股长，把开拓造田的秘件交给满系官吏去办又不放心，结果小林副县长给镇东县副县长写封信，央求他作开拓民入植计划，派代理开拓股长鞠万英到镇东周家村开拓团去见学取经。到镇东后，日本丸山（开拓科长）问到安广开拓用地水利资源情况时，鞠说：“域内有霍林河但旱年常涸。”丸山连说：“不行，不行，没有水怎能造水田，日本是吃大米的民族……开发水田最好是选在江、河两岸、安广县不是北濒洮儿河吗？在那里可以先搞块试验田试试看。”小林副县长接受这个意见，邀请镇东县周家村日本开拓团五名团员来到安广，选中在洮儿河南岸黑帝庙河套中，国堤与民堤之间一片洼地开拓水田3陌（1陌＝1.37亩）。康德十二年春适时播种，精心管理，如果试验成功，来年再扩大开拓面积。小林对这块实验田和五名开拓员非常关心，常到试验田去走走，县公署里的人便把这四亩多地水田，戏之谓“小林窝堡”。不了解情况的人传说安广县已入殖了开拓民，实际是个误会。

伪满时期的大赉教育

于波洋

我是一名从事教育三十多年的教育工作者。离休后，于1984—1986年又参加大安县地方教育志的撰写工作，因此，对大赉教育比较知情，兹根据档案资料及亲身经历写成此文，献给读者，遗误之处，恳请指正。

教育行政机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大赉县当时隶属龙江省管辖。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奴化中国人民，巩固其在东北的统治，从中央到地方设置了教育行政机构，掌握教育的管理大权。1932年（大同元年），伪满洲国中央设立文教部，大臣是阮振铎，次长是许汝芬。下设礼教、学务、总务三个司。1935年（康德二年）将文教部并入民生部，内设教育司。龙江省始设教育厅，厅长王宾章，下设视学室、礼教科和学务科。大赉县始设教育局，局长于海龙。1937年（康德四年）实施新县制，将教育直属于内务局所辖，称教育股，承

县长、参事官、内务局长之命，执行教育的一切事宜，当时人员有：

内务局长：林士魁

教育股长：国庆志

教育科员：王宪章、周德昌

雇　　员：李　钧、郑延龄

1940年（康德七年），将教育股又归属于行政科。至1945年光复时人员有：

行政科长：李永胜

教育股长：周德昌

视学官：吴从山

属　　官：于纯良

事务员：于波洋

雇　　员：孙凤翔

教育内容和宗旨

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教育方面实施“首先基教育之普及，则当唯礼教之是崇”的基本原则，颁布了各学校课程暂用“四书”、“孝经”，经崇礼教。并确定教育方针为“重仁义，发扬王道主义。对于人民生活方面力谋其独立安全，交往方面自重节义，对于世界民族以亲友善邻、共存共荣，以世界大同为宗旨”。1937年（康德四年）5月2日公布了中小学校令，明确规定，国民及国民优级学校“以留意学生身心之发达，涵养国民道德，注重关于实务之普通知识

技能之授与、培养劳作习惯，提高其为忠良国民之资质为目的”。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以涵养国民道德、修练国民精神、锻炼身体，置根于实业教育，授与国民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堪为国民之中坚男子为目的”。而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以涵养国民道德，特别注重妇德，修炼国民精神，锻炼身体，授与女子所必需之知识技能，培养劳作习惯，养成堪为良妻贤母者为目的”。

学校设置及其负责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县城乡学校一律关闭。1932 年（大同元年）各学校陆续开学。1933 年（大同二年）全县有小学 31 所，教师 73 人，学生 1610 人。1938 年（康德五年）1 月 1 日，日伪当局为了深入实施奴化教育，调整了教育结构，改初级小学为国民学校、高级小学为国民优级学校、私立小学为国民学舍、私塾为国民义塾，天主教会小学改为大东国民学校（后并入礼全国民学校）。是年，全县有国民学校 62 所、117 个班、122 名教师、5746 名学生；国民优级学校 17 个班、122 名教师、5764 名学生；国民学舍 33 处、35 名教师、1216 名学生；国民义塾 39 处、39 个班、34 名教师、1272 名学生。到 1942 年（康德九年）全县共有学校 60 所、127 个班、教师 135 人、学生 5552 人。其中国民优级学校 4 所，教师 23 人，学生 895 人。

1940 年（康德七年）2 月，建立大赉国民高等学校（水产科），学制四年（将原初、高中合并在一起），校址设

在大赉城南门外南大营（今皮毛制品厂、大赉镇粉丝社院内）后借仁德国民学校（今罐头厂院内）房舍。1942年（康德九年）八月，始迁入大北门外路西（今大安三中院内）新舍。初建时有教职工5人，学生58人，先后招六期学生，每期招50～55人，有两期毕业生，约百余人。

1945年（康德十二年）2月建立大赉女子国民高等学校，校址在伪满“讨伐队”大营（今电机厂院内）。

先后担任这些学校的校长是：

大赉县礼全初高两级学校校长：邹立成

大赉县礼智女子初高级小学校长：鞠馥屏（女）

大赉县仁德初级小学校校长：常学文（女）

大赉县公园初级小学校校长：宋国富

大赉县治安初级小学校校长：宋文信

大赉县初福公初级小学校校长：蔡永芳

大赉县庶乡（西大洼村）初级小学校长：王运兴

大赉县富乡（辛广店村）两家子初级小学校校长：周玉柯

大赉县教乡（端基屯村）蔡家店初级小学校校长：朱子欣

学制和课程设置

伪满时期，学制根据各类学校确定。伪满初期，学制规定：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初级中学三年，高级中学三年。1937年（康德四年）实行学制改革，国民学

校令规定：国民学校学制为四年；国民优级学校令规定：国民优级学校学制为二年；国民高等学校令规定：国民高等学制为四年。

课程设置是：国民学校设国民科（国民道德、满语、日语）、算术、作业、图画、体育、音乐；国民优级学校设国民科（国民道德、满语、日语）、算术、实务、图画、体育、音乐；国民高等学校设：国民道德、国语（满、日语）、实业、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体育、音乐、水产；女子国民高等学校设国民道德、国语（满、日语）、教育、军事、裁缝手艺、实业、历史、地理、数学、理科、图画、体育、音乐。

此外，从小学一开始，就重点设置日语、军事训练和实业课。

伪满洲国成立不久，文教部发布了大、中、小学教育中必须彻底普及日语的训令，把日语称作"国语"，考大学时均需用日语答卷。伪满政府还把日语规定了语学检定等级制度（共分为特、一、二、三、四个等级），大学生毕业日语要达到二等为合格，国高毕业生要达到三等为合格。当时就对这种强制的的学习方法均有反感，时常流露出不满情绪。

开设的军事训练课，是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式。国民高等学校，派有实战经验的日本陆军人员作军事教官，每年省军管区还要派出检查团进行全面视察，检查一年来的军事训练成果。

从中央到地方全面灌输奴化教育，各类学校日常讲武

士道精神，等级禁严，上一年级学生有权严管下一年级的学生，下一年级学生要绝对服从。

除正课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奴化教育方式。诸如：对学生强迫苦役劳动的“勤劳奉仕”、背“诏书”和“国民训”升国旗、唱国歌、参拜神社等，从思想上、行动上奴化中国青少年。

伪满强行普及日语的种种手段

雷振海

“九·一八”事变时我还末满十二周岁。伪满大同元年（1932年）伴随学校复课，使我又步入学校，接受奴化教育七年。毕业后又在德惠、前郭两地任教七年，一直到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为止。前后十四年，学校灌输的是奴化教育。

康德四年（1937年）伪满洲国文教部发布《在学校教育中彻底普及日语训令》后，日本统治者在学校中和社会上更变本加历地采用软、硬 兼施的手法，加速强行普及日语，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长期霸占我国领土的野心，采取文化攻心的办法，培养亲日分子，践踏中华民族。

日本侵略者普及日语的手段不外乎强迫，利诱这两套软硬兼施的办法。一种是在学校里采取强制的手段。硬性规定把日语作为“国语”中小学均设，由日本人主事监督推行。国民优级（五、六年）开始设满语（汉语，同样，日语课每周不少于六节）。至于中学，除日本人担任教师用日文讲授 实业课外，每周日语课也不少于六节，多则七、八节。在大学，日本教师不但用日文讲授各类专业课，而且

考试答卷，一律用日文。毕业时，要求中学生语学检定达到三等，大学生达到二等才算合格。否则日语不合格，即使准予毕业，也难以分配到条件较好的单位去。只要日语好，其它学科差些也能被安排到较好的单位工作。更严格要求的是，在课堂上和日常生活中，强迫学生用日语对话，不然遇到日本教师时，用汉语说话时就会遭到辱骂，甚至遭到体罚。伪满前郭农校教 务主任（副校长）伊腾，为人专横，性情粗暴，经常辱骂、欧打学生，他的“协和嘴巴”最残无人道，就是强迫学生相互打嘴巴。一次，在课堂上有一名学生没有答上他提出的问题，他就破口大骂，随之抬手就打。该生受到了一次莫大的岐视和污辱。

学生们为了反抗日本教师的强制手段，采取了种种办法来反抗。例如在课堂上见到日本教师来，就立即操起日语书应酬。课外见到日本人，便用日满混合语说话。即可避免遭到辱骂和体罚又反抗了强制手段。

另一种手段是在衙署采取引诱手段。康德八（1941）伪满政府发表《官吏语学必修业务要纲》规定，凡伪满官吏义务必修语学，合格后才能留用，否则黜职罢官，并负有对日不友好之嫌。还规定凡是通过自学（日语专科学校毕业的除外）经语学检定，三等以上合格者逐月发给语学津贴。语学等级标准，分为特、一、二、三共四个等级。其标准大致是：特等应具有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并著有论文、出版著作的水平；一等具有翻译日本文学著作和报刊杂志的水平；二等能起草公文文件及做各种翻译的水平；三等具有通晓日常对话和翻译本职业务的有关资料的水平。以

二等为例，每月发给语学津贴六元。等级越高、津贴越多。用金钱诱惑的办法鼓励刺激学习日语的积极性。这只是明的刺激办法，还有暗的一套。例如：增俸（长工资）、拔擢（晋级）、年中、年末赏与（奖金）等，虽然没有明文规定把通晓日语做为提职提薪、奖金多少的衡量标准，但是会说日语的人，即使能力再差，也占有一定的优势。伪满德惠国民高等学校校长李兴华，以年令大为由，不愿学习日语，虽说为人刚正不阿，毕业于中国大学，通今博古，才华横溢，令人敬佩，但就是因为不买日本人的帐，几乎以反满抗日的莫须有罪名被迫害，最后被排挤到伪热河省兴隆中学任职。谁能想到他走到那还不是一样，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断然辞职返籍，弃文从商。当时还有安广县教育股长王露培，原北京国民大学教育系毕业，能力虽强，只是其不通晓日语，也被排斥出县。如此具有民族气节的人，被排挤、被压抑甚至被迫害的岂止王、李二人，的确是屡见不鲜。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对中华族背信弃义，卑躬屈膝于日本人。伪前郭旗农校校长蒋思潮，当时虽已年近半百，但仍然学习日语，唯日本人之命是从，处处讨好日本人的欢欣，被提拔为与伪县长同级的“荐任官”校长。他夫妻二人皆食鸦片，那时虽有明令严禁伪官吏吸毒的规定，但是蒋在日本人的庇护下，照吸无阻，更肆无忌惮地侵吞公款，为自己在前郭旗镇内修建一栋砖瓦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失败，他的黄梁美梦也宣告终结。

我所知道的伪满
洮南国民高等学校

王浦泉

洮南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是由建校已久的洮南县初级中学和师范讲习所两者合在一处，简称师中校。经伪满的学制改革后命的名。

师中校系1926年建完，当年招收首届学生。开创了洮七县中学教育的先导，颇有名望，人才辈出，远近学者，慕名而至。已故胡秉权将军即是师中校首届优秀毕业生之一。

1938年（伪康德五年）进行国民教育全面改革。将初级小学改名为国民学校，学制四年，将高级小学改名为国民优级学校，学制二年，将初中改为农业学校，学制二年，将初中和高中合并为国民高等学校，学制四年，农业学校毕业后可考入国高三年级，读完四年级国高毕业。国高毕业后可直接考入大学或各技术员养成所（相当专科）。讲习所和大学学习年限1——5年不等，比如考入师道本科学习一年毕业，毕业后即任小学教师。养成所一般为二年毕业。大学三、四年不等，满洲帝国最高学府建国大学，学习五年毕业。

县级教育行政管理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省教育

厅管理国民高等学校。教育部管理养成所和大学。

国民高等学校就分专业学校。分为农、工、商三科。农科类又分农科、畜产科、水产科等（当年大赉国高即水产科)。国高的服装全国规定统一样式，制服四个兜系腰带、腿上扎腿绑、制帽的帽箍上环以白色条带，是区分专业的标志，(农科一道、工科二道、商科三道)。年级也有标志，养成阶级服从制度，低年级学生见高年级学生先敬礼，仿效军人礼节。

洮南国民高等学校是属农科类，分两个科，农科一班，畜产科一班。每年各招收50名学生。1939年开始招收初级中学毕业生，再考入国高四年级学一年专业课，发给国高毕业证书，1941年改制后，在校学生400名左右。是洮七县唯一一所较大的国高学校。所以邻近几县的好学生纷纷云集洮南国高就学，住宿生约占三分之一。

一　学校规模

校址在原洮南老城的东南隅，学校的南墙以原南城墙（土城坎）为界。学校的东墙也是东城墙为界。东西有两节街长，西界至现松辽街（原二经路），南北长有三节街，北至原南大营南旧城墙（现约为二毛大院一部分、铁合金厂和实验幼儿园，至毛条厂北墙）。

当年课间操完毕可信步登上东南角的原防御炮台，因年久失修炮台已成为直径十米余，高六、七米园锥台形，向西向北与城墙连接，举目南望可见南水塔和南站旧票房的

残垣断壁，平看是一片平展的星罗棋布的块块的农田，余者则为碱土坑或零散坟墓，白绿相间可谓对大地的点缀。向西看则为护城的高大杨树，看不到尽头。回首北眺可瞰视校舍布局有致，尽收眼底。南城墙至校舍间为小操场，供早会或间操用。原校舍四栋砖平房，每栋13间。前三栋中间有门洞铺有青砖甬路通往各教室，最后第四栋十三间长桶房，平时东西两头各有一班上课，中间用木隔板隔开，出入各不相扰。如有全校集会将隔板卸掉即成礼堂，最西头搭有高台，供开会演节目用。礼堂足够容纳四百多名师生。第三栋全是教室，第二栋门洞西侧为事务处和教研室，门洞东测为校长室、图书室、仪器室、实验室。最前栋有两个教室，余者为马厩、牛舍、鸡舍、兔房和胶轮车车库等。布局严谨、合理实用。

1942年，在大操场西北土岗上，又新建一栋砖瓦结构新校舍，当年只建一半，只有四个教室和教师用房。原设计为E型，只建成厂型一半，因大东亚战争，经费禁用停建，只使用两年，1945年战争吃紧，日本军队将洮南国高全部校舍强占去做营房。国高被迫搬到城西北部（原豫贞庆烧锅的柴禾栏子）。到“八·一五”光复，国高的财产被群众抢劫一空。

祖国光复后，苏联红军进驻洮南原校舍曾作过苏军军营，其间又拆一部分。红军撤走后，所有校舍被群众拆毁，只剩一堆瓦砾。

二　教学情况

洮南国高属农科学校，招收农科、畜产科两个专业各

一班。

1、学习科目：国高前两年农科、畜产科所学课程一样，均开设国文、数学（代数、几何）、外国语（英语、日语）、植物、动物、物理、化学、农业知识、音乐、体操，每周军事训练两个小时，每周实习劳动六个小时以上。

2、三年级开始上专业课，所有专业课的课文完全是日文。农科学包括土壤学、肥料学、农作物栽培、园艺、果树等，畜产科学包括畜产、兽医、兽药、畜牧饲养、疾病防治等。

3、军事训练是由现役军官担任教官，一至四年级学生每周各两个小时，军训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华民族的重要手段，从中学生起养成阶级服从，具有一定的军事技能，从队列到战术实用，刺枪术、击剑术练个不停，直至行军作战，四年级还进行实弹射击，有一套训练计划。学校校长无权过问军训。统由军管区专人管理。每年一次由军管区司令官亲自检阅各市县国高学生训练成果，评比列名通报。洮南国高于1943年曾得过龙江省军训第一名，这纯属当时教官王日棍棒之功也。（1945年王日被调到第三军管区升为少校）。

三　学校管理人员

国民高等学校由省公署教育厅直接管辖。县无权过问。省厅管人事任免、调转和经费拨给，教学计划指令由校长完成，校长是高等官。副校长由日本人充任。历任校长如下：

贾成章　　赵××　　马　彰　　鲁鸿翎

副校长：大好竹敏

历任教官如下：

白××（少校）　　李万春（少校）

王　日（字佩伦　上尉）　　张延长（中尉）助教

王魁星（上尉）

教　员

王文超（高等官、语文）　　李　宽（语文）

裴玉书（字梦麟、数学）　　唐凤池（字逸忠、理化）

孙建垣（畜产）　　王聘之（农业知识）

张书棠（化学）　　朱　瑞（外语、化学）

张兴源（畜产）　　韩家枢（兽医、兽药）

李长元（土壤、肥料）　　王英林（英语）

小池三郎（日语）　　中村××（兽医）

伊滕××（农业）　　松下××

狄野村一　　家进久米雄

张福兴（军官、农业）　吕国详　张一揆（体操）

事务处：张大化　　杨遇华　　华国章

四　教学设备及实习园地

洮南国高当年教学设备齐全，足够学生实习使用。畜产科备有洋马种一匹，另有改良马三匹，供拉车耕地用。优良乳牛一头，种猪一口，羊 50 只，来克亨白鸡 300 多只，

还饲养家兔多种，都是当时有名的优良纯种（肉、皮、毛兼有）。这些牲畜除工友晚间看管外，皆由畜产科学生轮流饲养。

曾饲养过一只灰鹤。有一段难忘的故事。一年春季引来一只野灰鹤，在校庭间盘旋鸣叫不肯离去，时而落在鹤笼上，很有眷恋之意，似乎老友重逢，相依为命之感，过一段时间试开笼门，它竟自进去，它们进进出出像是驯服，福兮祸所依，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有一天两鹤高飞云端，一去不复返，师生都很惋惜。

农科则有水园子一垧多地，水井一眼，用牲畜拉水磨提水浇菜畦。大田有五六、垧，用于种植各种大田农作物。

1941 年大东亚战争爆发后，1942 年春大量开垦校舍周围空闲地，全部种上蓖麻，榨蓖麻油供军用飞机用。把学生累得敢怒不敢言，只好消极怠工，学生专看老师或日本人。曾在远处设监视哨，以站起来擦汗为号令，同学们见到后再一起干起来。

五　“勤劳奉仕”

“勤劳奉仕”是日语，实质是日伪统治者利用日本军国主义的强权政治，统治奴役中国人民劳动的一个美称。它们从多种渠道实施。除直接抓派劳工外，像国兵、或国兵漏都是间接劳工，边训练边劳动。就连在校的国高学生从未放过。洮南国高学校规定新生入学后必备三件工具（锹、锄、镰），放在学校工具室内，以备随时劳动使用。

洮南国高曾参加过如下几种“勤劳奉仕”：

（一）直接为日军服务。每年全校学生都去洮南飞机场几次，劳动项目是清除飞机场内蒿草，特别是黄蒿杆茬子，防止刺破飞机轮胎。采用人海战术，一人一锹，一字排开，见黄蒿或杂草就连根铲平，不许落掉一棵蒿根。

1941年是由飞机场来汽车接送学生前去劳动。以后几年由于战争吃紧，为节省汽油，则采取军事化行动，由教官带队徒步往返，有时还作行军演习。

还给飞机挖过深坑，分散贮存汽油桶或炸弹（每坑埋百桶或百颗）。

1943年曾去黑水东山飞机场仓库（现五中、农业高中处）挖坑，选择有树木的地方，将大仓库的汽油和弹药分散贮存，学生挖好坑，按一定数量运去，装好，由日本军人掩埋。学生自带午饭，每日清晨坐火车去，晚间坐火车回家住宿，也干过一个多月。

（二）1945年，洮南国高四年级学生两个班去白城北大岗里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去“勤劳奉仕”，直至祖国光复。

（三）民间劳动。1943年修筑三大坝长岗屯东西坝时，洮南国高学生和女高学生都分担了一定数量的土方量，干了四十多天。

（四）1944年夏锄期间，为了增加“出荷粮”支援大东亚战争的需要，由国高四年级两个班百余名学生参加铲地，去我县北部山区消灭草荒。分四个村（万宝、宝利、兴隆、永平）专给大地主铲地，干了一个多月。

附：学生轶事

1、痛打分所长

洮南大什字街分所是伪满众所周知的日伪统治阶级奴役劳动人民，剥削收刮资财的最前哨，地处繁华闹市中心，同是分所一级城内有13处，唯独大什字分所所长孙连富是警尉衔（其余各分所长是警尉补衔）。他是警界的大红人，深受日本统治者和伪政首脑的青睐，无疑是人民大众的死对头，明知其为非做歹，也无人敢问津。

可1943年应征入伍的何有漪（现名何虎），当年是洮南国高畜产科三年级学生，投笔从戎，要治一治孙某人的飞扬跋扈。何有漪趁其回洮省亲之际与分所长孙连富路上相遇，冲突起来，何有漪不畏惧他的权势，竟在大什街分所屋中动起手来，用皮带把孙打得顺口随合不敢还手。直叫路人拍手称快，一时间传为佳话。

2、教训日伪走狗——王纪斋

王纪斋合法身份是《大北报》驻洮南记者。对日本人穷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十足的汉奸走狗。他还是洮南中央大戏院的财东之一。伪满后期他的女儿又投师学戏，成了名演员，一时间上座率很高，他也为之洋洋得意。

1943年正月十五日，戏院座满，洮南国高好事的同学三、五十人也去凑热闹看戏。在查票清场时，院方和学生发生纠纷，王纪斋假惺惺地打官腔，在场的同学们看到他的丑态当即都很愤怒。院方扬言必须补票，否则必须退场。同学们互相交换眼神，暂时让步，一齐退去。出外大家商议要教训王纪斋。当晚散戏后学生们早就等候在戏院后门外，看王纪斋一走过马路北侧，学生们不由分说一齐动手，

并教训他别狗仗人势，别目中无人，别和学生过不去……最后他被打在洋沟里哀求不已，解了大家心头之恨。

据悉王纪斋在家养伤月余才露面，找到校方交涉被打之事。学校执意要他指出学生姓名来，好一一惩处。其实学校是在难为他，他在深夜毫无准备被打，怎能记得谁的面孔？因无证据，只好自认倒霉，他白挨顿打的事就不了了之。从此他再也不敢惹洮南国高学生了。

伪满时期的洮南县教育

姜纯良

洮南县建治较早，清光绪年间，属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辖地。一九〇二年于此地设局放荒，一九〇三年设洮南府，一九一三年改为洮南县。当时，洮南县是西满一带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会同洮南县县长申振先和地方绅士代表刘奇山等人亲日投敌，从此洮南一带沦陷，以后东北各地相继沦陷。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扶植满洲傀儡政府，加强其在中国统治。日本侵略者除了强化军事、政治、经济手段之外，他们通过满洲傀儡政府加强对中国人民的奴化教育。现将伪满时期，洮南县教育实况搜集整理如下：

一　洮南县教育沿革

洮南县有着较长的教育历史，一九〇八年洮南府设劝学所，在城内募集校地筹建学校，扎萨克图郡王献地一块，建立洮南第一校（今县医院院内西半部）。该校教员皆由外

地聘请学识渊博之士任教。当时城乡多是私人办塾。一九二五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公所，从此正式行使教育行政职能权力。同年建立男女师范讲习所各一处和女子职工学校一处。男子师范讲习所在东南隅（今第二毛纺厂址），女子师范讲习所在城内仁义街路北（今二小地址）。后来男女师范讲习所又设初中班改为男女师中校。女子职业学校在富文街路南（今邮局院）。此后相继建立第二、三、四、五、六、七校。还有清贞、慈普、祝君三所私立小学和加拿大办的一所天主堂学校。男女师范讲习所毕业生基本在洮南县几所小学任教。

伪满初期，洮南县教育体制，学校分布大体沿袭着以前的旧制，但学校数和学生数相对减少。由于日本侵略者军事侵略的需要，到一九三八年开始改革中小学学制，把小学六年级改为国民学校四年和国民优级学校二年，把初中、高中六年分段制改为四年制的国民高等学校。国民学校、国民优级学校、国民高等学校这三个教育层次，就是强化"建国精神"的国民教育。正因为强化"建国精神"的国民教育，各学校都开设日语课，开设日语课的节数多于满语（指汉语）。国民教育的实质就是培养学生做日本附庸的奴化教育。

二　伪满教育管理体制及学校分布

1．教育行政管理体制。

伪满初期，县公署设教育局，后改为教育科，教育科

设科长一人，科副一人，科副由日人担任。科内设学务股和礼教股，后期又设宏报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另有吏员一、二人（吏员都是委任官），雇员二、三人。

伪满初期，日伪为了对中小学加强观察工作，设观察人员名为视学。视学由教育厅任命，相当于县公署科长级。县视学负责对小学视察工作，每月向上级做视察报告，对学校教职员有提升、嘉奖、罢免的建议权。

学务股掌管中小学教育，包括设校、开班、人员、经费和开拓等项。男高和女高由龙江省教育厅直辖，学务股只掌管一般情况，不管人财物。

礼教股掌管社会教育，包括寺庙宗教、影剧院、图书馆所，道德会等项。

宏报股掌握大东亚战局情报和秘侦。

2．学校管理体制

伪满时期，学校管理体制也完全适应奴化教育内容定编定制。男女国民高等学校设校长一人、副校长一人（日人担任），日人副校长监视全校师生思想动态，设训谕主任一人（亲日分子担任），训谕主任专门对学生进行“建国精神”教育，协同日人副校长掌握师生思想动态，定期向县公署教育科宏报股汇报。设事务主任一人，军事教练官一人（现役军官担任），其他学科配备教师若干人。

县立国民优级学校设校长一人。日语教师全由日人担任，其他学科教师均受日人统治。其中协进国民优级学校是伪满洲国文教部确定的重点校，由文教部派主事一人（日人担任），主事实为日本侵略者派到学校特务人员，监

视师生在校言行。县立国民学校管理体制同上。

各行政村学校分为村中心校，屯小学和义塾三种办学形式。村中心校设校长一人，掌管全村各屯学校和义塾情况，召开教学人员会议，定期向教育科教务股和县视学汇报情况。各屯学校只有教师一人，教单班复式。偏僻小屯设国民义塾，私人办塾和教学内容，教学时间不受限制，教师工薪由学生摊派，伪满后期国民义塾被撤销。

3. 学校分布情况

伪满时期，洮南县管辖一个街公所（相当今洮南镇），十六个村公所（协和村、玉成村、黑水村、安定村、大通村、富贵村、瓦房村、兴隆村、永平村、永安村、万宝村、宝利村、新德村、福顺村、庆平村、庆远村）。全县人口约二十万。行政街、行政村所辖范围都没有小学，农村学校布点稀疏，学生不能就近上学，校舍设备简陋，上学者不多，而辍学学生甚多。

（1）全县有男子国民高等学校一所，一、二、三、四年级，共八个教学班（畜科四个班、农科四个班）。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一所，一、二、三、四年级共四个教学班。男女国高教员编制每班平均三人，总计男女国高教师四十人左右，学生六百人左右。每年教育经费（包括教师工薪）约四万八千元伪币，国高经费由省财政厅统一支付。

（2）县立国民优级学校四所，国民学校四所，共计九十七个班，教职员约一百二十人，学生约四千七百五十人，每年教育经费（包括教师工薪）约九万六千元伪币，由县公署财政科统一支付。

（3）村两级小学校，中心校十六所，屯小二十七所，总计五十三个教学班。瓦房村中心校，班级较多，均为单式班教学。大多数村中心校两个班，个别的中心校也有三个班的，其他屯小都是一校、一班、一师。村中心校校长兼课。凡是村中心校和屯小都配备夫役（工友）一人。总计全县村中心校和屯小教师约六十九人，学生约二千六百人，全年教育经费（包括教师工薪）约四万四千伪币。除教师工薪由县财政科支付外，其他修建、购置、设备、办公等经费按地亩摊派，由村公所支付。

三　伪满时期中小学教育目的及教育内容

（1）教育目的以亲日忠君为主线，对学生进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建国精神教育，培养效忠日本侵略者的奴仆。日伪官方为完成教育目的，着重加强以下几项教育内容。

首先，进行亲日和忠君教育。根据日伪官方指示，以“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为训谕方针，规定中小学每天朝会做“建国体操”，在早操前全体师生向东京帝都遥拜，早操后用《回銮训民诏书》精神向学生训谕。诏书大致内容：伪皇帝溥仪访日深受日本天皇热诚相待，回銮训谕国民要“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一九三九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官方规定每天早操时，全体师生必读《国民训》。规定每月八日为“诏书奉戴日”，全体师生宣读诏书，以唤起“国民”亲日忠君的精神。国民学校和国民

优级学校均设“建国精神课”，国民高等学校设“国民道德课”，其基本内容都是灌输亲日思想，推崇日本天照大神至上，宣扬丰臣秀吉、乃木正成的创业奇威，歌颂伊藤博文、乃木大将、武藤信义的开拓战功。每年春秋两季还组织学生瞻仰日本神社，向死难日本战士致哀，进而教育学生学习他们的忠君精神。

其次，灌输封建伦理思想。“国民训”和“国民道德”的内容，包括伦理道德教育，继承了封建道德思想，宣扬“五尊”。教育学生崇拜伪满皇帝，做忠臣顺民。尊敬 祖先，父叔，做孝子贤孙。规定每年“春了祀孔”和“秋了祀孔”，从而，教育学生尊孔尊师，对师长绝对服从。

再次，对女生教育方面，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宣扬男尊女卑，男女有别、三从四德、谨守妇节、克尽妇道。主张女子只能治家不能参政。基于此目的，从国民优级学校开始，男女分班，国民高等学校男女分校。女班、女校增设“家事课”，从而教育女学生懂得家事，尊敬公婆，依附丈夫，操持家务，抚育婴儿等诸项治家规矩。

2. 伪满时期，教育内容是为其教育目的服务的。

首先，各级学校增设日语课。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日语课和满语课（指汉语）并开，每周都是九节课。国民高等学校日语课更为突出，课堂师生会话提倡用日语，国高毕业必须达到日语三等合格，能给日本人当翻译。不论哪级学校，开设日语课均由日人讲课。各科教材中编写有关历史人物、地理名称、科学术语完全用日文注释。

其次，日伪官方规定教师日语进修义务制，并在富文

校开办业余日语补习所，定期进行日语测验，检查教师学习日语情况。伪满后期，官方以不会日语为借口，个别教师被淘汰。当时，村中心校校长张鸿钧、张春林、邢壮观、汪德厚等人都因不会日语被解职。

再次，国民学校、国民优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单一化。只开"满语"、"日语"、"算术"、"体操"、"图画"、"唱歌"六门课。学生读完六年书，根本学不到什么基础知识。

再其次，国民高等学校的课程内容愚民化。男女国民高等学校一二年都是开设共同课，包括"国文"、"日语"、"数学"、"国民道德"、"地理"、"历史"、"物理"、"化学"、"体育"、"音乐"、"美术"十一门课。从三年级开始，男子国民高等学校分"农科"、""畜科"，增设专业课。国高农科开设农学课，包括土壤、肥料、果树、园艺、农业。国高畜科开设畜产课，包括兽医、畜牧、药理、病理。

女子国民高等学校从三年级开始，增设"家事课"、"裁手课"。家事课包括烹调、洗染、养老、育儿、妇礼。裁手课包括缝纫、刺绣、编织。男女国高大量增加这些职业实习课，其目的就是培养日伪统治的雇佣。男女国高开设的课程，从内容看都不系统，而知识又是支离破碎。有关史地知识，自然科学知识都是愚民内容，用满洲历史代替中国历史，把中国地理叫"支那地理"。学生虽学史地课，但不知祖国疆域到底多大，民族祖先以及历史沿革。

3. 开展"献纳"和勤劳奉仕活动。

日本侵略者为实现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对青少年学生加强军国主义教育，宣传日本武士道精神，男高开设军事

训练课，专门教练战斗技术，以便适应军事战略和战时补充兵源的需要。在少年中开展“献纳”活动，组织小学生拣废铁、废奖品、废钢献纳国家制造战斗机，号召小学生把杀猪时的猪血晒干制成血粉献纳国家，并搜集兽毛、兽骨、猪鬃献纳国家。开展“献纳”活动，其目的是补充日本侵略者军工原料的缺乏。

男女国民高等学校开展“勤劳奉仕”活动，所谓“勤劳奉仕”，即不计报酬，为日伪服劳役。每年春夏秋，男女国高到城南飞机场锄草、平整场地，每期“勤劳奉仕”为七天。男女国高三四年级，夏锄到农村“勤劳奉仕”半个月左右，给大地主家锄草。女高学生还要到间甲（相当现在的组）逐户募集“献纳金”，此金做为效劳太平洋战争的“献纳金”。

四　教师社会地位及待遇

伪满时期，东北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当然，中小学教师也不例外。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是极其低下的。

1. 教师的任用。

伪满初期的教师基本接用民国时期的教师。后来伪县公署教育科经过一次考试选拨合格的小学教师，其实不是测验文化和业务能力，而是把在岗的不懂日语的年令大的教师淘汰了。

一九三八年以后任用教师的主要渠道由省立师道本科学校和师道特修科学校为国民学校和国民优级学校培养输送师资。凡是师道本科毕业授予二种教谕职称，师道特修科学校毕业授予教导职称，这类学校毕业任教都称为“正统教员”，格外受日伪器重。二种教谕到中央高等师道讲习所学习，一年授予一种教谕，相当于荐任官待遇（科长级待遇）。当时，洮南县教师中，一种教谕只有一、二人。可是每年教师队伍中还有一定缺员，补充缺员办法基本采用国民高等学校毕业生，洮南当时都由掌握教育大权的科副西本中男（日人）决定。谁想当教员都必须送礼行贿，谁给西本中男送礼物最多，谁就有可能被录用，并且被分配到较好的学校。至于凭本事不送礼的人也必然名落孙山。

2. 教师的待遇

伪满公职人员中，教师的待遇最低，教师只靠月工薪，别无其他收入。而其他公职人员除本月工薪外，还有许多额外收入。国民高等学校教师每月工薪由五十元到一百元。国民优级学校教师每月工薪由四十元到七十元，国民学校教师每月工薪由三十元到五十元，夫役每月工薪只有十元。而国高毕业生到“兴农合作社”当雇员，开始录用每月工薪三十元，加上“出张费”约十五元，“里程补贴”约十五元，“月津贴”约十元，总计月收入七十元左右，相当于国民优级学校校长的月收入，相当于国高学历的小学教员收入的二倍。可是，日本人的教员或县公署的官僚每月工薪收入和教员相比差距更大。日人教员每月工薪一百元到一百五十元，相当于中等教员二倍到三倍。县公署各科科长

每月工薪一百五十元以上，相当于中等教员工薪三倍。县长每月工薪二百五十元到三百元，相当于中等教员五倍到六倍。日 统治者为了掩盖教师待遇低这一社会现实，日伪官方实行年终尝予一个月的工薪到两个月工薪，教育科副（日人）掌握决定。尽管如此，也丝豪掩盖不了伪满时期教师地位和待遇是极其低下的事实。除了教师工薪低之外，还有都是终年悬挂自己职业，稍不顺从上司旨意就要遭受革职的厄运。一九三四年夏，县视学孙彦帮到黑水国民义塾去视察，发现教员董秀芝睡午觉，回县后传递一张便笺，写道“董秀芝懒惰成性，贪睡午觉，不宜为教，革职归田”。从此，董秀芝被革职返城，后经友人串联董向孙视学认错，才得复职。

3. 师生反满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一九三九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加强对中、小学教师思想统治，派日人到各级学校兼课，实际是监视教师和学生的言行。谁要谈论政局或带有不满日伪统治者情绪都列入政治犯、思想嫌疑犯之列，校内日人立即向教育科宏报股长（日人担任）汇报，宏报股根据情节再向宪兵队汇报。当时协进国民优级学校青年教师李云生、黄中达因雨天上班迟到，学校主事高岛义雄（日人）训谕他们俩。两人不满日人统治，和高岛论争是非，激起怒火，李云生用雨伞把打了高岛，后经校长调解，勉强平息了风波。但引起日人猜忌，把两位青年教师列为思想嫌疑犯向宏报股汇报，李云生为了避开浩劫，辞职去冀北当汪

伪军去了，黄中达也被迫离开学校当伪国兵去了。还有女高教师刘思源因受嫌疑，日人暗地监视，因此，离职潜逃。光化校校长刘玉林因受政治嫌疑被关进监狱。当时，日伪官方想要封住人民的嘴，所以强调“莫谈国事，守口如瓶”，可是人民的口是封不住的，反满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侵略者豢养大批警察、特务，他们依仗权势，搜刮民财；迫害良民。激起广大师生的义愤。洮南城内出现多起痛打日本走狗警察事件，特别是男高学生砸大什街（今被服厂西北角所在地址）警察派出所，痛打分所长孙连富事件哄动全城，传为佳话。警察当局要惩办凶手，男高学校军事教练官白××怀有爱国感情，支持学生爱国行为，掩护学殴打警察事件真相，警察当局无可奈何。国高学生痛打警察事件，洮南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回忆伪满大赉国民高等学校

王文哲

一　伪满大赉国高的诞生

伪满时期，大赉县国民高等学校是1940年2月开始建立的，校名叫龙江省立大赉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大赉国高）。在这以前，大赉县高级小学毕业生，都到省城齐齐哈尔去念中学或师范。大赉国高于1939年12月从伪满全国（东北三省）招生，经过考试（笔试、口试、体检）合格，招收58名学生为第一期，校址设在大赉县城小南门外，南大营旧址院内（今皮毛制品厂和大赉粉丝社院内）。第一任校长是日本人叫松井淳（兼任），当时他是奉天省立第二国民高等学校校长。伪满国高是从1940年开始普遍实行四年制的。大赉国高因刚建立，教员少，兼职多。校长松井淳，桑原重雄教日语，其余都是中国人。黄文耀（吉林八百垄伪满国立高师毕业）教代数兼语文。刘超是庶务（管帐目）兼教动物学、植物学和体育。聘请礼全小学董兰荃老师教音乐。省军管区派陆军少校唐继武教军事科目。工人车永安负责上、下课时摇铃、送公文等。第一期学生58名，

来自大赉、安广、镇东、扶余、肇源、延寿、白城、辽阳、依安、景星、甘南、林甸、杜尔伯特旗（泰康）、一百坡、齐齐哈尔等 15 个市县。

伪满时期，中小学均为春季始业，大赉国高也是三月开学，至 1941 年春又招收一个班，全校一年、二年共两个班级，学生增至 120 余人，住宿生有 50 余人，教员也相对增多。南大营院内缺教室，当时暂借仁德小学（今罐头厂院内）房舍为教室和办公室。徐永伦任二年班主任，教一年、二年数学。郑联墀任一年班主任，教一年、二年语文和体育。宋广弼教物理和化学。何凤鸣（回族）教水产专业课，包括渔捞、养殖、制造、水产化学。到二年级时唐教官调走，由省军官区又派来一名陆军少校张忠厚教军事科目。桑原重雄仍教日语和国民道德课。

1942 年春，大赉国高发展到一、二、三年共三个班级，学生增至 180 余名，这时松井淳调到新京兴农合作社中央理事会，调来徐文波当校长。新调来的教员有金成玢、吴文俊、滕俊良等人。由于学生和教职员工逐年增多，从 1942 年春，龙江省教育厅派人与大赉县公署商妥选定大北门外路西（现三中院内）地址兴建校舍，至同年八月新校舍落成，学校由仁德小学迁至新校舍，这时，学生增至 240 余名。一年班主任由滕俊良担任，二年班主任由金成玢担任，三年班主任由郑联墀担任，四年班主任由徐永伦担任。陆军少校张忠厚退职，省军管区又派一名陆军少校李振中任军事教官。

二　水产专业的概况

大赉国高是水产专业，一、二年级学水产动、植物学，三、四年级学水产养殖、渔捞和水产化学课程。学校设有鱼船、鱼网等捕捞工具。县公署拨给公舍泡子和小河子为水产实习场地。夏季学校组织学生到小河子指定范围插箔捕捞实习（也叫插迷魂阵），冬季由刘超老师率领学生到公舍泡子水上学打大拉网。此外，学校还组织四年级学生到水产公司进行选鱼、装筐、缝篓等毕业实习。借修学旅行（注 1）机会到白城、新京、哈尔滨、奉天、营口、旅顺、大连等地水产部门参观访问，以便学生受到专科训练。因为伪满教育均为资产阶段实用主义教育，所以无论校内学习、校外参观实习，都是理论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的教育活动。如四年级去水产公司毕业实习，实际每天就是出劳力装鱼筐、缝鱼筐。宋老师讲物理、化学课很少实验。何老师讲水产专科知识，也是纸上谈兵，理论和实际脱离。去外地参观都是走马观花，收效甚微。

三　奴化教育“日满亲善”

学校从一年入学至四年毕业，均设军事科目，派有实际作战经验的陆军少校当军事教官，对学生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实属对中国青年进行有系统的军国主义教育。每年九、十月间由省军管区派出陆军中校或上校组成检查团，

到各市县中等学校进行全面视察，检阅一年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成果。

日语教师桑原重雄教的“国民道德”（日文课本），实质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那里讲的“国民中坚”就是“忠君”、“日满一德一心”、“日满亲善”、“日、德、意联盟”，称日本国为“亲帮”等说法，实质就是把中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让日本帝国主义任意、永远奴役中国、侵略中国的奴化教育。

伪满实行奴化教育，是根据伪满中央政府文教部发布的大、中、小学校教育中彻底普及日本语的训令，训令中规定教师、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把日本语叫“国语”。伪政府还把学日语规定成等级制度：伪大学毕业生要求达到二等合格；国高毕业生要求达到三等合格；一般国家公教人员均要求达到三等合格。当时学生对学日语都有反感，不愿意学。经常听到：“日本语不用学，过去三年用不着”的不满情绪。

教师对学生采取法西斯的棍棒教育，尊师爱生只是空喊口号，实际师生的情绪是对立的，貌合神离。桑原重雄是日本人，对学生冷言怒斥、大发雷霆，次数太多记不清了，可有两次记得最清终生难忘。1940 年 6 月一天上日语课时，同学陶振江不知道怎么惹怒了他，吼叫一声，把陶振江叫到讲桌边，用木粉笔盒打得陶振江鼻青脸肿；还有一次是 1942 年秋，也是上日语课，桑原又翻脸把田文斐、刘玉珂同学打倒在地，连踢带打一顿。至于平常骂人是家常便饭。这种把学生当成奴隶的法西斯行为是经常出现的。

由于学校贯彻殖民地阶级压迫的奴化教育，学生与学生之间也讲阶级服从，上个年级的学生，可以随便打骂下几个年级的学生。

除正课外，还有一项“勤劳奉仕”，实际是对学生实行过力的强迫劳动，如挖壕、刨坑种地。1943年初冬某日，北风刮脸，连风加雪，有的学生没穿棉衣，强迫学生去半道王顶风冒雪收蓖麻。张福林同学因体弱衣薄，劳动后患重感冒，治疗无效，离毕业前两个月就痛苦地死去了。

日伪学校对学生贯彻唯心主义的唯神论教育，办公室内供俸天照大神（日本祖先）和天皇陛下及皇帝陛下的御影。每天朝会，学生整队，先面向东方行90度宫遥拜的最敬礼，然后再面向南方也行90度皇宫廷遥拜的最敬礼，接着背诵“国民训”，最后作建国体操（共分一、二两套）。此外，每年三月一日（伪康德皇帝登极日）和五月二日（伪满康德皇帝访问日本回銮日）都由校长或桑原重雄宣读诏书，妄图借此训服学生。

四　教师遭受特务监视

学校教师也受当地特务机关监视。郑联墀原系吉林高师体育系毕业生（师范大学），北平、天津都有亲戚和同学，于1942年夏他去关内北平一趟（当时那里是陈公博统治的冀东政府——新中华），九月份回大赉后，伪大赉县公署警务科特务股的便衣特务衣国栋等人身穿大和绉长袍，腰里别一颗匣枪，经常到学校来寻风或找教师谈话。宋广弼是

理化教员，原系张学良在奉天办的东北大学毕业生，1944年春，说他是思想犯，被日伪特务机关抓到哈尔滨坐牢，严刑拷打，把脚趾过电烧掉，至1945年“八·一五”祖国光复才释放回家。

以上所述，是我于1940年至1943年在大赉国高读书时经历的一段回忆（我是第一期毕业生），因时间已过去40余年，遗漏之处是难免的，望我的老同学与知情者正之。

注：1. 修学旅行：新生入学缴纳学杂费中就有一项“旅行费”每学期约八元，到临毕业前约两周停止学习，到外地参观。

伪满安广国民高等学校轶事

王兆铭　周　航

一　伪满安广国高成立沿革

原安广县建于光绪31年(1905年)。地址在平安镇(现大安市新平安镇),隶属辽宁省洮昌道管辖。伪满后划归龙江省。边陲小县,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国民十七年(1928年)安广县才办起第一所中学——安广县立师范讲习科。学制三年。六年功夫毕业两个班,培养出50多名小学教师。此时全县初、高小教育才有所发展。伪康德二年(1935年)师范讲习科第三期招生时改为安广县初级中学。伪康德三年(1936年)为兴办安广农业,培养农业技术人材,遂将初中改为安广农业学校,学制二年。伪康德四年(1937年)安广农业学校随安广县公署的搬迁也挪到龙泉镇(今安广镇)。伪康德八年(1941年)改为安广国民高等学校。

二　伪满安广国高的规模与组织机构

日本侵占东北后，把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攫取了

一切军政大权。当然教育大权也不例外。为了培养驯服工具，贯彻奴化思想教育，使学生成为“日满亲善”、“民族协和”、“一德一心”、“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忠君之国民，将原来传统的初中三年制与高中三年制合并为四年制，改为国民高等学校。这就是伪满的教育方针和奴化教育的宗旨。

伪康德八年（1941年），安广农业学校改为国高，正式名称为龙江省立安广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安广国高）。仍属农科学校。原康德六、七年入农业学校的学生，愿意毕业的即毕业，不愿毕业的仍留校编入国高三、四年级学习。学生来源从全省（龙江省省会在齐齐哈尔市）各县招生。当时有大赉、洮南、镇东、乾安、长岭、开通、瞻榆等县学生报考。每年招一个班，约50—60名学生，全校共四个班，一至四年各一个班，共计200余名学生。到毕业时，因流失性大，每班最多不超过45人。

安广国高校址设在安广镇西北隅（今安广林场院内），占地约三万平方米。校舍近50间（包括校长、教员办公室、教室、食堂、宿舍）。因是农科学校，有土地8垧，钢轴车一辆，马4匹，养羊近100余只，以备学生劳动实习用。

学校组织机构：校长赵元相、副校长西崛（日本人）。教员：赵宝信教满语兼日语和英文课。（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英文课取消），马玉成教化学，刘兆周教物理兼英语，张文学教农业课，韩复乾教林业课兼畜产课、崔瑞祺教代数兼历史课，张大化教日语课，王忠民教教练（军事课），聘请伪专卖局长何文玉教几何课，林雨时做会计工作，金

永年管出纳兼管事务工作。以后金永年调走，又派来一名日本人叫草野的接管他的工作。伪康德11年（1944年）校长赵元相调到大赉国高任职，安广国高的校长由洮南调来的张福典担任。教员马玉成调到大赉国高任教，关魁元从外地调来安广国高任教。

课程设置：国民道德、日语、满语、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音乐、体育、教练、农业泛论、林业泛论、畜产泛论等科。

教学形式和方法：基本是课堂教学，结合所学专业，虽开农业实习课，但只是农园的劳动力，达不到实习目的，所学农业知识甚微。物理、化学等科根本没有实验室，有关这方面的教具、实验设备全无。老师只能在黑板上画图讲解，教授的知识与实际脱节。教学方法以教者讲授为主，是填鸭式和注入式，学完自己消化理解，老师不予辅导。纯属“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设置的课程每学期都完不成教学任务。

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的各种形式：伪满时期，学校通过“国民道德”以“日满协和”，“日满共存共荣”、“一德一心”为主旨，为帝国主义培训驯服工具。所讲的（国民道德）无非是“唯神之道”，“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学校的管理，实行法西斯手段、阶级服从，师生间，同学间非打即骂，上级学生可以打下级生，人身不得自由。

《国民道德》是进行奴化思想教育的主要教材，多是由校长或是日本人担任。安广国高后期新调来的校长给学

生讲“唯神之道。可算“忠贞”之至，学生把他称之为“唯神之道”校长，绰号为“神”。1945年日本鬼子将要投降之前，他还在课堂上讲“唯神之道”、“大东亚圣战”必胜。“老毛子（指苏联红军）要出兵，我们用钢笔水瓶也要把他打出去!”但时隔不久，1945年8月苏联飞机到安广县城上空时，他先跑的无影无踪了。

利用朝会（每天早上课前，师生集合到操场举行的一种仪式）训练学生“忠君爱国”思想。每天早晨（周日除外）全校学生在自己教室门前集合好，跑步进入操场，排好队形，由值周学生任司令，向东南方向行两次鞠躬礼，先给日本天皇遥拜；接着校长登台受礼，宣读“国民训”，校长念一句，学生复诵一句。起初用汉语，后来变成用日语了。仪式完了，由值周学生领做“建国体操”。操毕，整队，各班按顺序正步走到自己教室门前解散。在走正步过程中，军事教官挨班检查，有不齐者重走，个别跟不上脚步的要挨打。康八级有一名学生叫张鹏飞，他个小腿短，经常走错走，十有八九挨揍。周一的朝会与平时不一样，除上述内容外，还要升国旗、唱国歌，宣读“诏书”。起初读“建国诏书”，伪皇帝访日后，改读他颁发的“回銮训民诏书”。东亚战争挑起后又改读“时局诏书”，诏书在校长室内设有“奉安库”（装诏书的匣子）。每日教职员上班，必到校长室先向“诏书”敬礼，而后向校长问安。

通过课堂教练形式，训练学生阶级服从，尚武精神。伪满时期凡中等学校都实行军事训练，经课堂形式固定下来，名曰“教练”，每班每周两节。各校都派有教官。学校规模

较小的派有中尉或上尉，规模大的派少校或中校军官执教。安广国高则与众不同，只派一名退伍上士充任。

“教练”内容：分室内、室外两种形式。室内以讲授伪军事条例、军事操典为教材，训练学生熟习军事基础知识。室外则分徒手、持枪、战斗演习三种。徒手教练以练基本功为重点，“立正、“稍息”、“看齐”、“左右转”、“喊口令”、“拨慢步”（为走正步打基础），“走正步”、“跑步”、横队、纵队的队形变换。都要按教官讲的要领要求做到，否则要受责罚。持枪教练，安广国高使用的是木头枪（模型），学习各种持枪动作，刺杀技术。战斗演习，多是两个班合上，设“假想敌”，派“斥候”（即侦察兵）侦察，报告敌情。有主攻队和预备队，指挥者要运用地形地物，机动、灵活歼灭“敌人”。此外，住宿生比走读生格外吃点“小灶”，每月有一次夜间临时紧急集合，要求五分钟内叠好被褥、穿好衣服、打好裹腿，到外面站好队伍，等待教官检查。不合要求或集合迟到者严惩不贷。平时有的同学吓得不敢把衣服全脱就寝。

安广国高的教练课，在教官的统治下，全校四个班，编成两个中队，六个小队，九个分队。在学生中选出中、小分队长并戴有标志。中队长三道杠、小队长两道杠、分队长一道杠。严格阶级服从。学生常年打裹腿，行动军事化，每上教练课，学生都有恐惧感。四年级一位徐文波同学正步走不好，屡遭教官痛打，课后休息时他对教官说：“王教官，我的正步比以前强了，我走几步你看看。”看后，教官鼓励说：“唉，他妈的有进步！”徐说：“我可上心了，晚间

做梦都在甩正步。”伪康德九年秋（1942年）一次教练课，学生轮流指挥队形变换，横排前进时，指挥者必须给排头指出固定目标，好按目标行进。轮到徐文波指挥时，他神情紧张，张口就喊：“目标，正前方一家雀！”同学们哄的笑了，惹急了教官，他骂骂咧咧地说：照家雀走，往哪走，你他妈逗人还怎么逗？当即对徐文波拳脚相加一顿胖揍。

三　法西斯棍棒教育点滴

伪满时期从小学到大学，全部实行法西斯的棍棒教育。为帝国主义培养忠实的驯服者。经回忆，就我们当时亲临所见举出数例，可见伪满学校棍棒教育的一斑了。

教官发慈心又开“杀戒”。军事教官王忠民，是个“行五”出身的“老兵痞”，识字不多，不懂什么知识，他把防空的警报器叫成“嗡子”，因此学生背地送他外号“老嗡子”。他性格粗野，但对日本鬼子却忠心耿耿，他常向学生散布说：“唉，我他妈的，官名教官，职名教练，一年挣国家一千多元，不给干出点成绩，那他妈是什么玩艺儿！”每上教练课不打学生实在少见，就连不给他老婆敬礼，也找学生后帐。惹起学生众怒。记得康六级（按伪康年号排班次）一伙学生晚间砸了他家的玻璃。学生们守口如瓶，始终也没破了案，从此他的粗野行为有所收敛。忽一日当众宣布：“他入了安广“道德会”，要讲慈善、仁爱、荫子积德，不再打骂学生了。同学们着实松了一口气。约有三个多月确实和气了。但好景不长，不知他抽的哪股邪风，扬

言说:“给好脸不要脸,说不定哪天抓个倒霉的开刀!”1942年冬,三、四年(即康七级与康六级)合班在学校小后山持枪教练,天冷风大,听不清口令、跑步刺杀动作不齐,他已在运气发怒,放学时间到了,他命令三年级学生王兆铭,把队带回学校。跑步返校时队形已乱了套,一进西边校门同学们就散了,扛的木头枪从校门口到操场扔的满地都是。王兆铭预感大祸临头,正往回敛木头枪时,教官从后面跑上来没用分说,拳打脚踢,在外面打了一顿不解气,又叫到教员室打嘴巴子、打手板儿。手心肿得老高。直到校长出来说情,才算了事。这是他修好积德后拿我第一个开了“杀戒”。从此他对学生打骂比以前犹为邪虎。

一首《黄族歌》捅了马蜂窝。1944年(伪康德十一年)春,周航在安广伪国高二年级学习,一个周六全班去金山堡后边的甸子植树,班主任马老师骑自行车先走了,同学们由班长领着边走边唱《黄族歌》。“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且莫同种自相残,莫叫英美着先鞭。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洪水共滔天,只手挽狂澜,方不负,石穿铁砚后,哲前贤。”唱着唱着,不知是谁随着调唱了一句:“大赵一声吓连连天,。接着你一句他一句,用老师的外号凑首歌的歌词。经过一路的集体创作,这首《黄族歌》的歌词重新凑成了:“大赵一声吓连天,捡臭鱼王教官;可怜可怜,刘大倔子抽大烟,臭狗屎张教官,(当时教师也称教官)关小猴子跳钻钻;马大傻颤连连,堂堂不拉韩复乾;校长(指后来的校长)“唯神之道”不离唇,这学校年年课本讲不完。”

第二天是周日。同学孙某去他舅舅张文学（即张教官）家串门，唱起了这首歌给他听，把张文学气坏了。第二天一上班张文学就在教员室唱起了这首歌给全体老师听，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班主任马玉成先找去了梁班长，全体老师把梁班长围在中心，追问这首歌是谁编的？梁班长咬定这首歌是全体同学你一句我一句凑成了，我也说不清都有谁。气的从不打学生的马老师打了梁班长两板子。不论马老师劝也好、打也好，梁班长总是那一句话。这样，可把全体老师气炸了锅，几乎全员出动，来到二年教室，个个吹胡子瞪眼，怒斥、审问声、打骂声不绝于耳，还是问不出来。“老嗡子”想出个鬼点子，按课桌行一个个地问，不说就打五板子，打完全班50多名同学，连累带气弄得他上气不接下气，汗流夹背。折腾了一上午，全班同学都是一句话：“不知道”。全体老师回到教员室以后，不知是谁又出了一个损着，把全班同学集合在教室门前，再一次逼问，并扬言：“不说就跪太阳，不准回家吃午饭”。还是没人吱声。结果，真的命令全班同学跪太阳。一跪就是一个多小时，跪的双膝疼痛，汗流满面。直至其它班的同学吃完午饭返校后，才让我们班回去吃午饭。

蓖麻地里的风波。一九四四年的早春，一天上完一节课，别的老师不愿上了，王教官又来“捡臭鱼”。领我们到北校田地种蓖麻。干了一气活后，王教官叫我们在地头休息一会儿，同学们都很累，有的坐下，有的就地躺下。崔景荣同学最后来到地头，向大伙说：“我还剩点种子谁要？”李清友同学灵机一动，挤着眼睛拉着长声说：“那捡臭鱼的

还不有的是。”大伙也觉得这句话“犯劲”，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同时偷眼看着王教官，就看他脸色由红变白，慢慢地站了起来，边解皮带（武官腰扎的宽皮带）边说：“哎，你说什么?”抡起皮带不管脑袋屁股猛抽。把李清友同学抽倒在地，满地打滚，不住声地喊叫。同学们眼泪汪汪，有的同学背过身去，不忍目睹同学遭受如此毒打。足足抽了十多分钟，他累了才罢手。午后上学李清友同学脱了下衣给同学们看，身上被皮卡带子抽的青一块紫一块的，真叫人心疼。

一条虫子两竹剑。安广伪国高是农科学校，学校共种了八垧实习地。年年都在实习地里种甘兰（大头菜），生了虫子也不打药，全靠学生捉。有一天，我们又捉虫子，同学们个个提心吊胆，这倒不是怕一个小小的菜青虫，而是王教官领着捉虫子立下了一个规矩：捉完一条垄后，由教官检查，每发现一条虫子就要打两竹剑，并且当时兑现。所以每次捉虫子若是王教官领队，不挨打的人不多。

收马薯（土豆）就地下窖。1943年（伪康德十年）秋收时，有一天我们去收马薯，领队老师还是王教官，他让同学们用锹挖，但不准挖坏。边干他边检查。发现有半拉的，不是吃耳光子就是打嘴巴子。吓的同学们把挖坏的马薯乘老师不注意往就近的树地扔，如不得把，就挖个深坑把挖坏的马铃薯窖起来。以此来对付这不合理的惩罚。

上级生打下级生名曰阶级服从。1943年我们一入学（当时是春季始业）学校就向新生宣布：下级生在街上遇到上级生可行进间敬礼，见到老师或大队长（学生军训组织

的大队长由高年级学生担任）要站在路旁、立正，还要由一名学生喊“敬礼”，同时要目送受礼者走过去才能走。否则就要受到惩罚。由于这个规定，有的上级生常向下级生要威风大打出手。吓的新生星期天不敢上街。有必要的事上街就得两眼留神，很怕不注意没向上级生敬礼，第二天上学轻则挨训，重则挨打。每天都有因此而挨打的。如我班杨树生同学一次上街不慎（没看到）没给康九级张××敬礼，第二天早自习时，康九级学生王××在我班教室门口大叫：“杨树生出来，康九级张××找你。”张××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杨树生同学走到张××跟前，敬礼后垂手立站，等待发落。张××问：“昨天上街在庆泰东门前见到我为什么不敬礼？”杨说：“我没有看见”。张瞪起眼睛大声训斥：“怎么没看见？你没长眼睛？”随着训斥声站起来，左右开弓就是两巴掌。该班同学有的还帮腔、喊打。打的杨树生同学面红耳赤晕头转向。打完还训斥说：“以后注意点！去吧！”杨树生同学被打蒙了，忘了敬礼就走了。“回来！”一声怒吼，吓得杨树生只得回来。“打你不愿意是不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敬礼就走了？”站起来啪、啪又是两个嘴巴。杨树生同学嘴角流着血忍气吞声又敬了个礼，抹着嘴流着泪走回本班教室，象傻子似的，一天都没听好课。

从以上法西斯棍棒教育情况，可以看出日伪时期施用种种手段，统治、压迫学生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学生敢怒不敢言。除对日伪的奴化教育反感外，也直接造成师生间的对立情绪。因此学生们针对老师日常对待学生的好坏，

背地里加以品评、议论、起绰号，甚至砸个别为虎作伥者的家，以泄胸中之气。

四 毕业班也要过“勤劳奉仕”关

笔者走访了参加过勤劳奉仕队的王国同、齐海林、朱广斌、腾振国等同志，他们回忆了伪满末期，征用民夫、抓劳工、抓浮浪者，组织国兵漏参加“勤劳奉仕”队，去干苦力活，日甚一日。将要毕业的国高学生也不例外。1942年12月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凡国民高等学校或相当于国民高等学校的毕业班，在毕业前，都必须参加半年的“勤劳奉仕队”劳动。

1945年下学期，开学伊始，根据《学生勤劳奉公令》张福典校长亲自动员康九级毕业班，一律参加“勤劳奉仕队”劳动，支援大东亚战争。“奉仕”地点，白城市西平台飞机场。任何同学不得借故逃避。只有参加并圆满地完成“奉仕”任务，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否则不发给毕业证书。同时宣布：劳动时间半年，要带齐冬季的防寒用品（被褥、棉衣、棉鞋、帽），中间不给假回家，限两天备齐。第三天全班45名同学背着行李、衣物由张文学老师带队，乘火车经由白城换车，当天下午就到了平台火车站。住宿地点离火车站不远，全是日本式的起脊红砖房。每个小房间都是大炕式的板床，上面铺着榻榻密（蒲草垫子）。各房间设有大立柜，做为同学们装衣物用。每个房间睡六个人，为此以宿舍为单位，每六个人编成一个小组，日常的一切活动

事项都以这个小组为单位。

早晨5：30分起床，洗漱后参加朝会。向日本皇室和满洲帝宫遥拜；向阵亡“烈士”默哀。领读《国民训》；最后做早操。早饭6：30分，主食是带沙子的小米饭、或高粱米饭，副食最多数是没油拉水的黄瓜汤，好多同学吃不饱。生活条件好的同学，不得不自己买点麻花、烧饼充饥，7：30分以班为单位打旗排队去厂区出工。在厂区的周围，立有一米半高的石头柱子，上面刻着大字标语“军事重地，闲人免进”。15分钟左右就到了由日本兵站岗的厂区大院。院内也立有“死保皇土”、“严防间谍”等标语牌。厂区方圆有十几里。

劳动项目两种，少数小组参加木工劳动。每人发给两把锯、一个锤子、一只尺、一个刨子。木料是3公分厚的红松板，制做40公分长、25公分宽的长方形木箱。任务每人每天钉两个，由日本人领工指导。产品是做什么的，谁也不知道，也不许问。同学们偷偷议论说：“咱们钉的盒子，是给日本鬼子装骨灰用了。”

多数小组参加挖土坑劳动。土坑规格为长12米、宽7米深3米。劳动工具铁锹和镐临时由领工发给。由于每天从早到晚都是挖土劳动，每个同学手都打了血泡，过了一周后这些血泡又变成了老茧。每天累的腰酸腿疼，晕头涨脑。

每次收工先以班为单位站好队，日本领工在队前喊：“欧苦漏莎”（辛苦了），同学们答：“阿力嗄斗勾扎一马斯（谢谢），然后由班长领队回宿舍吃饭、休息。

开始谁也不知道挖这些大坑做什么？以后发现日本人用拖车把车床、铣床等机器设备拉到大坑边上。原来这大坑是埋机器用的。晚上同学们偷偷议论说："日本鬼子这回可真要完蛋了，要不打败仗为啥埋机器？我们回家的日子可不远了。"

时局的发展正象同学们分析的那样，8 月 14 日左右，我们发现日本领工无精打采的，厂子的车辆调动频繁。也看到有些日本妇女和孩子有撤退的迹象，整个厂区出现了混乱状态。8 月 16 日午后我们正在挖大坑，突然警报机响了，工厂的上空发现了一架苏联军用轰炸机，转了几圈飞走了。当时把我们吓坏了，有的同学腿都不好使了，在大坑里怎么也上不来，工厂乱了营，日本领工也找不到了。同学们正在焦急不安的时候，张老师从厂部回来了，他把同学们召集在一起，宣布："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从现在起上边让我们自讨方便，我们可以回家了。"全体学生听了这个特大喜讯，沸腾了，谢春花同学激动地高呼："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可以回家了！"同学们也都情不自禁的高呼："日本鬼子垮台了，我们回家吧！"好多同学激动地流出了眼泪。

回到宿舍，同学们忙着打行李整理衣物，准备回家。天快黑了，厨房里没人给做饭，只好饿着肚子赶快离开"奉仕"一个多月的平台飞机场。在黑蒙蒙的夜幕下，飞机厂的油库已经着起了大火，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我们全班同学背着沉重的行李、衣物，摸黑好不容易走到五合公司屯，在那儿求告大户人家吃了一顿饭，休息

一个多小时，又出发了。在白城北，路旁有很多军用帐棚和日本兵，也有日本妇女和儿童。我们想这一定是在北山里打仗退下来的。第二天下午到了白城车站，准备乘火车回家。经张老师多次联系，结果还是不准乘车。车箱里挤的满满的，全是日本兵。没办法，只好沿着火车道往回步行。当走到高平小站时，天已经黑了，又下着小雨。小站只有几家住户，再三商量，都不肯接待我们，有的还说我们是逃跑的国兵漏子，没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这时衣服、行李全浇湿了，身上的负荷越来越重，走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走一会停一会，休息时就在泥地上躺一会儿，有的同学一躺下就睡着了。好多同学打开行李，把棉被、棉衣里面扯下来，扔掉棉套，棉鞋、帽子扔的就更多了。如麻得胜同学因年令小身体弱，被子、棉衣、鞋帽全扔了。同学们个个象个泥人。这要是往常同学们一定得笑破肚皮，可是今天被饿、累、困、冷四只恶魔轮番攻击中的同学们，谁还有兴致笑呢。过了舍力北大桥，进入了安广境界，同学们开始活跃了，家住六合、叉干、古城、平安、大岗子、龙沼村的同学们陆续和我们告别，直接顺路回家了。第三天午后我们来到了来福屯张喜荣同学的家，张大伯乐的合不拢嘴。立即决定杀一口猪一只羊让大家共同吃一顿“喜饭”。晚上同学们在张喜荣家美美地睡了一宿觉。次日早饭后，张喜荣同学的哥哥（来福火车站的养路工）把我们领到火车站，找来了全站仅有的两台压车子，教我们怎样用和对面来车时的紧急安全措施。我们安广镇以及两家子和大赉等地的二十几名同学分乘两辆压车子迅速向安广站行

驶。同学们高兴极了，几天的疲劳一扫而光。一个多小时到了安广站西道口，安广镇的同学们下车各自回家了。大赉、两家子的几名同学又乘车往大赉城的方向驶去。历经一个多月，“勤劳奉仕”的同学们从虎口里几经磨难，总算平安的回来了。

伪满末期安广县
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经费来源

王郁芬

我于1943年至1945年8月间，曾在伪满安广县公署行政科教育股工作，仅据回忆，对伪满后期安广教育行政机构和教育经费情况，写成此文，献给读者。

一　机构设置及职权范围

伪满末期安广县教育股设在县公署行政科内，按行政科长及科副之命，执行全县教育行政事宜。教育股共有6名工作人员。股长兼视学卢恒，科员王郁芬、赵喜亮、雇员王广志、杜义常、刘德勤。

教育股下设学务系、财务系、总务系和教育会。股长卢恒负责全面工作及视学业务，其他人员分工是：

学务系王郁芬，负责全县各小学校人事任免、调动、调薪、档案管理及股内文件拟稿、保管等项事宜。

财务系赵喜元，负责全县教育经费预决算编造、收支和教职员工薪优越发放等事宜。

总务系王广志，负责管理股内总务及全县学校办公用品、学生配给品的领取发放事宜。教育会杜义常，主要是管理全县教科书、寒暑假学生作业本及教学参考书发放、学生体育运动等事宜。

收发刘德勤，负责股内文件收发、文件抄写及表格填报等事宜。

教育股管辖的学校有实验小学一所，中心小学八所。这些学校是：安广县立国民优级学校，校长柳书绅。舍力中心小学校，校长曲逸君。烧锅镇中心小学校，校长孙英林。大岗子中心小学校，校长金作铭。平安中心小学校，校长王辅。海坨中心小学校，校长董作民。东发中心小学校，校长李树。立顺中心小学校，校长王志礼。新荒中心小学校，校长梁文阁。

二　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1、财政预决算内的经费

县财政预算内经费由县总务科经理股负责支出，包括教育股人员薪俸开支、公出旅费和全县各学校教职员工薪俸。在年初按一种教谕、二种教谕、三种教谕、教导教辅等官职人数编造预算（包括勤务津贴、家族津贴、语学津贴和年末赏与金等）经理股核准拨款，由教育股会计领回，按人装袋，经各中心校发给每个人。年终教育股把年度决算报给经理股审核。各学校办公用品的发放，由教育股按学校数，教职员员工数，班级数编制预算，报经理股核准购买实物。教育股下发通知单，各学校分别到经理股保管

处领取。办公用品有：学校日记、班级日记、点名册、签到簿、办公用纸、教案纸、钢笔杆、钢笔尖、粉笔、墨水、毛笔、黑板擦和学费收据等。

学生的配给品，发放期限不定。品种有学生棉线黄色制服、胶鞋、手巾等。配给品上级配给一定数额，由教育股根据学校学生数，按百分比发放。有时数量多，就都能得到。如1944年各校教职员每人都发给一套协和服。

2. 社会捐助的经费

各学校办学经费的另一个来源，是靠父兄会的捐助。父兄会是由学校召开的家长会议选举产生的资助办学的群众组织。成员都是有威望的知名人士。父兄会采取不定期例会的形式开展活动。父兄会成立须报县公署备案。该会主要作用是在县财政拨给学校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对校舍维修、新建、桌凳增添、修理及教学设备购置等所需费用，进行筹款。具体作法是由父兄会会长组织成员到各绅商、富户处捐款、捐物，资助学校办学。如1931年安广县立国民优级学校缺少教6个，需建房18间，当时县财政无力解决。该校父兄会会长吕英和成员梁昆权、刘飞海、张永和、邹继文等人，发动各界人士，捐款捐物。建成了两栋18间教室。开始施工时，父兄会派人常驻学校，负责物资保管、财物收支、工程管理等全部工作。学校还出一名办事员，负责给捐赠人开收据，定期向父兄会公布收支情况，工程全部竣工时，父兄会全体成员验收后，方交付学校使用。同时，每期开学前，各学校父兄会都派木工到学校修理桌凳，学校开运动会时，购买奖品和纪念品的费用都是父兄会捐赠的。

我记忆中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张东藩

我是一九四〇年三月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一九四一年九月毕业，学习时间一年半多一点。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座落在日本东京西郊外六十华里的相模川平原。分南北两个大院，北院较大，四周长约有三华里，南院较小，四周长约有两华里。北院的东侧靠山，层峦叠嶂，松柏苍翠，景致十分幽美。西边二十华里处，有厚木市，远处三十华里左右是一座高丛云端的大山。每逢春天，樱花盛开，大山脚下披上一层粉白的轻纱。

士官学校院内西侧设有游泳池，游泳和船运演习在院内。汽车、摩托车、小型坦克等的驾驶演习，一般也都在院内。连着校院的北门，就是相模的练兵场，占地面积很大，有各种自然地形，适合陆军演习。

它的行政隶属于神奈川县，从东京坐小田原电车到相武台下车，三十分钟可到士官学校。这个学校是士官学校的本科，是后建的，原来的士官学校，是在东京市内，当时是士官学校予科，"九·一八"侵华战争的之前，予科本科都在这里，培养的人数很少，大概在侵华战争的中期，由于学生人数的急剧增加，才扩大了士官学校的规模，校舍

也就移到了相模川平原。全校除大礼堂是水泥结构外，整个校舍全是木结构的。大礼堂可容纳三千多人。

为了战时军官的补充，到一九四二年，每期学生人数，竟达到二千五百人之多。上下期生在校重叠半年，这是为了上期生把士官学校的传统精神，留传给下期生。

士官学校学生的来源：主要是来自陆军小学、陆军中学、士官学校予科。战时学生人数多了，采取考试制度，由高中毕业生或大学予科中录取，然后进入士官学校予科，予科毕业后，再分配到部队三个月的实务教育，从上等兵开始到下士官，然后进入士官学校本科。

什么是他们的传统呢？养成服从精神，是他们的传统信念。下期生绝对尊敬和服从上期生。下期生对上期生，见面就要敬礼，如上期生发现下期生没有给他敬礼就走过去了，上期生喊“库拉”（哎的意思），下期生便得跑到上期生的面前，垂手站立不动，等待上期生打嘴巴子，有的上期生毫不留情的打一下或打数下；有的只是告诉他下次要注意，便说：“去吧”就算了事。当下期生因有急事，想由上期生旁边走过去的时候，也要喊一声：“我走过去再敬礼”，当上期生说：“好”才能走过去。有一次，在作剑道时，有一个下期生，急于入剑道场，没看见上期生就跑过去了，上期生喊一声“哎”，下期生马上跑到他的跟前，一连打了好几个嘴巴才让走。

上期生打下期生，怎么打的狠，下期生也毫无怨色，明年下期生升为上期生的时候，也照样作下去，把这种精神一期一期传下去，一直带到部队中去。在部队的军官中，上

期生和下期生，先晋升和后晋升，那怕晋升就差一天，同等的军衔，也必须绝对服从。打嘴巴子的教育，在士官学校，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部队里，习以为常。但在佐（校）级以上军官里，是不采取这种作法的。

在士官学校里，没有政治思想教育课目，他们以精神教育当作政治思想教育。每周进行一次精神教育，是以万世一系的尊天皇教育为中心，尊天皇为现人神，把他当作神来看待。士官学校的学生，在每天早操解散之后，都要到东侧山上，向皇宫遥拜，深深地向皇宫方向鞠个躬。他们的精神教育，就是神道主义教育。把他们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正义的，“忠于天皇”，战死也是光荣的。

士官学校培养学生的中心思想是以向天皇尽忠为光荣，以自己当官为光荣。从明治天皇开始，士官学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天皇必亲临学校，亲自宣读诏书，然后绕场一周，检阅学生。学生感动“龙颜咫尺”，虽死犹荣。因此他们从学校毕业奔赴战场，视死如归，这就是他们忠君思想的突出表现。但是也有少数人，以战争为苦恼，悲观厌世，认为士官学校是个大猪圈，毕业之后到中国大陆白白去送死，感到对中国发动战争是非正义的，是无望的。

士官学校对内务教育要求的最严格，武士道精神，贯穿在日本军队的整个思想教育过程之中。要求走路快、吃饭快，大小便快。十分尊崇幕府时代的传统思想，经常讲“白虎队”精神，亡国自尽。同时也重视军队的礼貌。

内务要求齐正严肃，日常的行动要快，骑兵学生的行动，特别要求迅速，养成兵种所具备的特点。区队长对学

生的要求最严格，在兵器内务不符合要求时，有的区队长也打学生的嘴巴子。区队长一般都是大尉，中队长是少校，各学科的教官都是少、中校。士官学校本科，一共有二十五个中队，中队以上直属学生队，学生队长是上校或少将，再以上有各部，即：战术部、炮兵部、步兵部、骑兵部等，各部部长一般是上校或少将衔。

士官学校是培养初、中级军官的地方，士官学校的学生升级只能到中、少将级，大将级必须是陆军大学毕业，学历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士官学校的在校生学生教育是半日课堂学科学习，半日术科实习。理论与实践，互相密切配合，讲课全部以实物教育为基础，课本上讲的，在展览室内都有实物，例如汽车、飞机、坦克等，也有断面实物。关于海军的部分，要把学生带到舰艇上去讲。关于国防部分、如从满洲里沿黑龙江到佳木斯，苏联有多少个军事碉堡设施，士官学校的教育资料室里，都有详图和实物说明。学科有十六门。中期以后的重点教育是战术战略。现地战术，要求到师、团、营。图上战术要求达到军、师、旅、团。术科教育达到连、营、团为止。

每期有一次野营演习，有一次步骑炮工辎，陆空的联合大演习。演习的行动非常激烈，每年的联合演习，学生中都有伤亡。陆军省极为重视士官学校的联合大演习，一般是陆相（国防部长）和教育总监亲自参加，一九四一年的学生毕业联合大演习，是东条英机和山田乙大将，亲自参加了一个星期。

士官学校的校长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名将充当。一九四〇年是山室宗武中将（号称炮兵神），一九四一年是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中将。

在日本士官学校的留学生，除了伪满洲国和汪伪的"新中华留学生队"数量较多之外，也有东南亚小国的少数留学生。泰国和缅甸各派一、二名，都是皇族贵族子弟，单吃单住，上课演习参加日本学生内。

日本的皇族在士官学校学习的单有校舍，演习授课都同一般学生一起。一九四〇年有东久尔宫殿下和朝阳宫殿下。平常对他们很恭敬，一旦演习与一般学生相同。据说上期生对于他们也要找机会（晚上或夜间），叫他们尝试一下打嘴巴子的传统。

一九四〇年这一期为满洲国学生，一共二十九名，是由国内军官学校毕业后二年，参加数次考试派遣去的，（日本是五十五期）。食宿单住，单独一个讲堂，排以下的教练由自己充当，连、团的演习借用日本骑兵师团的士官。除伪满洲国的留学生外，日本军队严格禁止外国留学生使用（指挥）他们的军队。

一九四一年汪伪派去的中华留学生队，一共三十名，在南校院，不与日本学生队在一起，其中有一名学生是孔子的七十二代孙。

外国学生在日本，是否对军事上保守秘密？书上记载的一般不保守秘密，但在课堂授课的细节问题上和作战中的实际战例上，当然要有分寸的。对满洲国的学生尤其"中华队"，因为他们战斗的对象是中国，所以他们在作战

中的阴险毒辣手段和对中国人的残忍政策，自然也要保守秘密的。

一九四一年秋季，在五十五期学生毕业的讲话中，有他们陆军中的重要人物参加。当马渊报道部长(宣传部)谈到对中国作战的形势，对中国作战的上不利之处和评论汉奸汪精卫时，下边有人提醒说：“有外国学生在场”，于是立即使伪满和新中华学生退场了。

日本对中国和各国留学生的用意深远，他们以为在日本留过学的学生，在未来的政变中，都会成为他们的帮凶和爪牙，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设想。据说，日本士官学校，把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名簿、住处等，从蒋介石、阎锡山等开始，一直完整的保存着。

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时，所以培养很多日本留学生，是想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增加侵略者的羽翼和忠实走卒，但效忠日本军国主义的民族败类毕竟少数，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已随着人类的觉醒和世界的进步而破灭了，强权政治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我这个片断回忆，如能给读者了解日本军国主义提供一点帮助的话，当以自慰。

谈伪满时期的大赉邮政

董明谦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的活动，预谋已久。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开始在东北地区强索租借地，驻扎军队、开办工、商企业。在其长期的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侵略同时，当然也不会放过对于这些部门的信息工具——邮政事务的侵略。早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已在东北地区的大石头城、奉天西关、奉天大北门、铁岭西门、长春城、吉林、安东、凤凰城、新民府、哈尔宾、间岛设置了十一个日本邮政局。与此同时，在东北的其他小市镇还设立了日本邮政代办所共二百二十三处。实际上东北腹地早已成为日本人的邮政领地。当时东北地区与日本国内内地的邮件，定在大连、营口、辽阳、奉天、铁岭、四平、长春、安东等八处为东北和日本国内地的邮件交换地。

“九·一八”事变以后，大赉县在伪满洲国的邮政十四年中，可分为大同年间和康德年间两个阶段。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以康德二年（1935年）6月15日京（长春）白（白城子）线铁路建成通车为界限。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变，

决定着邮政事务，包括邮政制度、设施，乃至邮政业务的一系列的改变。

一　大赉县伪满大同年间（铁路建成前）的邮政状况

"九·一八"事变后，于1932年7月23日中华邮政上海总局即电令在东北的中华邮政人员向关内撤退。于是东北全境的邮政局、所于1932年7月26日脱离中华邮政。同年9月1日伪满邮政正式接管了中华邮政。之后，日本对东北的邮政事务，为了服务于日本的侵华需要，完全仿照了日本国内的邮政模式进行一元化的整备。从人事制度和邮政设施乃至业务范围等都排除了中华邮政的传统影响。将邮政人员的职称由员、佐、差制，改为日本式的技工、雇员、佣人制；局长、信差、邮务员改为技正、事务官、理事官。废除邮务长制度。信差的制服也由绿色改为深兰色。

伪满时期的大同年间，大赉县邮政局上属哈尔滨特别市邮政管理局管辖。大赉县邮政局地址在大赉城的大东街路北（今五小学对侧），共五间租用姓陈的门市房子。

大赉县大同年间的县内外和城乡的邮路有：

1、县外邮件，南线由中东路的陶赖昭站；西线由洮昂路的洮南站，递送、收发。

2、大赉县城至省城齐齐哈尔的陆路经由：古鲁站、他拉哈站、多耐站、二站、头站、齐齐哈尔。大车需行六天

大赉县夏季水路去省城齐齐哈尔有二条：一路是，从城北老坎子江口乘船北上直达江桥，再转乘平齐路北去的火车；另一路是，于老坎子江口乘船至哈尔滨，再转乘北满路火车。两条水路去省城皆为三天路程。

3、大赉县城至伯都讷（今扶余县城），经由：大福镇两家子店、四棵树、衙门子、西凉河、东丁次、巴家嵩、烧锅、伯都讷。大车冬天为一日，夏天为二日路程。

4、大赉城至泰来气。经由：曹家窝堡、腰窝堡、李家围子、双榆树、西二龙梭口、乌兰昭、泰来气。计五日里程，十日往返。

5、大赉城至安广县城（今平安乡）。经由：泰平林、大平山、发财屯、二鹿山、小五家子、小新立屯、冯家窝堡、安广县城。二日路程，五日往返。

6、县外西至洮南，东至肇州老街基，均为三日路程七天往返。

伪满大同年间的大赉县县内邮路。境内城乡划分为三个邮政区。即有城内，马连根桑，西二龙梭口三个邮政局。城内为第一邮政区；河南庶、富、教三乡为第二邮政区；河北永、庆、升、平四乡为第三邮政区。河北各乡的邮件，统归泰来县邮政局负责收发。

伪满初期，大赉县城赴河北各乡的邮路，沿大赉县泰来气路于洮儿河内刻河口，或绕道刀冷屯河口渡洮儿河。

伪满初期的信资。于大同元年（1932年）9月，随着伪满币制的变动的同时，变动了原中华邮政的邮资（习称伪满第一次变动邮资）对寄往日本内地的邮件由一元一角

二分变为四角五分。普通信件由二角五分变为一角；明信片由一角五分变为六分。东北内地平信15瓦以内由四分变为三分，每超过15瓦增加三分；明信片由二分变为一分。国外（东北地区以外）普通函为二角；明信片为一角；保险信函每千元收费一角；普通邮件收百分之一，小包裹每百瓦收费一角，千瓦收费二角……以上递增至万瓦为一元。汇兑收费，县内五分，省内六分，省外七分。大同元年九月，建立了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同年十一月设航空邮政。航空邮件二瓦内收费一角二分；日本内地收费六角；中国内地收费三角五分；明信片收费一角八分。

二　大赉县伪满康德年间（铁路建成后）的邮政状况

大赉县邮政事务从康德二年（1935年）6月15日长白线铁路建成通车开始，铁路部门即承办邮运业务。从此，县外邮件完全由大赉城火车站收发。

伪满时期，大赉县人民与祖国内地通邮是从康德二年（1935年）开始的，于康德元年（1934年）9月中华邮政代表与伪满邮政代表在北平开始谈判。中华邮政侧代表以高宗武为主席委员，成员有余翔麟；满洲国侧代表以伪满交通部邮政司司长藤原保明（日本人）为主席委员，成员有代谷胜三（日本人）。这次谈判达成了协议。于康德元年（1934年）12月14日公布了通邮细目。于康德二年（1935年）1月10日开始正式通邮，同年2月1日起通包裹与汇

兑，华满邮件交换地点定在山海关和古北口。从此，大赉县人民和祖国内地亲人得以继续通邮。

伪满康德年间大赉县县内农村邮路有三：

1、河北四乡的邮件，在长白线铁路通邮后，于县领地坦途车站上下火车，设坦途邮政代办所，负责收发。

2、设端基屯邮政代办所。

3、送往江东、肇源县茂兴站。

康德四年（1937年）伪满洲国成立邮政总局，在奉天、哈尔滨、长春、锦州、牡丹江设立了五个邮政管理局。大赉县邮政上属仍为哈尔滨管理局。

康德七年(1940年)大赉县邮政局人员共有十五人。他们的职责分工是：

局长　洪德喜

属官 孔令义 负责储蓄保险。办事员张大中、柴井连

属官　郑维生　负责邮政事务。办事员王兴奇

委任官试补　毛玉　负责汇兑。办事员韩成章

邮务员　李宝　负责包裹的管理和收发。

接站员　孙多民　李春山

城内投递员　董湘斌　孟庆阁

外差 端基屯投递员王殿君。江东茂兴投递员 汪运兴

本县邮政工作人员，服装统一，身着黄色制服。帽徽以黄色线绣有（㕚）形大字。徽意为邮字的拼音字母，“一又”组成。制服的袖头襄有黄色布条杠一条。农村投递员穿兰色背心，身后面贴一个大邮字。

大赉县邮政局设备简单，除租用五间门市房办公外，还

包租韩姓的马车一台，定时去大赉城火车站接送邮件。农村端基投递员自备自行车一台，江东茂兴投递员，徒步背送邮件，他们工作都很艰苦。

伪满康德年间的信资，于康德四年（1937年）4月1日实行新邮政法，对邮资做了重新调整。（习称伪满第二次邮资调整）。普通信件为四分；明信片为二分；单挂号为一角二分；双挂号为二角四分。于同年7月1日实行快递邮政，普通信件为一角八分；邑内小包裹收费二元。邮寄到祖国内地的普通书信为五分；明信片为二分五厘。国外普通信件收费二角；明信片为一角。后于康德九年（1942年）3月第三次变动邮资。普通书信由四分改为六分；明信片二分改为三分；印刷品提高了五厘至一分。小包裹邮资提高一角；其他特殊的邮资办理，分别提高三成乃至四成，这次调整后的邮资，东北地区和祖国内地间，东北与日本本土间的邮资趋于一致。

三 伪满时期，大赉县行使的邮票

伪满邮票，在票面上分为满洲国邮政和满洲帝国邮政两种。伪满初期时使用大同年号，从大同元年三月九日溥仪执政开始至大同三年改元为康德年号止。这个时期，伪满国体为执政政治，国号称为满洲国。这个时期发行的邮票称为满洲国邮政邮票。

伪满初年，大同元年四月一日建立伪中央交通部，下设邮务司，管理全境邮政。同年八月一日交通部发第三号

令。发行满洲国第一版邮票开始。在这个时期共发行五套邮票。共三十九枚。称为满洲国邮政邮票。习称伪满国字邮票。

满洲帝国邮政邮票。大同三年一月二十日伪满“国务院总理”郑孝胥发表帝制声明：伪满国体由执政政治改为立宪君主制。同年三月一日溥仪从一个全国人民推举的政府首脑——“执政”，变为世袭的皇帝。国名改为满洲帝国。这个时期以后发行的邮票称为满洲帝国邮政邮票，习称帝国邮票。帝国邮票从发行开始到东北光复止，共发行二十五套一百二十种邮票。此外，于康德八年（1941年）3月1日还发行了一组储金邮票，共两种。于康德十二年（1945年）还印制了一组飞机附加金邮票、没有来得及发行东北就光复了。

伪满邮票在大赉县流通使用最多的有两套。

一是，辽阳白塔和溥仪头像图案普通邮票。这套邮票于大同元年（1932年）7月26日始印发行；于1934年1月再印发行；同年11月1日三印发行。前后共印制三次。从半分到一圆共二十种面值、是伪满时期，发行量最大、使用时期最长的一套邮票。

辽阳白塔邮票图案上的白塔名称叫广佐佛塔。高二百三十尺，八角形，十三层，砖制。广佐寺，俗称白塔寺。金代初年建立，为金代第四代王完颜亮于1149年12月始建后于大定初年，即1661年10月，经金代第五代王、世宗完颜雍、仁孝皇帝扩建，至今。伪满使用白塔图案，其意在：使用白塔图案象征着东北地区，原来就是满洲地区，满

洲始祖努尔哈赤于1115年统一东北的女真族各部落后，建立了满族统治的大金国，国号为满洲。以掩饰日本法西斯侵略东北的实质。以溥仪头像为图案，意在溥仪不但是满洲现在之君，而且是满族入主中原后的第十代皇帝，他是东北始皇的后代，是满洲的子孙，溥仪是当然的东北地区的主宰者，同样是掩人耳目。

二是，康德二年（1935年）1月1日发行的中国内地和东北地区通邮的专用普通邮票。于1935年3月1日再印发行；1936年4月12日三印发行；1937年4月1日四印发行。前后共印制发行四次。从二分至一角三分共七种面值。是伪满时期使用最广泛的一套邮票。

这套邮票以白头山（即长白山）和黑龙江为图案，意在长白山是满洲始祖的发祥地，白山黑水是满族的象征。早在商周时代满族的祖先肃慎人就生活在长白山、黑龙江一带。日本人以其意来离间东北人民、欺骗世人、粉饰侵略的企图是徒劳的。随着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东北地区又回到了祖国的版图。

伪满爱路少年队赴日观光漫记

刁秉正

伪满康德五年（1938）春，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安广国民优级学校里传播开来。“学生刁世玉选中出国观光了!”学校和家庭都看作是千载难逢的大喜事。我个人更是雀跃腾欢，好像长了翅膀。

童子有幸　跨海东游

访日代表团的主持者，是满洲国铁道总局。成员是各条铁路沿线的爱路少年队员代表。代表是经过文化考试、学校选择、家庭同意、协和会县本部审核推荐预送到白城铁路分局口试（日语对话），然后身体检查、复选合格、报送齐齐哈尔铁路局批准，才通知本人和所在学校。

伪满全国各省共选出爱路少年队员代表57名，黑龙江省12名，我是京白线（新京——白城）的代表。于3月中旬队员们集中到沈阳作出国前的训导教育，为期一个月，定于4月22日由沈阳出发。每省编成一个小队，由2名日本人带队。总队领导、翻译官都是铁路总局的人。特等翻译

官叫李成裕，朝鲜族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语。每名队员持一支建国杈作为护路的标志，并配有水壶、蝇拍、背包等物。总队还带一部电影录像机。

访日代表团由沈阳乘火车经安东（丹东）入朝鲜由釜山上船，渡朝鲜海峡到日本下关，舍舟登陆坐快车直达东京都，在一路旅途中，由于带队人照顾周到，队员们有说有笑。兴致很高，没有一人晕车晕船的。

银座樱花　诱人如醉

列车驰进东京都车站时，欢迎的人群早已在那里等候，上千名日本小学生，手持日、满国旗不停地摆动欢呼，高唱日本歌曲。汽车把我们送到都内最有名气的小学校，举行迎风洗尘欢迎会。会上互赠礼品，日本给我们的是绚丽初放的樱花，我们回敬的是傲霜的秋菊，还有其它礼品。这所小学校长在欢迎词中讲道：“——日满亲善，一德一心，须从少年作起，以奠定两国永久友好之基础……”我方由总团长佐藤答词，也是同一个调子。会后安排我们住在冒平旅馆，随即开始在东京都作为期二个月的见学、观光活动。

每天早六点开饭，七点开始学习。本着“入乡问禁、入国问俗”的礼俗，先学习日本国的地理概况、行政区划的名称读法、写法和所到之处见学的重点。代表团对成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不准出现有损帝国体面的行为。

每年4月29日是日本樱花节，这时东京上野公园樱花盛开，好一片花的海洋。赏花游园的人们络绎不绝，对我

来说是大开眼界。园中还豢养着许多珍禽异兽，供游人欣赏和科学研究。还有参天老树和老人休息亭阁……。在这个公园里我们逛了三天，据说还没走遍，可见公园之大。

东京都的博物馆，当时在亚洲来说算是第一流的。那时我年少无知，只对逛公园感兴趣。记得乃木大将配刀骑马高大雕像，听翻译官讲他是日俄战争中攻打首山（在辽宁省）的日军指挥官。这场血战双方伤亡惨重，日本以80%的伤亡率从俄国军队手中夺下首山，从而取代了俄国在南满的一切特权。日俄战争虽为日本帝国大长了国威，但给日本人民却带来了灾难。无数丧夫绝嗣者，痛不欲生，纷纷给乃木大将投书责骂他是“杀人魔王”。在国民谴责之下，乃木大将觉得有愧“江东父老”，最后引咎自杀以谢国人。我们参观过他自杀的地方，墙上残留着斑斑血迹。当时我真不明白这个杀人魔王日本政府还要崇拜他，到处给他塑像表彰？日本和俄国为什么争夺中国土地？在我脑海中留下一连串的问号。

东京都最大的商店是白木屋，店内柜台上见不到一个售货员，所有商品皆名码实价标志清楚，顾客想买什么，只要写明货码、数量同货币一起放在电运斗里，运斗自动进入操作室，操作员即将购买商品余款由原运斗退出付给顾客，丝毫不爽。素有“银座”之称的第三产业，每当夜幕降临，华灯齐放，五光十色，歌楼欢唱纸醉金迷，看来好一般升平景象。

东京都有高架铁道和地下铁道，高架铁道在楼顶上通过，沿约40公分粗的一根单轨运行，坐上去如驾云腾空，

提心吊胆。地下铁道非常壮观，地下商店和地面上一样繁华。车辆来往穿梭，公共汽车、电车、出租车有秩序地行驰。当时看过这些真觉得日本国好。

扑朔迷离　安识其秘

德岛县是日本四国有名的一个县，那里工商业都很发达。我们访问了几所小学，其接待仪式大体和东京都相同，但别有风采的是：在某一小学的联欢会上，学校为我们57名代表配了57名日本少女陪同，和我们偎依谈欢，格外亲密。该校长公然提出："日满两国人民是同文同种，你们像兄弟姐妹一样，不拘国际界限，要建立长期友爱关系，一德一心，共存共荣"。陪我那名姑娘叫正木秀子，和我同龄，秀丽端正，天真婉妮，十分喜人。她家住在德岛市557番地。我们俩互留了通信地址。这些究竟是为什么？是他们想抬举华人入赘东瀛、还是想嫁女来大陆定居？世界上哪有这无缘无故的爱呢。扑塑迷离、猜不透。归国之后秀子曾给我来过几封信，鼓励我将来去日本留学。我复信也互相勉励，但字里行间却没有一点跨海联姻的意思。

富士山在本州是日本旅游观光的胜地，谁到日本都想去此地游览。山顶常年白雪皑皑，山腰草木葱笼，十分壮观，我们在这里摄制了影片。山脚处从事服务行业的妇女待客殷勤，服务周到。

这次历时八个月的东游，访问了日本国的一都（东京都）一道（北海道）两府（大阪府、京都府）四十二个县，

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

结束东游　返掉复命

12 月 25 日，观光日程全部结束。从日本门司搭军舰回国。当时看到有大批日本军人同舰开赴满洲。军人家眷莅港挥泪相送，日本士兵垂头走进舰舱。由于大批增兵侵略中国，国内很少见到 20—40 岁以内的男人，她们说儿子和丈夫都应征赴中国打仗去了。

到旅顺港离舰登陆，迎面望见白玉山上的表忠塔，也是为了表彰乃木大将的忠勇而建的。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人的军魂，觊觎大陆是日本国的国策，它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奠定了基础。

我们回国后又集中在沈阳，用一个月的时间整理日记畅谈心得，统一宣传口径。各省都带回一部摄下的电影片，代表们回到各自的路段上沿途放映，照本宣科。通过宣传，在青年中撒下亲日的种子，在我们的心灵中扎根尤深。直到祖国光复后，我才和那名日本姑娘断绝了联系。

康德六年（1939）春季开学，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当时我简直成为宠儿，顺利地读完国民优级、国民高等学校。满洲帝国协和会安排我在安广县本部的青年训练所当教官，自诩为有旅日经历，得到日本人的器重，忘乎所以为虎作伥，凌辱青年。祖国光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政府安排我作了人民教师，懂得些革命道理，洗面革心更名曰：“刁秉正”，以志不忘前非，永远沿着正路前进。

伪满时期去甘南勤奉队纪实

桃金诚　陈子钦

笔者伪满时期在安广县动员股当职员，对征集民夫、劳工、组织勤奉队系亲历亲闻，记忆尤新。下面仅就1944年带队去甘南开发水田，作片段纪实。

《勤劳奉公法》的公布

统治者无偿征用徭役自古有之。迄乎伪满洲国时期，征民夫、出劳工，频征苦役名目繁多。1942年（伪康德九年）又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勤劳奉公队编成令》，确立所谓国民总服务体制。凡适令应征国兵而不合格入伍者通称之谓“国兵漏”，依法组成勤劳奉公队，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劳动，利用青年可塑性的特点奴役驯化青年。同年12月接连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安广国民高等学校1945年应届毕业生被迫到白城县平台修飞机场。

勤劳奉公队员的就劳年龄，初时规定为满19岁至22周岁。1945年（伪康德十二年）修改《国民勤劳奉公法》时，勤奉队年龄延到30周岁。每次勤奉动员指标均由省公署决

定，下达到县公署，县公署酌增机动名额分配到街、村。街、村具体落实到人头。谁去谁留依壮丁名簿指定。旧社会哪有公道事，有钱有势人家，该去勤奉的也可以贿免，穷苦壮丁去过勤奉，三年之后也免不了再去劳工。

勤劳奉公队的组织

勤劳奉公队的组织纪律非常严，要求行动军事化、劳动战斗化。一切服从命令，队长可以打骂队员。工地设司令部，正、副司令官都是日本人。各县设大队部，安广县大队长是教育股长卢恒、大队副是动员股事务员补钱树贵。大队下设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长是动员股事务员补栾殿生、中队副是文书股事务员补刘庆瑞、第二中队长是动员股事务员补陈子钦，中队副是开拓股雇一员刘海滨。中队以下设十一个小队，每小队各设正、副小队长一人。每小队队员编制为 60 人。安广县共去勤奉队员 660 人。五月中旬的一天，队员们集结在县公署门前，出发时千余人送行。父送子、妻送郎难舍难分，人们尾送到安广火车站，眼看亲人被装进闷罐车厢，火车一开动车上下一片哭声。到富拉尔基站下车后，队员们步行 100 多华里，到达甘南县查哈阳农场劳动工地。这里地处于阿伦河两岸，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原野。开发查哈阳农场是根据 1943 年 9 月日本政府提出建立日满共同粮食自给体制，通过内阁会议作出《满洲国紧急造田事业之件》，在吉林省开发前郭灌区，在黑龙江省开发查哈阳农场，在奈曼旗开垦大沁塔拉草原。垦荒造

田以保障日本人前、后方都有大米供给。我们县勤奉队的任务，是去修稻田的水渠，工程还没有什么危险，但生活太艰苦，在工地上真是度日如年。

勤奉队员的苦难

去甘南县勤奉劳动140多天，虽然没死人，但队员们在日本人的残酷辖制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就拿衣、食、住和完成劳动任务来说——

衣：每人发给一套黄粗布的勤奉服，一套灰色更生布的衬衣。个人去时穿的衣服全部收缴上去，以防队员着便衣潜逃。就连这两套衣服也是白天发给穿，夜间脱下来收归小队集中保管，队员们赤条条地睡在工棚子里。队员们整天汗流夹背的劳动，没有洗澡、洗换衣服的时间。衬衣生虱子，外衣汗水浸渗，气味熏人。没有袜子，打着赤脚，穿的是张嘴掉底的鞋，简直不如乞丐。

食：一天三顿饭都是苞米碴子，菜里见不到半点油星。司令部安排中队长以上另开中灶，伙食比较好些。队员们天天喝大锅粥都吃不饱，饿着肚子干活。由于伙食太差、劳动量又大，队员们健康情况日趋恶化，每天病号不下20多人。在工地上得不到及时治疗，不等病好就催着出工，实在干不动，还挨骂是偷懒、"磨洋工"。日本人发现了鞭打脚踢，骂他"良心坏坏的"。

住：队员们住在野外临时搭起的草棚子里，睡在草铺上。一个棚子住一个小队，共90人，对头铺，挤得人都翻

不过身来。下雨天棚子漏雨，里边见不到阳光，摸什么都是湿漉漉的。工棚的两头各有一个出口，夜间两门一堵，设一名小队副放哨巡逻，防范队员夜间逃跑。棚子里放有马桶（便器），大小便不许出棚，棚内外空气不流通，尿臊气、臭屁味熏人欲呕。加上离乡曲、惊魂梦使人彻夜难眠，人人盼望勤奉期满早日回家团聚，不受这个“洋罪”。

劳动：主要是修稻田水渠。日本司令官对工程质量、工程进度、劳动纪律要求非常严格。各县大队长逐级向下传达，勤奉队员必须如期保质保量完成任务。队员们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劳动前后是训练，出工集合要快、静、齐，听小队长口令。收工时要收拾工具成队加工营（工棚）不得散漫掉队。每天不能出工劳动，在棚子里学唱日满国歌，听讲“建国精神”、背诵“国民训”和“时局诏书”一类东西。其目的是不让队员有片刻休息时间，劳其体力并征服其神志，去作侵略者的驯服工具。

尽管严紧，而队员不堪其苦，总想方逃出罯网。仅在到达工地的第一个月时间，就有十几名队员跑掉。逃跑的队员如果抓回来，这顿痛打也挨不起。第一中队队员阚占清借请假办事的机会逃回家，被县动员股追回到工地，中队长将他打得皮开肉绽，瘫倒在铺上，养伤一个多月才能出工。

慎蹈覆辙全员班师

这次出勤奉没死一个人，全员返乡。主要原因是：一

是伪县长刘布林接受1943年去乌奴尔勤奉队中死亡率达百分之五的血的教训，为保住乌纱、息愤于民，想挽回影响，从带队的人选到队员们的生活安排，都比以前周到些。在甘南出勤奉期间，姚金诚随县长曾带着副食品、香烟去工地慰问，队长们看到家乡来人倍感亲切，似乎得到些慰籍。刘县长又对打骂队员的行径作了告诫，中、小队长的虎威由之有所刹减；二是大队长卢恒是读书人胆小怕事。临出勤前刘县长亲口许愿："这次带队一个人不死，给你记功，铨衡为荐任官。"竣工回县果然兑现，由安广县教育股长（荐任官）调任到肇东县任动员科长（荐任官三等）；三是带我们这些中、小队长也怀揣着一幅升官图，带队千万别出事故，企望能从现职事务员补晋升为事务员，攀高一级。如果任性胡来打死人，恐怕丢了饭碗，毁了自家。

片段回忆仅供读者了解伪满勤奉队的概况。

我当劳工的六个月

胡宝良口述　胡国忠记录整理

伪满时，我虽然只是当了六个月的劳工，但当劳工受罪的滋味我是尝够了。

“九·一八”事变，我们东北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从那时候起，我们就成了日本人的亡国奴。日本人为了加强在东北的统治，他们掠夺财物，要国兵、抓劳工、要勤劳奉仕队……，弄得人们不得安宁。我就是一九三九年（康德六年）农历五月被抓去当劳工中的一个。

在日本统治的那年月，抛家舍业去当劳工，明知道命在日本人手里攥着，可我们赤手空拳，不去又有什么法子呢？当时，我家有五口人：有年过六十的父亲，身体多病的母亲，一个十多岁的兄弟，还有一个父死母改嫁的四岁小侄女。我们这个家，我算是个壮劳力。那年我二十岁，怕征国兵、抓劳工，隐瞒了两岁，瞒两岁也没顶用，他要你去你就得去，终于当上了劳工。

我们这期劳工是在本县修飞机场，我们没干上几天活就变了。一天傍晚，收工刚回来，一个日本人找我，叫我马上收拾行李，说是要转移。问他上哪里去，他也不告诉。

我一想，坏了，这次不知给派到哪去，怕是有去无回。我要求回家看看，他们不让。晚上九点多钟，天大黑了，日本人把挑出来的人赶到火车站，黑灯瞎火地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只是听说装了两闷罐。在火车上，劳工们都犯了愁，谁也没心思唠嗑，有的打咳声，有的哭泣。到了第二天晌午，每个人发给两个黑馒头，算是充饥了。火车继续往前走，谁知道往哪个方向开。天又黑了，日本人叫我们下车。外面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们背着行李一个跟一个地下了火车，往西南走了大约二三里地就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阿尔山林区。说我们的劳动任务是往林区里头修公路。当夜我们就露宿在树林里。

第二天，在日本人的监督下，用炕席搭起了临时工棚，每个棚子住十几个人，没有床，大家就弄些草来铺上，把行李放在上面，这就是睡铺。大森林里，阴雨天多，地下潮湿，不少人得了疥疮。白天太阳晒，晚上蚊子咬，蚂蚁、跳蚤更不用说了，要不是困急了，是睡不着的。白天干活，天黑才回来，顾不上收拾，工棚里边弄得脏不可闻。

劳工们吃的更差，早晨是小米粥，还不满一中碗，沙子很多，简直不敢嚼。可喜的是给点咸菜条，大家还挺满意。中午每人两个橡子面的窝窝头，一个有二两左右，有一碗空汤。橡子面涩得很，干咽也咽不进去，不是有汤很难进去。晚上吃的是土豆汤，里边撒包米面，每人一大碗。干那么重活，吃得这么少！年青人消化快，一天总觉得饿。晚上睡觉还不觉得怎么的，劳累一天躺下就着。白天干活，一点劲儿都没有，直冒虚汗，饥肠刮肚的，实在难熬。劳

工作平时唠得最多的一个是想家，一个是想办法能吃顿饱饭。有时候连做梦都吃着香甜甜的苞米面大饼子，一高兴醒了原来是个梦，很失望，肚子里还是空空的。白面、大米那是不敢想的，自然也不会做那样的梦了。

劳工的活计是非常累的。早上三点多钟就吹号起床，搁下碗筷就出工，我们的活主要是放树、运树、打石头、铺路、平地、洒油漆等。这条油漆路往树林深处修得很远很远，听说一直修到日本驻扎的山洞子。因为我们离日本军的山洞子很远，还不知道详情。我们听说，给日本军修山洞的劳工，修完了就把劳工全部杀掉，不杀怕你出去泄露出洞子的秘密。为此，我们还感动挺幸运。我们的劳动量挺大，分工分段定出任务，不吃饭不睡觉也得完成。劳工干活由日本人的工头和劳工小队长监工。日本人的大柜穿着白衣服，每天下段检查二次，他对劳工非常苛度，看哪个劳工不顺眼非打即骂。有一次，我的铁锹头掉了，偏赶上大柜看见了，他说我磨洋工，上来就用劈柴拌子给我两下，打得我疼痛难忍，还不准我叫唤，真是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申。干活中间是没休息的，一直到吹号收工为止。

劳工的卫生就不用提了。尽管他们每月用大笼屉把劳工的衣服蒸一次，说是叫消毒，但十几个人挤在一个棚子里，夏天闷热，透不过气，又没有衣服换，有时还浑身打浑身，人们都生了虱子。加上活累，吃不饱，传染病流行，所以经常有人得病，大多数得病都是起羊毛疔、攻心翻、上吐下泻之类的。那时候，我们这些劳工有谁去过洋人医院呢？有病就得用土方治疗。得上病就挺重、挺急。日本人

每天都查铺，他们绝不允许劳工趴铺，发现有病趴铺的，不由分说就给拽走，见病轻点的还能为他们卖力的，就给打几针，吃点药，关在隔离所里，稍微见点好就撵你下段劳动；见病重点的就给打定血针，填一份劳工死亡单，把死人拽到山沟里用火一炼了之。我们去的那些劳工差不多三天两头就有死的。我们这些人每天都是在死亡线上挣扎。

有一次，我也得了病，烧得很厉害，眼冒金花，全身象散架子似的，连骨头节都疼，实在起不来了。我想，这回可完了，再也回不去家了，这条命算交待到这儿了。和我在一个铺住的老乡郭宝春和高秉关看我得病都非常着急，怕我趴铺落到鬼子手里。早上的饭他们给我打回来，出工时又扶着我裹在出工的劳工中间，偷偷地把我放在地段旁边的树林里藏起来。段上的任务他们大伙替我完成，晚上收工又把我扶回来。第二天傍晚，郭宝春偷偷地跑到离铺十来里地的"宝局会"买了点酒，找了点辣椒。高秉关找来一个姓杨的劳工，他也是镇东县去的。他把我前后心用针挑了，用酒和辣椒水把我浑身都搓了一遍，给盖上被子叫我发汗，第二天我就觉得好多了，硬挺着去段里干活了。我当时想，如果没有那些老乡们的帮助，恐怕早就没命了。

劳工的命在日本人手里攥着呢。有时候，他们从一个地方来的劳工中调走几个，调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调到这些人都互不相识的地方，让你举目无亲，互不了解。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连个往家里捎信的人都没有。他们这样做也是有目的，是等完工以后，为了工程保密，灭绝人

性地把为他们出力的劳工统统处死埋掉。

尽管日本人采取种种措施，劳工睡觉时有站岗的，劳工干活时有监工的，但也有的劳工受不了那个罪，私自逃跑了。一旦被抓回来就遭殃了，当着劳工的面打个半死，杀鸡给猴看，让劳工们吸取“教训”，谁要再跑就这么对待。

我们去的阿尔山，在树林深处也有抗日游击队在活动，经常向日本人打冷枪。他们打完就走，出没无常，日本人虽然戒备森严，但也是提心吊胆。

当时说出劳工也挣钱，每个月给伪洲国那时候的钱六十元。可是到冬底，我们吃了六个月的苦，遭了六个月的罪，却分文没得着，不知是日本人骗我们，还是叫那些工头们给贪污了。

当劳工那年我才刚刚二十岁，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有些事已经忘却了。但当劳工受苦受罪的滋味，当亡国奴挨打受骂的滋味，我永远不能忘记。

回忆我在镇东日本飞机场做工的情景

柳世荣口述　　张焕东整理

我自幼家贫，学了木匠，靠做木工养活寡母和弟弟、妹妹。那年月，活难找，饭难吃。1938 年（伪满康德五年），我被迫给一个当地工头招去修飞机场。一干就是好几年，累没少挨，苦没少受，其间我耳闻目睹了不少事，回忆起来就好像还在眼前。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所谓柳条沟事件，一举侵占了我整个东北，继而日军突破长城线，占领北平、天津等地。日本帝国义义侵略的胃口越来越大，1937 年 7 月 7 日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向中国全面进攻。日军相继攻陷大同、保定、石家庄、包头、太原、杭州、济南，向上海发动总攻击，在南京实行大屠杀。1938 年 1 月 14 日，日本临时阁议，决定实施御前会议决定侵略中国的强硬方针，接着日本三路围攻徐州，在台儿庄展开激战。随之徐州、开封、厦门、九江、武汉三镇失陷。中国半壁绵绣江山沧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

此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发表声明（即第三次近卫声

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伸出诱降之手，提出“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日本帝国义妄想以“东亚新秩序”为诱耳，挑起中国内战，渔翁得利；另一方面加紧扩充军备，为实现他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目的，以我东北为基地，加紧了军事建设。他们在东北掠夺物资，强征民夫，修建飞机场。镇东日本飞机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修建的。镇东日本飞机场位于平齐铁路和长白铁路交叉重要枢纽白城子的左翼。这个飞机场既可保这段铁路的安全运输，又可抗御苏联的进袭，作用之大，不言而喻。

镇东日本飞机场是于1938年（伪满康德五年）开始修建的。经过五年多的时间，于1943年（伪满康德十年）竣工。这个飞机场南临火车站，铺设了专用铁路线，北至前六家子（现在建平乡政府所在地），东至六合屯，西至羊营子。占地面积约为一千六百万平方米。

飞机场主要跑道为西南——东北方向，长为一千二百余米，宽为一百余米，碎石、沥青路面。飞机场的东侧有一座三层大楼，是这个空军大队部，还有机修、油库等很多建筑。大楼东侧还修建了十几个大型的飞机库，都是钢筋水泥结构，上有天窗，亮亮堂堂。指挥塔高耸入云，日夜都有灯光在闪烁着，象监视天空的眼睛。飞机场的四周修有几十个岗哨暗堡，每个暗堡都用钢筋水泥筑成，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土，长着很高的草。暗堡里可容纳十几个人。岗哨在这里日夜值班，机关枪口冲外支着。这是镇

东日本飞机场外部能够看到的情况，里边是啥样，我们这样的人是无法知道的。下面说说修建时的情况。

镇东日本飞机场的规模甚大。当时，日本人从长春、锦州、齐齐哈尔调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镇东、白城等地征集民工三千多人。

飞机场工程是由白城子来的日本人服部藤次郎承包的。在工地设有经理部。经理部下设两个组：一个是鹿岛组，一个是池崎组。鹿岛、池崎都是日本人。那时候人们都叫他们柜头。组是以柜头姓氏命名的，各组又分为若干个小组。

飞机场整个工程都是由经理部指挥。经理部先后有日本人十余名，多数是从长春调来的。经理部负责的先是日本人稻本，后是日本人石见。其他日本人有白石、吉古大山、未久、浅田、九德、小伏天，后来的万艾、石合、加藤、黑板、田太会一，还有个朝鲜人钱凤好。

经理部还雇用了几个中国工人，看门的柴洪安，烧浴池的陆希宝，厨师魏金山、王兴刚等人。他们还在飞机的东南角开了个小卖店，销售烟、酒、糖、茶、饼干以及日用品。经理部还在城内设一处专用豆腐坊，由日本人田太会一负责，每天往飞机场送一次豆腐。

经理部办公室设在施工的飞机场的东边，是临时用木板钉成的。日本人上下班全都是汽车接送。经理部人员当时都住在火车站东侧的日本人住宅，当时有四、五栋房舍。经理部有二十五、六台汽车，汽车司机和跟汽车的都是日本人。随汽车做工的有二十五、六个中国苦力工。

鹿岛组主要任务是建筑楼和飞机库。技术活多数是日本人，也有少数中国人，都是由锦州调来的。鹿岛组柜头是日本人鹿岛。二柜是日本人守田，也称守田事务所。鹿岛组由经理部包下活来，再包给守田事务所。守田再把活包给苦力头，大苦力头再包给小苦力头。就这样层层包，层层扒皮，吃亏的是苦力。

鹿岛组的日本人还有监工头雪野、柳频、山下、森林。大柜鹿岛的中国翻译是郭长海。二柜守田的中国翻译是姜云禄、吕贵林。吕贵林管事较多，他在办公室任差，除了守田就是吕贵林说了算。吕是由白城子机务段辞职到守田事务所就职的。他的职务每天统计工数报给大柜鹿岛，到大柜领取物资发给各工头，管理仓库。守田用日本话布置任务时吕给当翻译。

鹿岛组大体分三个部分，内分为瓦工、力工、木工、共有苦力二千四、五百人。

池崎组的主要任务是平整场地，修马路和飞机跑道。这个组的日本人和中国人的苦力头都是从齐齐哈尔调来的。池崎组柜头是日本人池崎冲次郎，二柜是日本人大佐（外号欧斯嘎斯）。这个组没有事务所，直接领导中国的苦力头。其他日本人也各持一摊，监工成田管轱辘马子，纪三管超平机平场地，小林管修路还管一机器打碎石，目古、宏马昌、金泽等人管现场、看民夫，内田管仓库，给民夫发吃的穿的等东西，后来是山田管了。总会计广来，他在齐齐哈尔龙江饭店住，到开支时来，开完支就回齐齐哈尔。固本管垫马路的，黑下管跑道儿的。日本翻译板田（女），中

国翻译是邱振山。

池崎组有苦力头十几人，各领着三十人到百人民夫不等，但这个组总的不超过五百人。该组于 1942 年把洋灰马路修完后，全部转到南边修飞机场。

日本关东军九三二部队，后改为九五六部队，是于 1941 年（伪满康德八年）驻防的。关东军来了后，由伪镇东县警务科命令飞机场周围各屯农户听令：飞机场是军事要地，无论何人不准超越界线，如超越以坏人论处，打死勿论。并在飞机场周围划定了区域范围，设立了禁止交通的牌子。除关东军经理部发给证明外，任何人都不准进入飞机场。到了夜间更是戒备森严。在飞机场周围一里左右设有日本关东军岗哨。老百姓都非常注意，不敢接近。镇东城北百姓上街赶集都不敢从飞机场附近路过，而是绕出很远。铁路客车通过镇东车站时，放下窗帘，不许旅客看飞机场。飞机场的设施和装备是绝对保密的，就是伪镇东县各机关都很少同其有来往。只有日本人稻津副县长常去关东军部队的航空军事基地。

回想我们修飞机场时受的苦可太多了。出入飞机场排队，还得受日本鬼子搜身，进去怕带火柴，出来怕苦力偷东西。民夫吃的是橡子面窝窝头，喝的是白菜汤，有时给少许玉米面，算是改善生活。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有的病倒在施工地上，死人的事情是常有的。日本人为了加快施工进度就加班加点，稍有怠慢就遭毒打。当时有个外号叫大胡子的，见哪个民夫不顺眼，非打即骂。民夫当面都怕他，背地都骂他。有一次因为一点儿小事把一个赶车

的老板让他给打得死去活来，总算留下了一条命，民夫们敢怒而不敢言。

镇东日本飞机场于1943年（伪满康德十年）按期建成后，日本人稻津副县长就叫镇东百姓捐款，叫作“飞机献纳”。并组织职员和街里的商民到飞机场参观百姓献纳的镇东号飞机。他们叫小学生有组织地去飞机场薅草，为其出力。至此，镇东日本飞机场的飞机不断增加，就象无数秃鹫一样在镇东县人民头顶盘旋、飞行，恐怖的气氛越来越浓。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奋起抗日，战争狂的美梦破灭了，日本人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彻底破产了。1945年5月，苏联攻克柏林，希特勒德国无条件投降。8月，苏联对日宣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击溃了日本陆军主力关东军，促成了日寇的投降。8月9日，毛泽东同志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大反攻。朱德总司令发布进军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及东北抗日联军对日寇进行总反攻。8月15日，日本天皇颁发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驻镇东飞机场的日本关军受命将飞机场全部炸毁。他们爆破了油库、办公楼、飞机窝……，燃起了熊熊大火，一烧就是七、八天。昔日中国人用血泪修成的飞机场变成了一片废墟。盘踞在我东北十四年的日本鬼子又在镇东大地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勤劳奉仕”亲历记

黎福才口述　李太生记录

伪满康德十二年（1945年）征国兵，我高度近视，当国兵不合格，便成“国兵漏”。伪政府规定，当不上国兵的，不仅在三年内要用一半时间参加军事训练，每年还要有四个月“勤劳奉仕”。所谓“勤劳奉仕”就是变相劳工，非常苦累。有钱人家可以花二三百元挖弄一个小头头，不干活；我家穷，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只得挺着去出苦力了。

旧历二月十七，白城县太平庄村公所国兵民籍系的王云杰通知铁岭王甲，要甲内三十来个“国兵漏”明天到县里集中，去“勤劳奉仕”。我母亲听到消息后，连夜为我打点行装，借盘缠，还用玉米面和高粮米制成炒面30多斤。

第二天上午，有人领着我们到街内的聂家店集中。点名后，每人发一套黄亚麻布制成的单衣，一顶战斗帽，一副黄裹腿，一条白毛巾，一副线手套，还有一双水袜子（胶鞋）。当换好衣服，宣布各小队和各班的头头后，就不准随便到街内溜达了。从此，我们就像抓来的劳工一样，被看管起来。

在聂家店集中有一百二十多人，说是去平阳修水田的

先遣队。住了一宿，乘上了去齐齐哈尔方向的火车，在拉哈下车后，到平阳还有30多里，需渡船过嫩江，坐一段小火车。虽然临近清明，可江还没开，江边有沿凌水，风又刮得很大，只得在拉哈住了下来。

都是青年人，好动，晚上烦闷无事，便鼓动小队长领大家去戏园子看戏。因为有几人没买票，和把门的吵吵起来，出来几个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没进去的全挡在外面，并把已经进去的全都清了出来，立即关上了大门，说我们寻衅滋扰，不给退票，大家都很气愤。

第二天，白城子去的人正在街内溜达，还赶上防空演习。都是农村来的，也不懂得联空，行动迟缓，便遭到警察的辱骂。有两个国兵漏子不服，争辩一下，便上来一帮警察，拳打脚踢，并把附近的五六个国兵漏子也给抓进警察署。大家听说我们的人被抓，全奔向警察署去评理，有的人还顺手把摊床上的扁担、镐把操在手里，把警察署给包围起来。警察署的头子一看这阵势，又经我们交涉，才不得不把抓去的人给放了出来。

五六天过后，江开了，渡江船通了，我们才离开拉哈，到了平阳镇。

平阳镇西北十多里是查哈阳，东南十多里路就是东阳镇。这一带土地肥沃，原有不少住户，开垦出大片大片土地。自从划为日本的“开拓地”之后，这里的农户被迫迁走了，迁入的全是日本人和朝鲜人。在大片的田地上，全是清一色的稻田。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把这里建成他们的粮仓，几年来已投入了大量财力和人力。用火犁（拖拉机）翻

过的土地一眼望不到边，而那里开拓团的人少，种不过来，才调大批国兵漏去“勤劳奉仕”，以支持大东亚的“圣战”。

我们“勤劳奉仕”的地点，是在平阳镇西南六七里的地方。从黄河沟水闸（查哈阳附近）引过来的嫩江水通过主渠道流向这里。渠道西侧就是头一年翻过的土地，并有一条条已修好的支渠。渠道东侧就是“勤劳奉仕”人员的居住区，那里有头年修水渠搭好的窝棚。这些窝棚是用大竹竿绑成，东西六七丈长，南北一丈四五，上面苫上茅草，东西两头，用茅草扎成的门，也没有门帘子。窝棚内，有一条狭窄的过道，两边就是堆放一些茅草的睡铺。为使铺下的茅草不外露，过道的两边都垒一行土楞子。这样不仅能压住茅草，而且还成了睡觉时的枕头。“勤劳奉仕队”的锅灶搭在外面壕方子的一角，上面既没有遮雨布，四周也没挡风墙。常常是刮风添“佐料”（泥沙），下雨给加“汤”(雨水)。饮用水就是水渠里的水，不消毒，很不卫生。由于一个小队60人只有两个锅灶，一菜一饭，没有时间烧开水，渴了就只好到水渠去喝生水了。如要洗脸、洗手，则全是凉水。夏天还可以，我们去时天气特别冷，手伸到水里拔凉，许多人就不洗脸了。而大队部和中队部不是窝棚，是用草垡子砌的房墙，上面有檩子，下面的柱脚，锅灶都搭在屋里，有土炕，有门窗，且专有人为他们做饭做菜烧开水。大队部有五六个人，房子有三间，粮食、豆油等都放在那里，定时按中队往下发放，中队再发给小队。

先遣队的任务是为大队人马到来修整好窝棚、搭好炉灶，搬运粮食，而前六七天里是整烧柴。我们是来这里修

水田的，带的无非是锹、土篮和扁担一类工具。虽然附近柴草多，没办法，只好用锹剁、手薅了。规定一人一天要整十几捆茅草，完不成就要挨打挨骂，所以不到两天，人们的手就全搂出了血泡。

我们刚去时，每天虽是三顿饭，但早午两顿却是一中碗粘米粥，还有一小勺土豆酱。晚间饭量更少，是一碗比米汤稍稠点的稀粥，加上两根咸菜条。所谓土豆酱，既没有酱，也不放油，只是把土豆煮熟捣烂，里面拌些盐。我在头两个月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从家中带来的炒面，后来炒面吃光了，为了填充肚子，就只好多要咸菜，好多喝水。向厨师要咸菜时得附近没有中队长或小队长等人，我因为眼神不好，正在要咸菜时，被他们听见，挨打两三次，他们说我“思想不良。”

晚上睡在这地窝棚内，薄薄的被子挡不住寒风的侵袭，身上的衣服一件也不敢脱。开化后，白天还觉得很暖和，可到了晚间，躺在睡铺上是又潮又凉，身上的衣服也是湿漉漉的。可跳蚤、虱子却逐渐多了起来，叮咬后身上奇痒，闹得你一宿睡不上一个好觉。窝棚内晚间挂着一盏保险灯(带玻璃罩的煤油灯)，每个窝棚两头还各有一个打更的。谁晚上出去大小便，都必须事先报告，应准之后，才可出去。棚内的几十人是一个连环保，一个跑了，大家要受牵连，晚间跑了人，打更的要受责。所以轮到谁打更时，在就寝前都细心清点人数，夜间打更时，小心看住窝棚内的每一个人。

一个月以后，大队的人全到了。我记得有白城、扶余、泰来、大赉、安广、洮南、开通、瞻榆、镇东、林甸等十

三个县的人，还有延边那边的朝鲜族人。一个县一个大队，都是近千人。工地上的窝棚是十丈远一个，水渠东侧遍地布满了茅草窝棚。白城县去东阳的有八百多人（有一百多人留在平台和大青山修飞机场），大队长是当过伪警察大队长的郭振东。这个人对国兵漏子非常恨，他不亲自动手，经常命令中小队长打人。还有一个大队副和一个日本人。下分两个中队，一中队长姬化周，二中队长王恩普，他俩都是青年训练所的。中队也有中队副，他们一方面管干活，一面管军事训练。每个中队下分六个小队。每小队六十人，住一个地窝棚。每十人划为一个班，互相之间都建立连环保。中队和大队的人都是委派的，他们不干活，经常在下面了解劳动情况，监督军事训练。小队长，甚至班长也都是花钱挖弄来的，干活也不多。

勤劳奉仕的队员们早晨天刚亮，号一响就得起床，没容你洗把脸，哨声一响就得跑步集合。事前纽扣要扣好，风纪钩也得挂上，否则就被打嘴巴。特别是裹腿，要打“满协和式”的，即从下缠几道之后，要扭一个劲，缠过一圈后，再扭一个劲，这就叫“日满协和”。我们去的这些人多数是文盲半文盲，读书很少，哪知裹腿上还有这些讲究，事先也没人教给，自从挨打之后，我才学会的。所谓军事训练，就是练列队，左右转，一路变二路，二路变四路，天天如此，弄得人们像惊鸟似的提心吊胆，就怕挨揍。吃过晚饭后，还得训练，直到七点半。我们特别害怕进行单独训练，如练正步走，口令没喊到下个动作，只得单腿站着，一点也不敢动，稍一点动作，便挨揍。

一天三顿饭都回窝棚里吃。每个人有两个碗，要放在自己铺位前。这种碗比一般大碗还大，很厚，上面还印有“勤劳奉仕”字样，我们都管佗叫“奉仕碗”。打饭时不许说话，给你打多少就是多少，不许争要。打完饭菜后，也不准吃。这时有头头领着面向东方，向日本天皇默祷一二分钟，祈祷天皇长寿，感谢天皇所建的“王道乐土”。直到头头喊“默祷毕”，才可以拿起饭碗吃饭。好容易盼到端午节，我们中队杀了两口猪，还做了白面馒头，大家乐得不得了。等到吃饭时一看，盛在碗里只是几块肥肉，一碗稀汤。端午节过后，依然是咸菜和粥。

开始是修小水渠，高二尺，宽三尺多，后来就修水田的池梗子。池梗都是纵横相对，边修边放水边播稻种。这里地势平坦，火犁翻过之后，一条一条的草垡子，都是腐殖土，很暄，地也不耙。由开拓团的人撒稻种，直接撒在翻过来的草垡子上。之后就放水，水漫过来前，要把池梗子垒好、踏实，哪地方渗水，就要及时用土补修好。每半天下达一次任务，如果谁那段池梗子修的不牢，渗出了水，谁就会挨揍。伪满时讲“阶级服从”，还讲打“协和嘴巴”。是个头就说了算，一级管一级，不得违抗。所谓打“协和嘴巴”，就是做“错事”的两个人相对站立，你打我一个嘴巴，我打你一个嘴巴，谁打轻了队长就给你做示范，狠狠打你几个嘴巴，叫你这样用力打对方。如果一个人“做错事”，队长让谁去打，谁就得打，不用力，队长也会给你做示范。

按当时活计讲，一天干活十来个小时，还有军事训练，吃的还不足，就够劳累的了。而头头们还说我们“磨洋

工”（出工不出力），找各种借口打我们，骂我们。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

勤劳奉仕倒透霉，

饭不够吃咸菜堆（堆读成 Duī），

肚子饿了喝凉水，

穿着破裤子露大腿。

几个月的勤劳奉仕，把这些小青年饿瘦了，穿的也磨成大窟窿小眼的。艰苦的生活，沉重的劳动，有些人吃不消得了病，他们头头怕传染，就挖了一个地窨子，建立一个隔离室。所谓隔离，没有什么药，也没有医生来看病，到那里就是不干活，可以躺着。因为病号不干活，给的饭就少了，每顿只给二三两，病轻的，饿得实在受不了，还得硬挺着出来干活。有的小青年为了逃避劳动，说是得病了，要进隔离室，中小队长给你检查，看你头热不，拉稀屎是不是痢疾，如果发现没有病，就说你“泡蘑菇”，把人按在地上，用扁担打屁股，直到打得皮开肉绽才罢休。大队里有个日本人，平时不说什么，他专门查病号，像个幽灵似的，他走后不久，准得有病号挨打，大家都说他是个“瘟神”。为了逃避这沉重的劳役，我们那期跑了十多个，怕被抓回来挨打，都不敢回自己的家，而远走高飞，直到光复后才敢露面。在小队里干活，白天黑夜看的特别严，不好跑。逃走的人都是在病号室逃跑的。病号室虽然有连环保，但看的比较松。特别在白天，人们都上水渠西边干活去了，可以借大小便之机隐藏在草甸里，到夜晚再远逃。在哪个病号室跑了人，没有跑的人就遭罪了。头头们挨个把病号

按在地上，狠狠地打屁股，问他们“为什么没有看住?”当有的说，“我没有跑，为什么找我呀?”头头就说，“你为什么不报告? 逃跑的人是你放走的，打你是应该的!”

据说伪康德十一年（1944 年）去勤劳奉仕比我们这期更艰苦。那一期是去乌奴耳（海拉尔附近)，他们一边伐树，一边修道，构筑“满洲国”的西北防线。在那里监督的日本人也多，还有武装士兵。勤劳奉仕队员们经常挨打，在重压下，只得乖乖地出力干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全线失败，一些身强力壮的日本军政人员都上前线打仗去了，到我们这一期在大队部只有一个前边已经提过的年老体弱的日本人了。在春耕播种当时，他经常在大队部，还接待满洲拓殖株式会社的日本人和当地县公署来的官员。播完种之后，这个日本人就不经常露面了。我们的劳动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夏天的日子也不好熬，周围都是稻田地，没有什么蔬菜，连野菜也很难采到，光吃咸菜怎能行。由于各小队长的反映，中队长姬化周同意每个小队抽出两三个人，到开拓团那里做零工，给人家铲地，一天能换回萝卜黄瓜等一类青菜，我们就着盐水吃，觉得日子好多了。不久人家铲完地，也不用人了，我们就又过起了粥饭加咸菜的苦日子。

白城子去的七八百人，除逃跑的以外，还没有一个死亡的，这是我们的幸运。有个得梦遗的马德生在病号室躺了两个月，回来时，大家轮流抬着他，也平安回到了太平庄他的家。不像外县这次“勤劳奉仕”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故。

我们住的窝棚是竹竿和茅草搭成的，极易失火。林甸县死伤二十余人，就是窝棚失火造成的。在阴历四月间，林甸县一个窝棚两个打更的在过半夜时睡着了，不知是谁在睡眠中用脚踹动了搭窝棚的竹竿，使保险灯晃动，引起了大火。火着起之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浓烟和热浪熏烤着每一个人。靠近两边草门的被烤醒之后，就跑出去了；中间睡觉的等惊醒后，也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胡乱的撞起来，结果被烧死十多个人。受伤的拉到当地县医院进行治疗，烧死的就地火化。虽给死者家属几个钱，可不久光复了，这些钱也就成一堆废纸了。继林甸县一窝棚失火后，扶余县也有一个窝棚失了火。扶余那窝棚失火是在白天，人都去干活了，烧着的只是被褥和棉衣一类东西。从此打更时间也有了变动，原来都是一班顶一宿，自从失火之后，也就改为二小时一换，轮流值班，并且也加强了巡查，严禁打更人睡觉，一些人想在夜间逃跑就更加困难了。

在端午节之后，播种期已过，修整水田的劳动就比较轻了。中队部的人便趁巡查之机到各窝棚设起了牌九局。去的这些人谁腰里都揣十元二十元的，他们便千方百计撺弄你去押赌，这些人推牌九、掷骰子会作鬼，哪门押的多哪门输，一个来月时间，他们腰中就赢千把百元了。后有人告发到大队部，大队长郭振东听后，把参加赌博的都叫人按在地上，用扁担打了屁股，把赢去的那些钱也完全没收，装入了他的腰包。

到了旧历七月初，那里的水渠和配套工程都已完成，放假几天，只等白城县公署的指令，准备撤回。初八那天下

午，我正在洗脚，听一些人议论，有的说“开拓团的日本人朝鲜人为啥走了呢？”还有的说“大队长郭振东等人昨天就不见了。”我急着问他们，谁也说不出道理来。不一会儿，中队长姬化周回来了，他告诉我们“现在事变了，日本鬼子打败仗了，我们明天就可以回家了。”他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他说，现在大火车、小火车都不通了，要想坐火车，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看来我们只得走旱路了。我们是一起来的，回去还要一起回去。为了使大家都能安全到家，还是集体走比较好，出了事，互相之间还能照应。因为时局动乱，一路上人生地不熟，单个走也很危险。我们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

接着他领我们一些人把大队部里存在的白面和豆油全都拿出来，各小队的锅灶都生起了火，烙起了油饼。这些青年人一晚上也没有睡个好觉，说啊，笑啊，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七月初九吃过早饭，人人背起了行李，带上了油饼，为了防御，还拿了木棍和扁担。我们是沿着朱家大坎、塔子城、乌鸦站一路走的，五百多人（端午节过后，回白城子二百多人）还是很长的队伍呢。一路上总是阴天，细雨连绵，道路泥泞，行李越背越沉，到休息时候，行李又不能用，简直成了累赘，只好边走边把被褥里的棉花扔掉。到了朱家大坎，看见日本鬼子撤退时把粮食囤子全点火烧了，散发着焦糊的气味，无不切齿忿恨。还看见国民党军队用飞机沿铁路线撒的宣传品和中国国旗。为了减轻徒步的疲劳，腰中有钱的还集资雇了十几辆马车，大家轮流到车上休息。那个得梦遗、身体很弱的马德生也坐到了车上。

到了景星镇，那十几个赶马车的说，前边经常有土匪出没，再加倍给钱，他们也不干了，我们只得继续步行了。

当我们走出景星镇附近一个屯子时，看见了大队苏联红军正在南进。当与他们相距还有半里路远时，忽然一辆军车停下来，并把机枪瞄向我们头上就是一梭子弹，把我们吓得立即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了。多亏屯中出来的一位老年人，他说："是不是他们把你们当成日本人了？"经他提醒，我们派人跟他们的翻译一说，他们知道我们是被逼做苦役的劳工，才消除了误会。我们便把身上穿的黄制服、黄帽子换下来，并和他们一路向南行进。苏联红军的军车在国道（公路）上面走，我们就在下面走。他们有时还向我们喊"上高，上高"。我们也不明白啥意思，就照葫芦画瓢地向他们喊"上高"。走了一段路程之后，他们向泰来方向继续走，我们则向塔子城方向，就与他们分开了。又当我们走近乌鸦站不到一里时，那屯里的人又向我们开枪，子弹在我们头上飞过，我们只好停下来。听一过路的人说，这是一个蒙古屯，这些蒙古人是最恨日本人的，你们当中不是有不少人还穿着黄衣服吗？他们是否把你们当成日本人了？这时身体渐好的马德生自告奋勇要前去联系。原来马德生是蒙古族，他到屯中用蒙古族话和他们一说，我们才顺利通过了乌鸦站。大家对那几个穿黄制服的小青年好埋怨，从此，谁也不敢再穿那套黄衣服了。

旧历七月十九，我们才走到白城子境内的八家子屯，在大地主老孙家吃的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才各奔前程，各回各的家。

伪满日本开拓团在洮南活动一瞥

王浦泉

日本侵略者强占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一切权力又全操纵在关东军司令部手中，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无孔不入。就连农业生产方面和广阔农村也安插了侵略势力——日本开拓团。

就其组织形式分为在乡军人（不带家属）组成的，另一类是日本农民移民的开拓团（带家属）组成的。

开拓团分散东北三省各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东三省人民的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的庞大机构。以从事农业生产起示范作用为名，行侵略监督中国农民动态为实。各团部都配备轻重武器，设在交通畅通之地的是在乡军人为主体，如：大仙站开拓团。边远交通不便的地区，多数是日本本土来的农民集体移民带家属的开拓团，在我市境内占地较多规模很大的，如四棵树、野马吐、七道岭等。都配备武器定期军事演习，起威慑中国人民的作用。

现以洮南市区最近的一处为例略述如下：

大仙站开拓团，位于城北五公里处。满铁特在此增设一个火车站（即大仙站）团部设在兴建屯（2号桥北）原名

叫田成屯。把整屯农户全部撵走，当时有十几户人家（有田富、田广、田成、田玉华、赵奎、李凤春、王合伟、尹家、康家等）。1942年成立团部时当即宣布占用全屯，限定时间净身出户。这些农户只好扶老携幼、投奔亲友、暂住他乡。当日即造成无处栖身，无有土地耕种，无法生存的绝境。

设开拓团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如意算盘。第一步于1939年实行土地国有化，把东北境内的土地收为国有，将耕田付给一定金额进行收买。凡种地的农民都种国家的耕地付给租料（拿出荷粮）。第二步设开拓团，哪里地好就要哪里，使用土地理直气壮，叫你无话可说。

当年设在大仙站的开拓团就涉及到周围几个屯的土地，共占千余垧地，包括后李家、花喇嘛、侯家窑、于粉房、四棵树、新发屯和田家屯。

团部设在田成屯（新建屯），下设三个点：花喇嘛、新发屯、田家屯。

人员：大仙站开拓团团部有队长（日本人）外设一名队副（中国人，名田英），家有地，他本从国高毕业，会日本话，日本特意选任他，为了迎合中国农民的心里，也是侵略者所需要的理想人物。

此处开拓团的队员是集体在乡军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实行军事化生活，休息时间严格，一百多人分居在三个点上，时而集中训练，其余时间都在各点上分组劳动。

开拓团虽实行科学种田，但由于新设点不会管理，农业收成并不理想。他们想开发水田。用中国的劳工给挖了

稻田沟。东西走向比较窄，南北走向很宽。上口2米，土两边分放，深1米。当时有一名叫王宝祯的监工头（俗称小王队长）替日本开拓团忠实效力。刚一光复就逃之夭夭。当时所挖的稻田沟的痕迹至今仍可辨认清楚。

开拓团实行定食定量，年轻的队员正是发育时期加之参加体力劳动，普遍吃不饱，常常到附近农户家找吃的东西充饥。他们队员发的津贴不多，钱花光了常以物易食物。多数人在日暮黄昏朦朦胧胧之际，则三三两两偷偷地进入当时仅有的几户人家，吃专为他们准备的小零食。比如煎糕、烧饼、油饼……双方都是背人行事，日方不许他们队员与中国人接触；中国人买卖东西又怕有经济犯嫌，所以，不敢摆在明面上叫卖。

大仙开拓团对附近村民骚扰很甚，因土地连片，往往有农田插花，免不了相互接触，中国农民都取避而远之，而牲畜是不知界限的，有时农民的牲畜进入开拓团的地里，除非看不见则已。如看见，不管大小牲畜和家禽，凡进入它们地里没有活着出来的。特别是猪进入他的地里非抓住给杀了吃肉不可。小鸡、小鸭也是同样结局。若是毛驴进入开拓团边境内，他们年青的队员们抓住就轮流骑毛驴取笑，非把毛驴累的走不动才算罢休，再给你推出他的范围之外，不管它的死活。中国农民无人敢动员招惹是非，他们的蛮横行为，越演越烈。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曾在这里出现一桩中国农民痛打鬼子之事。

刘勤住德顺乡新建村。当年他在五家子住。他家的猪

跑到开拓团地里，被他们给打死吃肉了。刘勤知道后就硬着头皮去找开拓团团长，告了他们队员的状，他们几个日本鬼子都受了罚，怀恨在心。团部赔刘勤一头小母猪。他赶回来养了两三个月后，猪逐渐大起来，这头小母猪早已揣崽了。此事却被被受罚的几名日本鬼子知道了。他们几个常来刘家猪圈看猪，并说："猪的孩子的有了。"扬言说："猪孩子他们的要。"

有一次那几个日本鬼子又来刘家看猪，刘家的狗咬日本鬼子，日本鬼子把狗打伤了，刘勤执意要去找团长讲理，他们几个围着刘勤不让动身，刘勤一气之下大打出手，打了其中两名日本鬼子，其余的三人正要一齐下手之际，刘勤看势不妙撒腿就跑，他们亮出"二人夺"就追，刘勤跑得飞快，出屯外钻进高粱地里不见了。他们几个没追上，人抓不到他们不甘心，回屯找屯长要人，后村公所出面，由史助理、姜佰良好言相劝，事态才算平息下来。

刘勤打日本的事一时传为佳话。流传甚广。而刘勤知道闯了祸，便逃避在外不敢回家，一直躲藏到祖国光复才露面。

光复前几天，大仙站开拓团团部存放的武器、弹药 部分物资趁黑夜无人察觉时，拉到远处旷野无人处销毁几次，大仙站开拓团的日本人集体转移，附近的中国人不明真象。只剩下田英副队长维持局面。他并说："太君出去军事演习，几天后还会回来的。"可 1945 年 8 月 11 日晚田副队长用大车往家拉开拓团的物资。第二天仍狐假虎威地不准附近农民进入开拓团队部。这天哈沁套保的农民赶着车去分开拓

团的物资说："洮南电信局都烧了，日本人都跑了，你还虎什么洋气？"农民要打死他，他才溜之大吉。他们把开拓团仓库砸开将物品（拣洋落）分散一空，田英这个汉奸走狗，土改时被斗，偿还了血债，得到了应有的可耻下场。

"八·一五"光复后两天，在这附近刘草房发生日本人凶杀中国人事件。有五名日本散逃军人，过路到老田家找饭吃（他家距屯较远，只此一家）吃完饭他们要更换中国便衣，因田家没有多余的衣服，没答应换。他们便动手抢衣服。田老大和老五不给，便撕打起来（他们五人携带三支大枪、一支手枪、一把战刀）。其中一人开枪将田老大打死在屋里，老五极力想报仇，赤手反抗也被打死，他们五人衣服也不要了一齐逃跑出门。田老二去大仙站报告驻守的苏联红军，当时只有三名红军，跟随田老二向高粱地追去，开枪寻找，当打几梭轮盘枪后，几名日本兵也开枪还击，红军因人少不敢深入高粱地就不追了。

第二天田老二与秦××来洮南报告洮南的苏联红军司令部，申述他家被日本军人打死的事。司令部当即派一辆大卡车，满载着红军来到现场，先与大仙站的红军交换了意见。田老二和高升二人带领红军在大仙站南高粱地寻找，不久在现五孔桥附近发现那几名日本军人正在地里睡觉，红军半包围前来，用轮盘枪打了一阵，当时打死一人（日本兵），一名鬼子逃出不远自己用手榴弹引爆自杀，其余三人缴枪被俘，也算为田家两兄弟报了血仇。

伪满洲国时的洮南“日本街”

葛　藤

伪满时期，洮南康乐街（今光明大街）中心地段有条“日本街”。日本人叫“日本町”，“町”就是汉语“街”的意思，日语读“麻其”。

“日本街”北起今七米店，南至交通局。“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买卖不过八、九家；日本占领后，竟膨胀到三、四十家日本洋行、会社、“料理”、旅馆和妓院等行业。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商人，明商暗探、谍妓并行、乃至“御谍”军妓！从事宫事、经济和文化情报活动。

按洮南“日本街”示意图（附后）标注的主要门面说起。

光明街西侧：

1、满春馆，地址在今七米店，是满、鲜娼馆，故号“满春馆”。洋房一栋，规模不大。

2、伊会园，位置即今市电业局址是建工会社。承包机场、交通等项建筑

3、福仙书屋，今电影放映公司北侧，类似书店和图书馆行业。福仙是“九·一八”前卧底坐探。

4、福永文化会社，与福仙毗邻，文化用品兼营文化娱乐厅。时称“文化沙龙”，实际是游乐场。

5、洮南禁烟馆，即今洮南电影院的位置。是禁烟又卖烟的鸦片烟馆，大量走私鸦片、海洛因等毒品，又是黄、白硬货的走私场。伪满后期变为“国立”合法的矫正院。

6、水板新闻社，地址在今日杂果品公司商店，是“满洲国”大同通讯社洮南分社。“九·一八”前以新闻广播为掩护，刺探洮府军情。伪满时设有日本电台和“满洲”电台（满台设在天恩地局后院），水板任社长兼日系台长；谢起伏（洮南二龙谢家 围子“谢保董”之长子，留日学生，汉奸。“八·一五”逃亡日本）任满系台长。统归“满铁”洮南公所特务恒峰宁次郎秘密指挥。

7、日本派出所，位置在商贸一店。“九·一八”前叫陈棚铺警察分驻所，伪满时改叫广昌路派出所，主管“日本街”治安。因防日本兵闹事增设日警，洮南人叫它“日本派出所”。

8、南满旅馆，地址即今土地局。“九·一八”前是日本“满铁”洮南公所招待驿（站），因洮南站原用南站，故于就近建南满旅馆。是洮南府最大最高级的旅馆，实为日本窑子。日本占领后改为初级“慰安所”（招待日军尉官以下的随军妓院），妓女全是日籍军妓。谍妓植松菊子和植松幸子姐妹就是走红南满旅馆，是东门里“朝日旅馆”的坐探。

9、酒精组合会社专卖行，在南满旅馆南侧。类似现在的糖酒专卖公司，组合会社原址在今农机校院内，统制洮

突酿酒业。实行军事管制，高浓度酒精用于军事、化工；低度的专卖批发。由关东军特务明石义雄主持。“八·一五”光复后，新四军代表赵文忠来洮接收，改为“公集泉酿酒公司”。因南局宅拆毁迁往“豫贞庆酒厂”（今啤酒厂）生产。

10、大林珠航建会社，在今福利院东南角。是伪龙江省省立航建公司，相当今日的三线军工行业。

11、国际公司，即今整个福利院位置。是日本国际贸易信托公司洮南分公司，是关东军的后勤基地。据日本“满洲史”统计披露：“关东军17%的的军需供应是来至洮南国际公司”。日本以一个汽车中队（连）成年累月地抢运洮南蒙边四旗七县畜产、农林和土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八·一五”光复被土匪抢掠一空，1953年为洮南荣校宿舍，1958年在旧址成立白城地区社会福利院。

12、南满汽车公司，今交通局整个大院，民国年间为洮南十家汽车运输行，民营洮突客货。伪满按“逆产”没收改为公司，规模犹如现在洮南汔车运输公司。日本投降撤退时被焚毁。

光明街东侧：

13、高丽房子，在今市政府西侧。是日本开拓团随员住宅，因朝鲜人多，故叫“高丽房子”。

14、乙女洮南，现鞋厂南侧。翻译后就是“二等窑子”。日、朝妓女各半，是日本“低级慰安所”。

15、“御料理”，旧址即今一鞋厂主楼位置。是日本皇家国立高级旅餐馆，所谓“料理，就是有女招待服侍的旅

馆饭店，实际就是日本窑子。“九·一八”改为高级慰安所。“御”日语是皇家、国家的冠头尊称，犹似西方的“圣”字头一样。

洮南“御料理”因有日本皇室“御谍”李香兰（嵯峨英子）的股份，所以起名“御料理”。嵯峨英子是溥杰之妻嵯峨浩的堂妹，同为日本公主。李香兰是溥仪妃李玉琴（玉兰）之谱系。

李香兰是“满映”名星，主演《卖糖姑娘》和《樱花妓》而走红“满洲”（东北）和日本艺苑。日本投降时，因“御谍案”被扣长春。按戴笠秘密指示：“李香兰与金璧辉（川岛芳子）均以“国事犯”密裁”。1946年3月戴笠摔死，宋美龄巡视东北经日本领事说情将李香兰带回南京。后来李出任南京中央研究院《日本侵华史》主编。

16、密丝洮南，是英语“洮南小姐”的意思。全是洮南姑娘，是伪满时建的日军初等慰安所。

17、银玲台球社，与“密丝洮南”毗连，就是今光明商场的位置。日本私人银玲佳玳夫妇开的“夫妻店”，兼营台球游艺社。

18、胜业洋行，即“胜业商行”的前身。前者在今百货大楼，是日营日货；后者在兴隆东街，是开明人士成盛三先生的“袭号”。成老年轻时，曾在胜业洋行当过学徒。解放后，集资办“建业”，该厂即今东方红造纸厂。

19、兴亚影院，是日本浪人恒峰的私产。在二轻商店南侧，解放后以危房拆除（二楼包厢影院）。

恒峰宁次郎，“九·一八”前以《同仇报》记者身份

“卧底”洮南，刺探经济、军事情报。十四年无随眷。长期糜烂“武公馆”，与末夫人梁某、“武小姐”、杜若兰和武淑芳、“兴农”千斤徐洋，以及植松姐妹等日满姑娘数人寻欢作乐。武府几成“恒峰娱乐院”。今追忆几句民间纪实：

玻璃车中三五放荡女，左右膝上各一风流妞；

得意忘形于“日本町”面，招摇过市在萨鸡街头！

每年农历七月十三的盂兰盆盛会狂欢在“双流”河畔；日本年节及侵华“祝捷”提灯晚会拥挤于“日本街”上。此时的兴亚影院，更是靡靡之音通宵达旦。

恒峰这个法西斯分子，不仅是色狼更是虐待狂，曾逼得南满日妓小林珠成疯鬼；害得“女高”校花杜若兰吞金而死。(恒峰与“张大麻子”的三虎子张俊臣争风武府，一说事变后恒峰解回洮南，处决前对质武家，杜女自愧株连而死)。

1945年“九·三”胜利，遣返日本战俘时恒峰被扣留长春，解返回洮。处决于洮南的小北门外，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20、伊贺原组，即今二轻商店的位置。是日本在洮最大的托拉斯集团组合，垄断洮南经济。

21、云水居，电业局营业室对过儿东街角处，是日营食品大酒居，副食带餐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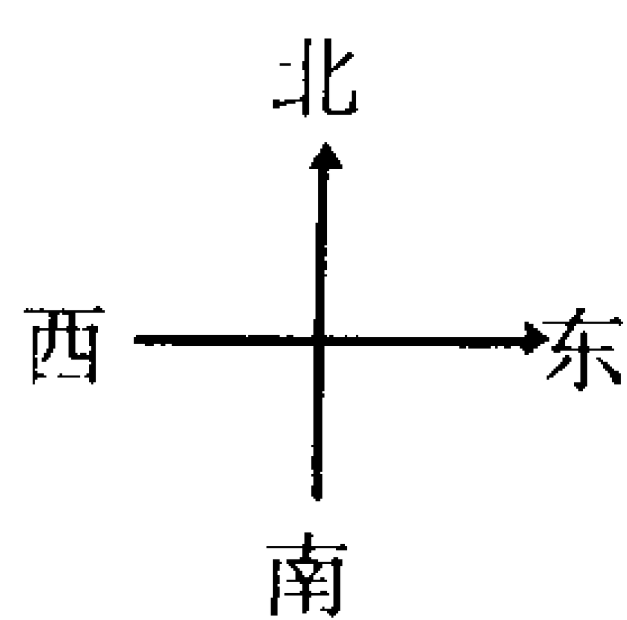
22、中村电料行，在今七米店斜过门儿。日本人中村开的私营电器洋行。

23、庄野百货商店，今七米店对门儿。“庄野”是大商店，经销西南亚土特产与俄人秋林公司的俄国货，有洮南

“小秋林”之称。

这就是伪满洮南“日本街”买卖之一斑。日人如此觊觎洮南，商贾云集“日本街”。目的是窥测“九·一八”事变前后驻洮的两师四旅（29师、32师，奉天游击旅、骑兵15旅、黄显声的20旅、常经武的17旅）及邹作华的兴安屯垦军。也起“策反”作用，只不过是说降了大汉奸张海鹏而已！事变后就另当别论了。

伪满时，“日本街”也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并非自由世界。认为有钱就是大爷的流氓无赖挨“协合嘴巴”，装入大麻袋摔个半死的例子屡见不鲜。“日本街”是日本侵略者的天堂；不是中国人的乐园。



洮南"日本街"示意图

富文西路　光　富文东路

明

清真西路　北　清真东路

满春堂 1　街　23 庄野商店

伊会园 2　22 中村电料行

21 云水居

（

繁荣西路　繁荣东路

福仙书屋 3　康　20 伊贺原组

福水文化社 4

洮南禁烟馆 5　19 兴亚影院

水板新闻社 6　乐

日本派出所 7　19 胜业洋行

广昌西路　街　广昌东路

南满旅馆 8　17 银铃台球社

国际公司 11　16 密丝洮南

酒精专卖行 9　）　15 御料理

大林珠 10　14 乙女洮南

荣福西路　光　荣福东路

（于家园子）　明　13 高丽房子　（民宅）

团结西路　南　团结东路

汽车公司 12　街

（1931 年—1945 年）

伪满白城子见闻

高耀先

石头井子大屠杀的传闻

伪满康德四年7月，我与何永庆到齐齐哈尔地方警察学校高等科第四期上学时，何向我讲述石头井子大屠杀的事。

伪满康德四年3月，蒙古人张白虎向葛根庙的日本喇嘛密报，说洮安县（后白城县）索格营子（今洮南市镇西镇）管内石头井子屯有很多“反满抗日”的“胡匪”，日本军队随即调到石头井子屯恣意抓人。在抓完人之后，有两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到了索格营子警察分所去找分所长。分所长何永庆不知何故就叫两个日本兵用刺刀逼到石头井子屯抓人现场。日本指挥官一见到他就打了几个大嘴巴，斥骂何永庆“八嘎牙路，你的分所长吗？你的老百姓通通马胡子的有，你知道吗？”何说“不知道”。日本人高喝：“你的通通知道！”何说：“真不知道”。这个指挥官又把战刀横在何永庆的脖子上威吓，何仍说：“不知道”。这个日本人又问：“这些人是马胡子不是？”何见了汽车上

被倒手捆绑的几十人，他说不出话来了。日本指挥官教训了何永庆一阵后，指挥汽车走了，何永庆望着远去的汽车，才发觉自己身上冷汗淋漓。后来听说这些被绑去的群众，都叫日本鬼子给杀了。

时隔不久，日本兵又来索格营子管内抓了一些人。这次被抓的人当中有广义泉烧锅的傅俊峰。广义泉烧锅是张海鹏在民国年间建的买卖，烧锅经理人被抓，立即有人马不停蹄地赶到新京（今长春），找伪满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张海鹏听此情况，连夜派来一名日本校级军官到索格营子见到葛根庙里日本喇嘛，并找到抓人的日本指挥军，经他一说，第二次被抓的傅俊峰和其他几人才得到释放。

夜抓土匪，空手而归

伪康德三年8月的一天午后，白城子警察署指导官菊谷鹰重（当时于联权为代理署长）召集全署内外勤警兵30多人开会。会上菊谷扼要地向大家讲，北门外陈铁匠家有几个胡子，准备今晚到街内行抢，陈铁匠已经自首，几个土匪仍在他的家中。今晚趁陈铁匠到街里为土匪买肉买酒的机会，叫他引路，好一网打尽。要大家在警察署待命，为了不走露消息，不要回家也不要外出了。

晚上七八点钟陈某果真来了，菊谷一见，就下令马上出发。到了北门外的一道土墙附近，陈就指点这南边的一个土屋说，土匪就在他家屋内，菊谷遂令警兵越土墙向小屋围拢。这时不知谁突然开了枪，枪声一响，警兵便乱喊

乱叫，顿时枪声大作。陈铁匠急了，大喊“快进屋抓胡匪呀，不然我一家人全完了！”有的警察倚着房墙慢慢移步，有的匍匐前进，等到小屋内一看，只剩陈铁匠的家人了。据他的家人讲，警察未到之前土匪已经走了，因不让他家人出外去看，他们也不知去向。

北门外枪声一响，驻白城子的日本守备队队长便急电讯问警务科首席指导官吉川荣，问为何打枪，吉川说是抓胡子。问抓住几个，吉川指导官答不上了。守备队长把吉川连斥带骂暴训一顿；后来吉川又将菊谷骂个狗血喷头。这件事是陈铁匠邀功而胡弄了菊谷指导官，还是警察们的行动过早地叫土匪发现了，始终也没弄清楚。

警察接到抗联电话，吓得直叫妈

伪康德七年秋冬，东北抗日联军神出鬼没，连克克山、讷河、三肇（肇源、肇东、肇州）等许多地方。抗联的行动，震惊了伪满洲国政府。龙江省警务厅命令各县警察全员出动去围剿抗日联军。白城县警务系统除我和几个实在离不开的警察外都出动了。白城县去的是镇东县的套保和大赉县的英台（现属镇赉县）。

白城子此次去有七八十名日满两系官警，由警务股长武政四郎和司法股长舒恩隆率领。二十多天后，这些人才回来，他们连抗联的影子也没见到。我听翻译白永昌讲，别说打和围呀，连抗联的人都没见着。二十多天时间，整天是跑啊跑，就是追赶不上。今天上边来个令说抗联在东边

一个屯里，等跑到那里，人早走了。明天又来一个令，叫向西边不远的一个屯子追击，等到那里，又晚了，整天疲于奔跑。有一天一个警察往附近的一个警察署挂电话，想知道那个警察署周围情况。一拿起耳机子，问对方接电话人是谁，接电话人说是抗日联军，这个警察吓得“妈呀”一声，手像触电似的，立刻把耳机子扔在了地上。

审讯狗腿子，遭到特务威胁

伪康德五年就实行了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度，以后配给品种逐年增多。到了伪康德八年以后，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都实行配给，给人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因为这些东西总得有人发放，也给一些人造成贪污和掺杂使假的机会。

白城子西南十几里路有一铁岭王屯，甲长李某就从配给人民的物品中贪污了很多东西。如配给的白面、豆油、布匹、煤油等，他贪污不少，被一个穷小伙子告了黑信。此信转到警务科，就叫翻译白永昌给扣下了。这小伙发现黑信不起作用，又戴着破草帽，光着膀子亲自到法院、警务科、白城子警察署、宪兵队一齐投信。这回的上告信投到宪兵队，宪兵队的特高系主任小门晴雄立即把警务科特务股长关根甚太郎找去，讯问此案情况，并亲手把信交给关根。因此案涉及的是经济统制问题，关根把此信又交给经济保安股，股长便命我调查处理。因信中写得很具体，贪污的白布就在染房里，有证有据，我即派人把李甲长传到警务科进行审讯。

我不知李甲长是白城子宪兵分队大特务刘景兰的“朋

友”，在审讯中便有几个同事向我说情。如经济保安股的事务警尉王玉山、佟万廷，警务股的警尉王连生等都是刘景兰的结义弟兄，他们请我下饭馆，提出对李甲长的事要“不了了之”，我不知就里，当时并未说出可否。后来司法股长舒恩隆又向我说情，我只得向他讲，“这是关根股长交给我们股的案件，办理情况总得有个交待，我不敢擅自处理”。舒股长见我这样态度，又有日本人关根股长的话，也就再没说什么。

在审讯李甲长的时候，因他有刘景兰这个后台，又有一些人给他出主意通报消息，所以态度很傲慢，对非法之事是一件不说。特别是将他贪污的大量白布摆在他面前时，他还是抵赖。我气急了，把他打了，才迫使他交待一些贪污问题。

随后刘景兰便当面和人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还在警务科内公开讲，他在某县“一个报告就抓了多少当官的，一个也没活”，谁要和他作对“没个好”。我知道刘景兰的为人，也听到一些他的罪恶行径，我听后很是害怕。

因李甲长的贪污问题人证物证皆有，不容抵赖，经济保安股处理这样案子也不合适，按当时法律条文属侵占罪，应归司法部门处理，便把此案移交司法股，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至于李甲长的案子司法股送没送给检查厅，后来我也没敢打听，不久我就被调到泰来去了。

警察利用案件陷害，促使人犯自杀身亡

伪满康德七年，白城子北八家子有个姓孟的大户，因

虐待妻子，妻子吞食鸦片自杀。此案经警务科司法股审理，是股长舒恩隆亲手处理的。在审讯过程中，舒股长有意从轻处理，风声传到白城子警察署司法系石荆璞耳中。石与舒平素有隙，背地串通白城子警察署司法主任神宫定，在一天夜里审讯孟犯。神宫与石逼问孟犯："在案发后，你给舒恩隆多少钱？"孟犯不说，他俩僦往死里打硬逼孟犯吐口。孟犯被逼性起，猛然跳起，抢到警刀一把，想杀死两这个人，他俩一看不好都乘机跑了。孟犯想到自己已没活路，就用刀对着自己的胸膛穿过而自杀了。孟犯实属虐待罪，不够判处死刑，却在这两个警察威逼口供，妄想陷害他人的情形下自杀了。事后，由警务股股长武政四郎处理，只将石荆璞调转到索格营子分所，日人神宫定和股长舒恩隆均未动。

一人犯法，株连家族

伪康德七年的春节过后不久，东五家户屯有一小铺被抢报案。司法股长田鸿宾率全股人员赶赴现场。由于案发后遗留的线索明显，由当地一个蒙古族人带路，顺着罪犯遗留下来的踪迹，一直追到白城子城北的肖家窝堡屯（现保平乡乘风村）的一个院落。追踪的人发现柴草垛里藏有脏物，田鸿宾立即命警察把这院包围起来，把院内几家所有成年人一齐抓起来，共抓有十多名男女。从口供中得知是孙秃子带的头，孙秃子等几人已逃。孙秃子有前科，在三合屯附近牟家窝堡行抢过。所以，按在逃几个人可能落

脚地进行了通辑，不到两天时间，全部案犯及其家属都被抓到警务科。

在审讯时，警务科内所有人都参加审问人犯（或其家属）。那时审讯都是压杠子、灌凉水，打嘴巴、踢小腿……不说就用刑，什么刑罚都用上了，结果把一个孕妇用凉水给灌死了。这死者并未参与抢劫，事前也不知情，那真是“一人犯法，株连家族”啊！

抓劳工，实行强制劳动

伪康德八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对东北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加紧了统治，特别对人民实行强制劳动。

伪康德九年春的一天晚上，在县长刘鸿谟的指挥下，动员全体警察、县公署及协和会职员，在城内抓一次劳工。凡当晚上街买东西的、看电影听说书的、在饭馆茶馆吃饭喝水的、逛窑子的、在火车站内停留的，都被抓了起来。抓时不容你分辩，一律抓到警察署先看押起来，后来警察署留置场（拘押人犯地方）放不下了，就放在县公署院内看押。

第二天一早，由县公署各科长，警务科各股长等分别讯问、审查被抓来的人。问在何处工作，从什么地方被抓来的，家中几口人，生活状况如何等。凡是铁路的职员都当场释放，怕误了火车的运行。有几个也硬充铁路的人，但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遭到警察的毒打，并被看押起来。在

回答时逐项核对，一个一个过筛子。有门子的使钱可以出来，没门子的一个也不放。

这次抓的人很多，放出去的极少，没放出去的人有一百多，后来听说都用火车运到外地去做劳工去了。以后这样抓人还有几次，都是上边来个电话或一个电报，立即抓人的。从那以后，乡下人不敢随便到街里来，街里人在夜间也不敢随便蹓跶了。

要求补发“配给粮”，险遭镇压

伪康德七年日伪当局公布了重要谷物“促进出荷统制令”，第二年又公布了“经济犯处理手续法”。这期间正是铁杆汉奸刘鸿谟任白城县县长，他积极“促进出荷”，卖力推行经济统制，弄得城乡人民衣不裹体、食不果腹，最后导致了白城县城乡千人请愿事件。我当时在伪警务科经济保安股任职，我见到的是如下情形。

伪康德九年的夏天，早八点多钟，伪白城子警察署经济保安系的警尉陆魁龄用电话告诉我，说有上千人手持米袋在福丰达等几个粮栈叫嚷，恐怕要闹事。经济保安股长北口荣一得此消息，立即报告警务科长稻冈鹿藏。科长即令经济保安股和特务股同去，北口股长命我带两股人员前往现场。当年正修石头块路，街道两旁堆的土很高。我们推自行车赶到现场后，只见人们吵嚷、叫骂，有的推搡大门，有的站在土堆上指手划脚，人们越聚越多，老人、妇女、小孩手拿面袋拥挤在福丰达粮栈的门前，把长长一段

街路都给堵塞了。我叫他们让开一条路，但群众根本不理我们。北口股长听此情形后，立即请示警务科长，叫打开枪库发枪，警察全员出动，弹压这些“反满抗日分子”。我见机提示，“拿着米袋拥挤的人们都是些小孩、妇女，多数面黄肌瘦，是没给发配给粮吧？”北口听后觉得有理，立即到伪县公署实业科找经济股长问明情况，得知两个多月没发给配给粮了，并说“已无粮可发”。北口一听回来又要发枪，我又提醒他说：“前些日子我们参加商务会，会后视查日清粮栈、同兴德、三泰栈等都有小米，几处粮仓有上千石粮米，几天工夫，粮米怎能就没有了呢？”北口想起来了，说：“对的，有粮”。立即叫我给白城子警察署去电话，叫他们通知街内居民，拿户口本、配给证到粮栈买粮；通知各粮栈补发三个月的配给粮；并要警察署维持买粮人的秩序。这样，一场险些流血的事件才没发生。

"张四虎子"投靠日寇仗势欺人的二、三事

刘斐然

旧时代兵即匪，匪即兵。匪患兵灾无穷尽，百姓遭殃不聊生。下面揭露一伙打着兵的旗号，干些匪的勾当的张团长——"张四虎子"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先后落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手中。日本帝国主义想统治中国，靠自己的力量是办不到的，必须扶植一些中华民族的败类，作为他的鹰犬。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张大麻子）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出卖了马占山，使其在江桥一役中失利，死心塌地的做了日本人的忠实走狗。后来做了傀儡皇帝溥仪的侍从武官长、海军上将军衔，飞黄腾达、一步登天。为了扩张个人势力，把原来的那些亲信，凡夫走卒皆加官晋爵。整个洮北七县，他都派驻了军队。什么十五团、十六团、朱团、杨团、于团……将各县弄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各团象走马灯似的在各县轮番骚扰。大同二年（1933年）春，张海鹏把他的四儿子（名字谁也不知道）封为团长，带领一团人马来到安广县（现新平安镇）驻防。将部扎在大商号聚丰后院。

这家伙依仗日本人和老子势力，残暴凶狠。老百姓送号“张四虎子”。

随意杀人

“张四虎子”凶狠残暴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若在街上闲逛，遇上他认为不顺眼的人，便开枪把这人打死。因此，他一出来老百姓就遭了殃，轻者有人受伤，重者有人丧命，人们见了他的影子，就象躲避瘟神一样似的藏了起来。有一天“张四虎子”心血来潮，早晨起来带着两个马弁上街闲溜。当走到十字街时，从北面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由北往南走，“张四虎子”从东向西走，正相遇在拐角处，这名军官此时再也无法躲藏了，一看是张团长，未免神色慌张。歪歪斜斜的，结结巴巴地上前给张团长敬礼、请安。“张四虎子”一眼便认出此人姓宫，是自己手下的副官。看他那衣貌不整，睡眼惺松的狼狈像，已猜到他夜间一定是寻花问柳去了。抬手便是一个耳光，大声喝道：“跪下，你他妈的昨晚干啥去了?”。顺手抽出匣枪，拉开大栓，砰砰就是两枪。因为宫是他的副官跟随多年，故意吓他一吓，要是小兵，今天就难逃活命了。所以子弹擦着宫的头皮掠过，把头皮烫一溜沟。直往外冒血筋。吓的宫副官爬在地上鸡啄米般的磕头哀求：“团长饶命！四爷饶命……”。

这时，太阳已升出地面一房多高了，市面各家店铺大都开板了。在十字街西南拐角处，有一家鲜货铺，掌柜的姓张名毓彦，雇几个伙计，其中有个年青的叫贺成，年纪

十七、八岁，刚开完窗扎板进屋。听到外面枪响，青年人好奇，想看个究竟，推开门探出上身张望。“张四虎子”在东北角上正训斥宫副官，这家伙眼尖手快，见是南角鲜货铺里有人探出身来，甩手一枪，砰的一声子弹穿透贺成的左臂，贺成挨了一枪，急忙缩回屋去。天哪！谁还敢再探头张望。贺成还算不幸中的万幸，若是一枪击中脑袋，他就得到阎老五那报到去了。

绑票诈财

“张四虎子”也是土匪出身，深懂绑票诀窍。他想若要发大财，只靠这点兵饷、薪俸是不成的，必须刮地皮。刮地皮他还没有征课税赋的权力，况且征课有限的捐税，也无济于事。想来想去，便想到土匪绑票这一招上来了。这招好是好，但今非昔比，现在是堂堂正正的“满洲国军”，随便绑票，岂不伤名损誉，传扬出去叫老子知道，恐要降罪的。后来有个副官给他出了个坏主意，就是指使手下人勾通地痞，刁咬某某财主家通匪，这样便出师有名了。

于是在旧历四月左右，“张四虎子”接到一张“密告状”，状告安广县城南富户刘春贵的长子刘润林与土匪勾结，扰乱地方治安。刘润林1928年毕业于安广县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在县政府当文书（当时人称在县里写字）。“张四虎子”得此告密如获至宝，立即下令将刘润林逮捕，这在当时的小县城成了特大的爆炸性新闻。

城南刘家闻讯后，当家人刘春贵立即飞奔到县城，进

县衙门找县长请求其帮助营救其长子。县长德养源是张大麻子派来的，与张四虎子兄弟相称，德县长一口答应去营救。刘春贵又到工商会、农会等处拜请会长出面，邀请各工商户和农户联名担保。当然刘家得拿出大量钱款来邀请和招待担保的众宾客。于是由工商会、农会的头头出面，代表工商界和农界求见“张四虎子”保释刘润林。

“张四虎子”早已盘算好，端起架子拒绝县长和各界求情作保，扬言要给地方除害，非要处死刘润林不可。这下可把刘春贵吓坏了。多次跪求县长及工商、农界人士再次去求情担保。同时也猜到“张四虎子”的用意，求县长传过话去：“一定满足张团长的要求，只要弄个条件便妥”。“张四虎子”仍要挟不放，要耍杀人魔王的威风。放出风去要在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这天用铡刀处死刘润林。

五月节这天骄阳似火，晒的大地直冒烟。刑车拉着刘润林和一把铡刀游街，游完街拉出西门外处斩。刘润林被五花大绑的绑在车上，背后插上亡命招子，沿街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走在最前面的是开道士兵。“张四虎子”骑着高头大马，手持战刀，带领副官马弁跟在的后面。当走到大十字街时，只见前面一字排开跪着一溜人，只有一个垂首躬身站在前头。每人手中都举着一个书筒似的物件（保单）。“张四虎子”定睛一看，前边站的是当县父母官德县长，后面跪着的是工商会长和农民会长率领手下的工商业主和四乡财主们，足有三十多人。四虎子见是德县长带领乡绅们拦路担保，也得装装斯文，急忙跳下马来挥挥手，副官、马弁等

也都跳下了马。四虎子上前拉住县长的手，并招手示意让众人起来。他环顾一下众人，清清嗓子拉长音调说："县长老兄台和众位乡坤，今日之举是为保刘润林而来，这样看来，刘润林八成是冤枉了。这样吧，刘暂不处死，咱们到县衙门计议"。说罢，传令将刘拉回监狱。

这回"张四虎子"看到火候了，开了价码，讲了条件，并一再声称"看在父母官和地方父老面上"才给的人情。价码是三八步枪二百条，手枪（匣枪）50只（刘家有三只德国造镜面匣枪必须拿来），快马一百匹，大洋两万块，大烟土一千两，还有猪、羊、牛及首饰、绸缎等物。限半月期，交齐了放人。经县长再三哀求，只把步枪减去一百只，匣枪减去二十只。但也给个活口，弄不到枪，作价给钱也行。

刘家为了要人，只好倾家荡产，按期将财物交齐，才把刘润林赎回来。刘家原是个逃荒户，发财不到三十年，是个善于饲养马、牛和耕种田地而发财的。家中虽养有数百匹"山后"大马，并有四处窝卜、近千垧地，长、短枪五、六十只，但要交上这笔赎金，必须变卖全部家产。经"张四虎子"敲这一下子，立刻又回到了赤贫状态。

"张四虎子"接着又敲了两家富户，于中秋节后，便拔营起寨回洮南去了。

忆洮索铁路工程局局长张魁恩

宛宏恩　宋家富

张魁恩，字远泽，1895年生，吉林人。青年时代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适值中国处于列强瓜分，人民遭荼炭之时。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影响之张魁恩，在海外结识了不少爱国之士，立志强国雪耻，复兴中华。

归国后，于1928年返回家乡吉林，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已深入满洲内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之惨状，感慨万千。毅然追随东北军邹作华炮兵部队北上洮索，屯垦戍边，遏制日本势力北侵。

这时四洮、洮昂铁路早已建成。因系借日款修筑，日人插手其间，处心积虑争夺该路之主权。洮索路未建之前，日人已垂涎三尺，深怀窃取包筑该路之野心，并于1928年由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同张作霖具体签订了《洮索路承修合同》。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与日人反目，故此搁置。

1929年9月9日，张魁恩由兴安区屯垦公署代建设处长任命为洮索铁路工程局（后改铁路局）局长。此后，张大声疾呼铁路系国家命脉，洮索乃东三省之后方，若再借

款筑路，无疑拱手他人，作茧自缚。坚决主张依靠自力，自行修筑，勿使日寇染指。此议深得当局赞许。由于洮索铁路排除日人插手，由京奉路资助，以屯垦军和扩充之筑路工人为主力，进行自筑。此举，张魁恩已结怨于日人。

张魁恩主持修筑洮索铁路间，主张“行政从简，筑路为先”。办公房舍的修建采用“里生外熟”（外皮用砖，内室用砖坯混砌）规格修建。机车库基础完成后，因经费不足，上部用木板围墙代替。局内办公设施不准奢侈，交往不准挥霍，他本人亦率先垂范，不讲场面，不摆阔气，常与工人攀谈，并经常步行于筑路区间，对于线路走向之选定，测量数据之复核，每必亲自躬行，力求节俭，避免损耗。

1930年时值洮怀段（洮安至怀远镇。洮安即白城子，怀远镇在乌兰浩特市东北）施工紧张进行，材料缺乏，而奉省拨款又处短缺之际，一“日商”河村乘隙窜进洮索路局，以“低息贷款”，“赊销材料”等手段为诱饵，多次求见局长张魁恩。张深知日本人居心不善，虽满口“资助”、“合作”，实则诱骗、掠夺，故均严辞拒绝。日人此计未成，于1931年6月又派遣军事间谍中村大尉等四人乔装骑马秘密潜入洮索路，窥探军情与筑路情况。张魁恩得知，大为愤慨，当即部署铁路工人密切注意日谍动向。此日谍终于在怀远镇东北一带山中（今察尔森水库处）被兴安屯垦军捕获，并就地处死。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沿四洮路北犯，满怀爱国激情的张魁恩意欲随屯垦军北上抗击日寇。此时路局工务

处长王省三等人眼含热泪地说："局长，我们不能走，不能丢掉三年来的血汗成果——洮索路，更不能抛弃与我们共同战斗的弟兄们……。"张魁恩听后，悲愤已极，毅然决定留下同弟兄们一起与洮索路共存亡。

9月21日，兴安屯垦军奉命取道塔子城（今泰来县的西北小镇），轻装转赴江桥与东北边防军黑龙江抗日部队会合，阻击北侵之日伪军。辎重弹药用大车从原驻地运至洮索路洮安北站（今白城青山工区）集中，装火车后再由洮昂路转运。此时日军飞机连日袭扰洮安，少数动摇分子匿而不出。张魁恩不顾个人安危，仍到北站指挥工作，并指派张德普等人，组织铁路工人掩护与装运这批军火。后经洮昂路转运至江桥战场，在给日伪军一次沉重打击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11月下旬，被日军诱降的汉奸张海鹏，为瓦解洮索路之反日势力，派洮南县"治安维持委员会"会长，亲赴洮安（白城）诱降张魁恩。张见到后，怒不可遏，大骂此人是民族败类，拔枪欲毙之，被在场的工务处长王省三阻拦。张怒气未消，狠狠地打他两记耳光，该人踉跄而逃。

数日后，日伪军警数十人闯入张魁恩住所，声称"请"张去洮南"会商"。张魁恩临危不惧，喝令日伪军在外稍候，他从容吃了四碗米饭，披上大衣戴上土耳其式帽，然后向赶来的工务处长王省三、段长刘贵武、工长张德普等人说："我此去生死难料，洮索路是中国人用血汗筑成的，你们要有骨气，不能白白送给日本人……。"

张魁恩到洮南后，先是受到日伪军政高级官员的"款

待”，并提出委任张为三路（四洮、洮昂、洮索）局长的诱降条件，要张与之合作，张厉言回绝。日军头目见利禄难移张之志向，便捏造罪名，将其囚禁起来。张被囚后，不畏强暴，怒斥敌酋。日寇见强暴手段亦无济于事，遂来洮安拘其兄张魁元（外号张大烟），迫其劝降张魁恩。张魁元应允日人的条件后，遂保释其弟出狱。张魁恩回洮安后，虽经其兄百般劝说，仍执意不允。日军头目感到张魁恩实难就范，便于同年 12 月采取极端卑鄙之手段，派一连日军，于深夜将张抓走，秘密押至大连而后处死。张魁恩为国捐躯，时年仅 36 岁。

张魁恩虽为旧中国洮索铁路局高级官员，地位、处境与深受剥削之铁路工人迥然不同，但其胸怀正气，身存硬骨，屯垦戍边，督筑铁路，尤其在国家面临危亡之紧要关头，敢同日伪强敌相抗争，誓与洮索铁路共存亡，宁死不屈，为国献身的爱国情操与民族大义精神是可敬可泣的。

“五洋”袭击日伪军“大板车”

张春园

伪康德二年（1935年），正是日本侵占东北初期，抗日烽火到处燃烧，地方秩序紊乱。当时我在开通县警务局当科员，对“五洋”打击日伪军事件的经过比较详细。

四月份的一天早晨，伪警务局情报处值班人员李树滋接到报告匪情的电话，电话是从四区（现在的八面乡）打来的，报告说：“四区南三十多里，离县东边界不远处，有报字‘五洋’的股匪约四五十人在夜里窜入，现在还在那里……。”值班的李树滋详细问了匪人的数目、窜入时间、装备情况和距县城的估计里程，又问了打电话人的姓名等，并一一记入电话记事簿内。随即，李树滋口头报告给日本那须浩指导官。那须浩详细看了电话记事后，立即命令警察大队高清玉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那须和另一名指导官杉田，带了小王翻译，率队五十余人分乘两台米黄色敞蓬大汽车（都叫它大板车），急驰有匪的屯落，以为可以一举歼灭“马贼”。

几十里路远，不长时间就到了。但见屯中无人行走，房上亦不见有匪哨。那须机警狡滑，杉田更是鬼诈多端。他

们当即命令鸣枪侦察看看动静，但许久没有任何反应，遂进屯打探。老百姓说，人走不到两顿饭功夫，并没抢什么，见他们往西去了，去哪里不知道，因有岗子隔着看不见。那须和杉田研究一会儿认为，他们白天行动不便走不多远，再找一找实在没有就回县城。他们在平坦的大荒原上又开车走有二十来里路，将近大泥哈嘎村时，停车观察了一会儿，也未见有匪的迹象，遂把车徐徐开进街里。车一停就跳下两个人去打探情况。去的人见家家都关着门，就捡一家大户，上前先敲了几下门没人答应，便从门缝往里看，见满院子是备着鞍的马，才知道胡匪在这里，于是抽身便跑，一边大喊："有胡子……"话音未落，几个场院里的枪声爆豆似的响了起来，一齐向两台汽车猛射。同时屯内其它院里的枪声，也集中目标射向两台汽车。原来"五洋"一伙人事先埋伏屯内，早张好口袋只等日伪军钻进来，就动手歼灭。这时车上的日本指挥官及所有警察队的官兵，突然遭此意外袭击，使他们在仓促间无法应付。不大功夫，汽车油箱起了火，顿时黑烟弥漫。有的忙从车上往下滚，有的当即被打死打伤。汽车司机助手刘庚尧（县公署二科科长刘梦琴的儿子）二十几岁的人早吓懵了，滚下汽车就往车底下钻，当即被击毙。两个日本指导官也已受伤，滚到场院阳沟里，没来得及还手就被打死了。

前后二十多分钟，战斗结束。点验共打死十一名，受轻重伤的有二十多名。其余那二十多名，均成俘虏。分队长刘荣三（原名刘禄，是刘庚尧的姐夫）要去看一个受伤的亲属队兵，刚到伤者近前，恰遇冷枪，当场死亡。大队

长高清玉因占的地形好没死。把他搜出来时，举着双手投降。小王翻译也没死，但因为年龄小，已吓得脸色苍白，走路踉跄了。

“五洋”命令他们的人搜集获得的全部战利品枪支子弹等，然后说道：“弟兄们，两个日本鬼子是坐汽车来的，我们还叫他坐汽车走！”于是大家把两个日本鬼子和一些伪兵的尸体，全拽到两台烧坏的汽车上，重新点火烧着。烧完之后，“五洋”向被俘的官兵们说：“你们回去告诉那些没死的鬼子，今后若不老老实实，再欺负中国人，就叫他们和这两个鬼子一样。”又说：“对不起点，你们也是坐汽车来的，现在请步行回去吧！”此后，“五洋”队伍拔出开通境，出没在其他地区。

当这场战斗正打着的时候，四区警察署已经知道打败仗的消息，就用电话向县里报告，县里一些能打仗的都出去了，剩下的那些当官的如坐针毡，知道县内已无战斗力，即使勉强凑出二三十个人，也是寡不敌众，怎能与劲敌去碰？再说对方的情况一点也不清楚，所以不敢冒然前往。

傍晚，好不容易盼着高清玉大队长和小王翻译他们回来，才得知现场的如实情况，和先前知道的情况没什么两样。县里那些当官的，一面向省里打紧急报告，一面组织运力往回拉死尸。剩下的伤号，叫老百姓往县里送。

次日，要了十几台大车，每台大车拉一口大红棺材。两个已死的日本指导官，给两个白茬骨灰箱。在装殓的时候，因为汽车被打着的时候，烧了一回，打完仗，又把死人和汽车一块烧了，所以尸首难以辩认。只好把能认出来的，标

上姓名，无法辩认的，胡乱写上×××。尸体拉回来后，象摆长蛇阵似的，摆在关岳庙前（现在印刷厂前边）的广场上，为了表示对日本人的优待，把两个日本人的骨灰箱摆在最东头。又令商务会买些香花供果摆在灵头。搭的席棚，雇不少人昼夜看守。又准备了花圈、挽联、祭文，开了追悼会，叫机关、团体、学校都臂带青纱、抬着花圈、举着挽联去参加说是为东北建设"王道乐土"死的。当时有个团体送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一战成仁千古恸"，下联是："三杯碧酒万年馨"。去的老百姓实际是全看热闹的。追悼会开完之后，除那须、杉田的骨灰箱由家属领回外，其余的十名伪军即埋在城北的二道岗子的南坡下。小王翻译吓得神不守舍，说什么也不干了，坚决辞职回家（他家在南满），最后准许他辞职走了。

开通县那时已由奉天省划归黑龙江省管。黑龙江省警务厅接到开通电话和文书的报告，认为这是个极不寻常的事件。特别是打死了两个日本人，那还了得？赤泽警务厅长带了不少随员，亲来开通县查问。他五十多岁年纪，留着小胡子，胖子红脸，身穿警服，警帽，肩牌和袖线全是金黄。到县后，他听了参事官的口头报告，即召集日本指导官小松、冈野和参事官开会，追问了一连串的问题：

1、来电话报告说有匪情，里边是否有鬼？

2、报告匪人盘踞的是××屯，为什么队伍去了以后，匪人又不在此屯却挪了地方？

3、汽车进入匪人据点后，为什么一点迹象全无？

4、大队长高清玉为什么就没死？

5、匪人要不是在事后打死分队长刘荣三的话，满洲人怎么连一个当官的也没死？

这些疑问都答不上来。赤泽警务厅长对此十分焦躁、恼火，令叫警务局长来。警务局长赵力田平素是个麦秸火脾气，沾火就噼啦乱响的人，这次也穿戴得整整齐齐，小心翼翼地进见，进来给厅长、参事官等人脱帽鞠躬后规规矩矩站在一边。赤泽满脸怒气地质问："你身为局长，听到匪情报告，为什么不带队去剿？"问得赵力田无话可答，只是低头不住行礼，一个劲地说："是！是！是！"赤泽又气呼呼地接着问："你不带队剿匪，已经错误，而警察队受包围，你为什么不去援救？"这更使赵力田无话可答，只有连声称"是！"赤泽又说："自己的警察队伤亡这些，你怎么也没到现场去看看？"，"第二天收尸，又为什么没去？"这一连串的问话，几乎使赵局长哭出来。没过几天，撤警务局长赵力田职的文书就到了，以安广县警务局长孙焕芳接替了他的遗缺。

"五洋"打"大板车"事件，在当时震动极大。不用说开通县的日本人不敢再轻易下乡虐害百姓，自省里通报各县以后，就是这附近几个县的日本人怕"五洋"怕得睡不好觉，可老百姓从此倒安宁一些了。

"五洋"这一名字是旧社会胡子的报字，这里听说的"五洋"何许人？原来他是开通县五区管内小门冯家屯的人，姓冯，名志恒，给地主当过长工。由于生活所迫，他拉起一伙人，走哪吃哪，但从未听说他抢过穷人。打日本人，他们是从不客气的。日本人以后也了解到他家住处，打算报

复，可他早已人走家搬，扑了个空。后来传说他在突泉县境内，又打了一次日本人的汽车。由突泉辗转到通辽又打了日本人的汽车。到后来，有的说他死在了乾安县那边，有的说他隐姓埋名不知去向。总之，众说纷云。

在开通的义勇军

张春元

一　我知道的情况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一九三二年初，才听说有义勇军，是专门打日本军的。在开通县义勇军逐渐多起来。在铁路以西，分散于十几里或几十里远的大小村落中。

后来青纱帐里，胡匪多起来了，他们到处流窜，其帮头稍大一点，有百八十人的，有的自称义勇军。这便弄得处处都有义勇军，也处处都有胡匪，造成兵匪不分。但此时确实已有以李海清率领的一万多义勇军散居四井子一带。刘桂堂（即刘黑七）率领的两万多人散居在七台庙一带。我的同事王经九去七台庙办事，被他们留了两三个月才放回来。王经九说他们很讲纪律，但违反纪律的也有。此外，还有“九一八”事变前，在开通县公安第五十五大队迫击炮分队当分队长的綦崇寰（二十七、八岁、山东人），也当义勇军司令，他有多少人和属谁领导，不详细。还有其他一些不知领导姓名的，即数不胜数了。

这些义勇军，除李海清约呆两三个月后去热察绥，刘桂堂约呆三四个月后去山东外，其余的如綦崇寰等等，不知于何时，自消自灭了。

二　义勇军袭击开通车站

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义勇军打开通车站。居住在铁路局宅货物处职员张廷元说，义勇军是在铁道西由南向北突然开始袭击的，将近晌午，他们是从高粱地过来的，估计最少也有一千五六百人。

我们都藏在家里，义勇军边打边向铁道东推进，占据铁路局宅。日本军只三、四十人，不过一个多钟头，全被打到水塔里去（那时是木水塔，在两个道岔子中间）。县指导部两个日本人赤石清三、新井清和给他们当翻泽的李国兴均在内。可惜义勇军未将铁路破坏，也没切断电话，以至日本军获得喘息机会。下午三点多，由洮南开来一列十几节闷罐与平板混合的兵车，老远即汽笛长鸣，用机枪和炮向车站方面射击起来，义勇军遂纷纷向南撤退。

日本兵车进站后，挤在水塔内的日本军才敢出来领他们向南追击。就在这时，不知由哪来的“冷枪”，打死一、二名日军，他们就折了回去。一会儿，又扑过来，又有被打死的，这样五、六次。后来日本军用炮把局宅南头一座砖房打倒，房盖掀去，义勇军也撤没了。

有铁西开砖窑的边华阁说，这天晚六点多钟，站里找我们六、七个人清理局宅一带战场，我们拿锹从局宅由北

往南走时，一路发现被打死的鬼子有十二名，没叫我们动。及到局宅南头被打坏的砖房时，见有一身上穿着旧灰军衣的人已被炸死，此人有四十岁左右，左胳膊白布箍上写的“东北义勇军三旅二团三营营长刘长江”字样。我们把他埋在南坨子上。

在瞻榆活动的义勇军

周哲明

一九三二年秋，有黑龙江李海青部队和吉林冯占海部队，经过瞻榆向开鲁撤退，据说到热河后改为义勇军了。

一九三三年夏天，义勇军已到热河多伦围场一带活动。不久即有李芳庭部，号称救国救民义勇军，来到瞻榆县境内。李芳庭系东北救国会由北平派出的任东北军十七路军司令。司令部住在瞻榆县城，旅长李相臣住在我家（即周家窝棚，现在的团结乡建设村）。还有一个我在小学读书时的校长刘定安，当旅部的书记官，也住在我家。当时大家都知道义勇军是来救国救民的，群众起来要求抗日。有各种各样的人参加了义勇军。当时义勇军发展的很快，遍及全县各地，甚至我县我区的地富武装也改为自卫团，归义勇军领导了。当时李相臣旅长，刘定安书记官，每天和我们见面都谈论救国救民之道，思想十分融洽。他们答应我在旅部当书记，我非常高兴。此时我腿部生疮，李旅长曾经行过医，积极为我治疗。当时药物奇缺，他采用土办法治疗，用烧酒消毒，用胭粉和猪油做药膏进行治疗。我腿上的疮快要好了，由于日寇在飞机的配合下向瞻榆进攻，义

勇军决定撤退到突泉一带山地活动。我备好马，准备随义勇军去打日本，不甘心当亡国奴。可是我准备的这匹马是生格子，把我摔下来，腿上的疮又加重了，行动非常不便。李旅长叫我等疮好了再去。谁知义勇军一去就再没回来。义勇军走后，日寇即开始清乡，收缴民枪，抓人杀人，凡与义勇军有过来往的人都有被抓被杀的危险。如瞻榆县第一小学校王校长以通匪罪被杀，农民自卫团长王杰等被日本守备队抓去，送到洮南装到皮口袋里摔死了。

到一九三四年热河也被占领，义勇军有的撤到关内，有的潜伏下来，有的分散了，有的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撤到东部与北部山里，对日寇长期作战，打游击去了。

日寇飞机轰炸瞻榆义勇军的经过

张健发

一九三一年秋，雨水调和，丰收在望。农民高兴有个好年头，城市贫民盼望粮食贱一点，生活好过一些。不料日本鬼子侵略了我国东北，兵荒马乱，战火由南向北燃烧。附近的洮南府和郑家屯都被占领了。这时，人们都盼望快点出兵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但有哪个军队能来呢？老百姓也不知道。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听说热河省汤大虎的军队快要来打日本鬼子了。人们日日夜夜盼望着，等待着。

到了初夏的时候，一天下午从西方突然来了一支队伍，头目是胡必烈司令（蒙古人），共有一千来人，有步兵，也有骑兵，蒙族汉族都有。他们穿着灰色的军装，大盖帽，打着裹脚。武器都是步枪，有湖北造的筒子、连珠枪。没有重武器。打着红旗，队伍整齐，纪律严明，不许打骂老百姓，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许叫群众给蹓马等等，颇受群众欢迎，尤其他们要去洮南打日本鬼子，更受老百姓的钦佩和拥护。

义勇军的主要机关驻在瞻榆县城西边张豆腐房屯，司令部就驻在我们家院内。胡司令为人和蔼，平易近人，好

和群众谈话。群众问他们是由哪里来的，他说，他们归汤司令管，是地方组织的军队，叫义勇军，是专门打日本的。来到以后，这支军队开始扩军，又进行练兵。到了八月份要去洮南打日本鬼子。后勤部还留在张豆腐房屯驻守，看管给养以及枪支弹药，留守人员大约有五十多人，其中病号有二十多人。

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一架日本飞机在瞻榆县城的上空盘旋，飞的比较低，飞机肚子上的膏药旗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当时正在私立学堂念书，过去听说，人坐飞机能在天上飞，这次都要看看飞机什么样。不一会儿，飞机到了我们头顶上空。同学和徐子库老先生都到院内看飞机。老先生惊讶地说："这是日本飞机，上边的红色月亮就是日本旗。赶快躲开。"刹那间，飞机突然低飞并向下投弹，发出巨大的爆炸声。第一颗炸弹投在屯西头，目标是大树下人多的地方。由于人分散及时，把树炸倒了几棵，没有炸着人。随着投下第二颗炸弹，炸倒了三间房屋，压死了老信头和他的儿子。老百姓都跑出屯外，义勇军没有跑，他们说跑出去要暴露目标。接着又投了第三颗炸弹，落在老赵家院内，炸了一丈多深的大坑，出了水。把房子炸坏了一部分。趁着烟雾，义勇军转移到高粱地里。第四颗炸弹也没炸着义勇军。把正在包米地摘豆角的老封太太(封运财的老妈)炸掉了一只胳膊，昏倒在地里。到了中午飞机走了，各家都出来找孩子。学堂也停学了。这次日寇飞机为什么炸张豆腐房屯呢，主要原因是飞机发现了义勇军从洮南派回来取给养的大车引起的。

第一次轰炸后又过五、六天，在九月上旬的一天十点

左右，从东北方向又来两架飞机，到瞻榆县城上空盘旋三圈后，向着县衙门院内连续投了三枚炸弹，后又向人多的地方用机枪扫射。被炸死的有县衙门东院居民老卢太太，双腿被炸掉，当场死亡，有两名职员被炸死。大街上有五个老百姓受了伤，还炸死了三头毛驴。日本侵略者两次轰炸扫射，只炸死、炸伤居民和牲畜，一个义勇军也没炸着，进一步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性的侵略罪行，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

旧中国衙门的官员只知道掠夺民财，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日本飞机的两次轰炸后，把当官的吓破了胆。这时街里有个姓许的算卦先生（许瞎子）算了一卦，他说，某日某时日本飞机还来轰炸。衙门职员也不上班了，有的把家都搬到乡下去了。

县长庄绍裕表面虽不信算卦，但心里无底，怕再来飞机被炸死，在十月初带着全家逃往集贤村（现团结乡）避难去了。跑了一个多月才回县。当年冬，日伪军张大麻子（张海鹏）队伍——三支队来打瞻榆县城，由于义勇军吉林队人少，又缺少枪支弹药，很快就撤走了。只剩下大刀会，有一百来人在北门外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杀死敌军十几个人，由于大刀会有伤亡，又无援军，也撤走了。大刀会给人们留下了英勇的深刻印象。

日伪旁边占领了瞻榆县城，庄绍裕又当了伪县长。继之又进来日本守备队，天天坐三四辆大板车（汽车）进东门出西门，进进出出好象有多少兵似的，实际还是那一部分发人，虚张声势，镇压中国人民对他们的反抗。

李海青战进大赉城

董明谦

抗日爱国志士李海青战进大赉城一事，至今一直被人们传颂着，给大赉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在解放前多从反面议论此事。笔者经走访部分知情人，获得些口碑材料，又经查阅档案文献，仅将李海青进大赉城的始末整理成文，以正视听，舛错之处，请知情者校正。

李海青原名李青年，号丹忱，山东夏津人，1896 年生，少时逃荒东北。海青是他青年时委身绿林的报字，后投马占山部任职，江桥抗战时因其抗日坚决，作战勇敢，被晋升为旅长。马占山被诱逼出任伪满州国军政部长兼黑龙江省长后，于 1932 年 2 月 24 日返回哈尔滨，准备重举义旗，马占山与李海青密商，由李海青率先举事。1932 年 3 月，李海青率所部三千余人哗变，冲出哈尔滨城，南下攻占了扶余，并联合各地抗日武装，队伍很快发展近万人，命名"东北民众自卫军"。

李海青举事后，率领部队同日伪军迂回转战于北起黑龙江省省城卜奎（齐齐哈尔），南至农安县城的大半个北满地区。经大、小战斗数十次。使日本侵略者刚刚建立的地

方伪政权屡遭打击，给惨遭奴役的东北同胞以莫大的安慰，使侵略者终日心神不得安宁。是年 9 月 24 日，李海青从齐齐哈尔门户昂昂溪出发转战在青岗、兰西、安达一线，于 12 月 9 日进入肇源县境，进行了整编。然后率三千多人的队伍攻占了茂兴、新宿（今超等乡），并把兵力集结在这一带，准备率部开赴热河省开鲁地区。大赉城是所经之地，所以，开始拟战大赉城。

当时，大赉城守城联军有黑龙江省军骑兵第十二团第三连 100 人，大赉警备队 200 人；大赉县公安队 30 人，商业自卫团 80 人，民众自卫团 40 人，蒙古队 80 人，共 530 人。城防兵力布置是：在大赉县警备队队部内设临时城防指挥部，以警备队担守县城西北隅，以商团和民团担守城正东面，以警察中队（即大赉县公安队）担守城东南隅，以留守第十二团第三连担守大南门至西南隅炮台，以江东蒙古保卫团担守自小西门至西南隅炮台。并由城内民户中挑丁编成扎枪队，环城墙一周，做为接应。将城南、东、北大小城门完全堵塞，仅留大西门一处，出入行人。

李海青在嫩江东沿休整七天，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之后，于 12 月 20 日上午八时进兵大赉城下，很快完成了攻城的部署，包围了大赉城。置司令部于北门外，将主力摆在南、北两个方面。在战前，李海青派人到城防指挥部向陈海胜劝降没有成功，于是，李海青决定在城南、北迂回攻击，双方进行了激战，战斗一直持续到 22 日半夜 12 点。这时，李军在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城东南角，也是城防力量较薄弱的公安队守区打开缺口。当时因为公安队长出

差不在队，有兵无将，士兵中降战意见不一，一些有正义感的士兵，在战斗中首先起义，里应外合，协助李军在城东南墙角挖开一个大洞，使攻城部分主力得以迅速进城。部队首先直取大西门，迅速占领西、东正阳大街，使城东、城西连成一线，把守城部队拦截成两段。李军迅速扩大战果，占领了县城的南半部，守城军一见半城难守，便退缩到县城西北角潘家烧锅院内，准备负隅顽抗。不料，李军立即发起猛烈攻击，打得守城军措手不及，抵挡不住，退出阵地，蜂涌从小东门逃出城外，奔江东而去。北门守军警备队王大队长和商民团一看大势已去，就地放下武器，向李军投降。至此，战斗结束。战斗中县公署第一科长张惠融、十二团军需官王成五被击毙。

李军得城后，首先打扫战场，收缴枪支弹药及军需物资，将放下武器的守城军兵集中到潘家烧锅大院看管起来。分兵占据全城各城门和大小街道，每个道口派兵八人，严加封锁，断绝行人；接着，占领县公署，设重兵把守，司令部迅速进驻县大院，将县长王家范俘获扣押起来。大队人马食宿安排以城内的大院为单位，集中住宿，不准任何人进驻民户家。大院的门口和制高点各置两个哨兵，严加警戒。

李军在城内安定秩序之后，做了一系列的政治工作。首先是张贴安民布告，内容是：宣传抗日主张，公布日军侵华罪行，揭露日本建立伪满州国的阴谋，申明本军义务等等；还召开群众大会，宣判县长王家范死刑（后经众人请求，给予宽恕）；其次是开放大赉监狱，释放所有在押人员；

再次是召开各界首脑会议，筹措军饷军需等等。

李军在大赉城驻扎七天撤走。在大批撤军的前一天清晨，首先派出先遣队，在郭队长率领下直指奉天省安广县城（今本县新平安镇），打通道路。撤军这天，从上午九时开始，大队人马列队出城，前导是四路马队，约400人，接着是大车队，约40多辆，车后为司令部人员，最后是大队人马约6,000余人在大车后。上午十时许，37岁的李海青是入城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他排在司令部最前面、最显赫的位置上。只见他普通农民模样，头戴棕色毡帽头，身穿白茬羊皮大衣，里面穿着青棉袄，系着黑腰带，带间斜插一支无套盒子枪，脚穿靰鞡，骑着枣红马，边走边向欢送人群招手致意。大队人马从上午九时开始到中午十二时，全部撤完，浩浩荡荡地向安广方向开去。李军的后卫队，约400人，在队长绰号一只鸡的率领下，于翌日凌晨秘密撤走西去。

这一段的战事活动，就是被后人传颂的李海青闹大赉城的故事。

我所见到的抗日武装

——李海青和他的队伍

李　树

海青进城　县官逃走

一九三二年，抗日武装——李海青的队伍，到过安广县城（现平安乡政府所在地）。“那时，我正在安广县师范学校读书。当年十一月的一天，海青的先头部队（骑兵），由郭军长率领，从大赉赶到安广县城。队伍到城外，他们没有直接从东门进城。因为当时是日冠侵略东北的第二年，各县都设立了伪政府，他们怕城内抵抗。在离城约二、三里远的地方，就分兵两路，从东面和北面急速前进兜围平安城。城内发现后，伪县长德养源和手下的几个亲信乘汽车从西门仓惶逃走。德养源逃走后，李海青的队伍，就进驻安广县城了。

农商各界　热情迎接

李海青的队伍，进入平安时，由农商会出头，组织学生和市民，成群结队，到东门外和北门外，排队迎接。我是随人群到东门外迎接的。军队来到城门前，郭军长下马向迎接的民众作自我介绍，态度很好。随后和迎接的群众一同进城。吃住问题由农商会安排招待。商号、市民家基本都分配住下部队。军纪还挺好。郭军长率领的队伍，在平安住一宿就向西南方向开走了。在第二天的下午，李海青率领部队也到达平安，迎接与安排食宿和上一天一样。民众对海青队伍的迎接，非常热情和隆重。

宣讲抗日　以雪国耻

李海青进城后，就和农商会联系。当晚，召集学生和民众在县城门前开会。在开会的时候，我见到李海青，他大约五十多岁，稍胖，中等身材，衣着朴素。他给民众讲演，他的言词和感情都很动人。他说："东北已被日寇侵略，东北的同胞已经成了亡国奴，凡是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当亡国奴的滋味。……"他热爱祖国，对日寇深恶痛绝。他说："我们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保卫祖国的尊严，有志救国的青壮年和自愿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都要挺身而出，参加抗日救国军，狠狠打击侵略者，把他们赶出中国去，以雪

国耻。愿意参加抗日联军的，可以就随我们走，到关里去会合抗日救国的大部队。只要我们四万万同胞一致奋起抗日，我们的抗日战争就一定能胜利。”他还指着他下巴上的伤疤说：“这就是打日本鬼子挂的彩，为了保卫祖国就不能怕牺牲，我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忍受当亡国奴的屈辱，去给洋人做牛马。”他的讲演使得一些人掉下了眼泪。

胸怀壮志　远征前方

李海青也只在安平住了一宿，第二天他满怀抗日救国的雄心壮志，率领他的部队向西南方向挺进了，部队走到大岗子时，和开通来的日军相遇，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双方各有伤亡。他率领部队又折回向正东方向远征去了。

彭金山见闻与白团起义

王六离

彭金山是从江西要饭过来的，后来在吴俊生的部下当了兵。彭小个，小眼睛，大脚，走起路来，一蹿一蹿的，没有什么派头。据说有次彭金山在吴俊生的室外练武术，吴俊生正好从穿衣镜里看到了他的身影，像个猴子似的在耍戏，遂称其为“猴子”。吴俊生很喜欢猴子，他认为猴子精灵，即对彭有所偏爱。当时吴俊生有一个副官长姓伊，也是江西人，经常关照彭金山，彭的官职也就一步一步地上来了。

民国初年，蒙古人叛乱占领白城子时，彭金山已是营长了，驻防在郑家屯。彭金山对蒙匪作战有功，更得到吴俊生的青睐，后被吴提拔为团长。洮辽镇守使署原设在郑家屯，由于这次叛乱，移驻到洮南，彭金山也就驻防在洮南一带。

民国十年，吴俊生调黑龙江省任督军之后，遂调彭金山为黑龙江省防军第二旅旅长，中将衔，同时兼任哈满镇守使。

民国十七年，吴俊生在奉天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阴谋

炸死后，彭金山串连一批吴俊生的旧部，极力保举吴俊生之子吴泰勋为黑龙江省督办，但事与愿违，万福麟却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督军。就在万福麟赴任督军时，彭金山率部将万福麟的专车阻挡于嫩江桥之南，不让通过。由于奉天军部一再来电催促，专车才得以放行。万福麟到齐齐哈尔就任省督办之后，立即将彭金山等人逮捕起来，并要将彭枪毙，后经众人讲情，才免去了彭金山的一切军衔，放回白城子闲居。在押期间，看守兵孟希孔对彭关照很周到，在彭被放出后，孟也随彭来白城子，并做了彭家管事的。

民国二十年，张海鹏就任蒙边督办，大力扩充军队，因彭与张是磕头弟兄，张也需要有彭这样的人来为自己扩大势力，就委彭为第七支队司令（旅长），并恢复了中将军衔。

第七旅（支队）兵力不多，彭金山实际是一个空头司令。此旅共两个团，第一团长姓温，原是十九团的团长，团部设在西门外道南，手下只有几十人。二团长是姜永盛，外号姜拽子，白城子四区人，原是吴俊生管事的副官。洮安县外乡有七个区，各区的自卫团均编为一个连，姜就任这个团的团长。

彭金山追随张海鹏投靠日寇不久，便被调离白城子，去郑家屯任职，他的两个团都留在白城，成了地方上的伪军。

伪满大同元年秋，曾发生白团起义并占领白城的事件。

白团是张海鹏的部属，伪满大同元年从外地调白城子驻防，团长姓白，叫白永盛，是鄂伦春人，后被张海鹏提为上校团长。团副金殿伦，军人出身，汉族，被张海鹏提为中校。这个团实际就两连人，都是骑兵，白、金各掌握

一个连。

起义的具体原因不详，据我所知，当时的伪县长是金文彬，此人媚日，原县里的公职人员薪俸都发大洋，而金任县长之后，却发给伪县公署自印的流通券，流通券经常贬值，引起公职人员生活上的波动。我当时在伪县公安局任职，局长陶贵祥曾到县公署要求发现大洋，而金文彬不答应，引起县内公职人员的不满和愤恨。

白团起义之前，曾与县公署的马队、八区的自卫团联络过，起义时金、白两个团长不和，白先把自己的那一连人拉走了。义军主力只剩金团长的那一个连了。

起义是在一天拂晓进行的。首先打进了县公署，八区自卫团也参加了行动。义军没有抓住县长金文彬，却抓住了县公署的实业局长陈景新，在县公署西院原七旅旅部门前枪毙了。同时找到了陈景新的日本太太和几个孩子，也要枪毙。却因陈锡嘏医生出面，说陈夫人会日本话，但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所以她才侥幸活下来。陈景新外号陈小胡子，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一日本老婆，原任兴安屯垦公署农政处的科长。日本鬼子侵略东北后，他留着日本式的小胡子，更神气起来了，对中国人耀武扬威，人们背地叫他“二鬼子”，这次成了义军第一个枪下鬼。

义军的行动和枪声引起了驻老万大楼内日本守备队的警惕和注意，不久便从那里传出向义军射击的机关枪声。下午又在白城火车站方向传来洮南援兵的三八小炮的轰击声，这时街上大乱，义军东西不能相顾，只好撤出城外。

义军此次行动，唤起了群众的抗日思想，震惊了日伪

阶级敌人，义军烧了伪县公署的两间厢房，取走了金柜内的两三万现洋，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囚禁在那里的十余名犯人。群众也在这义举的激励下，捣毁了伪县公署的门窗，拿走了各屋内椅子和凳子，使伪县公署长时间内不能正常办公。

伪县长金文彬平时作威作福，当他得知义军要攻县公署的消息后，便化装跑到县公安局内，装成病人，躺在炕上用被蒙起来，告诉亲信说他是公安局的雇员。虽然躲到此处，这里离县公署很近，他又感到不安全，便偷偷跑到天主堂附近伪公安局司法股长于震耀家里藏起来，简直成了一只惊弓之鸟。

义军除枪决汉奸陈景新外，又在车站附近枪毙十来个朝鲜人。义军这次除一名参加起义的自卫团员负伤外（后叫群众救出送走），其他均安全撤离，后日寇大肆搜捕，也未抓到一个可疑人。

伪县公署被烧之后，金文彬也不能在他的办公室内办公了，只好把办公地点挪到汇源涌烧锅，每天到那里上班。不几天，公安局长陶贵祥便把金文彬在汇源涌烧锅内押起来，陶遂代理县长。经日本人审问，也未审出什么结果来，遂把金放出。金放出后，日本人便把陶贵祥押起来，审讯三个多月，后放出就给免职了。

当义军打进县公署之后，公安局及公安大队虽与县公署只一墙之隔，因事先通了消息，并未与义军对峙。等义军撤出城后，公安大队也随着撤出城外，活动于胡宝山、三合屯一带，不敢回城里来。后托商工会长王香九等人出面，

向日本人说合，说是国为害怕打仗而撤出去的，得到日本人允许后，才敢回城里来。

后听说白永盛团长投了马占山的抗日部队，金殿伦带义军投奔了佘公府。因为义军攻占白城子，彭金山的原部下温团长事后还被日本人抓进了守备队，有人说他趁机逃跑了，是死是活，以后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

“九·一八”事变后镇东县青少年学生的革命活动

曹文友　杨蓬珠　张　旭　马裕萱

日本军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挑起柳条沟事件，向东北三省大举进攻。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祖国的锦绣河山，完全被践踏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三千万东北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帝侵占东北后，妄图变为它的殖民地，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动辄以“反满抗日”为借口，逮捕爱国同胞，有很多热血青年壮烈牺牲。经济上以“经济犯”和抗拒出荷粮的罪名而坐牢。对爱国青年和青少年学生，特殊防备，时时处处收集教员和学生的言行，把一些教员列入警务特务股的黑手册里，定为“要视察人”和“特务视察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镇东县学校里的教员、学生，也纷纷投入反满抗日的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曲爱国诗篇。

一九三四年（伪满康德元年），日本人泉守，驻城内第一完小监视青年教员和青少年学生的活动，他专横拔扈自称泉大老爷，对教员、学生非打即骂。青年教员谢恩普、马

裕萱、方敬起，共谋“智斗”反抗。一次以“角力”为名，轮流和泉守摔跤，用一个多小时，最后马裕萱把泉守抱起来举到头顶，摔在火炕上。他被摔伤，一个星期多，没有到学校。

日本统治东北，除军队控制外，普遍利用警察做为它的爪牙。镇东城内警务科警尉刘洪俊，控制、监视一完小，特务徐海龙控制东屏学校。他们不定时到学校，命令教员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撵出室内所有的人，翻看日记和学生作业本，记教员和学生言行。高年级教员，早就把日语书和日本杂志放在桌里，他们什么也没翻到，每次都空空回去。他们明知教员不服气，临走时说，不服气到警务科去。

一九三五年，泉守教日语，企图日满融合。教员支持青年学生，鼓动本班同学不学日语，泉守提问谁，谁都不回答，问学生贾风，贾说：“我不会”。泉守就又发疯狂，把贾风打的眼青鼻肿。并把他锁在屋里不准回家。教员们设计，请校长刘广庆领泉守到信成和商号打麻将，把贾风放回家。从这以后，每当泉守上日语课时，教员课前领贾风到别的同年班学习。泉守问贾风到那去时，学生都说他不念了。

一九三七年，泉守入伍去打武汉，学校又来一个主事板桓和日本教员大泽。更加严控升平国民优级学校（原一完小）和全县教育界的教员、高年级学生的言行。这一年镇东县召开全县运动会，板桓、大泽控制运动会，大泽看别的学校学生跑到前面时，他硬说跑差跑道了，就给取消了录取资格。至公国民优级学校的教员牟凤池、赵丹超等鼓动学生郑风林、张信等，罢赛400公尺、800公尺接力赛。

运动会闭幕后，立即罢免至公校马裕萱校长职务，把他撵到董家围子学校当教员。一九三八年秋季的一天，北大岗日本开拓团有三名日本人到董围子初级学校找差，企图打教员。全校几十名小学生，围绕教员和他们磨蹭，他们未能得手，天要黑时才离去了。

日本侵入中国关里后，他们对学校控制手段更毒辣，一大批知识分子送到保安矫正院或思想矫正院。镇东县警务科警正日本人，逮捕了青年教员谢恩普，多次严刑拷打他，未得着半点消息才把他放出来。

一九四四年秋，喇嘛窝堡日本开拓团，横行霸道，无所不为。当地老百姓敢怒不而不敢言。有几次一个日本人光着膀子，穿三角裤衩，手拿镐把到东屏学校追逐、打学生，女学生躲藏起来。师生气得咬牙瞪眼，青年教员曹文友、付亚林、赵文等人，发动佟以仁、张恒德、魏青年等六年级大个学生。在该日本人最后一次到学校横行时，学生们一齐动手，把他按倒在地，用鞋底痛打了一顿，打得他告了饶，说出“再不来”才拉倒。

一九四五年，东屏校青年教师们反抗日帝侵略，大骂警察狗带狗棒替侵略者帮凶，丧失中国人的人格。一天夜晚，东屏警察署传拘校长马裕萱、青年教员曹文友、牛照明、方景元、冷相春，一直审问到过半夜，没问出半点口供，好险没有去坐牢和送思想矫正院。

镇东县部分青年学生在泰来伪国高读书期间，为消灭警察狗帮凶气焰，和同班同学一起，砸了泰来县大西门警察分驻所。反满抗日行为的导火线是，分驻所警察拦截学

生不准在分驻所前的城壕通道过路而引起的。警察质问王洪飞为什么走城壕，他只说“这道谁都走，也不是我先走出的。”警察不但不讲理，竟把王洪飞打了一顿。他回到学校向同学讲了。学生都很气愤，当放学时，张旭（原名张守城）、杨蓬珠等人联络大个同学去讲理。并计议：“他们不讲理赔情，就把狗窝给砸了”。到达分驻所后，张旭同几名同学堵住警察分驻所西门。尚宝金同八名大个同学到屋里讲理。警察不容学生讲理，并持枪硬逼学生“滚出去”。学生齐喊：“给我打。”一场反满抗日行动开始了。张旭手上受伤，学生用木棒把拿枪的警察胳膊打断了。同时砸了电话匣子。当一个警察从窗户逃去报告他的主子时，全班同学胜利而归回到学校。这时泰来县的伪县长、伪警察署长、学校校长、日本军事教官都来了，警察马队包围了学校。挑个大学生抓走几名，又抓了几名教员进了牢房。张旭等同学，在学校被看起来也不准回家。学校停课两个多月。几经周折，坐牢师生被释放，开除了八名大个学生，校长和几名教师，被调离了泰来国民高等学校。

伪满十四年，东北同胞处于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之下，苏联出兵帮助摧垮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大批工作队，挺进了东北，镇东县和全东北各地一样，得到了解放。爱国的青年师生，从水深火热中重见天日，解脱了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蹂躏，过上了新生活。

“八·一五”白城子光复目击记

蒋卫平

一九四五年八月，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红军从东、北、西三面，分数路大军突破东北日本关东军的防线。其中一路摧毁了日寇在兴安岭的防线，穿过内蒙，指向白城，向东北腹地进军。

当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新闻的严密封锁，人们还不清楚边境的具体战况。但从日寇频繁调动军队，抢运作战物资，撤退侨民等忙乱迹象上，已看出前线吃紧，日本侵略者的命运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

在那几天里，去白城子车站经常看到，从白城子以北败退下来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军人，他们日夜抢乘各种车辆，向东、南方向逃去；有些没有抢上车的人，就自动地汇集在一起，徒步逃亡；在溃逃的队伍里，还有一些妇女、小孩，他们抢不上车辆，便连哭带喊，更形成一片溃乱的景象。往日侵略者的威风扫地了，一个个像丧家狗一样在奔逃。那几天白城子街上的伪警察、特务腿子也很少露面了，一个个就像挨打的狗一样，躲起来了。虽然受压迫、遭奴役、做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人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喜出望外，

互相传讯。但也警惕地看到，这些侵略者虽然失败了，但还是有组织的，他们手中还拿着杀人的武器。狗急了是要咬人的，谁知这些豺狼在灭亡之前会制造出什么杀人的名堂来。人们一方面在悄悄的议论着；另一方面也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八月十四日傍晚，西北方向传来了轰隆的炮声，苏联红军打过来了。当夜，苏军的炮火轰击了大青山飞机场后不久，隆隆的坦克声，各种奔驰的车辆声，象潮水一样，向东方涌去。人们上望满天的星斗，远看各种数不清的军车的灯光，相互映衬，如同银河降落到了人间。全城人民彻夜不眠，洋溢着一派喜悦的气氛，侵略者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就要被砸碎了，白城人民就要解放了。

翌日凌晨，全城沸腾，白城街内的人们涌上街头，欢呼雀跃，互相倾吐解放了的心情。更有一些人，不顾战乱后的生死，手持木棍铁器等应手家什，去伪宪兵队、县公署、警察署……，去寻找还未来得及逃走的日寇，以发泄十几年来的积恨。我也拿着一把大铁锹，加入到这支战斗队伍里。

上午，从城北逃来四名携枪的鬼子兵，城内立即喊声大振，“这里有鬼子！”“鬼子在这里！”“不能让鬼子逃跑了！”各胡同里又涌出一些手持家什的群众，向喊声所指的方向奔去。虽围攻的群众很多，但却没有人敢靠前，鬼子也没敢放下枪。在追赶途中，几个鬼子还背靠背地几次端着刺刀向围攻的群众冲杀，他们一冲杀，人们就向后退一下，他们一走，人们就往前赶，鬼子始终未能占着便宜，由于追

赶的群众缠着，他们也不能快走。人们越聚越多，把鬼子逼到福丰达烧锅西边路北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店里，并紧紧地包围起来。人们互相喊话，“要注意那边！”“不能让几个鬼子跑了！”群众的喊声、怒骂声，嘈杂一片。几个日本鬼子没能跑出来，围着的群众也不敢冲进屋里去，就这样相互对峙着。

近晌午的时候，苏联红军驾着几辆坦克从白城子西街开进城内，这时人们公推一位姓杨的回回向苏军喊话。杨回回会说几句俄语，他跑到战车前，向苏军喊了几句俄语，这时战车立刻停下来，从战车上下来三、四名红军，端着轮盘枪，砸开了这商店临街的窗户，跳上窗台。这时只听几声惨叫，窗台上的士兵立即倒在窗外。包围着的群众以为是鬼子冲出来了，便蜂拥而上。当人们冲到跟前一看，方知几位苏军战士全被刺成重伤。有的肠子已经流出，一面抽搐一面呻吟；有的虽在蠕动，但已濒临死亡，鲜血染红了一大片土地。人们方知这几个鬼子就待避在屋内的窗台下面。为着抢救这几位受伤的红军战士，都置身危险于不顾，抢着把倒在地下的战士用手托起来，擎到战车上。

这时，从战车上又跳下来数名红军战士，互相喊着话，遂将后面拖着的炮车摘下来，对准躲藏鬼子的房屋，开始炮轰。每当要发射一发炮弹时，人们就向两侧跑开，炮响后，又立即跑回现场。前后共打了十三炮，将那几间房子几乎炸毁，也没有听见鬼子的叫声，更没有看见鬼子的尸体。之后，红军战士端枪向里面扫射，也没有看见鬼子的回击枪声。这时有个围观的群众，在东墙外往这个院里探

头看望时，即被躲在院里的鬼子兵射伤。

鬼子的枪声一响，暴露了他们隐藏在防空壕内，红军战士便直奔防空壕冲去。当鬼子兵跳出防空壕向北拼命逃跑时，立即被红军战士的揍腚枪，一个个地打倒了。这场战斗结束后，人们翻了这四个鬼子的衣兜和子弹夹，发现只有几颗子弹了。

鬼子打死了，人民胜利了。群众对苏联红军怀着由衷的感激心情，一再高呼，“中国万岁！”“苏联万岁！”“红军上高！上高！”有的市民还与红军拥抱在一起。当晚全城彻夜灯火辉煌，鞭炮齐鸣，欢声笑语，通宵达旦，人们完全沉浸在喜庆的气氛中。

抗日战争四十年过去了，“八·一五”光复时的情景历历在目。回忆伪满十四年亡国奴的日子，使我更加缅怀烈士陵园内安葬着的为白城解放而捐躯的那几位苏军烈士。

伪满时期民谣

伪 满 洲

高利贷，驴打滚。
出荷粮，人扎嘴。
配给布，麻袋腿。
配给油，兑凉水。

经 济 犯

大过年，过不安，
特务鬼子挨家翻。
翻大米，翻白面，
翻出就是经济犯。

八 大 恶

满洲国，八大恶，
警察、宪兵、动员科，
防疫班、“协合坏（会）”，

同垦会、努图克，
再加一个兴农社，
一个更比一个恶。

十四年东北苦难当

秋风凉，草儿黄，
十四年东北苦难当，
思想起来好悲伤。
鬼子凶又狠，
就象活阎王。
抓劳工，要“出荷”，
捎带“报国粮”，
黎民百姓遭了殃。

伪满劳工叹

穷人当劳工，开到黑河省，
挨打挨骂累得把病生。
累死也无功啊！
老乡们哪，累死也无功啊！
劳工得了病，无人来照应，
无人抓药无人请先生（医生）。
躺在劳工棚啊！

老乡们哪，躺在劳工棚啊！
妻子不得见，父母不相逢，
想要见面除非在梦中
两眼泪盈盈啊！
老乡们哪，两眼泪盈盈啊！
吃的橡子面，住在茅草棚，
又病又饿死在劳工棚，
无人把信通啊！
老乡们哪，无人把信通啊！

伪满穷人叹

吴杰平收集整理

中华民国二十年，
日本鬼子来侵犯，
数十万军队不抵抗，
三千万人民落入泥潭。

刺刀下成立“满洲国”，
人民苦处对谁言。
当了亡国奴怎能甘心，
思想起来谁不心酸。

有钱人家吃饱饭，
穷人冻饿受饥寒。
地主恶霸常欺压，
军警宪特更凶残。

穷人没有房和地，
只靠卖身度时光。
起早贪黑拼命干，
外债累累压在肩。

有钱人家把年过，
穷人过年打转转。
有钱人家过年欢天喜地，
穷人过年眼泪汪汪。

只想能过团圆日，
哪料想抓劳工又遭殃。
有钱有势他们不要，
单抓穷人卖身郎。

沉重的煤篓压背上，
四肢朝地不见天。
稍有一点儿行动慢，
工头的鞭子抽在肩。

要是得了时令症，
躺在工棚更凄惨。
穷哥们对此没办法，
无药无钱帮不上忙。

日积月累病体重，
眼看小命见阎王。
抛下家人谁来管，
老母妻儿饿肚肠。

侥幸逃出阎罗口，
拖着病体回家园。
苦度岁月何时满，
苍天怎不睁眼来看看。

封面题字：曹伯铭
封面照片：高玉田
封底篆刻：张禹海
封面设计：郑连宇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 9906011 号
印刷:白城市委机关印刷厂
工本费:11.00 元